



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思想集 (2009-2018)

中国基金会70年大事记 (1949-2019)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策划：中国基金会档案馆

总编：吕全斌 谭红波

执行编辑：洪峰 史成斌

校稿：刘丽琴 任广阔 邵燕 孙祥腾 徐文硕 杨鑫 赵燕

美术编辑：唐瑞娟

中国基金会档案馆介绍：

保存历史资料、积累行业经验、开展相关研究等是公益行业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自 2019 年起开始筹备“基金会档案馆”项目，旨在搜集 1949 年以来以中国基金会为主的公益行业历史资料，抢救珍贵史料，记录历史当下，整合公益资源，搭建共享平台，为未来国内外研究公益行业发展做好积累和基础工作。

让档案见证公益，希望与您携手同行。

扫描二维码了解档案馆详情：



电话：18911224664 010-64299290 邮箱：mishuchu@cfforum.org

官方网站：www.cfforum.org 微信公号：CFF2008



此为内部读物，如发现有印刷、装订、内容等质量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编 / 者 / 按

公益慈善事业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变，慈善在国家管理体制中一度被污名化，前进道路坎坷，情势跌宕起伏。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40 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我国的慈善事业历经解冻、复兴到蓬勃发展。作为慈善组织形式之一的基金会，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可喜局面。

1981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诞生；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2016 年，《慈善法》正式出台；……如今，我国的基金会行业进入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截至 2019 年 9 月底，中国基金会总数达 7399 家，2018 年末净资产总量达 1378 亿元，2018 年全国基金会捐赠收入为 487 亿元。基金会已经成为接受社会捐赠资源的主体，其话语权、影响力与日俱增。基金会行业正在通过公益慈善的途径，阐释和实践自己对美好社会的理解。

为加强中国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使基金会行业成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力量，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前身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应运而生，并且坚持每年举办一系列行业活动。其中，年度盛会（简称年会）是品牌项目之一，它为全国的基金会和其他公益组织搭建了集中交流、思想对话、务实合作的高层次平台。十年来，许嘉璐、蒋正华、李金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出席年会并讲话；徐永光、俞可平、何道峰、康晓光、杨平等资深公益人士、专家学者多次参与并作演讲。截至目前，基金会论坛共举办 10 届年会，累计 2600 多家机构、6000 多人次参会。

2019 年，基金会论坛年会进入第 11 个年头。为响应今年年会“坚守初心、共谋发展”的主题，基金会论坛秘书处精编了前十届年会留下的 60 余篇重要讲话、精彩演讲和独到发言，形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思想集（2009-2018）》，以飨读者。这些文稿是年会活动宝贵的知识产出



和智慧结晶，而思想集是对这些思想储备的梳理和再完善，旨在展现行业发展多维度、多面向的声音，记录中国基金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实践与思考。

2019 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基金会论坛秘书处在原基金会简史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丰富形成了《中国基金会 70 年大事记（1949-2019）》，作为附录呈现给读者，旨在与每一位关心中国社会建设、公益慈善事业和基金会行业发展的同仁，共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公益慈善事业和基金会行业的兴起、发展、曲折与趋势。

以上两部分成果的出炉，得益于很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基金会论坛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为思想集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慈善蓝皮书》为大事记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此一并感谢。特别要感谢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和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对思想集印刷的资助。

因时间和能力所限，文中稿件难免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并指正。冀望您与我们一道，持续完善中国内地基金会的发展历史与思想果实。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

2019 年 10 月 1 日

备注：

- 1、文中演讲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工作职务。
- 2、文中演讲嘉宾提及的“论坛”如无特殊说明，多指当年年会。
- 3、文稿排序多按当年年会嘉宾发言顺序而定。
- 4、文中稿件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略有精简，部分稿件未经本人审阅，难免疏漏，不吝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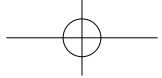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目 /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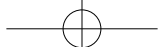
■ 2009 年：使命、责任和希望——成长中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	9
孙伟林：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09 年会上的致辞	10
徐永光：使命、责任和希望 ——《2008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概要	13
金锦萍：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为了散财	18
杨 平：公益机构供给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及解决之道	22
康晓光：未来的核心议题——企业与第三部门的发展	25
李 劲：做令人尊敬的基金会	28
■ 2010 年：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项目成效	30
杨 岳：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0 年会上的致辞	31
潘江雪：自我约束和有效披露是基金会的道德基础	33
冯 仑：要求所有企业家都“裸捐”将非常不幸	37
康晓光：公益组织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比国企还严重	41
圆桌对话：非公募基金会“不差钱”与草根“就差钱”	44
■ 2011 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	51
许嘉璐：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1 年会上的讲话	52
孙伟林：民政部将加强对非公募基金的扶持和监督	54
圆桌论坛：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56
圆桌论坛：非公募基金会的困境与突破	59
焦自伟：慈善需要宗教，宗教也需要慈善	62
郑筱筠：宗教公益慈善事业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效突进	64
■ 2012 年：财“劲”其用，追求卓越	67
刘忠祥：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 年会上的致辞	68
朱健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最佳资助实践的案例、启示及建议	71
姚晓迅：基金会官方背景的“罪”与“罚”	74
洪 波：民间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的合作	76
刘小钢：资助的力量—非公募基金会资助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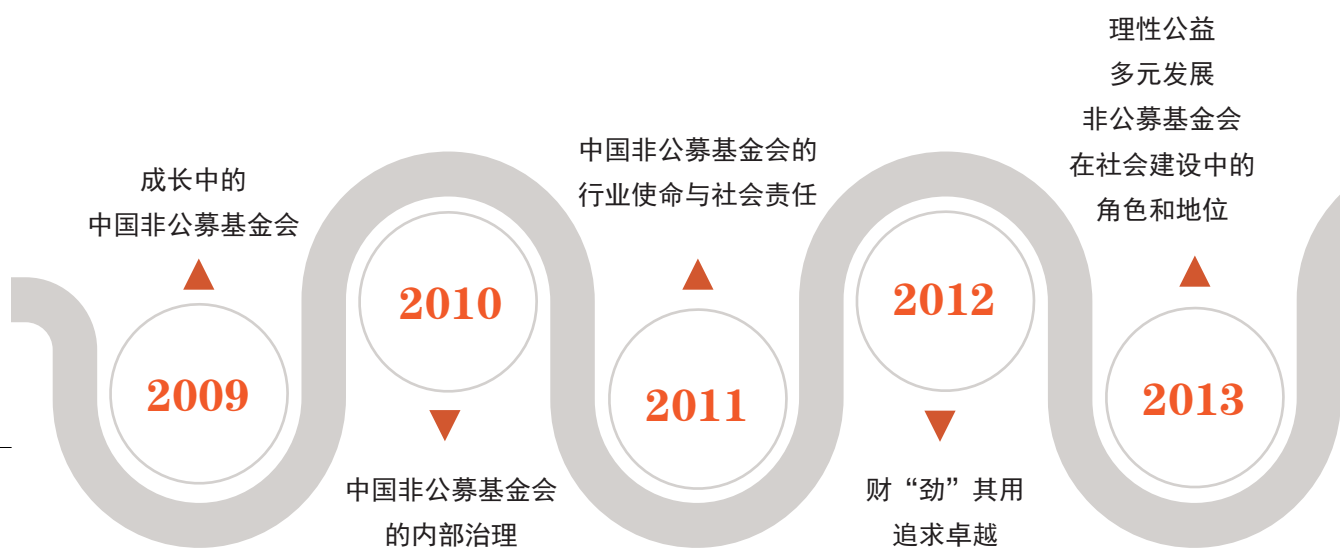
何道峰：稚嫩的肩膀，沉重的使命	83
■ 2013 年：理性公益 多元发展	89
蒋正华：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3 年会上的讲话	90
李金华：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3 年会上的讲话	93
沙祖康：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96
康晓光：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98
吴静钰：践行体育公益，呼吁更多冠军加入公益行业	100
卢德之：顺势而为，谋定而动	102
■ 2014 年：超越·共识——大互联时代非公募基金会的转型与发展	106
马 昕：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4 年会上的致辞	107
高端对话：家族财富的传承之道	109
刘 涛：《中国基金会资助行为及状况调研》阶段成果发布	113
余佳玥：00 后的未来公益之路	116
■ 2015 年：非公募基金会的人才素养与根基培力	118
廖 鸿：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5 年会上的致辞	119
胡小军：公益人才培育的战略和发展方向	122
文 运：传统文化智慧于公益之思考	125
师曾志：时代变迁中的互联网与公益	127
专题论坛：女性公益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	130
■ 2016 年：新格局 新想象	133
刘振国：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 年会上的致辞	134
彭艳妮：公益发展的三大新趋势	136
杨 晔：基金会如何与私营部门求同存异创造共享价值？	138
薛 澜：国际格局的演变与社会领域发展的新格局	140
马庆钰：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空间	143
李小云：中国公益的新使命与挑战	147
王行最：中国公益的新格局和新想象	149
徐永光：公益慈善组织不要妄自菲薄，要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	154



■ 2017 年：新价值 新生态	157
俞可平：基金会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158
朱卫国：数据智能与公益未来	163
胡广华：基金会要“名符其实”	167
刘选国：新时代中国基金会国际化的契机与路径	170
阿克曼：中国社会组织与国际联系的观察和建议	173
叶祖禹：陪伴公益路上的温暖与力量	175
李劲：合力是公益最后能够成功的基本要素	178
■ 2018 年：拾年—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	181
何道峰：社会转型期，公益更应关注培育人的现代性	182
朱永新：社会转型，让公益人看到行动的力量	186
秦 晖：以志愿求公益，与现代政府和文明市场共同成长	188
杨 平：剧变的时代，艰难的使命，中国公益任重道远	196
潘江雪：会适应、会等待、好运气——公益组织如何优雅地活下去	203
贾西津：转型背景下看公益发展的“冷暖色调”	205
金锦萍：十年一梦还是十年一剑？	208
徐永光：慈善不能靠国营，中国需要良性的慈善生态	216
■ 附录：中国基金会 70 年大事记（1949-2019）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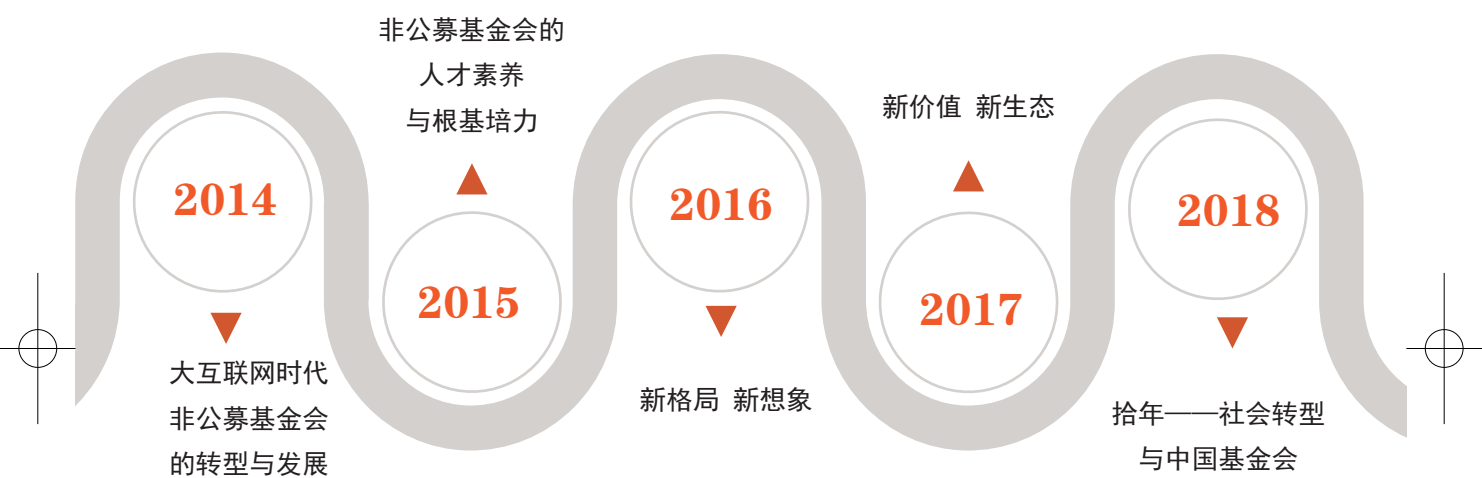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历届年度盛会



年会已连续举办 **10 届**



累计参会人数 **6000+**



累计参会机构 **2600+**



累计参会媒体 **300+**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思想集 (2009-2018)



2009 年会

主题：使命、责任和希望——成长中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

2009 年 7 月 2 日至 3 日，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第一次大聚会、大展示、大联合。出席本次年会的人员总数近 500 人，非公募基金会达 110 多家，公募基金会 10 余家，境外基金会及国际组织 10 余家。年会还邀请了 20 余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40 余家服务类公益组织、10 家工商企业和 40 余家国内媒体。会上发布了《2008 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自律宣言》。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09 年组委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09年会上的致辞

孙伟林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今天，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我国公益领域的一件大事、喜事。民政部对这次论坛非常重视，孙绍骋副部长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出席论坛开幕式。在此，我代表民间组织管理局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中华民族具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但作为慈善组织形式之一的基金会，1981年才在我国出现。2004年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类，明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律地位。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企业和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捐赠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还可以自己的名义命名，这为他们投身公益事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极大调动了捐赠积极性，鼓励了民间公益慈善行为。

按照立法原意，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民政部门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

展一直持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

一是给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相比于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设立的门槛低，在名称、业务范围、公益支出比例、人员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比较宽松。

二是帮助解决设立遇到的困难。双重管理体制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业务主管单位是指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来说，由于业务范围往往比较宽泛，民间色彩也比较强，有时难以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是业务涉及民政所主管的社会福利、慈善等领域的非公募基金会，民政部和地方民政部门都积极承担了业务主管的职责。

三是争取税收上的优惠。2008年底，民政部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对基金会和公益性社团申请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政策予以明



确，由过去的特批变成普惠，今后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一样，只要满足条件都能获得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人是很大的鼓励。新设立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捐赠也可享受所得税前扣除，提高了企业和个人设立基金会的积极性。此外，我们还配合研究非营利组织，包括非公募基金会本身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四是注重引导和培育，各级民政部门很重视对非公募基金会工作的指导，不仅利用年检、评估来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为进行引导，还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研讨，促进非公募基金会的交流与进步。

自《条例》实施以来，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1597个，比上年增长19.2%。其中，非公募基金会643个，2005年底这个数字只有253个，现在是2005年底的2.5倍。非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的比例已经超过40%，有些已经在公益领域崭露头角，同时非公募基金会的类型不断丰富，企业和个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意愿持续上升，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灾慷慨捐赠后，很多企业进一步思考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模式。

虽然2009年我们遇到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但还是有不少企业和个人捐资申请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这充分说明非公募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是源于社会的内在动力，是社会走向成熟的结果。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仍处于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与社会要求和民众期望还有很大距离。比如，有的资金量偏小，难有作为；有的和捐赠企业绑得过紧，商业色彩浓厚，公益性不足；有的缺乏活力，开展活动较少；有的缺乏合理定位和规划，不会做公益，不善于和其他组织合作；有的变相公募；此外，还普遍欠缺内部建设，缺乏专业人才。

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非公募基金会本身对公益道路的探索仅仅是开了一个头，相对于我国日益多样化的公益需求和不断增长的公益意识，全社会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期望日益增强，非公募基金会必将大有作为。

非公募基金会自身，包括所有志在通过非公募基金会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组织和个人，应当坚定信心，积极探索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成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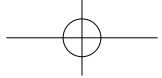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路：一方面学习国外公益慈善组织成熟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入商业运作的成功经验。

作为登记管理社会组织和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府部门，民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今后将进一步推动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改进双重管理体制，鼓励设立非公募基金会；加强监管，督促非公募基金会遵守章程、履行职责，为公益慈善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帮助指导非公募基金会加大公开透明的程度，提高社会公信力；为基金会的发展争取更多的优惠措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增加税收优惠等。

我们还要探索为非公募基金会的沟通搭建平台，介绍国内外先进经验，增进基金会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合作交流，支持基金会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另外，我们希望非公募基金会扩大与其他类型公益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加强对基层公益慈善机构的资助与支持，培育公益合作伙伴。

这次，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八家社会组织共同发起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百余家非公募基金会济济一堂，是我国非公募基金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聚会、大联合，来参加论坛的多是行业的中坚力量。年会既安排了优秀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的演讲报告，又组织了不同类型的对话和项目交流，充分考虑各方需求，必将会有丰硕成果。

希望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建立基金会自律和行业互律机制，促进非公募基金会之间以及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引导并推动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使命、责任和希望

——《2008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概要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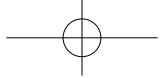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继续迅猛发展，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使中国民间公益的一支新生力量——非公募基金会得以破茧而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为增强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公益事业，帮助困难群体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开辟了新途径，对于公民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非公募基金会叩开了民间力量设立基金会的厚重大门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金会都带有很强的“官办”色彩，只有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才有设立基金会的可能，个人或企业想成立基金会因制度缺位而无法如愿以偿。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与公募基金会相比，《基金会管理条例》和相关政策对非公募基金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积极态度，在基金会的名称、登记条件、负责人任职资格、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宽松，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身公益事业。

自 2004 年以来，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截至 2008 年底，全国各级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达到 643 家；其中，地方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有 604 家，占总数的 94%，成为非公募基金会的的主力军。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的发展正处于起飞的初级阶段，可以预期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将是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高潮期，这与世界上各国基金会的发展规律基本吻合。

可见，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突破了只能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设立基金会的制度屏障，叩开了民间资源设立基金会的厚重大门，开辟了以民间资源设立慈善组织的一片蓝海。



二、非公募基金会优化慈善资源配置，改变了民间公益发展生态

我国的公募基金会已经有 20 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些基金会的资金筹集、善款使用和日常管理等方方面面，难以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民间捐赠的使用往往与政府的财政资源混在一起，这种混同导致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功能过强，慈善捐赠最终无法体现民间公益的地位和作用。这既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大势不符，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生长发育，消减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生产力。

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崛起无疑是改变民间公益生态的一大举措。非公募基金会可以自主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成为补充政府职能缺陷的有生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慈善资源将更多地流向政府系统所未能覆盖的区域和领域，成为民间公益服务机构（俗称“草根组织”）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民间公益发展的生态。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在 2008 年的表现可圈可点，无论是面对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还是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全面发展，都表现出反应迅速、勇于担当、援助独到、以少博多、项目多元、匠心独运等特征，真可谓是“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职责和使命，诠释了社会组织价值和理念，提升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形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褒扬。”

通过对非公募基金会宗旨和活动领域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扎堆于传统慈善领域，公益项目的设计也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把握和远瞻，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在资金使用上还比较粗放。

三、非公募基金会在独立性和治理结构上的制度障碍已经突破

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体现在其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创办者的社会性格。基金会章程确定的宗旨使命是其灵魂所系，确定的治理结构是其骨架所在。

基金会和一切民间组织的独立性要求其理事会依据法律和章程，通过治理结构所确定的议事规则独立自主地决定组织的各种事项。然而，非公募基金会出现之前，我国的“官办”基金会因其与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



的联系，难以保持其独立性。

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没有“官办”基金会的先天不足，它们与政府之间没有财产上的纠葛，也无人事上的交错。《基金会管理条例》为非公募基金会确保其独立性并实现以理事会为决策核心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制度的“先天”优良条件并不意味非公募基金会的“后天”发展必然健康。一些非公募基金会无论在人力资源、办公场所，还是在资金来源上，对创办者有着浓重的依赖关系，有的是直接由公司员工兼任基金会管理职务。与公募基金会相比，非公募基金会保持其独立性并无制度障碍，但从现实状况看，相当数量的非公募基金会连形式上的独立都不具备，理事会形同虚设。这是值得业界特别注意的严重问题。

四、非公募基金会是培育民间公益理念、实现个人公益理想的上选途径

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在合法前提下，对于基金会宗旨和使命的确定具有完全的意识自治。非公募基金会摆脱了基金会原有的浓重官方色彩，在运作管理上更为灵活和现代，对于公益目的的贯彻更为独立和独到。它们确定自身宗旨与使命，完全建立在创办者对于中国现实的判断之上，是融合自身对于公益事业和美好社会目标的理解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可以充分体现基金会在价值追求上的多元。

宗旨和使命是非公募基金会的灵魂所在。非公募基金会创办时就应当明确宗旨和使命。从目前登记注册的情况来看，我国非公募基金会所确定的宗旨较为单一，大多集中于教育事业和弱势群体扶助方面，其他诸如公共政策倡导、公共安全研究、社区发展、艺术促进、环境保护等领域则鲜有涉及。

五、非公募基金会业已成为企业持续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组织形式

以非公募基金会的组织形式从事公益事业，完成了企业捐助的质的飞跃。企业从被动的、临时的、随意的、以突发事件为主的捐助，走向主动的、长期的、独立的、系统性的、有规划的捐助，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形式，不仅有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和公益理念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使大量谄



熟现代公司治理和市场营销专业知识的人士投身公益领域，势必对原有的公募基金会构成挑战和竞争，促使基金会的优胜劣汰和行业的整体发展。

从财产来源分析，非公募基金会的后续捐赠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靠创办者和理事会成员的捐助。不少非公募基金会希望借鉴国外私人基金会的成功经验，以自身资金投资收益维系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但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国家相关税收政策需要进一步明确，即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投资收益继续用于公益事业一概予以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专业人才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六、非公募基金会能力吸纳大量专业人士，改变慈善领域人才匮乏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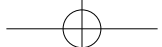
非公募基金会出现之前，“官办”基金会因其行政化倾向，缺乏吸引优秀专业人才的机制，中国民间公益慈善领域人才极度匮乏。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大多为营利领域的成功人士，积累了丰富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发展规划、资金运作、机构治理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具有将这些知识、技术和管理智慧运用到慈善领域的条件与主动性。非公募基金会会有条件以接近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薪酬待遇，吸引大批知识结构新、综合素质高的专业人才，这将对改善民间公益领域的人才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目前非公募基金会行业对于提高机构专业化、管理人员职业化水平的意识远远不够，从业人员普遍缺乏公益领域的从业经验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人才匮乏仍然是制约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障碍之一。

七、社会认知度逐渐提高，公信力面临更大挑战

非公募基金会随着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随着公众公益参与热情的提高，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质疑之声也日盛。非公募基金会需要通过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建立自律机制来提高公信力。

信息公开是非公募基金会主动承担社会问责的体现。除了根据政府法规要求公开必要信息和内容之外，非公募基金会还应选择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但是从这次发展报告收集的信息来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不习惯于将自己透明化，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没有机构网站和网页，



甚至专家小组的问卷调查也遭冷遇，下发的几百份问卷仅仅回收二十多份，回收率之低在社会调查中实属罕见。

总之，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涌现，对于促进我国公益事业发展、改变慈善事业体制格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性作用，将背负起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但其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有些来自处于特定历史阶段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有些来自现有制度方面的掣肘，更多的是我们该躬身自问：在制度闸门已经打开、相关鼓励扶持政策也相继出台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十分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籍本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召开，业内同仁通过交流沟通，探讨合作发展，将进一步深刻了解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任重道远，定能自觉担当，自律慎行，不辱使命，努力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谱写辉煌篇章。



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为了散财

金锦萍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目前非公募基金会在已登记社会组织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其资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显得微不足道，但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所赋予的使命、价值和责任，已经远远超过这些数据本身。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中，这种制度创新具有慈善史上划时代的意义，非公募基金会所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

公益事业或者慈善事业，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西方社会曾经兴起一场叫“科学慈善”的运动，当时工业化、机器化大生产造成城市工人失业，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城市贫民数量剧增。由于慈善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共福利、改善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的一种机制，对于慈善的批评之声也就日益尖锐。例如，认为慈善只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表层，无法从根本上纠正社会病态；认为慈善甚至会使贫困者更加贫困，因为他们已经依赖于他人的恩赐；认为志愿性的、非专业性的慈善管理会造成浪费、重复和低效率。这些批评对慈善提出了更高要求，意味着慈善必须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更为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转型。

科学慈善运动要求将科学的专业知识、组织管理和策略注入到慈善领域，要求慈善必须吸纳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参与管理，要求慈善必须透过现象本身关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试图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变革是根本性的。这场运动使西方的慈善事业大有改观，慈善的含义变得更为宽泛和灵活，让我们看到应急性、暂时性地缓解困苦的传统慈善，逐渐转向具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现代慈善，慈善事业逐渐吸收科学化的管理和运作，将系统化的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慈善领域。在这个活动中，人的理性高扬，慈善成为人类应用理性去主动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之一。从那场运动开始，慈善逐渐趋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慈善在各种自然灾害和紧急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激发了人们的爱心，但几乎同时也引发了大量质疑。例如，对于未经慈善组织作为中介、直接由捐助者帮助受赠者而导致的纠纷日益增多，对于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和从业人员素质的质疑，对于慈善组织善款去向的质疑，对于慈善动机的质疑，对于现行慈善制度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乃至税收政策的质疑，这些质疑有些是蛮不讲理的，但需要我们及时作出回应。我国的慈善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转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恰恰就是慈善转型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中国慈善事业也逐渐地从临时性的——对于慈善受助对象的直接资助，转为设立基金会进行长期的、有规划的慈善事业，表明中国的慈善已不再满足于捐助行为本身，更想通过慈善这个途径，去阐释和实践自己对于美好社会的理解。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是慈善组织化的体现。传统慈善更多的是捐助者对于受益人的直接帮助，或者通过现成的慈善组织进行捐助，与此不同的是，科学慈善运动所出现的是大量的私立机会，比如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基金会经过几十年乃至百年之久，尽管其创办者可能已经先去，但是基金会却依然按照原先设立的宗旨在不断运行，慈善的组织化使财富的拥有者得以设立永续性的、纪念性的基金会，以超越他本身的生命周期，持续致力于某种慈善目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自从小洛克菲勒担任第一任会长以来，目前已经是第五代来做会长，但其名称依旧、初衷不改。

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自 2004 年以来，正经历快速的发展期，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产规模上，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些都显示着富裕阶层对于社会公益的关注和投入，凸显了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反哺社会的热情和梦想，正通过这种组织形式逐步实现。如果说慈善的组织化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将是慈善的专业化和制度化，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只是实现了慈善的组织化，如何去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如何去营造良好的



制度环境，这些将是更为深入的问题。

但是关于制度，我只想重复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让基金会成为可能的制度和体制都是值得维系的，但是非公募基金会如何可能成为百年老店？商界里的成功人士能否在慈善领域继续成功之旅？当市场机制在慈善领域无用武之地时，我们依靠什么来凝聚和激励我们的团队？依靠什么来判断我们是否成功？用什么来保持基金会的初衷？如果缺乏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正确定位，这些都是疑问，甚至会转化成质疑。

尽管按照立法原意，非公募基金会并非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劝募活动，只是不能向不特定公众进行募集。但从更纯粹意义而言，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为了散财，而非聚财，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可能是对非公募基金会创办者最好的写照。但是，即使给予也没有比获取更为容易，这是因为：

第一，非公募却要公共、公益。非公募基金会的财产，尽管依然要实行一个私有制上的或者法人的所有权，但是被赋予了一定公共目的的限制，要符合社会公益的检验。私人的资产通过这种公益的限制，被赋予一种公共责任。公共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宗旨选择、资产使用等方面，势必会影响公共领域，这也是它应当承担起公共责任的原因所在。

第二，非公募却要公道、公平。有人非常形象地描述基金会，他说基金会是什么？就是被一大群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团团包围的一大笔钱，如果没有成立基金会，如何处置财产本身是属于意识自治的范畴，可以赠送给任何你喜欢的或者甚至你讨厌的人，但是一旦设立了基金会就不能随意确定受益人。在基金会的宗旨范围内，在众多需要救助的人群里，我们必须体现公平和公道。公益项目需要通过一定的公开竞争方式来进行，需要向公众说明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变成受益人，需要有程序来筛选受助对象，需要追踪、监督和评估公益项目的运行。一位智者曾经说过，财富的捐赠绝对不能使受益者更加堕落或者进一步陷入贫困，因为赖行不施比吝啬本身更为罪恶。

第三，非公募却要公开、公众。未设立基金会之前，完全可以用隐私



权来对抗所有对你私有财产有好奇心的人，但是既然设立了基金会，关于基金会的财产状况、善款使用、公益项目运行等情况都要向公众公开，因为向公众公开本身就是公信力的必由之路。目前我们发现，本应该阳光透明的非公募基金会中，有很多组织我们无从获得信息，网络、期刊、报纸、登记管理机关的网站、雅虎、Google、百度、电话、短信、问卷调查，所有能想到的方法，我们都用了，有成效吗？不是没有，但成效不大。希望今后信息的获得能够变得越来越简便。

第四，非公募却要公心、公信。公心，心灵之心，意味着即便是一个小小的非公募基金会，也要胸怀天下、天下为公。公心意味着从事慈善的人，尽管是凡人，但却要具备涉公的气质和宽厚，公心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们，即便你们是高端志愿者，不收取分文报酬，但也要保持良好品行，不能与基金会的利益有任何冲突。公信，信任之信，是基金会的生存之本，公信源于非公募基金会问责的需要，既然基金会以公益自居，就必须让公众相信这一点。公信意味着基金会获得公众的信任，也终将获得公众的支持。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志愿者、优秀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项目、优秀的社区、优秀的社会，没有公信也就无从谈起。行善的确是一种美德，但是理性科学的行善是更大的德行。我们坚信，慈善不仅仅关乎心灵，更关乎理性与智慧。



公益机构供给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及解决之道

杨平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导致社会捐赠井喷式增长，志愿者队伍、公益机构各种援助项目，也出现井喷式增长，然而与此同时，公益机构和社会捐助项目的作用却并未同步增长，灾后一年无组织的志愿行为已基本结束，以组织形式坚持下来的公益行为也大面积退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的救助与灾后重建高效并迅速，创造了世界救灾史及灾后重建历史的奇迹。导致社会公益组织上述情形的突出原因是专业能力与组织能力不足，不能为灾区提供及时有效的公共产品，尤其无法提供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特定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成为灾区政府和灾民的某种负担。回顾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

我们大致可以将公共产品分成两类：一类是专业化程度不高的产品，比如说宣传、动员、救助、维权；一类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如环保、教育、研究、灾后重建等。凡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公共领域，社会公益组织可为的空间很小，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社会公益组织的生产和发展，其根本的意义在于提供政府能力及特性不足以完成、企业因无力而不为的公共产品，使得社会能够在自治的情况下完成社会建设，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支撑并相互制约的良性结构。如果社会自组织力量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提供与政府和企业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社会自组织力量的发展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首先是专业能力不足。以汶川大地震救灾为例，某地区灾民点安置急需公共厕所和洁净水的供应，中国救援组织和志愿者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解决，当时来自英国的志愿者，迅速按救灾安置点人数和地理位置，测算出所需厕所数量和每天的饮水量，迅速展开了工作。再以发展类项目为例，某家发展组织为推动当地替代产业，组织农民与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奶牛饲养业，其全过程都有利益相关方的介入，是参与式发展的典型案



例。但经过专家评估，认为农民合作社的奶牛饲养，在技术上存在重大缺陷，牛奶的疫病防治、牛奶的含菌量无法控制，经过三聚氰氨事件之后，这种粗放的奶牛饲养业被证明是无法持续的。

专业能力的不足是社会公益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缺乏有效的公共产品模式和创新能力。各家公益机构在面对不同的公共问题时，缺乏创新和研发产品的能力，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长时间不见效果。中国的公益机构很少出现独创性的产品，比如孟加拉国尤努斯先生的小额贷款这种创新模式，就很少出现。

第二是缺乏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产品。一个机构往往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现在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是中国的公益机构大都去解决综合性问题，由于专业能力和专业分工不足，迫使公益组织要同时解决公共问题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导致产品粗放，社会效益不佳。

第三是专业人才缺乏。公益组织人才市场尚未形成，加上专业能力和专业分工不足，导致公益组织无法按照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模式只能向综合性、复合型的人才转变，由此出现人才进一步短缺的恶性循环。

第四是缺乏公共产品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虽然有大量资源投入到公益组织的公共产品生产中，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益却缺乏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以二氧化碳减排为目标的环保项目，其与减排的实际成效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以扶贫为目标的发展项目，也难以将项目成果与其他因素进行量化比较和统计，这都是专业能力不足。

其次是组织管理能力不足。我们发现，中国公益组织人数规模发展到百人以上的，少之又少。其突出原因一个是治理能力。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理事会秘书处的权责关系，以及理事会不同成员的权责关系，一般民间性的公益组织，在治理结构上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理事会形同虚设，导致组织资源无法扩展，同时也导致内部治理缺乏监控和制约机制；二是理事会资源优势替代秘书处，在不成熟的民主机制下，形成多头指挥、



内耗增加、效率低下、治理不佳的局面。再来是管理能力。其一是战略管理能力，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人力与无限的事业空间、无限的热情之间，普遍缺乏战略目标的制订，以及将资源和人力投入一个目标的能力。其二是产品生产流程的粗放化问题，由于公益组织产品往往专业性不强，在产品生产的组织分工、流程设计等方面不专业，成本高、耗时长、产出低，其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完全无法与同类型商业组织相比拟。

中国公益组织公共产品供给及创新能力不足的形成原因很多。第一是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由于登记注册门槛过高，导致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缓慢，发展历程短，人才难以聚集，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其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自然偏低。第二，当代社会面临大量复杂的公共问题。今天很多问题是人类过去很少遇到的，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产品大多处在创新探索阶段，有效的公共产品模式很少。在黑暗中摸索付出的代价将十分巨大，因此鼓励创新型公共产品的出现，应该是社会公益组织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另外，社会公益组织对于公共产品研发和产品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是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未来的核心议题——企业与第三部门的发展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

最近几年，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第三部门开展公益活动，其背景首先是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财富的积累使得一大批资金雄厚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始出现，与此同时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的不平等也广泛出现，穷人、弱势群体这些概念开始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新一届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关注，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关注。再者就是当前舆论的压力。当然，很重要的还有企业家和企业本身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利益，越来越会寻找一些更成熟的谋求发展的战略。

影响中国第三部门和公益事业发展的有四种重要力量：海外的力量，政府的影响，企业部门的影响，本土的历史文化。三年前可以说，只要了解政府和海外的因素，我们就可以解释和预测第三部门的行为。但是在今天和未来，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企业的态度、策略和行为，才能更好地描述、解释和预测第三部门的发展。企业，已经成为影响第三部门发展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企业参与第三部门的形式丰富多样，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直接捐赠。捐赠有的是偶然性的，有的是经常性的，比如在企业内部设立基金，有的是简单的捐赠，有的是深入的参与。还有资金之外的方式，鼓励员工作为志愿者来参与公益行动。再一大类是设立专职的部门，比如企业内部设立基金，成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等。还有一类是组建 NPO，有项目型的，专门围绕一个或一两类项目开展活动；有能力支持型的，包括从理念、专业、技能和资金上提供支持；还有成立各种各样的公益基金会，像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等，都非常典型；再者就是成为一个联合体，阿拉善生态协会就是民营企业家的群体，组成一个类似俱乐部，也是正式注册的。

第三部门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就是正在迅速成长的非公募基金会，但发展也高度不平衡，有的发展非常好，像南都、友成，扎扎实实在做工作，



还有很多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像冬天要休眠的青蛙和熊，一年四季休眠不干什么事，这个也相当多。

企业的慈善行为，传统上的解释，或出于良知，或出于爱心，或出于道义，或出于企业法人对社会的责任。另外还有一种策略性的慈善解释，企业做慈善不完全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做公益，它是作为企业牟利、赢得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式，它的捐赠在企业财务里算作广告费，即我们说的软广告。企业通过慈善行为确实可以提高知名度，可以改善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可以开拓市场，可以建立企业文化、凝聚员工等等，从事公益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利益，我们看到很多企业从事捐赠时，会考虑很多利益。所以，策略性也是一个重要动机。

伴随慈善意识的兴起，用理性的精神、企业的方法来推动公益事业，像慈善资本主义这样的理念开始发展起来。慈善资本主义强调用市场、企业的东西来改造慈善领域，就是把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技能、企业家在市场中探索的一系列方式方法，引入公益部门，从而有效提升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让社会慈善资源，无论是志愿者的爱心、时间的奉献，还是各种资金和物质以及理念、激情的投入，更有效地服务于这个社会。

最近几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崛起，就是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倡导创新的资本主义，他强调用公益的精神来改造企业、改造市场。比尔·盖茨几乎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赠出来，并且号召搞慈善创新改造资本主义。他认为，人的本性中蕴含着两个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个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巨富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21 世纪的新型资本主义需要对此进行调整，通过市场的力量和制度的创新，直接服务于穷人。在比尔·盖茨看来，新型资本主义有两个使命：一个是赚钱，一个是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利益的人群得到改善。他提出两个激励手段：一个是获得利润，另外一个就是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敬。利用这两种动力机制，可以推动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反过来也是在更高的境界上自我实现的一种自利。



未来最重要的挑战，就是设计出这样一种创新资本主义的制度。比尔·盖茨在文章里说得非常好：无论把人看成多么自私，在人的本性中，明显地存在着某些根本的原则，一个人对改善别人的命运产生兴趣，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必需，虽然从中他并不能获得什么，只是他感到满足，有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个理念值得我们的企业家去深思。比尔·盖茨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献出来，他创造了一种为他人赚钱，然后把他的企业经营得非常好的模式，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出于利他来经营、并在市场中经营成功企业的模式。他彻底颠覆了把自利作为动机的资本主义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比尔·盖茨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对我们未来的公益事业乃至市场本身的发展，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做令人尊敬的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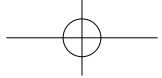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李劲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非公募基金会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肃然起敬？有一个三分天下的古典命题，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很发达的社会，必然是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三足鼎立的社会。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状况大概如何？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府部门，就是公共部门，虽然这些年在提“小政府大社会”，但传统上政府部门还是非常强大。第二，私营部门走向成熟，比如中小型企业现在占到我国 GDP 的 60%、税收的 50%、城镇就业岗位的 75% 左右，也相当强大了。那么非营利部门是什么状况？我们最多只能说是成长中的非营利部门，总的来说还比较弱小，正在成长之中。

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2008 年以来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涌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向这个方向靠拢。我认为有三个特征：一是政府之外的，特别是来自企业的资金进入社会发展领域。二是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比较充足，而且与公募基金会和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相比，资金使用上比较便利。三是非公募基金会目前以企业创立为主，企业家精神或者说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非公募基金会表现比较突出。

这三个特征之后，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打破了以前一谈到非营利部门、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时，就想到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印象，由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大量出现且扮演一定角色，这个格局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二个是冲击了以国际机构为主导的对我们国内民间组织的资助格局，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变化。

为什么要说令人尊敬的基金会这个话题？一方面是政府的期待和支持，政府希望社会资金能够大量进入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领域，对此也有很强的支持，比如免税资格，以前是选择性的，现在是普适性的。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我们有很多疑虑和误解，一说基金会，别人首先认为我们是基金，特别是你非公募，跟私募基金可能很像，你们投什么资？收益怎样？这样误会就大了。最后一个是我们自身的期望，我们都希望这个基金会能



做好，能受人尊敬，但是能不能做好？其实也在观望。

还有一个民间组织的挑战。中国的民间组织实际上发展了很多年，1995 年以来已经有十几年，非公募基金会才出现四五年，谁比谁更专业？谁来审核谁？这些非营利组织很多都是国际组织培养起来的，他们的专业性其实是很强的，在某些层面上，这对我们非公募基金会也提出了挑战。

当然，企业之间也有一个角力。这么多企业出来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到底是在比大还是比好？实际上暗中是一个一个在角力的。要做令人尊敬的基金会，我觉得外部应该是一个公信力的建设过程，内部则是一个问责制度的建立过程。



2010 年会

主题：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项目成效

2010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出席本次年会的有来自 91 家非公募基金会、96 家其他公益组织和企业的负责人和代表，以及 70 余家媒体记者，共计 350 余人。会上发布了《2009 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和《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系列研究报告。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0 年组委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轮值主席）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上海增爱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

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0 年会上的致辞

杨岳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非公募基金会是近几年在我国成长起来的新兴公益力量和重要的公益组织类型。企业和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捐赠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为公益事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极大调动了民间捐赠的积极性，鼓励了民间的公益慈善行为。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不面向公众募捐的私人基金会或者是企业基金会，是公益事业的主要提供者、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继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起步，数量增长迅速，实力不断扩大，已经初步形成一股蓬勃的公益力量。

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1843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846家，预计到今年年底，基金会总数将超过2000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将超过1000家。去年7月，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第一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论坛给整个公益领域带来极大的轰动。今年又第二次举行，一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公募基金会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是数量的增加、实力的扩大，更有很多探索和创新，在挖掘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方面，都有新的贡献。

当前我们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公益事业的发展进入上升期，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目前我国的基金会数量还不够多，整体素质还不高，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对于非公募基金会而言，绝大部分都面临着能力建设的困境，对内表现为缺乏合理治理、组织效率低下、公益服务效果不明显。对外显现为社会公信力不强，难以获得捐赠人、公众和政府的信任。这些因素致使其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社会的影响力不高。这些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有的发起人和捐赠人对基金会还不放心，采取各种方式直接控制基金会的决策和活动，导致有的基金会缺乏活力或者商业色彩浓厚；有的处理不好理事会与管理层的关系，发挥不了决策层和管理层各自的作用；有的财务不独立，没有独立的工作机构，



甚至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还不具备一个独立组织的基本形态。另外，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控制和管理力量薄弱，公益项目难见成效。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公众和捐赠人的公益热情将会受到打击，非公募基金会的发 展会遭遇瓶颈，影响整个公益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由此可见，保持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提高治理水平，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起人、捐赠人、管理者和公众都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问题。非公募基金会的发起人和捐赠人必须学会处理与基金会的关系，非公募基金会自身也必须立足自立自强。对于有志通过非公募基金会来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发展的个人和企业来说，必须在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之初就对自身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准确的定性。从建立核心竞争力需要出发，充分保障基金会的独立性，把加强基金会内部治理作为第一要务。

本届年会以内部治理为主题，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希望各个基金会能在会议上充分讨论交流，在会后积极探索和实践非公募基金会加强内部治理、改善能力建设的方法和手段，对内以法治代替人治，对外以透明代替封闭。

作为登记管理社会组织和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政府部门，民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今后将继续鼓励、支持非公募基金会的发 展，通过立法、制定政策，加强和改进日常监管，增加信息公开渠道等措施加强对基金会的培育。作为一种新兴的公益组织，非公募基金会除了要各自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和加强公开透明以外，还需要联合行业力量，成立行业组织，建立行业规范，搭建信息公开平台，扩大相互交流，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打造行业信誉。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动基金会的行业自律，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我国公益需求十分旺盛，有关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日趋完善，有志投身公益的个人和机构越来越多，全社会对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非公募基金会必将大有作为，全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借论坛年会之机推动和交流，对推动行业的发展大有益处。



自我约束和有效披露是基金会的道德基础

潘江雪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非公募基金会是公益领域年轻的生力军，尽管整体在数量上还不算多，但却在基础教育、赈灾救灾、扶贫济困、卫生环保、帮助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助推器。

基金会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组织，须对公众负责。良好的内部治理成为人们考虑是否要为基金会捐赠和加入基金会成为志愿者的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基金会内部治理，首先要确立明确的使命和目标，建立有责任的管理体系和工作程序来保证目标的实现，并对工作的成果和绩效进行监控和评估。治理的目标是加强公益组织的有效性，推行有效益的工作方式，从而加强公众对公益事业信心。概括一句话就是让公益更有效率。

真爱梦想能够在创立两年内发展为一个年度公益支出超过一千万的、单一的教育公益项目执行机构，与理事会和管理层在内部治理中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严格的预算约束机制、有效的授权体系和透明的监管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基金会应该设立明确的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完整、清晰的战略是每个基金会的立身之本，我们迟早都会遇到有限资源面对无限需求的选择，如何放弃将成为生存的前提。基金会在制定战略时应该定期检讨如下六个问题，以确保我们在既定的目标道路上能够正确前行。

问题一，要明确我们是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需要回答自己，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方面有真正的独到之处可以创立行业新标准？我们倡导的是什么？我们真正信仰的是什么？

问题二，我们想做什么项目。基金会其实应该像企业一样需要有明确的主业务，特别是像真爱梦想这样执行的基金会更应该分析清楚自己在教育公益的项目链上主要做哪个环节。专业分工可以产生最大的总体福利，



公益领域同样也遵循经济原理。

问题三，我们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项目。公益行为要传达怎样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在选择业务链上具有怎样的比较优势。

问题四，我们要想怎样做。在理事会层面要投入多少资源开展项目，以及这些资源取得怎样有效的管理。

问题五，我们想要看到怎样的结果。慈善行为应该力求数据化，需要包括每一个重要业务模块的数据，而不是笼统的汇总，我们还应该逐步发展出一套评估系统，测评项目的有效性，以及项目成果是否与我们的使命目标一致。

问题六，如何来衡量这个结果。我们需要为公益行为建立评价和监控体系，比如真爱梦想，在我们项目建设的指标就是成本变化曲线，我们梦想中心的运营指标就是图书节约率、梦想课程开课率。而基金会的效率指标是全职雇员的人均效能，我们的资产净能见指标就是运营资本比例。

如果我们能清晰回答上面六个问题，可以说基金会的战略制定是成功的。但是大部分基金会往往只能蜻蜓点水的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回答模糊的都不在少数。

第二，基金会要有全面的预算管理。爱心无价，但爱心是有成本的。预算控制是用数量化的方式来管理基金会的目标、善款和人员。真爱梦想实行的是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在每年的两次理事会上，基金会都会评估未来五年发展预算规划，并审议通过次年的预算规模。基金会的项目预算要与人员的发展相匹配，尽量减少人员的波动性，以达到可持续发展。在我们成立之初，曾经有一家很大的机构提出，“如果我们给真爱梦想一年五千万来执行项目，你们会怎么做？”当时我们的回答是，如果这不是一个持续性的项目，那么我们可能无法接受五千万的善款。因为秉着稳健的财务原则，我们将无法保证人员和善款平滑的曲线，所以我们会拒绝这样一次性的慈善捐助。

第三，基金会要有明确的授权。战略的执行需要富有创新和高效的管理团队，为了建立理事会和管理层的充分信任，需要合理谨慎的授权，双



方需要在理事会决策上、财务管理、利益冲突、预算审批和控制、项目管理等各个领域进行分级和授权，并需要将授权的权限和期限都明确在书面上。

第四，基金会要有严格的内部监管。中国的公益行业必然要从行政化走向市场化，而公益市场的良性发展依托于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基金会的监管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理事会监管；二是监事会监管；三是外部监管。如果要建立一个活跃有力的理事会、敏锐有效的监事会和慷慨信任的捐赠人团体，必须依靠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所以信息披露制度是内部治理的一个基础。

基金会除了要把好事做好，还要把好事说清楚。从设立之初，我们便不断地探索与捐赠人有效的沟通方式，除了将所有的项目信息定期送达捐赠人、合作伙伴和业务主管部门之外，我们还通过基金会网站，公开基金会的动态信息，供所有有兴趣的人士参阅和下载，我们的初衷是信息宁多勿少，把知情权留给所有需要了解的人。虽然目前我们的网站内容有些庞杂，而且也需要不断进行网站的升级和管理，甚至需要采购单独的大量服务器来支撑越来越多的信息，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好处是树立了基金会专业透明的形象。

举个例子，有一家跨国银行在挑选国内公益合作伙伴的时候，就是在没有事先通知任何备选基金会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基金会的网站资讯，就开展了在国内全体雇员的投票，最终选择当时正在注册的真爱梦想作为该银行的公益伙伴。三年以来，这家银行向我们共捐赠了 150 万元的善款。

除了披露公益项目完整报告外，最好的是我们的基金会还应该披露每月工作简报，基金会的重大活动和事项也要向公众和主管部门通报。其中，基金会的年报披露是最核心的披露内容。真爱梦想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格式标准作为模板，结合公益组织自身运作的特点加以调整，形成了真爱梦想 2009 年的年报披露结构。我们认为基金会作为公益财产的受托机构，有义务建立制度化的自我约束机制，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就是在相对固定的格式框架内，不以管理层的自身意愿和格式取舍为准则，



应该是真实准确、及时地反映基金会运营管理的核心信息和监管要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严格的报表内容模式化，可以保证披露内容的基本质量和完备性，避免报喜不报忧、避重就轻的情况发生。同时我们引用全球最大的独立慈善评估机构的指标系统。对基金会的组织效率和组织能力进行模拟的自我评估，对标美国优秀的同类基金会来改善自己的治理水平。

事实上，我们认为基金会和金融机构在本质上有着相同之处，就是承载着委托人赋予的信托责任。自我约束和有效的披露应该是行业存在的道德基础。当然，我们也深知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刚刚蹒跚起步，治理水平相对于商业机构而言仍处在较低水平。各个基金会在资质、规模和从事领域方面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与目前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相匹配的基于分级信息披露的分级监管体系，在分级的信息披露与分级的监管体系之下，对不同性质的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呼吁监管部门针对不同的信息披露标准的基金会给予不同的考核等级与政策扶持措施。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投资管理和人员薪酬限制等方面给予达到高级信息披露的基金会以更多的政策支持，以推动整个行业向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相信，基金会对业务进行完整、透彻的分析和有效的信息披露，不仅会增强公众对基金会的了解和认同，而且这个过程本身就会促进基金会自身战略规划和项目实施的深刻思考。基金会的公信力来自于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组织效率和组织能力的评估其实是爱的证明。惟有通过公开、透明、专业、高效的工作，才能不辜负捐赠人和公众的信任和期待。作为中国公益行业年轻的生力军，非公募基金会需要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公益的效率等于爱的证明。让公益更有效率，实际上是让爱心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真爱梦想绝不是这条道路上的独行者。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倡导下，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非公募基金会去关注内部治理，关注信息披露的质量，关注公益的效率，公益这个朝阳产业会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到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的事业中来。



要求所有企业家都“裸捐”将非常不幸

冯仑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前一段时间，比尔盖茨、巴菲特来中国倡导慈善和公益，引起很大的讨论。讨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中国民间的慈善和公益目前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二是我们企业，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人，包括一些创造财富的第一代人，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三是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发展慈善？

中国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民间公益慈善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转型、经济体制改革是相适应的。不光如此而且发展得非常好，甚至超过了原先的预期。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从国外来看，美国已经建国 200 年，现在有 10 万家私人的基金会。我在三年前去美国考察，考察过所有最重要的永久性私募基金会，大部分是在创业者第一代以后，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在中国目前所有的私募公益基金会里面的捐款人，大部分都不超过 15 年。也就意味着从零开始创业，不到 15 年就开始想这个事情，甚至开始设立基金会。比尔盖茨从 1975 年到 2000 年，经过 20 年，他已经成为首富很多年才开始设立基金会。巴菲特从赚钱开始，到决定捐出这么多钱，大概花了 50 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财富创造者、民营企业家、其他有善心的人士，从与国外发展的阶段和国内改革的财富创造的信用和时间来看，应该说并不惭愧，甚至更应该自豪。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时间非常短，而且占用的资源非常少，目前民营企业承担了 75% 以上的就业责任，提供了 50% 的税收，对社会私人部门的捐款去年已经超过了公共部门，同时占有的公共资源不到 30%。我们确实应该感到自豪和骄傲，应该感觉到社会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也应该有所进步。

谈到“裸捐”，现在多数企业家对这个问题持审慎态度。作为个人，每个人对财富的支配有自己的权力。但作为一个社会，如果我们去考虑、要求、期待甚至诱导所有的企业家都采取“裸捐”的姿态，我个人认为是



非常不幸的。这个不幸不是我今天危言耸听。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件事情就是公益慈善事业的进步不应该妨碍民间财富的基本创造制度，包括财产的所有结构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以及企业正常的经营。如果我们的公益和慈善伤害到财产所有制，伤害到私人企业继续的发展，伤害到民间财富的既有格局，伤害到财富创造的动力，那么我们的源泉没有了，捐赠最多也就是一次，后来就不可能再有。

当下在公益慈善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地保护以财产所有权为边界的、非常清楚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企业财产制度。

再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把钱捐给谁。1956年，我们把钱捐给政府，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国企超大超强，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以至于抑制了民间所有创造财富的动力，造成了国有企业低效率、没效率、浪费，最后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停滞。

如果今天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能够把这些钱更有效地捐赠给那些尊重捐赠人意愿、能够规范专业治理、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机构，捐给社会而不是政府，我们才能够保证公益慈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是所有企业家都“裸捐”，捐了以后90%的资金流入政府，最后的结果又是变成普天之下莫非国产。这一点非常重要。

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探讨私募公益基金会才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承载着所有人的爱心和我们对公益事业健康方向的期许。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当下我认为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望与各方面分享。

第一，要更快速、更大量、更有效地推动私募公益基金会数量上的增长。数量很重要，1993年在没有《公司法》以前，民营企业发展的数量都特别多。1993年以后，民营企业发展的登记注册越来越容易，发展到现在有700多万家民营企业，然后才有了万科、阿里巴巴这些优秀企业。这个数量增加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在注册方面给一些更透明、更顺利、更方便的政策。一个机构要能够很好地发展和生产，第一不能设防，第二要自然推动。对私募公益基金会，我认为不用设防，这些人把钱拿出来已经是了不起的



想法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动机，他没有留给自己，如果你还设防，那么这件事情就会挫伤他。大家应该鼓励，不必设防，这件事情不会出太大的事情。

我们看，因为走在马路上总会出车祸，每天高速公路上会消失大概一个连的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把高速公路关闭。今天我们数量远远不够的时候，即使出个别的状况，我认为仍然坚持数量上要尽快地增加。只有数量增加才能像企业竞争一样，细分市场，专业独立，最后才能比较出来。像真爱梦想对信息披露非常好，那些披露不好的就没有人理了，最后是自然竞争、自然选择的过程。

美国有很多基金会，其中有不少是非常怪异的。比如有的基金会专门拯救海外美国人利益，是由特种部队退伍的人做的，像解救伊朗人质，政府没有办法，这个基金会拿钱在海外组织特种部队把人质抢过来，这也是公益，是国家利益。所以，只有数量足够多，我们才能分门别类来做很多细节的公益。

第二，除了慈善，我们更应该强调公益。这两个概念很复合，在西方大部分慈善公益是一个字，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在中国，早先在文革的时候，慈善是一个负面的概念，后来逐渐把它中性化了，为了这样大家又发展出公益。所以你看我们有公益慈善基金会，有公益基金会，有慈善基金会。在中国历来慈善和伦理道德有关，而在西方是和宗教有关。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慈善也总是和富人、穷人有关，和强者、弱者有关。所以，慈善会引起道德联想和争议，同时又强化了弱势和强势、贫困和富裕的内涵，大家会从这些方面想很多。但是，公益这件事是面向所有人的，不分贵贱，不分强弱。所以在汉语词汇里，公益更接近公民社会微观的 NGO 组织。

当下，我觉得需要相关部门和媒体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在中国除了我们要坚持传统之外，更应该把重点放在现代公益组织建设上。因为公益组织的建设是几百年以来中国所没有过的，而传统的慈善几千年以来就不乏其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应该创造出一些新的公民社会微观机制。其中之一就是要强调建立现代规范治理、专业管理、



真正有效的公益组织，而不是传统的慈善组织。我们应该大规模地持续宣传现代公益组织的理念、方法、制度，用现代公益组织和 NGO 的方式来组织好我们的公益基金会，避免现代公益基金会沦为某些企业套利、资产处置的方式，或是群众的心理补偿等等一些扭曲的情况出现。

第三，我们需要大规模地培训、培养专业的人才。现在很多公益基金会在找专业的人才，但很困难。公益组织人才大部分来自于两个方面，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多来自于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和内部人员，民间私募基金会的人员有很多来自于企业。这两方面都会把原来的组织背景、组织文化、价值观带进公益组织，会使公益组织的发展不够专业。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大专院校，特别是像北师大已经开始与“壹基金”建立公益学院，能够很好地培养人才。20 年前没有 MBA，我们企业用的人都是江湖人士，今天我们再也不会用江湖人士，我们会用从名校毕业、MBA 或者是大公司培训过的人，这样公司才会治理规范。所以我们也希望，在 NGO 组织、公益组织当中使用到大量的专业人才。

现在有一个非常乐观的地方，一些公益组织，特别是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私募公益基金，在用人的薪酬、福利和激励方面，已经完全能够按照市场的标准，在公益组织中服务，所得到的基本保障不差于营利单位，这样也会激励人才流动，同时也能够对大学生就业有一个很好的吸纳。

总之，我个人对私募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包括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我也希望和大家做更多的努力，以有限的的能力推动这样一个无限发展的事业，走得更稳、更好。



公益组织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比国企还严重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当一个组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或者专业化的要求大到一定水准的时候，就会出现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现象。一旦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治理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经常讲的委托和代理的问题，代理人是否对委托人负责，代理人是否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特别是公益组织，包括公益基金会，无论是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都是公益组织。公益基金会如果硬要说所有权的话，它应该属于社会所有。它既不属于某个个人，也不属于某个机构，也不属于国家，它是属于社会所有。因此，非公募基金会要清算关门的时候，它的资产是要给同类组织的，发起人不能拿回去，捐方不能带走，国家也不能分配。我们这些公益组织属于全民、全社会所有的人，我们为某个范围内的公共利益服务，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所有者。公益机构的决策层理事会是自我维持的，这样就有一个所有者缺位的问题，真正的所有者没有办法来管理这个机构。对公益机构来说，治理问题尤为严重，委托代理的问题特别严重，比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还要严重。国有企业毕竟还有一个国资委，我们这干脆没人管。

研究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主要归结为理事会内部的决策机制、权力分布以及理事会、秘书处的财力分配状况。从目前来看我们发现有四种方式产生理事，首先创办者是顾问理事，或者业务主管单位委派理事，再者就是创办者邀请其他人来担任理事，还有是其他理事向理事会推荐。理事会内部的决策机制从权力分配来看，分为四种：一是垄断型，理事会的内部决策权几乎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三是大多数人共同分享；四是自己没什么权力，真正决策的人在理事会之外。

从理事会的理事邀请、秘书长的人员决定以及理事会的重大决策拍板



这三个方面来看，在基金会当中到底谁说了算，根据每个基金会找到关键的决策者和担任的职务，这就有了后面的重要发现。从理事会发挥的职能来看还是比较综合的，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基金会获得资源，特别是资金，另外是决策和咨询的作用，会给基金会带来声望，也会满足党和政府的要求。《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必须有多少个理事，必须一年开多少会，否则就是非法，否则就通不过年检。

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从内部治理来看，钱是谁找来的，谁就说了算，这是当前绝对的一个现实。注册资金的来源和日常运作经费的来源，与决策的发言权是密切相关的，相关度非常高。谁能找到钱，主要是几方面，一种是你有钱可以直接掏腰包，还有一种是你没钱，但是大学有自己的项目或者声望，或者某些艺术家卖作品也可以，或者某些著名学者得到学术界的承认，给他捐款也可以。或者你家里有权力背景、政治背景，企业家为了“作交易”，也可以为你捐款，不一定非得是有钱的人，只要你有办法，利用各种资源把钱换来，最终本身不是你有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办法把钱拿来，决定你在组织内部的发言权。所以至少在现阶段，绝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来说，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钱谁拿来的，谁就有发言权。

我们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按理说，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是代表社会来管理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是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内部实行民主决策，所有的理事一人一票。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理事百分之八九十都沦为私人操控？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公益机构本身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说是社会所有，社会又没有办法来管理，社会也犯不上来管理，你是个小机构，让全体人民来管理，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形成没有人管的局面。再一个非公募基金会高度依赖于资金，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资金。而非公募本身的特点本身就决定它的资金只能向几个少数的主体来筹集，往往会对一两个或者两三个个人组织在核心资源上高度依赖，这种资源依赖导致决策权分配得不平衡或者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情况。

从外部来看，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缺乏责任心。我在五六家机构担任理



事，这些机构说实在的还是佼佼者，它的理事会也非常好。但有的理事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会有消极的理事，这与非公募基金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有关。再一个法律监督不到位，比如民政部规定很多要求，但也不会严格去执行和督促，社会问责机制也缺失，这是主要的原因。

对策是什么呢？我不希望理事会还是独立专业方向，《基金会管理条例》对理事会怎么构成，理事会应该怎么开，决策怎么进行等等的规定要求还是相当不错的，体现公益基金的理念，如果把这些东西真正兑现是相当不错的。

解决的对策从内部来看，是如何完善理事会的治理；从外部来看，怎样加强外部的监督。因为公益机构的理事会往往是自我维持的，下一届理事会由上一届理事会来决定如何产生。所以，完全靠内部理事的述职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很难解决问题，外部的竞争、外部的问责、外部各种监督和压力，对于公益机构的完善非常重要。我们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外界的力量和内部的冲动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更有利于非公募基金会健康成长。

当然，治理结构好的不一定效率就好。有的机构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眼光和责任心，这个机构照样搞得非常好。有的机构是挺热闹，理事会一帮人开起来瞎侃，最后机构运行的效率不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一下，治理结构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和组织运行的实际效率来看没有必然的联系。我自己十几年在这个领域的观察，我看到最好的基金会都是个人独裁的基金会，前提是独裁者必须是能人，最大的基金会也是个人独裁的。现在到底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基金会的发展，在我们这样的初级阶段，各方面都处在百废待兴时期，不会有一个结论。



圆桌对话：非公募基金会“不差钱”与草根组织“就差钱”

主持人：梁晓燕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对话嘉宾：

刘洲鸿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维嘉 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会长

宋庆华 社区参与行动主任

窦瑞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刘洲鸿：

南都基金会资助机构和项目的要求是“严格把关、宁缺毋滥”。一开始我们特别强调，资助的机构要特别优秀，项目效果要特别好，这样选择草根组织也相应会特别困难。最后资助来资助去就是那几家，很多的机构特别需要钱，我们又没有办法资助。之后我们有一些调整，不能只盯着这几家机构，相对现在能力弱一点的机构，我们也应该支持，通过我们的支持来提升他们的能力。

对基金会而言，第一，我们的资助目标不要太高，不要总想着找最好的项目。第二，要更有耐心，不要一上来就给公益组织的项目很高的标准，应该给他们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用三到五年时间有一个持续的支持和提升。第三，基金会信息传播要做得更好，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基金会在做这个资助项目。还有，我们自身的能力不足，也要加强。我们刚刚成立两三年，有很多同事都比较年轻，我们人比较少，但是管理的项目又很多，7、8个人却支持了200多个项目。如何精细化管理也是一个问题。

我上周在云南和一些草根组织座谈，我问他们了解基金会多少。大概有10多个人参会，能够说出来的基金会不到10家。这一方面反映草根公益组织的资源意识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基金会的传播各个方面做得不太好。

南都基金会的使命就是支持民间公益，定位就是一个资助型基金会。



我们调研发现，草根组织的人力成本、行政经费和志愿者补贴最难得到支持。所以我们重点支持草根组织的人力成本、行政经费和志愿者补贴，这是对草根组织最关键的支持。第二，要支持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费用，一些机构说，如果给他们一千块钱，让他们出去参加一次学习、培训，解决交通、住宿的问题，对他们机构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还要支持草根组织机构的发展，支持公益人才的培育。南都基金会推出“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专门支持公益领域的年轻人公益创业，为此制定了很多配套支持。

王维嘉：

我们是北京企业家生态环保协会。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有一些台湾的企业家，他们觉得我们在资助项目的评估和审核中给钱给得太松。我们资助的这些组织都很弱小，管理也不完善，我们资助他们的目的是和他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而不是指责他们，或者放弃资助。我们会继续资助他们，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和机会。

对一个被资助组织的严要求和大胆资助并不矛盾。特别是现在的状态，应该以大胆支持为主，在大胆支持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要求。在筛选中，不是所有的受助组织最后都能活得下来，如果有人挺过了严要求，从弱能力变成强能力，今后他就成长起来了，有的团队成长不起来被淘汰，这就是市场，本来就应该如此。

我们一开始只是资助项目，后来我们增加了机构资助。所谓机构资助，就是看人。我不管你做什么事，只看你的人和团队。只要我信任你的团队，给你钱，你做什么我都不管。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了拿钱要给不同的基金会写不同的项目书，只有两三个人的组织，不可能干五六个方面的事儿。就像公司一样，只能在一个细分市场里面逐渐壮大，积累经验和团队。我们所信任的组织，会持续支持他们。今年我们的机构资助已经资助将近 300 万元，和我们的项目资助是一半对一半。

我们的机构资助就是用来给你们机构员工发工资和出差费用的。今天的中国只有这么少的人从事公益，都是一些有理想的先驱。你想变成一个



伟大的运动，变成几百万人参与的，你不可能靠几千个活雷锋，公益必须成为未来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吸引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里来。你想发财不能到公益里面来，但是做公益的人必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个理想的民间环保生态应该是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环保组织，不像今天是几百家，在中国这样环境问题如此严重的国家，应该有几万家环保组织。现在国内的非公募基金会大概只有我们一家是做环保资助的，其他主要是国外的。我们希望至少有几十家兄弟的非公募基金会一起来做，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市场。另外我们还资助了很多中介组织，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民间环保的生态。

宋庆华：

我的机构叫社区参与行动，成立于 2002 年，机构主要是在促进社区层面的公众参与，也就是如何能够让政府在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自下而上的行动。

目前为止，我们机构可以说是既不差钱也差钱。我们大部分钱是来自国际基金会的。用国际基金会和政府合作，这里面对我们有很多的困惑。那差的是什么钱？差的是我们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的钱，因为当我们的私募基金会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按理说，私募基金会和我们 NGO 应该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可是为什么在合作的时候这么难？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基金会的人说我们现在找不到有能力的 NGO。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应该说你们没有能力去找到有能力的 NGO，后来我们也和一些私募基金会合作，包括友成、万通和南都。在合作的过程中我自己在反思，基金会和 NGO 为什么合作起来会比较难？我终于发现，因为我们 NGO 已经有将近 20 年的历史，而非公募基金会只有五年。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样他们也可以成长，大家一起合作才可以改变。

中国在公益生态发育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不光是基金会，在中国包括政府购买服务也是新生事物。最近我



们机构也跟政府购买服务，做了好几个回合，做的过程中，我们和政府强调不是你购买服务，不是你给了我钱这个事情就由我解决了，而是我们要一起做事，要共同成长。我们 NGO 也要小心一点，即使我们拿了政府的钱，千万不要只是自己做事，和基金会合作也是一样。现在的确是基金会比较少，NGO 比较多。问题是这么多 NGO 为什么还找不到人去做事呢？我上周到长沙做了一个 NGO 的培训，结果四十几家 NGO 都不知道中国还有基金会。他们都说我们该怎么找钱，后来我和他们宣传了南都基金会，宣传了友成，宣传了壹基金，我说你们写报告给他们，你们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支持，这说明我们的宣传还是不够。

另外，基金会在态度上还是要把自己降下来。别以为给钱就是爷，我们 NGO 就是弱小的，但我们不是讨饭的，我们其实也应该是合作伙伴，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我特别欣赏万通基金会，老跟我们开会，对话会、讨论会，哪怕吵架都没事儿，吵完就是朋友了，可以一起做事了，所以真的要一起成长，这才是我们的前景。

窦瑞刚：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现在肯定是不差钱的时代，统计数据表明，NGO 和我们基金会是成长非常快。但是为什么很多 NPO 又觉得自己缺钱？我觉得，还是基金会和 NPO 之间的对话机制出了问题。两者都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带有意志的资金提供方，另一个是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方。两者都应该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存在的价值，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很好的衔接，就一定会出现基金会找不到很好的合作伙伴，NPO 找不到很好的资金资助方。很多 NPO 说，离开了基金会我们照样活下去；但是基金会如果没有我们，你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观点也是我们基金会应该反思的。非公募基金会还有一条路，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运作型的基金会，我们可以用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这个是双方反省的问题，为什么我的钱不愿意给你，为什么你觉得拿我的钱这么痛苦。结论是资金多，这个社会的问题多，专业的人才少，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少，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矛盾，非公募



基金会的钱花不出去，草根公益组织找不到钱。

前几天和招商局基金会聊天，他们搞了一个扶贫创新奖。入围的机构都是一些老面孔，没有什么新鲜面孔。招商局基金会的秘书长和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经典，他说：“演员就这么几个，在舞台上一出一出戏演来演去，你看到的当然都是老面孔。”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翻译成，咱们有各种各样的奖，现在基金会通常都喜欢搞个奖，希望从中能够筛选到比较好的项目。选来选去，就那么几家机构，就那么几个人在那答辩来答辩去、领来领去。这个东西是要反思的，我们老逼着这些公益组织写项目计划书，天天哪有精力给你们写项目计划书，每一个组织的要求还不一样，写项目计划书、写PPT，还要飞过去给你们讲，讲完哪有时间做项目？所以，弄来弄去就起不来新的公益组织，公益的生态链就建立不起来。我原来有一个观点，改革开放初期外企进入中国干什么？那时候所有的原材料供应商都没有起来。没有下游的供应商。老外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选择潜在可能的，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合作伙伴，然后送到国外培训。培训之后再建立一个长期的供应链关系，我和你共同成长，我派技术专家到你的机构里面指导你运作。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制造业就起来了。我建议我们非公募基金会以后不要老逼着人家写计划书，就写一次你能不能资助十年，每年评估完觉得不错，就接着资助他。

两个核心，第一个是NPO不要到处去申请项目，不要看到哪个基金会又招标了，反正有钱，我就去写个PPT申请。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细分市场在哪里，你解决的是哪一个社会问题，你的解决方案优良在哪里？然后去找潜在的、关注这个领域的基金会要钱。你不要到处撒网，这样牵扯你的精力，也牵扯了我的精力。第二个是要到钱以后要共同成长，要有一个对话机制，不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指责我，我也把我的门关起来指责你，这样就永远成长不起来。我们是在对话中成长的，你不能拒绝对话。和企业与供应商一样，永远要有一个对话机制，互相去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对方的话语方式，才能够共同成长。

战略合作、共同成长。我的思路和企业的思路是一样的，我在云南有



项目地，有试验田。最近在招募几个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去那里试验，只要我们的价值观一致，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试验下去。只要你在我的试验地里，我都给你们钱，庄稼你负责种好，钱我负责提供，大家一起来成长。但是如果你成长得不够快，也允许我可以换。

观众发言：

我来自玉树。玉树受到了非常大的地震灾害，我们中国的公益行业，非公募也好，志愿者也好，基金会也好，所有的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要向大家说一声感谢。我们是一个非常草根的组织，已经做了11年，现在有15个专职工作人员。我们刚开始确实非常艰难，确实缺钱，从三年前到现在我们确实又不缺钱。因为我们不缺国际的钱，缺的是自己的钱，我们11年都是拿国际的钱。在整个中国的公益事业里面，这个生态链没有打通，需要一个中间的平台。那么小的草根组织怎么敢和大的基金会要钱呢？在每一个项目的背后，有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的使命。比如玉树的地震救灾有很多人参与，基金会能够筹集资金，但是能不能把这个钱给当地的草根组织，让他们去执行。现在往往非公募基金会都是自己做，或者大部分钱都进入政府，和政府签订90%的合同。真正草根组织得到的钱是非常少的。如果不从这种方向上有根本改变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也许明年我们还是一样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做过非常急的事情，但它不一定很重要；而有些事情不是很急，但它真的很重要。我今年开始要和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合作，我也非常高兴，我们以前11年都是喝洋奶，现在我真的想喝母乳了。

梁晓燕：

基金会“不差钱”和草根公益组织“就差钱”这个话题很有趣。一方面，快到底了，不少基金会还有很多钱没花出去；另一方面，实际得到有效帮助的草根公益组织还是很少，在资金、资源上还有很大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听到双方很多的抱怨。我是有双重身份，既是草根组织出身，现在又在做基金会。基金会这个圈里不断地抱怨草根组织，草根组织的圈里不断在抱怨基金会。大家都不要关门，这个很重要，



最后毕竟是双方的，你有意见跟他谈，你能够说服他接受你的意见，这就是你的本事，双方都一样。基金会能够说服草根组织接受你这套方式去工作，也是你的本事。我们希望未来五年、十年内听到抱怨少一点，双方直接进行的沟通多一些，吵架本身也是一种沟通。不要背后去说，这不是建设性的提高。

现在，非公募基金会资助的形式已经从单纯的项目资助开始往更多元的方向走。资助不仅仅是钱，有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心平公益基金会关注图书馆，关注民间、农村的阅读推动。但是心平做得最好的工作，是他们组成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网，组成一个学习型组织，让这些公益组织在这中间互相学习，而且非常有效，他们的年会热气腾腾，方方面面大家共同推动，并且每个组织都有主动性。这个事情是心平在背后做了强有力的推动。但是他在这个里面是一员，他绝不站在前面领导，他在后面进行强有力的推动，这个推动很多也不是钱。所以对于一个基金会的能力和我们能够资助什么要打开思路，开放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基金会的人的能力更加综合化，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非公募基金会也好，草根组织也好，都是我们公益链条上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是中国的社会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埋头做项目，我们的事业还有一个功能不能被忽视。我们虽然在做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是在创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这个新的社会体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才要求我们互相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同，也不至于仅在项目层面我们互相怨来怨去，我们共同建设这个目标才会更加清晰。



2011 年会

主题：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

2011 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11 月 24 日至 26 日，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130 余家非公募基金会、40 多家 NGO、50 多家媒体记者，共计 400 余人出席本次年会。会上发布了《2010 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非公募基金会行业使命与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1 年组委会：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轮值主席）

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轮值主席）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上海增爱公益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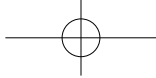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华夏人慈善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1 年会上的讲话

许嘉璐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我离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之前，自己也不太清楚，就进入了慈善的圈子。其实是一批热心慈善救助的人士触动了我多年来对于鳏寡孤独、残疾人等需要救助的人的关怀的心。

当今中国特别需要像私募基金会这样热心公益慈善的组织和行动。世界处在一个物欲横流、道德紊乱、以个人为中心、使得人情淡漠的时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是我们传统的丢失，一种把人向物质世界、肉欲世界驱赶的力量的入侵。当我们某一天看到或听到种种不道德行为的时候，特别需要一股清风，需要一股起而行之的力量，给这个社会希望，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温暖。

我要向今天到会的所有非公募基金会的代表和慈善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所做的公益和慈善事业，既给社会前进以助力，给需要关怀的人以温暖，同时在推动着中华民族回归我们祖先的慈悲之怀，回归我们朴实、真情的童心。

经过 19 世纪、20 世纪，人类的技术空前发达，物质丰富了，品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细想，人类是在进步吗？难道人类的进步、人类的历史就是物质解决的吗？如果和历代的哲人、善人相比，我认为，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人类在退步，只有像私募基金会这样众多的好心人携起手来，把事业做大，才能扭转这种局势，让中华民族真正取得精神的进步。

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应该让从业者把从事这项好事情的想法不断深化。非公募基金会在成立的时候，很可能有的企业、有的朋友会想做点好事情，同时我的企业也可以得到回报。要回报是正常的，作为这个论坛，应该团结更多有不同想法的朋友。但是我发现，也有些私募基金会不要求任何回报，默默无闻在做，因为他们说，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我是对社会尽孝，而你对父母尽孝，难道还要回报吗？还要宣传吗？我想，虽然大家想得不尽一致，都应该包容，应该尊重对方的想法。



但是有一点，反思自己最初的好心，有个更深的认识，这就是我所说的升华，从儒家的仁爱到佛家的慈悲，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到佛家的净心明性，于是衍生出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这就是天人合一。如果说当年老子、孔子、孟子和世尊他们，仅限于个人的和群体的通过对原始的天和地的观察、对四季的体验、对内心的体验，得出“天地本是一体”的结论的话，那么现代科学已经不断证明，世上任何一个事物都和距离自己万里之遥的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证明全人类的确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孩子。

科学上，如果微观到化验检测我们的基因细胞的时候，全人类都有共同点。前不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说过，全世界的人细胞有 15% 是一样的，虽然中国的天人合一观点形成的时候没有发达的科技，但是却和今天最发达的科技有着许多暗合，这样我们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就有一个牢固的思想感情基础。

第一，公益事业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管理。这方面政府正在研究要出台措施、出台政策，但是我想，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序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做公益事业的人把自己的行为牢牢树在参透天地、参透个人思想感情的认识基础上，我想，如果我们各个非公募基金会都做到这点，这也是对捐资者的一种精神的反馈，一种慈善的回报。

第二，我希望宗教界，不仅是佛教，也包括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能够更多更好地参与这项工作。为什么？因为各个宗教究其自古以来形成的作风，和儒家一样，最讲知行合一，认识到就做，在做的过程中提高认识，于是做人的境界也在不断提高。今天的社会，是不是双重性格两个面孔？太多了，到机关是一个面孔、是一个性格，回到家，或者请朋友在一起聚会，又是另外一个面孔、另外一个性格，这是和宗教不相合的，如果我们在这点上，做得多了，这也是对社会疾病的一种良药。

第三，希望非公募基金会论坛适当扩大在媒体的宣传。因为我们做得对，我们走得正，虽然我们不求名，但是宣传上可以让人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让人的善心、人的良知得到发挥，于是加入的人可能更多，这也给面对现代的社会状况感到迷茫的人一个更大的希望，这样我们的慈善、我们的公益就不仅限于物质和金钱，也包括我们精神的发扬与感召力的增强。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1 年会上的致辞

孙伟林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我国新兴的公益力量和重要的公益组织类型，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和长足进步。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登记的基金会 2143 家，非公募基金会 1065 家，基本是半壁江山。今年年底，预计全国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将超过公募基金会，这些非公募基金会分别是由众多有能力、有爱心、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大学和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出资设立的，类型多样，特色各异，在筹集公益捐赠、动员志愿服务、救助灾害、扶助困难，以及支持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环保事业，倡导健康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载体之一。

当前，我国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阶段，公益事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问题凸显与公益组织数量不足的矛盾，是社会公益、社会公益意识提升与公益组织在较短发展期尚未形成运作体系的矛盾，是社会服务的多样化与公益组织服务能力单一薄弱的矛盾。

基金会应当从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使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基金会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站在推动整个公益事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益事业发展的理论方法、管理模式和项目运作模式，更多关注涉及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正、化解社会矛盾的领域，使公益事业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事业紧密衔接、相互补充，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各类公益组织不懈的努力，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社会组织和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政府部门，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各类公益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有实际行动大力扶持和发展，通过改善登记管理体制，为公益组织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鼓励其增长。其中，非公募基金会仍将是我们鼓励的重点。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公益组织进入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发展领域。我们将继续为公益组织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激发公益组织的活力，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

另一方面，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公益组织的监督管理，建立“政府监管、公众监督、内部治理和行业自律”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我们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公益组织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规范公益组织的捐赠接收管理使用行为、保值增值行为、与盈利机构合作等行为，目前我们正在起草这方面规范化的文件。同时，我们将强化登记管理机关的职能，加强日常监督、年度检查、登记评估和税收优惠资格审查等现有监管手段，特别是我们要继续推动社会对公益组织的监督，继续推行信息公开，抓好现有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

我们将结合非公募基金会自身的特点，制定相应的鼓励扶持和监督管理政策，继续推动非公募基金会发挥在动员社会资源、创新公益服务方面的优势，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推动非公募基金会事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圆桌论坛：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主持人：杨澜 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对话嘉宾：

刘忠祥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创办人

曹德旺 河仁慈善基金会创办人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杨澜：政府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定位和期待有什么新政策？

刘忠祥：非公募基金会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确定的基金会类型，2004年之前，基金会不分公募和非公募，也有个人基金会，但是没有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是为了适应企业和个人向社会捐赠的形式，跟公募基金会有区别，设立的条件比较低，200万元就可以设立非公募基金会。同时，在推进进度方面，当时一些地方和民政部门做了非公募基金会的试点单位，致力于推动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所有基金会组织的发展。

杨澜：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数量基本持平，但是筹募资金方面有差距，公募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的两倍左右，您预见它们未来的趋势如何？非公募基金会有可能超过公募基金会吗？

刘忠祥：公募基金会是面向公众的，资金来自很多群体，非公募基金会资金渠道相对窄。如果政策积极推进的话，非公募基金会的成长会加速，一些非公企业和个人、大量民企、国企进入非公募基金会。

杨澜：非公募基金会和政府部门有合作关系，也和NGO组织和个人草根有合作关系，在项目的支持和选择上，您怎么看？

卢德之：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特色，非公募基金会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要有自己坚持的理念。我们希望非公募基金会与更多的基层组织联系起来，把一些具体的项目落实到由基层组织和我们共同关注、共同承担、



共同发展。我们一方面，需要成熟的价值观，需要有好的项目，另一方面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

中国富人大量的成长，已经排到世界第二，我们应该鼓励支持他们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我把女儿送到美国学习怎么做慈善，我希望她回来参与到我的事业当中来，希望孩子们能够发展这个基金会，成为大家的事业平台。

杨澜：有些基层组织抱怨，说非公募基金会是好，但却把我们的饭碗抢了，自己的人到基层把事情就做了。曹先生，您每年要捐赠4亿元，跟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怎样？

曹德旺：我从创业初期开始，就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引导、社会的帮助。我信佛教，应该尊重社会的意愿。他们叫我慈善家，我不承认我是慈善家，我是一名企业家，做慈善不要有功利性。

杨澜：万一将来资金的使用跟你的社会理想有所差异的时候，您会如何做？

曹德旺：我们有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接受公益机构的申请，监事会监管。慈善是一种良心、一种道德、一种情操，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把自己放进来，又请媒体进入，我们只有一个信念——社会责任，推动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杨澜：您觉得在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行业自律，接受公众的监督吗？

曹德旺：我相信将来公募基金会就没有了，公募基金会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政府的。邓小平一个“改革开放”，救了十几亿中国人，我们拿出几十亿不算什么。

杨澜：有一位外国企业家说，因为有慈善事业，有家族精神、社会精神的传承，我们有能力相亲相爱，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这对比中国说的富不过三代，可能是对精神价值和家庭传承不同的理解。曹先生，再过30年、50年，您希望您的子孙做什么事情，那时候你们的基金会有他们做事的位置吗？



曹德旺：现在我孩子在基金会做，如果能够继承我的做人标准、做事标准，我相信他将来会做得比我好。

杨澜：我们说有需求的人总是在远方，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愿意到非洲做志愿者工作，我们很关心西部山区的孩子中午是不是喝到了牛奶。基金会成立，不仅是把钱发出去，而是建立一个机制。我们非公募基金会的服务项目的设置上，目前存在太多重复的问题。康所长，您的看法是什么？

康晓光：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也相当普遍，这个是起步阶段一个必然的现象。套用政府的话，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进一步发展去解决。

曹先生去年资助了一个项目，给灾区发了两亿元捐赠的资金，我们做了评估。我觉得曹先生无论通过捐赠做公益，还是通过基金会做公益，特别值得我们非公募领域学习。第一，动机纯正；第二，方法专业。曹先生很客气，说自己是外行，其实不是，无论从捐赠还是创办基金会，都是非常专业。

有篇文章，基金会凭什么存在？你为社会干了什么？捐赠者本来可以把钱直接受助者，但是为什么要通过你？非公募基金会的存在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你是一个专业化的筛选人；第二，你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第三，你应该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某些方面没有达到你资助的标准，你就应该帮助他解决问题，这就是你花钱的空间；第四，专业基金会本身应该成为创新探索的发动机。

杨澜：对于制度的建设，大家还是有很高的期待和呼吁，希望我们非公募基金会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建设方面，能够加快脚步，做得更好。



圆桌论坛：非公募基金会的困境与突破

主持人：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对话嘉宾：

窦瑞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杜绍基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朱健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林启泰 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徐永光：讲到非公募基金会的困境，不一定是讲机构的困境，也有行业的困境，这里有可能会涉及到制度问题，涉及到专业化问题，涉及到和政府的关系，涉及到行业内部的合作等方面。

林启泰：我画了一个小人代表公益组织，他在走一条路，边上有花有草有树，上面有太阳，有风，还在下雨，下面有条河流。我的意思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困境与突破要分多个层次来讲。第一，从基金会的角度来讲，我们想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内心定位是怎样的？我们是要做一个野孩子，还是要一点一点成长起来，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价值的组织？我们准备担当什么样的使命？行使什么样的责任？这些对于公益组织来讲是非常核心的问题。使命跟组织发起人的价值观相关，而他的价值观跟他的人生观相关，他的人生观跟他整个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教育背景、社会道德、社会趋向有关系，如果这块我们理不清楚，那么他走出来的方向也不同。

第二，这个孩子要长得很强壮，这和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管理系统、执行能力密切相关。我们周边呢？有阳光、雨露、树，这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我们的政策、氛围、民众关注。如果我们自身理不清，比如治理结构不清楚，我们不愿意成长，那么外面阳光雨露再好也没有用。第三，希望孩子长成多大，给他什么阳光、给他什么雨露，想不想让这个孩子长大，如果我们不清楚，那也很麻烦。总的来说，从自身角度来看，有一个崇高明确的使命很重要；从社会来讲，让这个孩子健康成长很重要。



徐永光：启泰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公募基金会创办的使命、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在会上看到的这些非公募基金会，可以说是中国国内比较优秀的一批。如果我们全国的非公募基金会都有非常好的使命、价值观以及林启泰讲的内部治理，这对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将会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朱健刚：非公募基金会目前有三个困境：第一，政府限制公募；第二，治理产权不清；第三，评估环境好坏。第一，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都有一个愿望——想公募，我们希望项目做好，能够吸引更多的钱进来。现实生活中，这个政策限制性非常强。我们在广东深有体会，希望困境能够突破。第二，捐款人就是老板，实际上捐款人和投资人真不是一个概念，基金会的财产究竟属于谁，我对阿拉善 SEE 这样的基金会非常看好，它是民主治理的结构，吵架没有关系，民主治理非常好。第三，我们发现很多基金会花钱的能力不足，我们并不知道项目好坏，很多基金会没有从事过公益项目的运作，所以评论项目好坏的能力是基金会发展一个很大的困境。

杜绍基：虽然我们谈的是困境，但是实际上从 2004 年以后，非公募基金会从没有到现在有一千多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认为非公募基金会的第一个困境是不知道组织的灵魂。我们很多的公益组织，没搞清楚组织的使命、价值观、愿景，没有深入思考问题，并且没有清楚地沟通。是什么决定了这个组织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决定了组织做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基金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困境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哪里。一千三百多家非公募基金会，如果一家需要十个人，就需要一万三千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我们想象一下，十年以后，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有多少，现在美国大概有七万多个非公募基金会，中国潜力庞大，对这方面专业人士需求更大，我们今天能够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我们行内应该做什么，我们准备未来做什么，做什么才能让我们这个行业团队发展，这都是需要我们重视和深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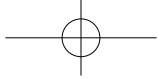
窦瑞刚：我作为企业基金会的代表，重点讲一下企业基金会面临的困



境。企业基金会这个词是美国的概念，由单一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发起的，以该企业的商号为基金会商号的，由该企业或该企业的员工为主要捐赠者的非公募基金会，我把符合这样意义都当作企业基金会。

对于企业基金会来讲，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基金会的筹备者和实际的运作者，我有很深的体会：第一，专业化的人才和有公益梦想的人才稀缺。公益人才有两个标准，一是专业化，二要有公益梦想，但是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人才基本上找不到。第二，缺乏优秀的合作伙伴。阿拉善讲的困境，绝大多数企业基金会都会面临，因为企业基金会和很多基金会比，价值判断不一样，比如企业的价值判断是关于效率和效益，关注投入和产出，那么他更倾向于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只是产出的不再是经济效应，而是社会效应。所以，如果一个项目没办法给我一个清晰的投入和产出，没有一个清晰、完全的解决方案，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资助你，这是企业一个思维训练根深蒂固扎下来的文化基因。

第三个困境，企业基金会和企业关系的平衡问题。从全世界看，企业基金会都是企业 CSR 的延伸，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个最重要的载体。那么，基本上企业基金会和企业是一个伴生关系，企业基金会从来不用担心资金来源问题，而最关注公益项目的投入和产出，寻找优秀的公益项目，以及公益项目和企业的愿景使命及价值观的高度吻合问题，还有在执行项目中，员工、合作伙伴、用户如何参与等问题。另外，如何平衡长远的目标和营销公益活动？在中国当下，绝大多数企业基金会实际上成了企业的附属，成为企业公益性品牌活动的部门，而丧失了自己作为独立主体的长远愿景，也没有长远规划。这是企业基金会可能面临的三个核心困境。



慈善需要宗教，宗教也需要慈善

焦自伟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副司长

宗教可以做慈善，也应该做慈善，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党和政府非常鼓励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是这几年党的宗教工作的一条主线，而在宗教界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里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公益慈善事业。早在 2007 年，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讲，要鼓励有条件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我们宗教部门这些年一直在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创造好的环境，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继续提升的空间很大。眼前我们正在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早日出台一个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文件。

第二，慈善需要宗教界的参与。过去我也曾经从事过和民政相关的工作，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会提到鼓励社会公益慈善业的发展，这个方针很明确，而宗教历来就被视为慈善之母，无论是古今中外，最早搞慈善或者说慈善影响最大的往往都和宗教有关系。新的时代，要推动整个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宗教界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第三，宗教本身也需要慈善。公益慈善事业是每个真正的宗教界人士或者信教群众提升自己宗教素养和造诣的一个必经途径，或者说是一个内在的诉求。因为无论是我们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其中，慈悲意识、济世利民、为上帝传播爱、为真主传播爱都是基本的教义。如果说一个宗教组织或者说一个宗教信众，他内心启发不出对别人的爱以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积极性的话，他本身的宗教造诣肯定会遇到障碍。所以我个人认为，从事慈善本身是宗教界一个内在的诉求。

作为宗教工作部门，我们希望宗教界的公益慈善能够做出自己的特点。现在社会爱心人士很多，特别是自 5.12 汶川地震以来，整个中国慈善热情都被激发出来，献爱心的企业家、公民个人都有很多。我们宗教界要从



事公益慈善的话，不是和别人进行同质竞争，而是进行互相补充，干出自己的特点。

宗教不仅是钱的事情，也不仅是行为的事情，更重要是精神上的事情，宗教是需要精神的，需要道德的，需要文化的。当然如果只有精神道德文化，没有一些可持续保障的机制，可能也做不下去。反之，如果没有精神道德文化的话，宗教慈善本身也很难持续，而这个领域恰恰是宗教界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展示自己独特特点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以前听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林启泰先生介绍过他们的培训理念，当时我很震撼，他说，一个志愿者要参与到我们这个基金会来，进行培训，最关键的第一个培训就是要转变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学诚大和尚给大家教导的，我们不是做救济工作，没有什么人需要我们去救济，我们是去给自己积累福报。也就是说，要感恩被助的人以自己的苦难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启发自己爱心、增长自己福德的一个平台。当时我听了，很震撼，那时候我正在做和慈善相关的工作，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做一点点微不足道善行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受助者的感恩，得到受助者的尊敬，如果万一没得到的话，内心很苦恼，产生各种问题，而他的理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干慈善是为了自己好，不仅仅是为了受助者好。

当然这可能是佛教的理念，在我们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里面一定也有类似的共通的理念，大家不仅为对方做慈善，同时为了自己。这样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情，可以有助于我们慈善长久持续做下去。



宗教公益慈善事业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效突进

郑筱筠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宗教慈善公益事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宗教在慈善公益领域做了很多事，作用逐渐被政府公众认可。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在社会慈善领域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厘清几个问题：宗教在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定位问题；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慈善公益事业中的角色问题；当代宗教公益事业将面临哪些挑战；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宗教慈善公益的发展趋势究竟如何。

第一，宗教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社会定位问题。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展出非常发达的慈善模式，比如美国是民间主导型的慈善模式，英国是政府民间合作伙伴型的慈善模式，加拿大是志愿参与型的慈善模式，新加坡是政府主导型的慈善模式，中国香港是社会多元参与型的慈善模式，中国台湾是社会福利型的慈善模式，而中国大陆的宗教慈善模式正在探索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准确定位非常关键。

过去，慈善公益事业是中国宗教的传统，慈善事业的兴起和中国的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宗教是慈善事业的一个常青藤，慈善观念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理论组成之一，慈善活动是宗教慈善观念外显化和社会化的，是宗教慈善理念的社会象征符号。最近 30 年来，我们大陆的佛教界相继成立很多基金会和各种机构，比如佛教希望工程编委会、慈善功德会、慈善超市等等慈善形式，而港台地区的台湾慈济功德会、佛光山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等等，也在积极践行佛教慈善事业。佛教这样，其他宗教也这样。

当代中国宗教已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慈善公益模式。近年来，宗教团体、宗教公益基金会，已经在慈善公益实践活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慈悲救助的社会服务能力，包括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走出中国特色的宗教慈善服务模式，包括云南西双版纳的“佛光之家”项目，目前西双版纳州大大小小八百多所佛寺，信佛群众 30 多



万人，百分之八九十都参与到“佛光之家”的事业中来。

除了常态下的慈善活动，在一些灾难现场非常态、非秩序化的状况下，我们宗教慈善公益活动如何开展？现在越来越形成非常独特的宗教应对体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一种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使人们从精神心理到日常生活重新秩序化。秩序化第一个层面，就是从观念上对灾难做出解释，将非常态、突变的事件纳入对既有世界的认知框架中，虽然不同宗教对灾难进行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个共同点，苦难是灾难的核心。第二个层面就是心理干预，通过抚慰、调整心理，这种心理干预的机制尤其表现在对个体的帮助方面，宗教应对的行为在帮助人们整理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慈善公益事业中的角色。在当代中国，政府始终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管理者，始终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09年以后，民政部门对慈善事业的宏观指导和推动日趋凸显，慈善联合救助机制趋于完善。但是政府应该在慈善政策法规建设中，强化发挥政府职责，积极培育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意识和责任，鼓励更多公益基金会和慈善团体参与社会公共领域建设中，同时还应该加大执法和监督的力度，使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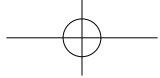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第三，当代宗教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挑战。首先，在组织制度方面，宗教慈善组织不能建立独立的法人机制，现有体制下难以全面开展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其次，宗教慈善基金管理方法，缺乏相应的管理监督机制，缺乏操作层面的制度保障。再者，虽然宗教界创办了各种慈善超市、慈善基金会，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开始展示中国宗教界在基金探索的模式，但是和慈善家参与的慈善事业相比，宗教慈善事业发展还显不足，也没有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还有，缺乏慈善公益事业的专业人才，这也困扰着中国宗教公益慈善发展。最后，如何与当代中国公益事业接轨，与国际交往活动接轨，我们如何以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去参与国际救援、国际慈善活动，这都是未来困扰大家的问题。

第四，中国宗教慈善公益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宗教公益慈善



仍然是步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效途径，宗教公益活动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契机。宗教慈善的专业化程度将得到有效提升。宗教慈善公益活动将得到有机的整合，从各自分散性的慈善公益活动逐步发展为联合性、整体性的宗教慈善公益活动，从而更好地展示中国宗教慈善活动的社会贡献力量。

因此，社会公益事业将成为当代中国宗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也将是其进入国际社会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效途径。未来，中国宗教将会形成中国特色的慈善公益模式，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慈善活动主体之一。



2012 年会

主题：财“劲”其用，追求卓越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广州召开。这是年会第一次走出北京。会议深入交流和探讨了作为推动社会建设与创新发展的积极力量，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有效使用和管理资金以及与此相应的策略、方法和具体实践等议题。共有 154 家基金会，82 家 NGO，70 家媒体和 43 家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等 597 人参会。会上发布了《第四届 CPFF 研究报告：财劲其用 有效公益》。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2 年组委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轮值主席）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上海增爱公益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华夏人慈善基金会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2 年会上的致辞

刘忠祥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非公募基金会是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创设的一种基金会类型，它的出现满足了企业和个人回馈社会的需要，丰富了我国公益组织的种类，动员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壮大了公益力量，和公募基金会以及其它公益组织一道为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非公募基金会从无到有，资金由小变大，每年都以快于公募基金会的速度在增长。截至 2011 年底，全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资产总额达 338.89 亿元，当年公益支出 73.8 亿元。今年第三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登记的 2793 家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为 1500 家，超过了公募基金会。这些非公募基金会中，有高校发起设立的，有企业和企业家发起设立的，还有热心公益的社会各界人士发起设立的，所以说是类型多样、特色各异。它们在救助灾害、扶贫济困、支持科教文卫、环保事业、动员志愿服务、倡导健康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非公募基金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整个行业的积极推动。多年来，登记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一直将非公募基金会作为鼓励支持的重点，在设立登记、日常管理、培育扶持等多个方面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非公募基金会自身也在积极探索和加强行业建设，在加强促进行业交流、推动行业发展方面进行创新和建设。2008 年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及部分非公募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论坛的举办为全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对话的高层次平台，也为社会了解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

从已举办的三届论坛年会来看，会议对于扩大非公募基金会之间的交流、促进非公募基金会的能力建设、推动非公募基金会行业的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届会议将讨论的重点定位在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有效地使用和管理资金上，可以说很有必要，只有“募钱有招、生财有道、用钱有效”才能充满活力，最大限度实现公益目的。

2004 年至今，非公募基金会在经历八年多的发展历程后，使命责任逐渐清晰，资产规模逐渐扩大，内部制度日益完善，人才队伍趋于稳定。非公募基金会在未来一个发展时间段内，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断提升资产和财产管理水平。

具体地说，一方面要提高善款的使用效率，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瞄准性，将拥有的公益资源配备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让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应，真正做到“财劲其用”。另一方面就是要做好资产的保值增值工作，以保证非公募基金会运作的独立性、增强发展的有序性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卡耐基曾经说过，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对于基金会而言，花钱比挣钱更加重要，如何花好钱、管好钱是每个基金会需要努力打造的核心竞争力。希望各位能借这次论坛召开之际，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交流，争取有所成果。

中国现在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各类公益组织的不懈努力，需要舆论的正确引导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探讨。民政部门作为公益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主管部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各类公益组织发展。

一方面，通过完善登记管理体制，对公益组织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其中非公募基金会仍将是鼓励增长的重点。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公益组织进入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发展领域，推动政府部门转移职能，加大对公益组织服务的力度和广度。我们还将继续为公益组织争取更多的支持，包括税收政策的支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公益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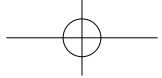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公益组织的监督管理，建立政府监督、公众监督、内部治理和行业自律的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首先，我们要进



一步制定和完善公益组织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规范公益组织的捐赠、接收、管理和使用行为、保值增值行为、与盈利机构的合作行为等。同时，我们将强化登记管理机关职能，加强日常监督、年度检查、等级评估和税收优惠资格审查等现有的监管手段。

特别是我们要推动对公益组织的监督，继续推行信息公开，抓好现有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扩大公益组织在组织募捐、开展公益活动、财产管理等公众关心环节的公开程度，还要进一步支持基金会统一网络工作平台的建设。当然，我们将结合非公募基金会自身的特点，在引导资金合理使用和高效管理方面制定相应的鼓励扶持和监督管理的政策，继续推动非公募基金会发挥在动员社会资源、创新公益服务模式方面的创新。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一路走来已有四年多，正在逐渐成为非公募基金会领域的知名品牌。希望在今后一个时期，论坛能够扩大主题的普适性和参会代表的广泛性，增强与公募基金会以及其它类型公益组织和其它相关领域的合作，为非公募基金会以及整个公益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最佳资助实践的案例、启示及建议

朱健刚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

基金会跟受助机构之间有一个互补关系，主要有四种类型，有的基金会可以同时具备这四种类型，或者只有两种类型，我们称之为理想类型。你会看到有四种不同的资助逻辑在影响着资助。

第一种是服务购买型。基金会资助受助机构去做基金会想做的事情。我可能不是很信任你，我的想法不能靠我一家执行，我去找相关的被资助机构执行，基金会带有一定的主导性。我们随便举个例子，万通基金会想做生态社区，也许有一个 NGO 组织可能并不是要做生态，可是它有人力在社区做，那么也跟它联系支持它去做生态社区的建设。

第二种是项目资助型。基金会资助受助机构去做受助机构想做的事情。比如联劝，作为一家公募基金会，它在做“一个鸡蛋的暴走”的时候，会找受助机构提出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再由联劝决定是不是去资助这些机构去做它们想做的事情。这是以受资助的机构开展项目为导向的。

第三种是机构资助型。随着信任的不断加深，有一些基金会不仅支持资助机构的项目发展，而是选择陪伴这些组织一起成长，我们称为伙伴策略。它不仅仅提供项目经费，而且也会对这些组织的行政经费、人力建设进行全方位的支持，比如南都基金会的景行计划。

第四种是孵化培育型。这类更加具有战略眼光，这个项目可能还没有，这个机构也还没有，去推进这些机构形成和发育，为新生的公益组织提供成长所需的充分养料，它像是一个催生公益组织和团体去实现的过程。比如说北京的联益基金会跟零点合作，做“黑苹果”计划，培育很多青年的公益团队。深圳的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培育很多残疾人的机构，孵化和培育它们，让它们成长和发展。

分析完以上四种类型，我们再分析基金会资助工作的动力机制。

第一类动机，强烈的价值驱动。很多时候是强烈的价值观念在推动基



基金会开展工作，它可能包括愿景、使命，也包括战略计划。比如说 SEE 基金会发展出一整套的战略，战略核心的观念就是要做资助，它是一种资助战略，我们有时候称为战略性的资助。

第二类动机，完整的制度保障。很多国际基金会有非常丰富完整的资助流程、资助及评估标准。基金会的资助跟以前的慈善式救助有很大的区别是，它的社会问题解决之道是发展，而非慈善，用发展的方式助人自助，形成一个培育的过程来试图使问题在根源上得到解决。比如凯风基金会，它关注一些中国社会的宏观问题、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然后找到相关的学者资助他们开展研究。此外，资助可以使很多项目完成资源的整合，推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通过资助的方式连接起来解决问题。南都基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它动员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民间公益组织能够跟基金会捐款人连接起来。

第三类动机，自我革新的需求。基金会因为有这样的资助，所以它会改造自己的资助和筹款道路。联劝的“一个鸡蛋的暴走”，因为要做这样的资助，所以它们发展出很多新的筹款方式，同时也会促进基金会治理的创新。

第四类动机，生态价值的渴望。资助可以打造公益的价值链，尤其是公益的知识性机构、草根服务组织它们之间怎么能够连接起来，形成内部的良性的生态系统。

第五类动机，再造社会力量的崇高使命。这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它不仅仅是完成资助，更是希望能够发展出以民间公益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和发育，在公益领域内建构社会资本的增长，促进人们之间、各种组织之间的信任、互惠与合作关系，这是社会力量的一个再造过程。比如壹基金的海洋天堂计划，把很多残疾人的机构连接起来，让它们形成网络，同时也包括医疗救灾，救灾也可以一起来，它不断通过这种方式来培育出一种网络形态的新的全球的社会。

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我们有以下建议。基金会应该放下上游下游的观念，应该实行一种多元主义的视角，形成一种多元伙伴的合作关系，实



施走出来的策略，将自己看作是整个公益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以资助为纽带，把资助跟筹款相结合，形成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基金会、社会创新家、媒体、学校等多样化的一种合作关系。它包括提供多元化的资助模式、形成充分的信任关系、建立规范的资助流程，同时我们也建议不仅仅是给钱而应该是技术、人脉的多元资助。

最终，我们希望形成公益行业内部有效的战略联盟，希望基金会通过资助的方式实现财劲其用，有效公益，也希望通过资助使得基金会成为民间公益组织在政府、企业之外的新资源，这种连接我认为是中国社会建设本土资源开发的最终道路。这样，我们的基金会和民间公益组织、公民社会才能够相对独立自主发展，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未来中国的希望。



基金会官方背景的“罪”与“罚”

姚晓迅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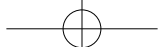
我服务于一家公募基金会，在当下的情况下，所谓的公募基金会一般来说总是与官方背景有关系，我讲的都是指这一类组织，不是特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我的基本观点是：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应该对自身做出调整，从原来单纯的拾遗补缺功能向服务公众转变。

上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前几年是公募基金会的兴盛时期，那时候有几家公募基金会和官方背景的组织在包打天下，很热闹，这类组织都无一例外地奉行这样的原则和策略：向社会募集款项，协助政府解决政府公共财政不足的问题，在教育、扶贫等领域内扶助弱势群体。这是通常很流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拾遗补缺，被很多组织定位为自身的功能。拾遗补缺这种定位确实实是高举着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大旗，在体制内正式组织，独立深入制度空间内，并寻找公共空间，并且定义了自身的活动空间。拾遗补缺的定位使官办组织找到了向社会募集捐款的根据，它是如此的有用和有效，以致于慢慢从权宜之计变成一种惯例，甚至成为制度固定下来，这种拾遗补缺的功能被基金会当成最优先战略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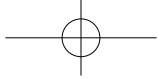
但是随着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增长，官办基金会资助的领域越来越被政府所接受，资助需求在萎缩。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有实力的公益组织不断进入公益领域，公益领域的竞争在不断加剧，官办组织的竞争力相对削弱。越来越多的竞争使得拾遗补缺活动空间缩小，这是必须面对的困境。

实际上在我看来，拾遗补缺这种功能没有什么不好，是这些组织应该做的，但是“应该做”不能当作单一的或者是特别重要的功能，应该寻找一些其他的功能补进去，这样对组织的自我更新也是有意义的。

这几年有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实力不断增长，他们有相当的实力，理所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了辅助性、补充性社会功能外，应该有更大的担当，应该创造新的活动空间。一般官办组织的优势在于面广、地域



宽、工作网络广泛，另外它也有积累下来成型的项目品牌，这些东西都为官方公募基金会发挥更多作用提供了基础。可能和非公募基金会比起来，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于“公募”两个字，可以面向更多的公众。但是公募基金会如果真的放下身段，谦卑地服务公众，可能会有更多的用户。



民间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的合作

洪波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理事长

徐永光老师说：“你们草根组织要主动敲基金会的门，你们自己要学会去推销自己。”但是很多伙伴都问过我：“你能不能介绍一些基金会？”其实我对中国 2000 多家的基金会也不了解，不知道去哪敲门，也不知道去敲哪家的门，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敲是合适的。所以我呼吁我们这个行业是否能够搭建一个平台，让供需双方互相了解，让一些在前线没有资源的公益机构和一些有大量资金的基金会都展现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期望。

第二个期望：我们希望在行业内有庞大的专家团队。我们在申请项目的过程中，曾遇到一些问题。有一次在北京参加评审现场，当时基金会在它的网页上告诉我们，届时会有 7 个知名专家到场，很多草根组织申请这个项目时也是因此慕名前去的，希望得到专家们的点评。于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到评审的现场后才发现，专家中的七个人变成五个人，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和图片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其中只有两个人是专家，那三个人很可能是被临时找去的，并且没有关注我们的评审。我们的伙伴就说：我们借着钱来北京，而专家却只有两个。我听了当时觉得心酸。我们格桑花获得了资助，但是在周围还有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们比我们更加艰难，甚至连站在这个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都没有。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钱的机构想申请基金会的资助，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你中标了，得到了资助，还得垫钱。因为从漫长的评审到项目结束，一直要等到基金会满意之后才会把钱转到你的账上。所以你必须要有家底，如果你没有流动资金，没有不定向捐款，即使申请到这个项目，还是要去借钱。于是这也造成一些机构不再申请项目。本来申请资助后很高兴，后来才发现执行中非常艰难。由于我们欠了供货商的钱，供货商不断打电话催促，基金会也十分忙碌，他们还要寻找评审团，因为专家不够用，有的基金会开放 100 多个项目，工作量也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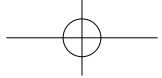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呼吁建立起公众参与评审的体系，使用更多好的方法来筛选出好的项目，而不是采用唯一的评审方法。

再来讲讲工作经费问题。我们中标后，基金会收取了 10% 的工作经费。在分配这个蛋糕的处理上，他们给了 2% 的经费。要知道，在西部，如此辽阔的西部用 2% 的工作经费把项目执行完，当时我们真的是贴钱做事。当年我推动这个组织的时候，只要能够申请资金的基金会我们都会争取，哪怕是贴钱，我们也觉得能够锻炼自己。但是后来发现，这样根本不能持续发展下去，每一次我们都是在艰难的情况下把项目艰难地做完，一次次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在损害这个组织未来长远的发展。有些项目只有请临时工，不敢请专职稳定的人员，因为人力成本就放在这，谁愿意到西部做长期的奉献呢？在这里我想讲的是：基金会要考虑到我们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都是共同推动中国改变的力量，我们不是总包和分包的关系，我们更不是贵族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商。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个故事。我们申请了一个 10 万元的采购项目，基金会要求我们分三次采购，然后三次拨款。我们从西宁采购到玉树一次是 2 千多公里路程，三次要 6 千多公里，浪费的运费难道不是社会资源吗？基金会的钱难道不是社会的钱？他们虽然在报告中的呈现非常完美，但在报告中都不曾出现过合作伙伴执行机构的名字，我们广大的草根组织都到哪里去了？在一线做执行的机构，他们都没有名字吗？大家都说有平等和尊重，平等和尊重不是放在嘴上，而是体现在工作的细节中。为什么给我们制定这样的标准？制定这样的规则，让我们分开做三次采购？为什么不听听我们的声音？这些标准和规则由谁制定，到底谁说了算？是不是有钱的人说了算？我们不是为基金会服务，我们也不是站在谁的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共同站在服务人群、受众对象的角度，从他们的需求来提出这个问题，看由谁说了算。我们不是为了这个项目做项目，而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及规范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基金会总认为草根组织不专业，难道基金会就专业吗？

我期望，我们有缘遇到过的基金会，都是我们的兄弟、伙伴、战友，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怀疑者、责难者和旁观者。因为我们都是改变中国的力量，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希望他们不把我们当成廉价劳动力的提供方，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很牛的发包方。他们不是像选秀选手一样的海选项目，而是抱着审慎的态度选择在中国基层一线做事情的机构和组织，希望能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希望有一天我的梦想能成为现实，我想这个希望也是代表很多像我们一样、顽强扎根在中国最偏远的农村、牧区的公益组织们。

希望今天现场的基金会代表听到我讲的故事后不要对号入座。因为讲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伙伴曾经建议我匿名发出这篇文章，但是我相信真话也会使基金会有改变的动力。我们需要共同的成长，也相信一定会有人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资助的力量—非公募基金会资助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刘小钢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

为什么要讲资助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资助的力量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很多朋友都知道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这是一家由 100 名企业家联办的环保社团，这个社团是 2004 年 6 月 5 日成立的。但是在这个社团成立 4 年后，我们成立了 SEE 基金会，SEE 基金会是这 100 个捐款人联合起来出资成立的，我们叫 SEE 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那就引发出一个思考，这 100 名企业家 2004 年成立生态环保协会，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做环保的平台了，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做慈善，为什么在 4 年后又要成立 SEE 基金会？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他们发现，100 个企业家加上 SEE 内部的工作团队，在阿拉善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的资源和影响力都没有办法释放出去。一个机构拿着这么多钱，去某一个地方做某一件事情，这样的模式事实上很难走得远，也很难发展壮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是，要把 SEE 的资源汇集给更多的民间环保组织，让民间环保组织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达成 SEE 或者说我们共同的使命、愿景，把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变成资助型的基金会，从这个过程，企业家们发现资助是有力量的。如果我们自己做，这个力量释放不出来，我们一定要用资金的力量，支持全国更多的环保人士、更多的环保社团，大家一起推动，这样资助的力量就能够发挥起来。

从 1981 年到 2003 年，这 20 年非公募基金会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但是从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得益于有利的制度条件，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很快，也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超过公募基金会，然后一直往上走，2009 年发展到最顶点，这一两年有一点回落。总的来讲，这个发展的趋势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会。为什么？事实上我相信这些捐款人，他



们都看到了资助的力量。很多企业家也好，个人也好，他们在 2004 年后纷纷用基金会的形式参与到中国公益慈善工作中。

为什么非公募基金会在这个制度基础上能够发展很快？因为它本身有很多优势。

首先，非公募基金会具有主观的能动性，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参与。我们做民间公益组织的这些伙伴们都知道，公益事实上跟人的内心驱动关系非常大，这不是一个被安排的工作，是你自己真的愿意去做。非公募基金会事实上是遵照我们每个捐款人的意愿，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去达成我们的愿望。所以，制度建立后，力量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在释放力量的过程中，确实也在平台上做了很多事情。解决社会问题，政府是主力，但民间的这股力量通过非公募基金会的平台释放出来，跟政府一起做了很多攸关社会福利、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

其次，非公募基金会具有更强的民间本土资源的动员能力。当我们能够自己去成立基金会，跟一批朋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就从根本上调动一些有资源的个体和群体，大家联合起来。非公募基金会其实是为这样一股力量的释放，搭建了一个平台。

再者，更重要的是，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前者的自主性比较强。我们这批捐款人，将我们的愿景和使命达成共识后，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而公募基金会特别是很多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性可能比我们差很多。

我们这次出了一份研究报告，研究成果表明，现有基金会掌握的资源，大多数都是资助给了民间公益组织以外的其他一些机构，资助给了政府机构、学校机构、研究机构或者是其他基金会。而民间公益组织冲在第一线，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活动，事实上他们是最需要资源的。现在真真正正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基金会资源，占比只有 8.9%，这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我们认为，资助的力量如果要释放的话，事实上应该支持我们在一线工作和服务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只有向下倾斜，把所有的公益力量重新整合起来，民间的力量才能发挥到最大。



事实上，现在的基金会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整体资源结构失衡。基金会的资源很重要的就是钱，钱的来源非常多的依赖于企业。而在一些民间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很多钱是来自于个人的。另外是公益资源的严重垄断，大部分社会捐赠流向政府部门或是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红会。官办基金会理论上也是应该将这些资源倾斜给一线服务型的组织，但实际上只有 1.3% 的捐款是流向慈善会以外的一线民间服务型组织。我们整体公益资源的流向是有问题的。基金会可能是有一定的资源的，但民间一线服务型组织非常缺乏资源。这两个资源怎么对接，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二是基金会的资助理念和模式的变化和演进。2004 年到 2007 年，非公募基金会的数字一直在稳定增长，但是更多的非公募基金会还是倾向于传统的运作方式，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没有很大的社会效应。2008 年 5·12 大地震后，因为灾害太大了，光靠这些基金会自己去做事实上是做不了的，所以很多的基金会，包括南都，就开始支持我们在一线的民间组织去救灾。壹基金花了很多资源去支持当时在四川救灾的组织，这对整个的公益发展有很大的促进。2009 年第一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召开，慢慢触动整个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这两三年大家就在思考，我们每一个基金会在整个行业里面，我们要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公益价值链来考虑，基金会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现在也开始考虑怎么样重心向下。可以说，基金会的资助理念也是有很大转变的。

我们的基金会从一开始筹到钱，到自己去做，到慢慢的用一些不同的模式去资助其他的这些组织去做，一步一步就形成了一个公益的价值链，那这个公益价值链在我看来，我就觉得我们基金会就是一个肩关节、胳膊肘。

我们如果是一线的服务型组织，它可以做得很多，也可以做得很深，但是因为它在一线工作，辐射面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一直往上走的话，它可能会离一线远一些，但是整个的辐射面和能够影响到的组织会越来越多，或者是受助人群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认为更有效地去发挥



资助的力量，是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做成肩关节这个位置，然后在肩关节这个位置上去给力，去给我们很多的枢纽型组织支持机构，然后去给力给一线的民间的服务型组织，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把大家都能够连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影响力，或者是整个民间社会影响力就会非常大。

从整个演变的过程来讲，从传统型逐步去开始尝试资助：有一些原来是单纯的资助项目，现在有战略型的资助；有一些原来是支持个别的组织，现在变成了行业的资助；从原来是资金的简单的资助，变成了资金、战略和能力提升的这种立体的资助。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公募基金会可以发展的很多的路径和去向，还有从关注短期的结果和需求到关注长期的社会影响力。

任何一个生态环境，都是由多种生物组成的，每一种的生物其实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作为基金会，作为服务型组织，作为各种各样在民间社会里面去给力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组织，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去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力量的话，我们把它联合起来，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助的力量。这是一个我们想看到的很重要的愿景，我们希望整个的民间社会，大家可以互动，可以互相给力，到最后有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存在，然后我们公民社会相信一定可以发展的很好。



稚嫩的肩膀，沉重的使命

何道峰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是社会市场构建的历史机遇期，为什么这么定义？我们讲现代化，现代化是迄今为止倒算 200 年以来，全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国际竞赛。本来现代化是荒谬的词汇，因为时间是不可能倒转的，每个人生活在现代，那什么叫现代化呢，现代化是定位国与国的差异，为了在差异中找标杆，因此出现了“现代化”这个词汇。

如果按普世标准讲现代化，绝对没有四个现代化，只有三个现代化。哪三个现代化呢？经济市场化、社会市场化、政治市场化。如果这三个市场化完成了，你就是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是指工业或后工业文明的经济市场化、社会市场化、政治市场化的社会，取代农耕文明的君权神授、民权君授的身份化社会。市场化取代身份化是什么过程？市场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平等加竞争等于公平。市场化平等竞争的原教旨主义有三大构建：第一个构建是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的主体。如果在里面打球的人是有身份的，那就不是市场化。第二个构建是周严细致且公开成文的公行准则。第三条要独立公正并接受监督的裁判系统。有这三个基本构建后，我们才能称为市场化，只有这种市场化才可能产生公平，也才可能产生效率。

中国的百年探索与牺牲，到邓公手里才找到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理性秩序即东亚模式，先搞经济市场，再建社会市场，最后建政治市场。撇开争议，先从建立经济市场开始，经历了 30 年，到了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关口，要建立社会市场。因此中国正处在构建社会市场的历史机遇期。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是 5 千美元。

第二，中国经济结构进入内需自循环边界，所有现代化国家一开始都要依靠对外扩张把工业撑起来，然后再靠内需完成城市化。到了这个点为什么可以？因为内需可以支撑循环，可以让我们走出这个怪圈，50% 城市化问题不大，尽管我们会犯错。



第三，中国 50% 城市化之后，第一代富人已经初具规模，虽然富人比例没有美国大，但是绝对数量超过美国。因为人口基数大，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中产阶级说到底是依靠服务业开始的，也包括做非政府组织的人，剩余财富、剩余时间积累，为公益提速准备了必要条件，未来十年中国一年 5 千亿捐款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中国的基尼系数 0.5，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分化阶段，政府由于重返经营领域与民争利，公共空间严重缺失，经济市场公平性界限显得模糊。

第五，社会心理的问题，社会过度物质化，新富人群和新中产阶级精神迷茫，心灵烦躁。最近庙里的大师跟企业家的对话急剧上升，各个大饭店的沙龙都有高僧出入，很多企业家成为学生在下面打坐。

第六，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互动，加速这种社会冲突，彰显公共空间的缺失，呼唤志愿精神与社会变革。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没有今天这么敏感，社会也没有坏到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因为有了互联网，把图像放大了，因此现在让我们国人心里的烦躁程度相当的沉重。一个推动社会改造与转型，构建社会市场的历史时代已经到来。

非公募基金会稚嫩的肩上落下沉重的历史使命。

非公募基金会一经开闸迅速崛起，在人类的公益发展史上，我没有做过比较。去年达到 1500 多家，超过公募基金会 20 多年数量的 20%。但是会议上很多讨论，非公募基金会的肩膀依然年轻稚嫩，比如体现在 1500 家有 215 亿资产，平均每家 1300 多万，但是高校基金会每一个都是一亿、几亿，中位数以下 200 多万。非公募基金会从逻辑上来讲，应该是捐一笔钱不动本金，主要靠这笔基金产生的盈利收入支持公益事业，但是如果只有 200 万，逻辑上有一点扯。200 万即使放小额信贷，收入也就几十万，做公益稍微有一点薄弱了。是否所有的非公募基金会投资人都想好了公益基金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追问的话题。

50% 以上的组织年收入只有 200 多万，年支出只有 166 万，每个基金会全职人员只有 2.9 人。还有一个数字很有意思，只有 23.4% 的基金会在



做投资，如果是公募基金会可以理解，非公募基金会的宗旨就是拿一笔钱去投资，赚了钱去做公益，现在只有 23.4% 在做投资，这就有点费解。当然这就是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我们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我们的未来。只有 6.4% 的收入来自投资，投资回报 7.7%，还不错。按照国际惯例这么多的基金会大多数应该是资助型的，但我们只有 13.5%。从这些数据看，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依然稚嫩，治理和管理还在探索中成长，还有诸多的问题，比如说理事会的结构是不是由捐款人管，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面对的问题是：中国公益的现状和期许。现代公益始于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公益是早产的、天生不足的，怎么不足？第一是用敛财补充财政收入的不足。第二，政府可以接受慈善捐赠。第三，事业单位可以接受慈善捐赠。第四，官办公募基金会的市场垄断，这个市场垄断基本上是发挥老干部余热，让老干部多干几年平衡社会矛盾。这样一种早产，现在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它不对，它已经这样发生了。历史是这样发生的，就像奥巴马上台讲的，中国没有西方这套东西以前，他们已经蹒跚走过了 5 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国的公益组织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一，公益等于慈善，慈善等于做好事，做好事等于学雷锋和积德行善。在这个等式中，把中国公益给阉割掉了。公益不等于慈善，慈善也不等于做好事，做好事也不等于学雷锋。但是我们这里是一回事。学雷锋说到底还是强行的计划经济情况下塑造非人典型让人们学习的政治冲动。现在公益首先必须是人，尊重人的需求为第一需求，人需要爱己、爱家才能谈得上爱社会和爱国家，一个不爱老婆、不爱家的人说爱国是瞎扯淡。人首先要担当家庭责任，然后才是社会和天下的责任，学雷锋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没认识自己的责任，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因此这两个概念相距千里。积德行善就不说了，为什么要积德，我又没有干坏事，积德行善是一种交换思想。

第二，公益组织继承政府的治理模式，不是公司的治理模式，而正常的公益发展，从市场经济发展看，一定是继承公司的治理模式。

第三，封闭性以及中介和各种人类文明成果的横向联合与利用。这



次论坛年会，把做股票的请来，就很好。

第四，既不是自由结社又非社会自治，无法发育出现代公益与公民社会。

因此，承负中国社会改革与公民社会发育的社会市场构建才刚刚破题，破题的标志就是中国允许非公募基金会注册成立，这样一来大家看到，历史代表未来的重责，落在了非公募基金会稚嫩的肩膀上。

因为第一，始于自由结社和社会自治的现代公益原教旨主义精神，是真正的公益；第二，较好地从公司治理方式中延伸出来，有经营精髓而非官僚精髓；第三，人才选拔和工资待遇可以遵循市场化的原则；第四，非公募代表公益的未来，“夫风，起于青萍之末”，我相信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有那一天；第五，是自身发起，要推动公募基金会的改革，要公益的大融合和社会改造与转型，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关乎到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绝不要妄自菲薄。

今天这个会是有纠结之心的一代与自由之心的一代的撞击与协同。老的慈善一代拥有一颗奋斗但纠结的心，徐永光、王振耀、冯仑、杨团、卢德之、朱卫国、江明修、朱健刚、陈开枝、刘小钢、何道峰……，我们心里有太多的历史情节，虽然我们想自由，但是心做不到完全无拘无束自由地飞翔。但是在会上，新的公益一代拥有一颗职业且自由的心，像窦瑞刚、李劲、沈彬、来超、陆非、子雯、金媛影、尼娜、杨鹏、胡红，他们很自由，还有许多成千上万的自由青年正在加入进来。

在中国公益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遭遇与撞击，第一是在公益理念及其哲学思考方面的撞击，第二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思考撞击，在基金运作经营技巧方面的撞击，在组织战略及机构理念方面的撞击，在资助策略与管理运行方面的撞击，在筹集合作与传播方面的撞击，在人力开发及项目管理评价方面的撞击，在存活与发展策略方面的交流与撞击，等等。公益历史使命对协同的历史互换撞击过后留下什么？我希望留下思考和行动。

历史需要公益界大数据及技术性的协同，我们应该从技术层面着手寻求协同，比如要在对话中寻求协同，在协同中寻求创新。作为大会成果，



我跟永光同志商议，2013年本人致力于推动举行公募基金会论坛，要做出的努力会很多，但是我会努力的。争取让公募基金会展开两年之后，2015年后，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交流。我们争取开一千人的大会。作为大会成果，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格桑花对话，听取洪波的报告。如果那十万块让她招标三次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不管是什么理由，都需要改进，我都可以代表这样的作为向洪波同志道歉。作为大会成果，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与高向军女士的合作探讨。

最后，讲一些个人体会：内修外行、果敢坚毅，在历史突围中探求生命的本真与价值。

人为什么来到世界？有前缘吗？有使命吗？人的生命中有许多不确定，但死亡是确定的，你准备好迎接那一刻的到来吗？这么重大的命题对每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其实都不时在心目中回响。我50岁就能听到死神的召唤，我能感觉到跟死亡的距离，我更要叩问人生的真意。

做公益这一行要内修外行，对外必须要采取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证明你的价值。每个人都很忙，没有时间反观内心。当我们反观内心，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忙就有意义，有很多忙其实都是垃圾，为何不清除那些垃圾呢？进入公益要有柔软而果敢的心，没有柔软的心进不了公益。但是要献身公益需要有坚毅的心，改革本身就是违规的过程，你要做公益，本身也是违规的过程，如果你不准备好、不敢违规，不要干这活。但是你要发菩提心，如果你心中有菩提，心中有光明，你有何怕？我理解各位在创业初期，相当不容易，我一生都在创业，我创完这个业就创那个业，要有坚毅的心。在我们行业中，多讨论一些技术——这个会议讨论了很多技术问题，少谈主义，不要简单分类，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不是敌人，里面同样有朋友、同道，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不是敌人，那里面有你的同道。

不要简单分类，要推倒横在人心之间的高墙，找到“臭味相投”的人，谋我们共同认为有价值的事。我们还要突围与磨炼。中国现在有很多困局，很多事情解决不了，王振耀、徐永光等在推动法律方面可以起作用，我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不等于说我没用。因为我还可以磨炼自己，磨炼本身是



为了改变这个制度做准备，每个人做的事只要形成群体效应，一定会影响这个社会。

我做小额信贷，做了17年，从来就是“非法”的，没有执照。但是我只要把这个钱放给穷人收回来，让他自立，谁要抓我，OK，请，我今晚就去。我很渴望，我坚守了17年还没有合法的执照，如果我要做到100万人，可能有人觉得，不给我这个执照就不是东西了，他自己要着急了，通过我们做终究会影响社会的改变。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些组织的领袖，有精彩的人才，有精彩的领袖，没有徐永光怎么会有希望工程？如果没有洪波，哪有格桑花？每一个伟大的组织，都是一个精彩的人创造的，你要进入公益领域，别把自己看成无名小卒，你就是领袖，你就是精彩的人，你就是影响着改变这个世界的人。谁说这个世界靠伟大领袖改变的？这个世界都是由平凡的人、有梦想的人改变的。既然各位有梦想坐在这里，你让你的精彩成就这个组织的精彩，你就成就了这个国家的精彩。

但是，每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和成为精彩的路都是不简单的，你看人家坐敞篷车看人很轻松，其实坐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轻松，所有成功的人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所有成功的人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上帝要成就你对生命本身的认识和对无限未来的期许，必让你经历磨难和考验。各位兄弟，我也经历很多磨难和考验，张开怀抱，迎接、拥抱和享受这种磨难和考验吧，这个过程原本是灿烂和美丽的！



2013 年会

主题：理性公益，多元发展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基金会、NGO、企业、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计 600 余人出席本次年会，共同回顾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非公募基金会未来应如何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理性发展，实现多元共生的公益诉求。会上发布了《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税收政策研究报告》。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3 年组委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华民慈善基金会（轮值主席）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上海增爱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3 年会上的讲话

蒋正华 第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初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

非常感谢会议组织者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各位嘉宾和与会者很多都是从事公益事业的，今天我们这个论坛着重来讨论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建设中怎样发挥作用以及今后我们怎么进一步发展的问題，我觉得是恰逢其时。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公报已经发布，随着进一步的改革，我相信我们国家新的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已经到来。在这个关键时期里，社会组织特别是像我们非公募基金会这类公益组织将会得到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我现在也正在从事一些公益事业，参与过一些公益活动，所以在这方面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同时我现在还兼任一些大学学院的院长，有的学院也专门建立关于慈善事业的研究中心，所以我们也跟美国的耶鲁大学很相像，它是美国研究慈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另外还有一些国际上很有名的慈善机构，我们跟他们也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我很乐意跟大家在一起交流情况、共同讨论，来研究怎么样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慈善”这两个字是我们公益事业的核心。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慈善，有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很多中国传统家庭都把积德行善作为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而且代代要相传。在西方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 200 多年以前，西方的一些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也基本上是个人的行为。所以西方过去把慈善事业的英语叫做“charity”，原意是慷慨、宽厚、大方的，这是从个人的行为的角度来描述公益慈善事业。

但是在最近 200 多年以来这个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跟我们社会的经济、文化等这些方面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慈善事业在西方的说法，英语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词叫“philanthropy”，意思是慈善机构，这就已经不再是个人的、独立的、偶然的行为，而是结合社会上大家慈善的理念，能够把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力量共同组织起来的一个组



织机构来实施达到我们的慈善目标，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整个资源组织得更好，而且使用更有效率。至于现在有一些慈善，像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它也在不断探索新方法，怎样使慈善资源更加扩大，慈善资金怎样能够自我增值等等。所以关于现代的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内容比狭义上的慈善行为显得更加宽广、更加深刻。

中国这个类型的非公募基金会从 2005 年开始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短短 8 年时间，现在已经超过了 2000 家，大概占到我们全国基金会的总数 60% 左右，这反映了社会对这方面的需求，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确实从来就不缺乏慈善观念，有很多做好公益事业意向的人士和资源。做公益事业一方面要有包括资金、物质等各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慈善观念在社会上深入人心，大家共同参与社会建设这样的慈善公益事业。

非公募基金会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中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在收集公益资源时是多方面的收集，能够接受这些方面资源的提供，这是从我们自己的体会来讲。从政府来讲，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强大的力量和环境，但是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弱点，由于很多程序方面的影响，往往它的反馈环节比较多，而且它对有些问题的反映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非公募基金会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灵活、多样，而且对一些突发的事件可以非常迅速的反映。所以我觉得政府这个层面跟我们民间的这个层面两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达到政府引导、主导，同时我们民间积极的参与，在行动方面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这两方面一定可以使得我们国家的公益事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为非公募基金会，对我们来说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要明确目标，统一思路。现在我们知道的有 2000 多家非公募基金会，每家非公募基金会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服务领域和机构的文化。另外，作为一个社会事业来做的话，应该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大的、共同的理念。我们尽管在不同的领域工作，针对不同方面，但我们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一致的。同时，我们应该怎么样更有组织的把我们 2000 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的



作用发挥好，更有效率地来运用我们的资源，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要完善制度，建好机制。一个好的机制是可以把一个企业、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引导到好的方面，而且可以使它不做坏事，即使有极个别的做了坏事，它的影响也可以缩减到最小的程度。中国原来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叫“人之初性本善”跟“人之初性本恶”，这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应该叫“人之初性本纯”，他是很纯粹、纯洁的出生，至于以后到底做好做坏，那就是我们体制制度的引导，所以体制机制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前两年媒体曝光了个别基金会的一些问题，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夸大或者和实际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确实那么多的基金会中有一些问题存在，有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存在，这也是必然的，但是这就要靠我们有力的体制机制的约束。道德是一个方面，但是道德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道德是一个底线，是我们每个人来参与这项工作的基础，我们还需要法律体制机制来保证。特别是怎样使我们的公益事业能够在阳光下操作，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跟监督，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要开拓思路，勇于创新。非公募基金会在资金募集方面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愿景和服务对象等方面没有跟其他的机构本质上的区别，在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迅速发展，还没有最终成熟的情况下，应该在开拓思路、发挥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能够在创新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占有重要的方面，发出我们的光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2020年提出了很多的前景、愿景，同时也建立了机构来研究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问题，我们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加大对这个问题的开拓创新力度，同时为我们在制度建设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在这里感谢非公募基金会那么多的朋友们多年来做出的贡献，也感谢外国朋友们来积极参加我们的讨论。以后我们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同道者将会在更多领域实现合作，所以我也很希望今后我们这么多的朋友能够有更多的见面机会，大家共同在这个领域中做更多的工作。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3 年会上的讲话

李金华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这里召开了。这应该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公益慈善界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这么多的公益慈善界的朋友们，还有来自美国、英国的公益慈善界的朋友们相聚一堂，共商公益慈善的发展，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
发展大计，的确是一件非常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情。

1981 年以来，中国的基金会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32 个春秋，并且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之一，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非公募基金会是基金会行业的一支新生力量，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近几年来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数量超过了两千多家，几乎占到基金会总数的 60%，直接和间接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工作成就十分显著。比如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救济等方面，非公募基金会往往行动迅速、专业细致、务实有效，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但是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毕竟起步比较晚，还缺乏成熟的经验，加之有些政治措施还没有相应跟上，因而在数量、规模和成效等方面与我国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距甚远，差距就是机遇。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改革步伐的加快，非公募基金会将会迎来又一个发展高潮，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决定》特别指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的创新，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这就为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包括非公募基金会的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保障和发展指南。长期以来，党和



政府都高度重视公益慈善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近年来，进一步加大了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力度，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的政策措施，今后政策措施方面的工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发展的步伐只会更大、不会后退。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包括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更重的任务。社会组织，包括公益慈善事业，大有可为，更有大为。为此我提出三点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做慈善工作就要真正把慈善作为一项工作来做。任何项目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慈善事业是一项爱心事业，也是一项道德事业。我们既然从事这项工作，就要对得起这项工作，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好道德底线、法律底线，不做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更不能做与慈善事业相背的事。不管慈善资金从哪里来，不管来自企业，若干个企业还是社会公众，哪怕是自己捐赠出来的钱，一旦成为公益慈善资金就要取得社会的信任，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要公开透明。一方面要经得起任何的审计和调查，另一方面项目的实施要规范，讲究实效，经得起评估，让社会满意，让出资人满意。

诚信度和公信力是今后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要想增强社会的诚信度和公信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强我们行为的、预算的以及预算执行的公开透明度。现在很多老百姓对我们的慈善事业有着这样那样的怀疑、疑虑，有我们工作上的不足，但更多还是我们在工作中缺乏透明度。全心全意服务也好，增强公信力也好，取得人民群众信任也好，最核心的一条是增强透明度，很多东西不增强透明度，本来没有问题的大家也怀疑你有问题。本来是可以说清楚的你也不主动去说清楚，大家就越来越怀疑，而且从众心态在我们社会上很严重，哪怕有一个帖子就会有很多人跟上去。我从事这么多年审计工作，我觉得解决很多问题要增强公开透明度，特别是我们公益事业在这一点尤为重要。

第二，要不断研究公益慈善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公益慈善事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



处于发展阶段。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同志们要注意发现和研究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我们不仅仅只是做一些慈善工作，我们还要有一批中国的职业慈善家、慈善理论家，这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探讨，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理论和指南，造就一大批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慈善专家。

第三，要进一步扩大视野，要学习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加强国际公益慈善合作，努力开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新局面。1914年前后，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把慈善事业做到了中国，在北京捐建了协和医院，中国人民始终铭记这份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爱心捐赠。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日益融入国际慈善队伍，特别是国际的救灾抗灾医疗援助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需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包括公益慈善方面人道主义义务。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适合中国的一些好的做法，另一方面也要让我们的慈善事业和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我们一定要扩大视野，放眼全球，把包含人道主义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国外去，让中国的公益慈善成为一个国际品牌，让世界人民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爱心和温暖。我们既要加强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还要进一步融入世界公益慈善组织与活动。事实上我们许多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今后我们还要迈出更大的步伐，为中国慈善事业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公益慈善事业是一项依托联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依托联系着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平凡而伟大的事业，现代社会离不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从事慈善事业的同志们都有一颗善良的爱心，你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有的自己省吃俭用，有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的受着社会种种误解和埋怨，但你们坚定不移、义无反顾、服务社会，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非公募基金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坚持改革、推动创新、服务社会，不断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沙祖康 联合国副秘书长、欧美社会科学院院长

我从事外交工作四十三年，一直在第一线工作，是典型的搞政治的，出席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公益事业的活动也参加了一些，但今天我还是生平以来第一次参加我们国内慈善行业的聚会，组委会想让我谈谈慈善国际化以及慈善在国际合作当中的作用，我不是做慈善工作的，对慈善工作也没什么研究，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就完全从门外汉的角度或者搞外交的角度谈一谈对慈善的看法，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第一，中国的慈善工作者应该首先努力把自己的慈善事业办好。我们讲国际化，国际合作前，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近两亿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难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办好中国的事就是全人类的重大问题之一，办好中国的慈善事业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联合国人才大会上，我曾经和美国朋友开过玩笑，我说你们美国人批评攻击别国的人权问题之前，最好用镜子好好照照自己。道理其实很简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身做好了即使不说也能影响到别人，也才能够真正具备说服力和发言权。因此我们讲国际合作，走向世界之前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看看自己怎么样，我们也用镜子照照自己，这是第一个。

第二，中国的慈善事业工作者和机构也应该“走出去”。这个话不是自相矛盾吗？因为世界上有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欠发达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我们联合国经常讲这些国家很穷很穷，所以我们和他们比还算是好的。我们应该发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向他们伸出援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正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疾病流行等跨国界的社会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中国的慈善机构，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



极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坚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慈善机构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能够在促进推动引领国际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第三，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应该走国际化道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中国的慈善事业也应该走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开放之路，实施“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许多国家，特别是先行的发达国家，他们的慈善事业起步早、发展快、做得好，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先进理念、组织及运作方式。我三十八年在国外工作，去过很多国家，但是我发现他们在慈善和公益方面，慈善捐款还要收税，我听了感到很震惊。我在美国很多年，在那当大使快十年，捐款还要交税？逻辑上我不大懂，那谁还愿意干这个事。我们应该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我们非公募基金会的慈善模式，我们讲非公募的起步晚，经验也不足，我们可以先当学生，而且要当好学生，我们应该敞开胸怀伸出双臂，热情地欢迎国际上的慈善机构到中国来做慈善。

总的来讲，我们应当走“先请进来再走出去”的道路。为此我们需要把房子打扫干净，做好家庭主义，然后再做好请客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慈善机构再“走出去”，承担与我们能力相当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国际化应当是双向的互动的，毋庸讳言，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的各方都应该严格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尊重遵守当事国的相关法律。这个话听起来像官话似的，最近棱镜门的案子大家听了很多。另外我当了十年大使，参与经济社会工作，包括人权委员会工作，我觉得我们做慈善要防止一个问题。我们热情欢迎大家到中国来做慈善，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有的人在钻慈善的空子，打着慈善的旗号，钻到我们慈善的队伍中来，搞渗透、搞颠覆、搞破坏和搞颜色革命。阿拉伯的情况大家看到了，那会带来灾难。我们要防止这样的机构来钻进我们慈善的队伍，因为他们是慈善事业的害群之马，我们不能不防。当然谁如果到中国来搞，他肯定要失败。

慈善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民族世界发展与和平的重要的一环。我希望能够与大家一道共同努力，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社会建设首先理解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的能力，表现为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它独立于政治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属性和能力，还有它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及内部团结与合作的能力。在社会自我的自治能力建设基础上，社会建设还要追求它对外部的一种制衡与协作的能力。此外，我们理解社会建设的根本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繁荣和幸福。

非公募基金会如何围绕着社会建设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想有五个主要的领域可以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团结、推动公众参与、建构价值观和理论、培育社会组织。非公募基金会可以通过在这些领域中的作为来对社会建设做出贡献。为此，我们要倡导用生态系统的观点来思考问题。所谓生态系统的观点就是要有一种整体观，同时要有一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理念，也就是说“第三部门”内部有直接为公众和社会做服务倡导的社会组织，还有提供专业性支持的社会组织，像研究机构、评估机构、信息收集机构等等，还有公益基金会，他们主要通过提供资金去支持这些在第一线做事的组织以及专业支持组织，只有通过分工合作才能够提高这个系统整体的效率。也就是说非公募基金会可以通过直接运作在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也可以通过与专业支持型组织的合作来发挥作用。还有一种是跨部门合作，与“第二部门”、“第一部门”合作，共同促进社会建设。

非公募基金会在这种合作和协作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它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区别是什么？首先是创新，也就是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发新的资源，让它更有效率地投入解决社会的问题。其次是择优资助，以你的眼光去挑选最好的项目和机构，然后资助它。不仅仅是资助这些人做事，更重要的是提升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有越来越强的能力和效率，服务于社会。最后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通过你宣扬的资助理念，通过你择优的资助，让全社会知道哪些受助者是高效率的受助者，



不仅仅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到高效率领域，也引领其他资源进入这些领域，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慈善资源的优化配置，让资源流入到那些更有效率使用它的人手中。所以，我们发挥作用的途径一方面是自己的创新，发挥创新的火车头和发动机的作用，另一方面择优资助、能力建设，以及通过这一切优化整个公益生态的资源配置，特别是资金的配置。

今天来看，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有零星的基金会做得比较好，但绝大多数还不尽如人意，发展总体状况不是太好。影响非公募基金会运行的因素有三类：内部因素、行业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战略性思考方面，很多基金会还是欠缺的。再是治理结构方面不完善，理事会建设残缺不全，理事会和秘书处的关系也比较混乱。还有专业能力，我们相当多的非公募基金会连固定的专职人员都没有，都是一些兼职人员，有一搭没一搭的做一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尽管总量在迅速发展，规模也在迅速扩张，但总体水平相当的不如人意。行业因素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行业自律和自我发展方面，整体的专业化水平，特别是行业文化规范建立方面还不完善。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一套强有力的规范，来约束每一个机构所作所为，大家还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整体的文化感没有形成。一个行业发展最成熟的标志是行业规范和行业文化的形成，所有的人和机构进入这里面都要受到约束，言谈举止有一套独特的风格，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这里都是一些“八国联军”和各路诸侯。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文化舆论的因素都对我们有所影响，总的来看大环境总体是非常有利，至少比二十年前有利。

如果说非公募基金会这个部门在发展方面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地方，我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外部的问题，不是公众的问题，也不是舆论吹毛求疵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不争气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更多是要修炼自己，然后才能修齐治平。



践行体育公益，呼吁更多冠军加入公益行业

吴静钰 伦敦奥运会 49 公斤级跆拳道冠军

我是一名跆拳道运动员。今天非常开心到这里和大家交流，谈谈公益。说起公益，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们全运会参赛运动员去慰问了苏州的福利院。我跟妈妈去过福利院很多次，我的感受每次都非常深刻。这次去福利院是和队友们一块去的，待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仍然让我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了以后，那里的老师和孩子们都非常开心，不停跟我们玩，跟我们交流。老师和我讲，她说周周很久没有说这么多话了，因为他们都是孤儿，他们在智力或者身体上都是有一定缺陷的。所以那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了一种价值感。让我感觉到，也许我们不用做太多，站在那里，就是给予他们一种快乐。更重要的是，有些孩子也许会感受不到，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对于那些老师来说也非常的重要，他们需要付出比别的老师更多的爱心和耐心。当我们和她们交流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你们非常伟大。她们就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能够得到我们的认可。也许公益不是让你去做太多的事情，而是希望你能够有时间有精力为更多的人做一些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2008 年我刚拿到冠军后，就一直想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母亲经常跟我说，你能够成才是因为很多人在帮助你，如果你能够有所成就，希望你也能帮助更多的人。很多山区里的孩子需要我们给予帮助，很多学校里的孩子甚至很多老人会寄信件过来，说非常崇拜你，希望得到你的回复。我的妈妈希望我拿到冠军荣誉后，有时间多做公益，多去学校做演讲。其实，运动员真正的财富就在于她是体育精神的一个载体，她不像演员，也不像其他人，她真正的意义在于她拥有体育精神，十多年以来她一直在不停地训练，接受困难，磨练自己，让自己成为冠军，成为冠军的同时她更多拥有的是体育精神。我们做公益，就是要发挥自己足够的影响力和体育精神。

少年强则中国强。现在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学生有学习压力，很多青



少年开始慢慢忽略体育，由于不锻炼变得肥胖、不合群、亚健康等等。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体育锻炼能给你带来什么，体育锻炼能让你变得健康，身心更加愉悦，和更多人交流，并且能够在体育锻炼中培养自信勇敢、坚忍不拔的品质。当然我是一名跆拳道运动员，跆拳道讲究一些基本的精神和礼仪。当我们拥有这些品质和财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讲述自身的经历来影响下一代更多的人。

2010年，我就参与了冠军基金，其实我也是受益人，因为那时候第一届冠军基金是让退役运动员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在做跆拳道公益演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似乎找到组织了，因为我们有这些财富，但是也许我们缺乏组织，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加入冠军基金后，我们一直在为退役运动员做一些培训，去更多的学校，去呼吁更多青少年走出来，去运动，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冠军基金有一个特点，它能够集聚很多力量，冠军们义务参加公益活动来影响大家。

我现在还是一名现役运动员，未来我会义无反顾地做体育公益。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冠军加入这个行业，来和大家一起做公益，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中国强。



顺势而为，谋定而动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理性公益、多元发展”。大家知道，公益往往感性多一点，动不动就流泪，但是这次我们为什么强调理性？说明我们还有很多不理性的地方。强调理性是因为我们要强调讲道理，特别是最好能把道理能够变成政策和法律，通过政策的创新、法律的制定来推动公益的创新，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解。第二我们强调多元，当今社会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公益、多元发展。我们通过这种推动，使得公益慈善在更加科学化的轨道上运行，能够使社会更加充满活力，使得公益社会特点更加有效呈现出来。

整体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三中全会刚刚开完，正在吹响改革的号角，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开这样一个盛会，实际上是对改革与发展的新一轮推动，所以这个盛会是很有意义的。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力大、国际化程度高，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毫无疑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一、顺势而上

我们知道天意难违，做事情逆势而上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得大势，所以我们要顺势而上。我认为至少有三大势：一是中国改革之势。三中全会的关键词就是改革，改革的主题是要以市场化的手段来分配社会资源。从某个角度来说，市场化与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词的两面，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改革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有序地放权，把权放给老百姓，把利让给老百姓。而非公募基金会正好是借这个势最有效的社会组织。二是行业发展之势，非公募基金会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 2000 多家，占到全部基金会数量的 60%，这个大势不得了，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一定会越来越多，这个大势催化我们，必须搞好自身建设，比如要透明公开，要讲诚信等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新的要求。第三个势是全球共享之势。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



一浪发展到今天，基金会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先头部队，中国的基金会现在应该走到时代的前头。

二、得势而为

怎么个“为”法？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我们确实在作为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瓶颈。中国基金会的发展是政府、社会大众、企业家和我们机构、志愿者各方面共同努力推动的过程。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财富观的影响。我们的财富观有历史包袱，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中，我们只承认劳动创造财富，而农民为什么那么恨地主，因为地主获得的财富是不明不白的。从农耕文明到商业文明，这种文化流传了下来，它会使得在民间造成一种对财富的嫉妒和仇恨，或者他获得财富后却不作正当的事，我认为民间仇富是仇邪富。学雷锋大家都很积极，但是雷锋是没有钱的人，所以我们确定什么样的财富观，民间怎么认识财富，包括政府怎么对待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老说“土豪”，土豪基本是不做好事的，这是对富人的一种贬称。无论是富人还是没有钱的人，大家都要有资本精神，对财富要有正确的态度。赚钱真的比花钱要难，创造财富的人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们的文化如果不把创造财富的人看成是这个时代值得骄傲的宝贵财富，那么中国人远远走不出消极保守的财富管理阴影。

做慈善，一方面需要社会大众的参与，同时也特别需要有钱人的参与。我们总不能天天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结果要求我们 NGO 的同志们天天拿着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拿着低水平的工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这可能吗？不可能的，做公益的人也是。所以必须首先要有一种财富观，一种资本精神，如果在全社会不建立起合乎于这个时代的资本精神，不把赚钱和花钱有机结合起来，如果不确立富人的地位，那我们的富人特别是亿万富翁们、大富豪们，70% 都有移民倾向，40% 都已经移民。移民不是人走了就行，他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本优势和其他的社会优势，不断把钱从投资上抽走，那就像是吸血鬼似的，像一个血管放在我们这个地方把财



富一批批的吸走了，最后钱都到外面去了，人都到外面去了。结果我们的父老乡亲、子孙后代永远住在贫瘠的土地上，这行吗？这肯定不行！

第二个瓶颈是体制制度的瓶颈。郭美美事件对大家伤害很大，特别是对公募基金会和红十字总会伤得更厉害，为什么社会反响这么大？我个人认为这是对慈善本质认识的问题，公益慈善这件事情它是以个体为主，个体自愿意志的行为，现在给它搞成政府行为，那就有问题了。公益慈善在我看来是民间的事情，民间是公益慈善的主体，所以我大声疾呼：公益慈善必须回归民间。当然，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税收问题。全国公益慈善的税加起来满打满算就两个亿，但是这两个亿伤害了一个行业，伤了整个公益慈善的心，也伤了一部分富人的积极性，他们在人们眼里不是好人，他们现在想做好人，可是现在叫做什么？行善无门，他想做善人做善事没有门，道路不畅，这就是现在的结果。税收你可能收了这两个亿，但是让这个地方丢了100个亿、1000个亿甚至几千个亿，可能就是在这个结果。所以我也强烈呼吁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要变，我们已经呼吁五年了，到现在基本上雷打不动，我们真的伤不起！

第三个瓶颈是行业自身的管理问题。行业的成长需要实践，我们这几年拼命说要加强诚信、提高诚信度等等，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研究清楚，公益慈善是必须与公开化联系在一起的，但万事皆有度。比如说像非公募基金会是不是事事都要公开？我不这么看。为什么？因为这里可能会遇到被帮扶对象的尊严问题，我们需要有所平衡。当然，透明度公开化肯定是慈善非常重要的健康化的保障。到底怎么做好，在探讨摸索的过程之中，有的需要我们坚持，有的需要我们改正。

三、谋定而动

我提出三方面的战略选择。

一是以开放促改革。我们常常说改革开放，但是大家认认真真仔细想一想，实际上每次开放是放在前面，先开放后改革，当年商鞅搞改革也是从别国先获得军力，备到他这个地方来。邓小平先生搞改革也是先搞开放，先从开放开始，然后再进行改革，包括我们现在开放上海自贸区，这也是



一种开放的举措。我们非公募基金会这几年也这么做，我们不断把外面的和尚“请进来”，因为外面的和尚好念经。鲍尔森先生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说请你来说说话，你念的经真得有用，有些和尚也念经，但是我们要找念真经的，比如洛克菲勒。然后我们自己“走出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进行碰撞，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习别人的经验来推动我们自身的改革和我们发展环境的变革，以开放促改革。

二是以开放促民间。当年安徽那个地方老百姓不签字，他们的试点也搞不成。有句话说：没有神仙皇帝，团结起来靠自己。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这两天的会议，我们的能力是高水平的，我感觉到大家的创造性、大家的智慧，我们不比哪一个界别差，也不比哪一个界别低，只要我们发挥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一定能够找到适合中国基金会发展的新路子。当然也要注意策略，许多问题是体制问题，需要有过程来改变。我们应该让参与体制的这些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但是不能怪他们，因为不是他们造成的。人民希望幸福，我们怎么官民携起手来，共同思考为中国基金会的发展，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路子。

三是以实干促共享。你必须要有共享的思想，这是非常高尚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事业在民间，我们更多要去鼓励实干和共享发展。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实干再实干，实干可以兴邦，实干也能兴行业，实干更能兴富人。我很欣赏中华民族的另外一个象征，就是熊猫。熊猫为什么得到全世界那么多人喜欢，说它憨态可掬，样子好。其实它是最符合中国思想的动物，所有动物中间黑色和白色彼此对立又高度统一，都没有熊猫这么好看。毛邓是对立统一的，又是可运动的，只有熊猫是最形象的代表。我本人非常欣赏熊猫，因为熊猫不怕所有的人，但是所有的人也不怕它，喜欢它，这样的精神是我们基金会应该倡导的一种精神。

最后，善有善报，祝做好事的人一定会长寿健康幸福。



2014 年会

主题：超越·共识——大互联时代非公募基金会的转型与发展

2014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第六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年会共有 300 余人出席，其中，基金会、NGO160 余家，高端对话及发言嘉宾约 80 人。会上发布了《中国基金会资助行为及状况调研》报告。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4 年组委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轮值主席）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轮值主席）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上海增爱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4 年会上的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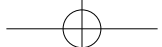
马昕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

很高兴受邀参加第六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这里，我代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向本届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从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一次明确提出非公募基金会这个概念以来，我们非公募基金会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的历程。十年来，从无到有，逐步壮大，为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非公募基金会之间沟通与合作的平台，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也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论坛扩大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提升了公信力，增进了公益慈善领域的沟通与融合，为非公募基金会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每年的论坛年会都会选择当下最有意义的话题进行讨论，今年的年会以“大互联时代的转型与发展”作为主题，也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丰富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传统范式，让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更加便捷和透明。可以说，从组织到个体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公益慈善的发展模式也悄然发生了变革。从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到社会动员、文化传递，既要依托网络新媒体所提供的灵活、便捷、低门槛、高效的传播方式，又必须去迎合网络时代新的节奏去积极应变。一方面，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更加方便，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高了；但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基金会和其他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以“大互联时代非公募基金会的转型与发展”作为第六届年会的主题，既是响应互联网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力图对基金会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预判，期待在这两天的交流和互动中，大家能够敞开心扉，各抒己见，提出观点，发表意见。

作为推动公益慈善发展的主管部门，民政部一直坚持对包括基金会在



内的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和规范，积极鼓励社会组织进行改革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鼓励发展和重点培育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精神更加明确，正在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贯彻执行十八大，以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为了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作为政府部门，同样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也在探索在大互联时代下怎样构建新型的政策关系，怎样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为社会组织提供更为优质的管理和服。因此，我也特别期望在这两天的年会中能够得到启发，收获建议，能够促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做出更多的创新工作。

最后，预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



高端对话：家族财富的传承之道

主持人：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对话嘉宾：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曾宪章 赠与亚洲理事

徐永光：三年前，洛克菲勒第五代传人带着全球慈善圈来到北京，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中国第一次的家族基金会论坛，那次论坛来的比较重要的人物是宗庆后，他带着他的女儿到会上讨论。当时宗庆后就说，“我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个家族基金会”，现在他女儿有一个宗馥莉基金会，他说我以后会建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这样的奖项，我相信在我们慈善环境更好的未来，宗庆后的这个想法是有可能的。也是三年以前，比尔盖茨跟我讨论的时候，他讲，“在美国劝富人捐财产难，在中国劝富人捐财产容易”。我说这话怎么说？他讲美国的富人因为大多数是财富的继承人，第一代创富的不是很多；而中国的富人基本上都是第一代的创造者，这样对财富安排的决定权就是在一个人身上，他能够决定财富怎么安排。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6年，现在进入了一个由第一代创富到第二代接棒的时候，正在经历财富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现在接棒的这批年轻人，他们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他们懂得财富怎样安排会更加合理。如果这个财富用于公益慈善，这个领域应该怎样做得更有效，这一代年轻人会掌握得更好。

今天这样一个对话，有关财富传承、家族基金会的话题，在国内找不到人来讨论，这反映一些现实问题，首先，大家觉得家族基金会不是一个好名字，基金会是慈善，什么家族基金会，慈善和家族搞到一起，那不乱套了。中国有非常好的家族基金会，但是有观念的问题，有专业运作的问



题，有家族基金会和公司基金会的关系问题，还有家族基金会的慈善财产怎么安排，它对社会创新有哪些价值，等等很多话题。我们不妨听听两位嘉宾的想法。

曾宪章：家族财富的传承不只是要把你的财富传下来，要把你的企业经营得更亮丽，更符合现代化的成长，也应该走入所谓的公益慈善，回馈到社会。所以，“创二代”跟“善二代”这个概念我们要大力去推动，毕竟有家庭财富的人，他的起始点比较高，他的资源、人脉广，他受的教育要比一般人高。当他们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创二代”，变成一个“善二代”，我相信他们能够对社会发挥的贡献里是非常巨大的。

不是说你有钱捐了就结束了，你要有效地做、长期地做，对社会产生正面价值的。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有系统的创业辅导和公益慈善辅导，建立一套面向所谓的“创二代”、“善二代”的EQ系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有秩序地来辅导有兴趣的“富二代”进入“创二代”，成为“善二代”，发挥他们的正能量。我相信给我们五到十年的时间，我们将会在慈善公益事业再创一个辉煌。

卢德之：什么是家族？家族有政治家族，有文化家族，有经济家族。大家看一看，文化家族的生命力是最长的，亚里士多德他们家族现在都能找到，孔子、孟子也能找到。至于政治家族，我们每个朝代也能延伸两三百年。唯独经济家族，很难维系一百年以上，所以叫“富不过三代”。这几年我在反复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家族慈善问题，一开始我也有点担心，家族慈善这个概念是否适合中国？但是后来发现，不仅适合，而且必须。目前美国古老的洛克菲勒家族跟我卢德之家族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良好关系。我发现中美之间至少有三个很大的不同：

第一、政治基础不同，其中也包括历史的政治基础。第二、发展阶段不同。美国上个世纪的第一代企业家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相距甚远，中国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代，因为1949年革命以后，中国的财富家族完全没有了。这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乘着时代的东风产生了很多巨富，但就全中国而言，这批人还是很少数，



而且积累的财富根部还远不扎实。第三、文化基础不同。美国是经过工业革命、民族革命以后的家族，而我们的家族都是从农耕文明走过来的。中国的富人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所仇视，长期以来养成一种文化习惯，好像不做基金会，不做公益，没人知道我是个富人，我一旦做基金会以后，必须要参加更多会议，必须要接受社会的各种拷问。这时候你越做好事，大家越瞅你。所以文化基础也不同。

鉴于种种的不同，中国家族基金会的发展确实与美国有不同的轨迹。但是，我仍然认为未来 30 年中国的家族基金会的发展一定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曾宪章：我从 1998 年开始辅导很多中国企业家，我要求他们做公益，做慈善。很多人说，我还没有赚到一百万，还没有赚到一千万，还没有赚到一亿，怎么做公益慈善？你今天能够做，你就做，今天即使能够捐 500、1000，你就开始做，如果规模大了，我要求就多了，我要求每年利润的 1% 捐赠出来做公益，这是我在国内大力推动的。

美国做公益形形色色，其中，卡耐基培训是非常有效地提升年轻人沟通力、领导力、团队建设的一个课程。我在 1976 年就接受这个培训，终身受用。它起源于卡耐基家族，当他累积一大堆财富后便立下遗嘱，我所有的遗产要去做终身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对社会教育、对成年教育、对终身教育是有帮助的。到今天为止，102 年前开始成立卡耐基基金会，推动 100 多名课程，美国很多大学已经承认他的学分。像这个家族基金会就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贡献，它不只是给你钱，它其实是教育你。像我们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卡耐基基金会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教育、终身教育做了很多贡献。

卢德之：未来家族基金会的发展必须要和几个东西配套。第一是公益信托，或者叫慈善信托，这个政策的形成、法律的形成，对中国的家族基金会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二是影响力投资，特别是形成巨额基金会资产以后，怎么才能既解决好社会问题，又能使得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两个制度的形成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



徐永光：我总结一下今天讨论家族基金会的几个要点。第一、家族基金会是最纯粹的。做一个小的公司基金会，它和市场有关系，可能里面还带有一些私利。但家族基金会的财产已经脱离了公司，所以它是最纯粹的，它没有市场的诉求。第二、家族基金会是最有追求的。因为后人继承了家族的财富，他们要承接家族的光荣与梦想，所以他们不能辱没先人，一定要把家族基金会做到最好，给先人脸上增光。第三、家族基金会是最创新的，因为家族基金会的钱是他们自己的，由他自己决定，他们会投入到社会创新，而且能够为自己的创新承担风险。第四、家族基金会是最廉洁的，它不会贪污，一般贪污是用别人的钱去贪污，家族基金会是自己的钱不会贪污。最后我想再加两句，家族基金会能够让家族的财富更兴旺，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中国基金会资助行为及状况调研》阶段成果发布

刘涛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会在资助行为过程中扮演几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种角色是供奶员，NGO 缺少奶源，本土基金会要像奶牛一样，承担起供奶的责任。第二种角色是拼图家，更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他可能会选择一个社会领域，或者某一个专业问题，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让它有所改善。他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把这个领域里面所有可能的途径或者方法都尝试掉，所以是拼图的方式来解决。第三种角色是吹号手，我吹响集结号，让大家知道有这个社会问题存在，然后一起倡导解决。第四种角色是助产士，就是资助一些新生组织，或者一些新的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五种角色是布道者，我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或者我认为某种价值很重要，我想让更多人分享。

供奶员，他相信的价值和使命给社会组织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并进行价值倡导以改善捐赠人和公众。他可能在资金用途上，主要用于项目，行动者主要是 NGO。风险偏好方面，通常会选择对优秀的组织或项目进行资助，总体来说，供奶员就是择优之路，价值倡导。择优之路是选择好的给他供奶，价值倡导就是让更多人认可他。

拼图家，专注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他相信社会问题是复杂的，不存在单一有效的解决方式。有可能前面的思路可能会被人置疑，但是最后那个问题解决了，有可能是很多组织或者很多种方案一同做的结果。它提供的核心价值，通过拼图实现对问题改善或者根本解决。资金用途上，可用于项目、能力建设、组织发展等各方面，它其实不太限制资金用在哪里。在行动者方面，也不局限于 NGO，他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某项研究，或者某个个人。风险偏好方面，愿意承担风险尝试新的解决方案或者培育新的组织。

吹号手，发现问题并倡导解决，他相信意识到问题并使之纳入公众日程是关键。有些问题大家都认识到，但是我吹响集结号，让大家关注这



个问题，这样我们能够比较快地解决这个问题。资金用途方面，不局限于发起项目、资助研究、搭建平台、联合倡导。在行动者方面，不局限于 NGO。风险偏好是优先选择影响力大、能力强的合作伙伴，因为它最终想把这个事情成为大家的事情，另外也会发现整个社会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

助产士，催生新的行动可能，相信公益资本是社会创新的驱动器。提供的核心价值是催生社会行动的主体或者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他可能会支持一些还在前沿的、探索性的、风险比较大的组织或问题解决方案，探索出来让社会受益。资金用途上，可用于核心业务，或者建立组织发展资金池。行动者也不局限于 NGO 个人，研究机构、社会企业均有。风险偏好方面，愿意承担较大风险。

布道者，我相信什么，我要怎么去做。他相信某类价值是重要的，并通过行动践行和传递。提供的核心价值是多元价值，资金用途可用于核心业务或建立组织发展资金池。风险偏好方面，愿意承担较大风险。不管它是组织、是个人，还是什么别的行动，我就认同他的理念，我就要做这个事情。

中国基金会能力不足，跟外国基金会相比，可能有很大差距。每一个基金会扮演的角色不同，对他的能力和外部环境要求也不同。下面我们分析五种角色基金会的能力和环境影响。

供奶员要有充足的奶源，要求具备较强的筹资能力，能够持续不断地供给，为此需要让公众相信你的选择。我做了选择之后，大家看到我的选择是对的，你们跟着我就好。但是，它需要一定数量的优秀 NGO，需要较强的公众捐赠意识。

拼图家需要的能力：一是复杂社会问题的界定和分析能力，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把它分析清楚，它的解决途径是什么；二是问题解决需要众人协力，可能是不同部门，目的是同一个领域不同解决方案的一些合作；三是一定的查漏补缺能力，帮助发现问题，完善行动策略；四是较为充分的信息沟通和行业联结，包括基础设施（需要找到这些社会组织在哪儿？）



以及社会支持与合作的氛围。

吹号手要有较强的倡导和影响能力，让问题进入议程，推动各方联合行动。简单地说，吹号手能够号召或者鼓动大家都跟着我干，如果我自己的影响力不够，没人跟你干，我们需要有很强的公共倡导能力。它需要有一些行业性的交流，也需要不同的跨部门合作。

助产士要有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充足的自有资金，或者较强的筹资能力，能够承担较高的风险；二是能够找到足够的探索者，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它需要的外部环境，包括探索性尝试和新的想法不会触犯法律风险，社会有较高的容忍度。

布道者的能力，一要有钱，二要有较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帮助获得支持。需要的外部环境也是对思想和社会行动的边界有合法性的明晰界定，以免社会不认同、法律有风险。

概括以上论述，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系统中的价值定位。基金会处在一定的系统之中，包括价值观、能力、整个环节和链条，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二，协同式的伙伴关系。基金会不应只满足做资金的中介人，而要以社会问题为导向，积极承担责任，与社会行动者建立伙伴关系，变简单链式的资助关系为协同式的伙伴关系。

第三，差异性的资助理由。基金会做资助有不同的理由，如果要使自己的资助可持续，能够满足实际能力和外部需求，我们需要找到价值、能力和环境三个维度的结合点，需要明确自身扮演的角色以及需要的内部能力和外部环境，这样基金会提供的价值才是可持续的，自身也才能得到持续的支持。



00 后的未来公益之路

余佳玥 学生代表

我是来自北京中学七年级的学生余佳玥，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我应该是今天出席活动年龄最小的一个。上周四，我刚刚接到组委会紧急的通知，邀请我来参加第六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说实话，单单这个会议的名字就拗口得令我发怵。从那时起我就在想，我到底要和在座的各位聊些什么？首先，作为闪电演讲者中的一员，我要感谢这次论坛的主办方，因为是他们慧眼识珠的发现了我不，应该说他们真正发现的是一个大约有着 1.5 亿人口的庞大群体，那就是我们 00 后。

我是 00 后中的幸运儿。中国青少年公益行动的推广人员来到我们学校，为我们这群 11 岁的孩子宣讲什么是公益、什么是项目、什么是行动力。我才开始意识到，除了每天面对书本的学习，我们还应该做些其他的事，那些可以帮助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事，那就是公益。于是我成立了环保公益社团，虽然当初我只说服三名同学加入我的队伍中来，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开始了。

有了队伍，接下来就是如何找项目，如何发现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中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大国，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习惯性丢弃厨余垃圾的问题，这样我们很快找到了项目，接下来就是把问题转化为行动力的过程。我们利用蚯蚓来分解厨余垃圾，通过一系列实验和时间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我们这些兼顾课业的学生来说，意味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公益项目的付出。

大家现在一定在想，“我们这些基金会对于孩子的培养是对的，你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错”。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越发意识到一个典故，那就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我们面对环境、人文等一系列问题，不都是看到问题才一股脑地做补救工作吗？每一代人都在给前一代人补漏洞，70 后给 50 后、60 后补裂缝，80 后在给 70 后填窟窿，



难道我们 00 后靠追随这样的模式去给 90 后做扫尾工作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种其他方式，我们 00 后应该有防患于未然的想法，我们需要你们这些成年人引导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就会发现问题的苗头，所以我们需要面向普及性的领导和发现项目的平台。我们相信，00 后的我们需要强烈的求知欲，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给予我们帮助，需要这样普及性的公益平台，带领我们形成一种把服务社会、服务未来当做己任的全新思维模式。

比如我们现在的环保项目处于 1.0 版本，希望 2015 年能拓宽队伍，让更多人意识到生物分解厨余垃圾的好处。我的愿望是，真正做到在社区建立蚯蚓养殖站，真正让这些厨余垃圾不出社区就可以分解掉，从而减少垃圾带来的碳排放。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遇到像在座各位这样的有识之士，用你们有力的大手拉着我们的小手，为北京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梁启超先生说过，“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胜，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就是我们 00 后的未来之路。



2015 年会

主题：非公募基金会的人才素养与根基培力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深圳举行，吸引了基金会、NGO、政府、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计 520 余人参与，其中，基金会 103 家 201 人。会上发布了《倾听一线的声音：项目官员眼中的基金会与行业》报告。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5 年组委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轮值主席）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轮值主席）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上海增爱公益基金会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5 年会上的致辞

廖鸿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六年，每年数百家非公募基金会慈善组织汇聚一堂，展示、聆听、交流、碰撞，启迪思想，促进合作。经过共同努力，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已经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为非公募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怀慈心，行善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公益慈善事业的开疆拓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支持鼓励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强慈善法制建设和政策支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的要求，全国人大积极推进慈善事业，慈善法草案前不久已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立法已经进入快车道，预计明年上半年就能够正式颁布，将为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2014 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政府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 2008 年至今，财政、税务、民政等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若干支持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和公益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从 2012 年开始，各级政府逐步推进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已经持续开展了三年，每年财政投入一定资金，发挥了引导和杠杆的作用，调动了公益慈善组织的积极性，也撬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社会组织人才建设不断出新举措，我们建立了社会组织人员培养体系，大力推进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进行了社会组织特有的职业开发试点，为推动社会组织人才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保障。各级民政部门鼓励公益慈善组织，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顺利发展，各地不同程度地下放登记权限，简化登记程序，开展孵化培育，可以说非公募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组织的整



个发展环境不断稳定下来。

非公募基金会是我们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支柱，自 2004 年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以来，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蓬勃发展，成绩斐然，已经占到基金会总数的 2/3 以上，目前全国 3000 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的资产总额将近 500 亿元，年度总收入接近 200 亿元，非公募基金会在扶弱济困、助医助学、文化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做出了显著成绩，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弘扬社会正能量，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以及党和政府的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的基金会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总体力量还比较薄弱，发展水平还不平衡，实际贡献还比较有限，内部治理、公开透明、人才队伍建设还跟不上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的要求，总的来说，非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还有待提高，社会认可度也有待增强。本次年会的主题是非公募基金会的人才储备和根基培力，讨论这个话题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我国非公募基金会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非公募基金会要厚植发展根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才能结出累累硕果，只有强身健体才能生机勃勃有序发展。厚植发展根基，要以加强基金会的公信力为基本目标，公信力是基金会获得社会信赖的信任从而引导大众参与慈善活动的的能力。基金会工作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资金的多少，更重要在于其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对广大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以及公众对基金会的满意程度和培养速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公信力是基金会的生命力所在。所以提升公信力，是基金会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非公募基金会要做好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打造基金会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表明基金会透明度与其获得的捐赠额度往往呈现正相关，公开、透明已经成为基金会发展的新常态，要及时公开项目的运作、资金使用情况等，使基金会成为人人信任的透明口袋。

非公募基金会要强调内部治理。要完善内部机构，实现自我管理，规范自身行为，增强自身能力。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民主决策和科学发展，



形成制衡有效的运行机制，通过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提升服务受益群体的效果和满意度。

非公募基金会要解决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人才资源是基金会的立意之源，要保证人才的基本权利和资源，既要用职业化、市场化的手段来更加严格地管理人才，又要用激励和道德规范，引导个人的发展。要培养捐赠人、受益人以及公众信得过的领导者和执行者。非公募基金会要加强诚信建设，要用诚信感染捐赠人，履行慈善承诺，要把诚信作为宝贵的财富，把诚信内化为组织的内部行动，发挥非公募基金会特有优势，积极引导新的财富观，促进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以实际行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今天与会的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在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探索和成熟的经验，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论坛提供的平台，互相学习，深入交流，互通信息，分享真知灼见。民政部作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促进慈善事业的部门，将一如既往把发展好、服务好、规范好非公募基金会和广大公益慈善组织作为我们的神圣使命，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公益人才培养的战略和发展方向

胡小军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我们对于公益人才培养战略的思考，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从未停止过。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下，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公益人才培养战略和发展方向。回顾中国现代公益走过的 20 多年历程，公益人才培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90 年代初到 2008 年之间的草根培育和根植社区。2008 年之前还没有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那时候很少有人提到基金会，整个民间公益领域里培养的主体对象是草根公益组织、草根 NGO。谁在驱动那个阶段的公益人才培养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际机构，就是大量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或者国际基金会或者海外 NGO 驱动中国民间公益的发展，当时他们不仅带来项目资金，带来技术和理念，同时他们也带来一套培养人才的理念。90 年代你申请很多国际援助机构或者国际基金会资助时，它同时会附加一个伙伴计划，它会对资助的项目组织进行各种能力建设和人才投入，它会给你一笔组织发展资金让你在推动项目时也能够带来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我认为这是当时这个阶段最重要一个驱动。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海外机构在整个中国民间公益进程中的地位。第二个方面的驱动力量是知识精英，他们大部分都是体制内的精英，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等等。2005 年、2006 年华南地区最早驱动本土草根 NGO 建设，比如中山大学的朱健刚教授的团队，他们做各种各样面向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第三个方面的驱动力量，我称之为区域的草根支持中心。比如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公益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广西的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在贵州、重庆、云南都有这样一些区域草根支持机构。他们扎根本土，专门支持本地的公益人才培养和公益组织能力建设，办各种培训、沙龙，做实习生项目，做小额资助等等。总而言之，当时那个阶段是中国民间公益或第三部门发展最好的



时代。背后核心的内容是强调公民社会的理念，同时也非常强调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工具、方法以及相应的实践，强调我们公益中最值得珍惜的一些精神。

第二个阶段是战略资助和投资于人。2008年后，大量本土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发展，公益人才培养的对象仍以民间公益组织为主。驱动机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非公募基金会和专业的支持型组织成为驱动中国本土公益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培育的领域分工开始聚焦：友成基金会关注扶贫，它培养的人才就是在扶贫领域；阿拉善基金会最关注环保，它做绿色领导力，做创绿家，做劲草同行，专门关注环保领域的人才培养；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汶川地震救援时，启动了第一笔的资助项目，基金会开始资助公益组织，然后来开展项目。

第三个阶段是跨界合作和协同共育。公益人才培养的对象已经突破了民间公益组织，而组成跨界多元，我们要推动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就要构建一种生态。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单纯有公益组织的从业人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形成一种跨界协作网络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多地在人才培养项目中得到认同。驱动机构虽然也有基金会，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企业和高校比较深入地卷入进来。在高校层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以及上个月深圳的国际公益学院的成立，都体现了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系统地针对公益慈善人才作定向培养。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做“百人计划”，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很多地方都开设跟公益慈善相关的专业，这都是协同共育的体现。在一些公益慈善的在职硕士班里，不仅有一线的公益慈善机构负责人和骨干，也有基金会的管理者，有管慈善会的政府官员，有团委、红十字会的，还有媒体从业者，这个硕士班最大的价值不是说教给他们多少知识，而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构建了一个相互协作、相互交流的网络。这个网络是非常强大的，他们会使现代公益慈善的理念迅速传播，落实到他们的行动中。

关于公益人才培养战略，未来公益人才培养应该做到五个方面的并重：



第一，在人才培养理念方面，坚持外部教育资源的引入，与高大上的、资深的国际成熟公益慈善理念的引入，本土公益行动者自身知识体系构建，以及学习型组织构建并重。

第二，在人才培养类型方面，坚持公益领袖型人才与业务骨干、管理中坚人才的培养并重。未来除了需要公益领导人之外，最需要的是一批能够把自己的理念、机构的理念和使命转化为实践行动的管理骨干。

第三，在人才培养方式方面，坚持短期的业务培训和长期系统的“书院式”教育并重。我想这恰恰是高校开始关注整个领域的公益人才培养的价值，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对公益慈善非常重要的培养机制。每一个公益组织的行动者有没有建立自己内在系统的支持体系，只有我们静下心来回顾、反思性的学习可能才会实现，而不是参加更多短期的业务培训。

第四，在人才培养对象方面，坚持全职公益人的能力提升与跨界人士的吸引和培养并重。

第五，在人才培养内容方面，坚持对国际成熟公益慈善的借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重。现在的问题是舶来品很多，本土化的东西很少，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上，当前的教育和公益慈善教育中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出来。



传统文化智慧于公益之思考

文运

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最近二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民间的传统文化学习热潮也正是在这二十年中兴起的。两者之间的同步性，是偶然的吗？

有人提到：公益是不是纯粹的舶来品？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公益文化和公益精神呢？我觉得，如果把“公益”这个概念定义到对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道德的关心的话，公益在中国当然不是舶来品。

任何一个社会的和谐、繁荣都离不开公益精神。众所周知，中国虽然在最近一百年落后了，但是过去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领先过。难道在夏、商、周、汉、唐的和谐、繁荣社会中，公益精神会是缺席的吗？一个没有人关心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道德的社会，有可能是和谐、繁荣的吗？我想是不会的。

这些年，我们的社会的确有种种不如人意的现象，比如公益精神缺乏、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等等。但是，这恐怕不能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因为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而更应当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文明变迁来看，任何一个失去了文化滋养的社会都会抑制人性、张扬兽性，不独中国为然。可以说，缺乏公益精神是缺乏文化的表现，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主要是四句话：探索根本规律，发现内心世界，追求无限价值，担当天下道义。

第一句，探索根本规律。学习圣贤遗教，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希求和尊重。儒释道有很多道德规范，但这些道德规范并不是哪个人为了某种目的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圣贤基于对世界真理的认识提出来的。在这些认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限的宇宙、无尽的人心，都遵循同一个根本规律。儒释道历代圣贤所追求的“道”，就是贯穿一切的根本规律。不但道家在追求这样的“道”，儒家、佛教也是如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就是这个意思。佛法所描述的“缘



起性空”、“业果法则”，也是贯穿于一切现象界的根本规律。

第二句，发现内心世界。这样的根本规律要如何去探索呢？圣贤告诉我们，“道”遍于一切，既在远也在近，既在外也在内，无所谓是大还是小、是一还是二、是先还是后、是内还是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通过任何一个事物，所体悟到的“道”，都是在整个宇宙里起作用的“道”。这个“道”，往大里说，包容天地；往小里说，不过在日用之间。既然在哪里，都能体悟这个“道”，那么最方便的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心也是道的载体，心也是一个无限的世界。通过无限的心念，来发现无限的内心世界的真相，进而探索无限意义上的根本规律，不就有成功的可能了吗？

第三句，追求无限价值。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无限的，而无限里面又有根本规律贯穿，而这个根本规律可以通过发现内心世界来把握，那我们的生命价值要放在有限上，还是无限上呢？当然要放在无限上了。学儒要成圣，修道要成仙，学佛要成佛，都是指每一个最普通的个体都具有达到生命至极圆满境界的潜力，都可能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同寿，与众生一体。所以，儒释道都告诉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无限价值。

第四句，担当天下道义。无限的生命价值要以何为立足点呢？古人提出来：担当天下道义。这里的“天下”并不是指统治天下，也不仅仅是指影响天下。《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今天的意义上来理解，“身”可以说是自己，“家”可以说是自己的私生活圈，“国”可以理解为自己的单位圈、事业圈，“天下”就是陌生人圈、路人圈。担当天下道义，就是要关心那些与我们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就是要关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也可以说就是要关心公益事业。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古人说的这种不为自己的“恒产”努力，却要担当天下道义的“士”，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益人吗？

总之，学习传统文化的智慧，对于培养公益人才、做好公益事业，很有必要。



时代变迁中的互联网与公益

师曾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发起人

公益人才培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创新、创变的移动社交时代，人们使用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在变革背后实际上是新媒介赋权下社会关系在跨越时空中的解构与重构。就今天演讲的题目，我想与大家分享以下四个观点。

一、互联网即人的器官

现在移动互联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变得须臾不可离开手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思想以及购物消费等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互联网已越来越融入我们的生活，借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的延伸》的话语，我们说互联网即人的器官。互联网的延伸，改变了人的态度与行为。记忆知识不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在百度上随时查阅有关知识，但理解力与共情力却是给我们每个人提出的要求，互联网不仅仅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平台，更重要的是需要提升人的行动与改变的能力。

二、互联网本质上是公益的

互联网所带来的分享经济、共享经济，让我们开始重新认知产权中的支配权与使用权，传统经济学中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但互联网时代使用权却可以做到基本免费。如果互联网公司有更多的组织、机构以及个人使用它们的平台、软件等，公司就可以做大。平台越免费，使用的用户越多，互联网公司就越有发展的空间。摩尔定律告诉我们，信息技术的进步，超出我们的想象，技术产品的成本会不断降低，性能与功能也会不断增加。原来资本是消耗型，现在资本似乎可以复制。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革，带动了政治、文化上的改变。文化与智慧是需要有发展的社会根基的，互联网提供了文化与智慧发展的别样土壤，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传统智慧的重要原因。

三、互联网即信任转型

中国正在进行着深刻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从本质上讲，



中国社会的跃迁实则是新媒介赋权下的信任转型。互联网时代，不仅仅是所谓的PC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是移动社交时代。互联网不简单只是信息的流动，更多是人与人的意念和认识的连接，导致信任关系的改变。原来可能是对权力、权威、财富、身份、地位等的信任，现在信任的基础越来越回向于个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就会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自己思想、意念的倾向性越来越成为连接的媒介。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为了公益，为了社会更加美好的愿景，我们聚在这里。公益连接人的背后，其实需要信任的基础。信任是如何建立和如何摧毁的，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大家可以听到我刚才讲的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似乎是非常乐观的，其实我恰恰认为转型社会中，互联网对信任的解构与重构是非常残忍的，因为互联网信任是“毁灭你，与你无关”的逻辑。我不同意，我可以不改变你，也不会去与你争论，总会有同道中人与我相印。公益人才的养成，需要建立在大众的信任基础上，更应该培养我们的心性；公益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公益行业的追求，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志业。因为公益的根在每个人的心上。

四、互联网最本质的是生命的相互唤醒

在信任转型的基础上，公益传播不仅在公共性以及利益层面展开，更重要的是在每个人生命底色上的延展。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公益人才培养，不仅仅是学者专家对公益人的教化，也不仅仅是对专业化、机制化、工具化的追求，更应当是生命的觉醒与生命之间的唤醒，学界与业界本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王阳明曾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合一强调的是我们生命的自我觉醒以及相互唤醒的能力，强调的是以开放的心态，不去强求什么，只是在接受中反思，并努力行动，在行动中不断试错与调整，找到更好的方法，达到公益人才培养的目的。因此，互联网公益首先要了解的是，你生命的底色是什么？

总之，移动社交时代，互联网成为人的延伸，甚至是人的器官；互联网本质上具有公益性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背后实则是信任转



型：互联网即因陀罗网，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意念、意识、认识等的流动，给人带来生命觉醒与相互唤醒的可能性。因此，互联网为公益行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公益传播不仅在公共性和利益层面展开，更重要的是在每个人生命底色上的延展。公益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行业的追求，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志业。



专题论坛：女性公益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

发言嘉宾：

黄奕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谢丽华 《农家女》杂志创办人、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

黄奕：

女性公益应该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投资女性不仅要促进性别平等，而且还会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储备人力资源，促进社会进步，在这个层面上女性公益是我们为了“她们”做事情，这个的“她”是女性的“她”；另一方面，女性公益人，就是我们自身不得不面对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限制，并且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我们从家庭角色到社会角色的转换，用实际行动来打破这些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做事。

我们针对现状做了一些调查。我们发现相对于其它的行业，公益行业中女性的领导人所占的比例比较大，但是相比起企事业单位的女性从业人员来说，女性公益人普遍薪水增加微薄，职业的上升空间更小，获得的能力提升机会更少，而社会对女性的普遍偏见并没有因为她们是公益从业人员而有所改变。

今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20 周年的年份，这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NGO 盛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让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的一些口号。今年 9 月在纪念北京世妇会召开 20 周年之际，中国一批女性公益人一起发表了“共识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包括：性别平等与公益慈善在理念和宗旨上是一致的；性别平等会让公益慈善更加有效；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是提升公益慈善专业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需要和表现；让公益慈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就要体现在项目管理与机构治理当中；让公益慈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需要政府、市场、基金会、媒体和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妇女组织的协同推进，需要社区服务对象，特别是妇



女的充分参与。

我们要看到女性不仅是慈善捐赠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组织者和捐赠者。给更多的妇女赋权，给她们以平等的资源与机会，培养更多的女性公益人才，会让公益更加有效，让我们持续为此努力。

谢丽华：

女性公益人才的培养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公益机构女性领导人的培养，基金会已经三千多家，加上我们的公益机构应该有几十万个，其中，女性领导者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大，需要我们关注。第二层意思是女性公益机构的人才培养，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专门以女性发展为宗旨的公益机构有一定的数量，占10%左右。这些公益机构要扩大、要创新，就一定要有更多的人才储备。第三层意思是女性公益人才的培养，大家都知道做公益的女性或者志愿者中女性的比例相当高，大约占60%到70%。应该说，女性在公益领域里不管是百分之多少，都是一个生力军或者有的就是主力军，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村女性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基层女干部的培养，这是我们各级妇联组织在做的事情，更主要的是推进女村官比例的提升、女村官的培训，还有女创业者、乡村女能手，这些也能够涌现不少人才。二是女性公益在实施项目中的人才培养，在专门进行妇女发展的机构里面，我们培养人才更多的是在执行项目中发现妇女的才能，培养她或是让她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农家女”机构的宗旨是：培养农家女领袖、孵化农村女组织。因为我们从这个机构一诞生就注重对农村妇女能力的开发。农村妇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能自主生活，谈婚论嫁大多都是被动的，因体制造成的各种性别不平等，再者农村妇女自杀率高，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把握。我们希望农村妇女能做生命的主人，“农家女”的使命是“赋权赋能农家女，携手共创自主、平等、幸福的生活”，这个宗旨20年没变过。我们有了一句话：“送你一颗果子，只能享用一次，送你一粒种子，可以受用一生。”这就像我们的暗号一样，只要参加我们培训的农村妇女，都知道这句话。



在工作中如何发现妇女人才？这需要我们的工作经验。首先要改变对农村妇女的刻板印象：一哭、二闹、三上吊，贫穷、愚昧、落后，我们要去掉这些帽子；另外，通过项目、培训和文化活动发现农家女的带头人、发现种子；同时，给她们提供再培训、交流、学习的机会，用项目为她们搭建社区发展的平台，让她们去管事，让她们去做主人；开展小组活动，让种子扎根在农村的土壤里；进行跟踪服务，与她们共同成长；还有，我们走出去、请进来，让她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6 年会

主题：新格局 新想象

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 320 家机构（其中，基金会 167 家）、30 家媒体共计 635 人参与此次年会。在本次年会上，正式宣布转型升级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6 年组委会：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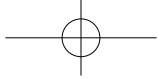
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与人公益基金会

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



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 年会上的致辞

刘振国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多年来，非公募基金会与其他慈善组织一道，动员了大量社会资源，开展了众多公益慈善项目，为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各级民政部门一直将非公募基金会作为鼓励扶持的重点，在设立登记、日常管理、培育扶持等多个方面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非公募基金会自身也在积极探索和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在促进行业交流、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屡有创新和建树。2008 年，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和部分非公募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论坛的举办既为全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对话的高层次平台，也为整个社会了解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从已经举办的几届论坛来看，这种形式对于扩大非公募基金会之间的交流，促进非公募基金会的能力建设，推动非公募基金会行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已经成为非公募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知名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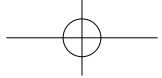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本届论坛的关键词是“新格局新想象”，非常契合目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背景、大方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慈善事业和社会组织改革发展高度重视，今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由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 9 月 1 日起施行。慈善法界定了以扶贫济困救灾为重点，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环保等公益事业在内的大慈善范围，明确了减免税费、金融支持、购买服务、弘扬慈善文化等促进措施和监督管理措施，规范了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信息公开等内容。可以说，作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经验的宝贵结晶和我国慈善制度建设最新最大的成果，慈善法是一部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和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各类慈善组织必须遵循的根本大法。



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和培育扶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的重要代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慈善法》和中央意见的要求，坚持依法依宗旨办会，进一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升保值增值、财务管理和项目运作水平，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强诚信自律建设。希望各位能借这次论坛召开之机，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交流，争取有所成果。

民政部作为慈善事业和社会组织的主管部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慈善法》和《意见》精神，已经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面向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社会组织解读、宣传、普及《慈善法》和中央意见；二是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规政策，包括《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关于做好慈善信托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等；三是加快修订《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部社会组织行政法规。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做好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公开募捐资格和公开募捐活动管理等工作，制定出台《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办法》《社会组织负责人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修订《社会组织评估办法》，启动统一慈善信息平台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将继续推动慈善组织税收优惠等促进措施的出台和完善，为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公益发展的三大新趋势

彭艳妮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2009年7月2号，那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的夏日，我在北太平庄桥附近的远望楼宾馆参加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第一届年会。今天是我第七次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年会。7年多过去了，我和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缘分越来越深。7年以前，我是一家英国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南都基金会合作伙伴的身份受邀参加论坛年会。而今天，我是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的代表，以组委会机构的身份，以主人翁的心态，参加咱们自己的行业盛会。

从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到基金会的秘书长，这一身份的转换让我更深入地学习和探索基金会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来自基金会，虽然大家的工作领域不一样，有教育、医疗、环保、文化艺术、社区发展、扶贫、残障、老年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说，基金会存在的终极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让每一个人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共享发展的成果。

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份事业的敬畏心和责任感就越强。捐赠人，无论是巨额财富的拥有者，还是普通工薪阶层，他们选择把钱捐给基金会，这些钱就带着他们的愿望和信任。这些钱我们花对地方了吗？花好了吗？投入产出比怎么样？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对吗？带来什么效果？产生副作用了吗？这些不仅仅是理事会需要问责的问题，而更应该我们作为基金会的从业者要不断拷问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追求治本，而不是治标；我们应该激发人的自主性，而不是养成服务对象的依赖心理；我们应该敢于支持创新，推动“从无到有”，而不是畏手畏脚。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公益发展的新趋势。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以及新技术的发展，在过去一二十年，出现了有别于20世纪基金会传统工作手法的新公益。首先，公益事业不再局限在非营利部门，在非营利部门和企业的光谱中间地带，出现了大量的创新，比如社会企业、公益创投、



影响力投资、共益企业、包容性企业、共享价值等一系列新的实践。这些做法既强调社会价值，也追求经济价值，改变了过去纯粹输血式的公益，提高了投入产出比。在美国和英国，基金会在推动这类新公益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也一样，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发展的本土机构绝大多数是基金会。

其次，新公益强调规模化，不再满足于“小而美”的项目，而是通过复制、推广、开源、推动政策改变等方法让项目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规模倍增。在中国，规模化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拿任何一个大家公认的优秀公益项目来说，它的覆盖面相对于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来说都非常小。前段时间我和春晖博爱基金会的 COO 交流，她们针对儿童福利院里的残障儿童的项目效果非常好，做了十来年，也只覆盖了 10% 的福利院，还有大量的在排队等她们的服务。但就是覆盖这 10%，她们就需要一年筹款一个亿。用老套路做，肯定走不通，必须调整发展模式。

第三，新公益拥抱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在资源动员上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今年的 99 公益日，三天时间共有 677 万人次在腾讯的平台上为 3643 个公益项目捐款 3.05 亿元。此外，互联网打破了组织边界，在志愿者动员和参与方面也展现了巨大潜力。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新格局，新想象”。刚才谈到的公益新趋势，其实也在建构着我们面对的新格局。新格局已经展开，基金会能否掀开新想象的篇章？答案需要我们每一个基金会的从业者带着敬畏心和责任感在实践中去探索。期待接下来的年会能给予我们一些探索的灵感！



基金会如何与私营部门求同存异创造共享价值？

杨晔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起起伏伏。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地球居民享受着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在全球各个地方，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自然资源的使用、清洁能源、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问题始终摆在大家的面前，这17个目标是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各个成员国通过的未来15年各国政府、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以及个人共同努力参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了消除贫困，促进共同的繁荣和福祉，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家在可持续发展这个议题下共同努力。

回顾最近八年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历史，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国家政策法规的逐步出台和完善，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可以更加平等和有效地参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和服务行业的工作。那么，我们基金会在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过程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基金会之间应当提升交流与合作。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交流，但合作还没有形成气候。拿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来讲，我们和几家基金会在教育和救灾领域开展了合作。我们非常希望把捐赠人的钱有效用于社会问题，我们要找到那些真正具有能力、能够高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让他们把钱真正用在刀刃上，在某些领域已经看到了合作，但是期待通过我们的相聚和研讨，找到更加系统性的合作机制。

第二，我们希望看到私营部门和基金会之间的合作。我2005年开始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在加入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之前，我始终作为捐赠人代表，实际上是做企业的筹款活动，八年来为宋庆龄基金会累积筹集了400多万元的善款，用于母婴平安项目的发展。私营部门实际上是社会上



拥有最多资源的部分，基金会如何能够把他们纳入到共同的目标框架中去，用好他们的资源，共同实现社会进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两个部门之间各有优势，各有差别，但也有着天然的互补性，两者的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在保持基金会的使命和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创造共享价值求同存异，与私营部门开展更加有效的深层次合作。

第三，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促进行业间的人才流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成功商业人士全身心投入到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当中，他们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更高效和更创新的方法。当然，除了这些领袖之外，我们也需要吸引更多的中层进入现有框架，能够加入到基金会工作中来。此外，我们也企盼着能够形成完整人才梯队的培养。大学层次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够有机会把选择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作为职业方向考虑。我们希望在各个层面吸引到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人类的福祉，迎接共同的挑战，来实现我们值得骄傲的使命。



国际格局的演变与社会领域发展的新格局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2016年，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一些新局面的出现，可能会对中国、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在这样一个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公益组织如何发挥中间桥梁作用，把社会需求和民众心声传递给政府，把中国的理念带给世界，实现大公益和微公益的结合，这是非常重大的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很多改革任务，把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社会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下，社会治理也有非常重要的内涵：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等等。

一、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和治理现代化的挑战

我们研究公共治理，讨论国家治理的四个基本要素：制度、价值、体系、能力。第一，基本政治制度。核心内容有三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第二，价值体系。大家耳熟能详的法治、效率、公平、正义、参与，可能十年二十年前是新的，但现在开始发生了变化。

“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这里面我们公益组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治理体系。我们讲国家治理机构的功能定位、组织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利益机制，这个主体既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也包括公共部门的组织，也包括企业。另外，治理主体之间的定位，不同层级之间的联合，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等等，这些尤其是公共管理研究特别关注的。第四，治理能力。有效配置和使用治理资源的能力，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匹配，也包括在紧急状态下的动员能力。大家知道2008年汶川地震，



恰好是我们公益组织、社会组织在动员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核心要素。实际上它的运行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不同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的可比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更多是研究它的一些客观规律，也希望能够借鉴其他国家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实现我们国家自己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治理现代化最核心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一些重要的关系，包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协调共治的公共治理体系。我们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不但要解决传统的市场、政府、社会失灵，还要解决市场不成熟、政府治理不完善、社会发育不足的问题。这几类问题加在一起，使得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有时就乱开药方。

二、国际国内宏观格局演变

第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半导体技术、互联网、基因检测、生物领域飞速发展，这些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在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收益时，它对我们的就业、收入分配、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

第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全球范围和一国之内贫富不均严重。

第三，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社会形成巨大的隔阂，社会极化现象非常严重。西方国家政治体系反应迟缓，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倾向明显。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问题：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念多元，一方面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另一方面碎片化倾向凸显。另外，社交媒体发达，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失灵，社会资本补充乏力等等，我们都将面临新挑战。

第四，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机遇，新兴大国新的机制发挥作用。去年，190多个国家领导人共同签署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事业。《巴黎协定》的签订、亚投行、G20等等，这些新



兴的机制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机遇。

三、从微公益到大公益——公益组织未来发展之路

微公益是自下而上的以慈悲为怀为基础的公益活动和组织，大公益是自上而下的以公共治理为目标的公益活动和组织。中国社会未来的公共治理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公益组织和再生宏观公共治理目标与基层社会之间起着关键的连接桥梁作用，这种需求越来越迫切、明显。《慈善法》的颁布，财富的积累，为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保障，也为资源整合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这需要政府、社会一起来做，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向善的社会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法律体系要继续完善，《慈善法》是一件大事情，后面配套的法律法规也要完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有很多争议。有了成熟的市场价值和有效的政府规则，这样会为我们社会组织提供更好的平台。

（二）引导社会资金，凝聚社会资本。中国的社会资本非常丰厚，我们的文化传统、社会网络，不管是儒家的教义，还是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本、文化历史传统，实际上中国文化是最有凝聚力的。过去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中，市场的发展对我们的社会资本形成了侵蚀，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我们的社会资本能够重新找到它更新的机制。

（三）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我们在新格局下也面临新机遇，在研究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时候，希望大家来仔细考虑核心的三要素：使命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我们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往往是三者不匹配：我们有宏大的构想，但是我们的运作模式不去支撑它，或者我们的使命很清楚、运作模式很清楚，但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所以做了几年就做偏了。这三者的结合很关键。



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空间

马庆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府长期以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激发活力，其中也包括社会的活力。进步非常明显，但还不够让人满意。我们社会的活力、能力、潜力需要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在这个需要互动的过程中，影响我们活力、能力、潜力的，主要还是在政府这个方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在一个热门话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着眼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资源的配置；在解决物质效率跟供给错位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性消费品供给短缺问题；在发力激活企业主体的同时，也要着力培养服务性的社会组织；在发挥科技等要素功能的同时，也要特别强调制度供给的关键性作用。

一、要高度重视社会资源配置及其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是要消除资源配置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不光是经济资源的配置，还有与它并驾齐驱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等等。经济资源配置针对的是物质消费产品的供给质量，社会资源配置针对的是社会性产品的需求与供给质量；政治资源配置针对的是公共权力产品的质量。

不管是哪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有两个方向或者两种途径，一种是以计划或者垄断为主的做法，一种是以市场选择为主的做法。以计划或者垄断来配置，它也有好处，好处就是权力说了算，它屏蔽其他的声音，决策简单、快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去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目标。但它的不好处是会抑制社会的创造性和活力，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高成本和低效率，而且逐步地、不可避免地产生特权腐败阶层。

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优胜劣汰和激发社会成员的生产潜能，使资源配置趋于优化，而且有强劲的资源增值能力，带动经济不断增长和社会不断发展。它的不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无限竞争的，是高点挖掘的，是马太效应的，因为它会积累强弱两肥和贫富的鸿沟，



所以需要政府来给它背书，给它补充校正。

虽然这两种配置方式各有优劣，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市场选择为主的方式最终为全世界所接受，也为我们中国所接受。在发达国家，不仅将这种选择性的配置用到了经济资源上，而且也广泛用到了社会资源配置和政治资源配置上。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 40 年，也就是从计划为主走向市场为主的过程，只是针对不同的资源，我们的市场配置程度不一样。经济资源开放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因而市场化的进程比较快；政治资源开放的接受度最低，因此基本谈不上什么市场配置；社会资源开放的认同度比较低，因而市场化的程度目前来看不高。但是随着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国家各界对社会领域创新的认识和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

二、开放社会资源配置的价值和效益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贯穿于社会服务和公益慈善领域，放开对社会组织发育和其他相关要素的限制，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选择机制，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成本，提高社会服务供给品质和效率。也就是公共权力部门放弃对如养老服务、卫生与健康服务、教育、就业、弱势群体的服务以及公益慈善的计划思维和封闭性做法，采用多元和竞争的方式配置资源。

在现有社会资源配置的现实选择中，虽然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新旧两条路的博弈仍然是极其焦灼的。一边是对开放性配置的积极态度，而 2004 年中央提出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 年，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组织体制；2013 年第七次机构改革首次正式提出，四类社会组织要简化登记；同年国务院发布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2015 年，两办又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方案；2016 年又颁布《慈善法》等等，这些都是积极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政策法规。

而在另一边，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封闭性的留恋，对于保守的留恋。虽然我们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已有 12 年之久，但是公权力这一方利用控球后卫的地位打独球还相当习惯，致使其他社会参与主体在球场上无球空跑的



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比如现在官办社会组织的阵容仍然强大，一些官办社会组织在做桥梁和纽带的同时，浪费了大量的稀缺资源。官僚化和庸俗化社会领域的生态，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影响不够理想。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问题上，虽然已有法律文字，但是因为职能部门，至少有一部分职能部门，这些岗位上的官员瞻前顾后，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市场化仍然是障碍重重，落地不易。又比如在社会组织中的党社关系上，也颇有纠结。

新旧路径的博弈、资源配置方式的飘忽不定，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要思考社会领域进行供给侧改革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认为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领域，只要有条件就应该采用开放的资源配置机制，计划只能是补充，垄断只能是例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能够强化选择，促进竞争，选优汰劣，培养多元。就社会领域来说，开放社会资源配置的好处，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第二，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第三，拉动经济和促进就业。

到 2015 年年底，我国人均 GDP 接近 8000 美元，已经大大超出世界银行 4085 美元的水平，我们已经进入了中上收入国家的门槛，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开始上升、凸显。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在由物质匮乏阶段物质消费需求与物质生产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变为旺盛的社会参与需求与参与条件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执政者需调整管理理念，在“改进社会管理”和“改进社会服务”的同时，增加“改进社会参与”的制度与政策供给。

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群体，社会组织无论是量的增加还是质的提升都越来越不可忽视，社会资源的选择性配置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其中的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服务方面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公益慈善领域存在大量服务需求群体，主要包括 65 岁以上的老者、各类残障人士、贫困人口、优抚对象、



毒瘾患者、孤儿、爱滋病患者等。根据咨询机构的研究，我们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养老服务需求规模、医疗健康服务需求规模，还有各类民办学校、学前教育的需求规模及环保生态方面的需求规模，加起来大约有 24 万亿元。

未来五年，这么多的社会服务规模的形成，既是对我们调结构、稳增长的强大支持，也是我们惠民生、促改革的有力条件。在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和经济下行的各种压力下，政府开放社会资源的配置，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符合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第一，直接拉动 GDP。根据 2015 年统计，各类社会组织年度支出总额达到 2400 亿元，在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纳税总额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团队测算的结果是 2014 年社会组织 GDP 不少于 3900 个亿。第二，促进投资和消费，我们有研究已经证实，社会组织每向消费者提供一美元的服务，产生的效应是一块八毛三。还有促进就业，2015 年我们这个领域的就业已经达到 734 万人。

三、制度供给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这是我的核心观点。我们研究团队预测，“十三五”期间社会组织将发展到 91 万到 100 万家，社会组织吸纳就业应该达到 1000 万到 1200 万人，支出规模达到 5000 亿元到 8000 亿元；社会组织 GDP 达到 7200 亿元到 8000 亿元；慈善捐赠总额是 1200 亿元到 1800 亿元。

要强化和优化制度供给。最主要的是党和政府的制度供给做托底，它需要改善制度供给的质量，其他各类主体特别是社会组织主体才能够发挥作用。现在最需要增加的制度供给是什么呢？

第一，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参与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第二，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的税收和人才政策，适用到教育、医疗、生态环境、弱势群体援助的社会服务组织。关于这个，十部委发的 33 号文件，大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第三，社会组织中的党社关系一定要合理界定；第四，为国内国外社会组织服务与合作制定更加便利的政策；第五，为社会组织走出去发挥国际作用制定配套政策；第六，通过制度安排限制公共权力对社会组织的不当干预；第七，用制度设计推动官办社会组织社会化和事业单位改革正确的转型。



中国公益的新使命与挑战

李小云 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在过去数年间出现两个维度的变化：对外，这个变化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意义，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向全球扩展，不是扩张；对内，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两个维度的变化是把握社会组织发育的重要条件。

90年代中期，我们做NGO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外部的拓展来看，第一，有我们民族的本体自立的力量，和人吃饭一样，有民族本体性的自我利益。第二，在寻求我们民族本体利益的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从文化角度，更主要的从物质角度讲，我们从过去的被现代化、被全球化，到今天拥有历史和物质的优越性，就需要思考一些问题，怎么能够真正公平地丰富其他文化。

当下和八九十年代不同，过去是一个具有共识性政治的阶段，这背后是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结合。今天由于发展主义的长期主导，导致了社会分化，分化以后就出现了不受益群体、少受益群体，甚至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出现民粹主义。中国现代的民粹主义把所有东西都揽在自己底下，就产生国家发展主义的胁迫，民粹主义是造成中国不稳定因素的重要主因。

这十年国内的变化太大了，我觉得中国公益面对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挑战是公益文化。我们的公益文化既有传统的慈善思想，但主要借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公益。对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在发展主义、民粹主义交织的过程中，公益作为一个促进社会稳定、促进新社会形态形成的重要手段，不是协助政府就可以，不是反对公司就可以。公益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公益。公益是具有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行业，它有具体的能力，有钱、人、机构，一旦变成民粹主义的工具，是非常可怕的。公益不可以作为国家主义的部分，也不能完全沦为发展主义的奴隶。公益是社会力量的代表，我们需要公益来取



得平衡，需要公益来把社会的正义体现出来。这非常重要。

公益的形态、产品很多，但最核心的部分在于财富的分配，公益对财富分配的意义，不是抢，是制度性的分配，它是一个相对隐形的社会契约。公益组织未来如何为我们的民族发育出一个自身的公益价值，我们现在还缺乏这样的价值，还没有共识。我们要建立起能够帮助我们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道德价值，这是公益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公益机构是不是有能力面对公益异化的压力？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基金会的设置。公益机构本身的异化风险越来越大，本来公益机构的作用是在捐赠人和受益人之间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道德缓冲。因为面对面捐钱会产生优越感，让受助人产生屈辱感。社会需要公益机构去做这样的缓冲，得到捐助的时候看不到谁捐的这个钱。我们需要这样现代化的公益机构来平衡社会各个方面的冲突。但今天大量的公益机构恰恰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产生异化，这是非常严重的。

第三个挑战，公益的法律问责。我在想，为什么搞慈善法？难道说规范一个人的捐助行为需要一个法律吗？不要，不需要大的法律规范人的捐助行为。做公司的，做 NGO 的，都在一个法律之下，并不需要一个专门法。但是我们最基本的问责体系，问责的思路是单向性问责，它是控制你，不是说要双向问责。

公益组织最大的长处，应该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进行救助。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政府确实确实缺乏创新的条件；而公益组织因为资金灵活，人也灵活，都是知识分子，有创新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长处，想办法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就可以引入政府资源，并且平衡市场资源，跟它们建立一个非常友好的伙伴关系，真正合力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



中国公益的新格局和新想象

王行最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

我是第一次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论坛。我听了一天半的会议，有两个感受：第一，感觉非常欣慰。欣慰是看到了老中新结合、充满激情、充满活力、充满梦想的基金会队伍，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队伍，它应该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催化剂。第二，我也倍感压力。今天我是面对一批追风的少年，曾经我们被称为行业里的“大叔”，我觉得大叔好像感觉有一点老了，我希望是大哥。所以这几年一直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自我创新，力求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大家的大哥。

这次论坛主题是新格局新想像，我总结了六大新格局、十四大新想象。

一、六大新格局，剖析公益现状

经济、政治、法律、行业生态、多元跨界、资本的共享以及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带来对行业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经济繁荣使公益行业爆发式发展。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有可能演变成现代欣欣向荣的行业。2014 年人均 GDP 达到 7500 美元，2015 年 8016 美元，现在是 8500 美元，从国际比较来看，GDP 达到 6000 美元的时候，无论是社会力量的变化，还是公益事业的发展，都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公益行业的三类组织，去年统计有 66 万家，年平均增长率 10% 以上，这是我们面临新的经济格局。

第二，有所作为地走向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我们从韬光养晦变成现在的有所作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积极参与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从被动接受规则到现在积极主动参与。

第三，《慈善法》促进公益行业全面发展。它的利好，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打破公募权垄断。大家特别提到这是最后一届非公募基金会，听着有一点悲凉，但是气氛很好，大家是怀着期待的心情。《慈善法》出台后，公募



与非公募的界限就模糊了，以后是我们基金会行业的发展。政府对慈善组织要求税收优惠，这是慈善法的重要章节，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格局。

第四，多元跨界使公益行业充满活力碰撞。公益组织的构造，基金会构成有大有小，上游、中游、下游，每一个基金会的定位不完全一样。曾经主要做两方面：一是扶贫，二是环保。我们想做发展研究包括人才支持等等，这样的基金会非常的多。同时我们人员的构成，来自不同的领域，跨界流动频繁。我们讲的跨界更多是企业界和公益界的交流：有一些跨过来，有的脚踩两只船。公益行业和政府有跨界吗？现在基本没有，政府有没有下来直接做公益的，这个也不是很多。学术之间的交流，开研讨会比较多，但是公益界和学术界的流动很少。不管怎么讲，多元跨界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新格局。

第五，资本共享使行业发展更迅猛。原来我们以为资本是肮脏的，资本家就是剥削，大萧条时期看见很多人没有饭吃，如果资金主义以这种方式演变下去，一定是要死的。但是资本为什么现在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因为资本的恶得到了遏制，善得到了褒扬，资本从善使得资本流向公益，促进这个社会更加繁荣，使这个结构更好。

第六，移动互联网带来全新变革。无论是品牌推广、筹资、项目实施，还是信息披露、互联网、物联网、高铁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也给我们机构专业化带来巨大的挑战。

这是我们面临六个方面新格局，有一些我们现在开始做了，有一些做得比较少。

二、十四大新想象，展望未来公益

第一，打造中国自己的发展伦理、公益价值观和文化。我们传统的公益文化思想，扶贫济困、好人好事，是雷锋式的，我们受这样的影响。作为现代公益组织，我们的水平和认知要得到极大提高。

第二，社会力量要培育出不依附政府、也不依附资本的主体性。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需要社会、市场部门的协同配合。公益行业依然非常弱小，需要发展壮大。没有政府支持和资本的流入，我们是无源之水。随着新技



术的引入，我们应该更多拥抱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更多依靠它们，使公众参与成为社会的潮流。

第三，将微公益与大公益有机结合，创造美好社会。清华的薛澜教授提出：微公益是自上而下以慈悲为怀为基础的公益活动和组织，大公益是以公共治理为目标的公益活动和组织。

第四，公益行业内组织的分工、协作、互动正在形成。我相信这种分工、协作、互动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公益行业是一个产业链，不同的公益组织应该有不同的定位，互相形成配合，形成整个行业的链条。这几年，有很多行业平台参与服务于这个行业，促进行业之间、机构之间的横向合作与互动，未来这些会越来越多。

第五，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将成为公益行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益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无利可图，它是不可持续也不能长久的。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做公益的方式，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公益市场上并不多。如果没有企业从业经验的人，办社会企业是很难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社会企业美好的前景，同时也要认识到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点管理企业经验都没有，这个社会企业十有八九会失败。

第六，越来越多基金会和其他公益组织走向国际，参与国际的发展。现在走向国际的中国公益组织仍是小众，有学者研究现在国际上有业务活动的中国基金会有 37 家。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全球中资企业直接投资的存量大概是 6 千亿美元，将近 4 万亿人民币，中国两万家企业在海外设立了自己的独立子公司或者分公司，企业如果希望在当地长久生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历史比较短，但是从事现代社会责任的经验相对还是有一些，这为我们公益事业走出去提供了空间。政府政策层面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央密集出台政策，包括两办文件，都在支持公益组织走出去。

第七，随着《慈善法》出台，我相信志愿服务总量比重会大幅提升，成为公益行业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注册登记志愿者是一个亿左右，占总人口 7.2%，相比美国差距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有专门的公益组织来做志



愿者服务，也有不同的公益组织在使用部分的志愿服务，同时也有参与到国际志愿服务的活动。我相信以后公益行业里志愿者服务将会非常庞大，也会产生中国的和平会。

第八，信息披露对基金会提升机构专业性和信息化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信息披露是一个表象，背后是机构执行力。如果没有一套体制机制，没有专业性比较强的队伍，不把项目做好，把项目效果呈现出来，你就无法继续。同时，没有相对完善的信息化体系来把这些项目的资料收集起来，你也不可能披露。这对我们机构的专业性、成本以及人力投入都提出了新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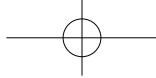
第九，移动互联网将对公益产生深刻变化，催生新的公益，促进社会公众参与，使公益影响和覆盖面成倍放大。腾讯“99 公益日”699 万人次参与捐赠，4643 个筹款项目贡献力量，总计金额超过 6 亿元，我们跟腾讯、阿里巴巴合作，公众捐赠达 40% 以上，他们利用“99 公益日”筹了 8 千多万元，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技术，这是难以想象的。

第十，公益资金来源越来越广泛，以前是直接捐赠，慈善信托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现在慈善信托已经达到 15 家。

第十一，公益养老大有可为。在教育、环保、医疗健康方面，我们现在许多公益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是养老方面，我们涉足不多。现在多是以商业方式解决，但解决得不是很好。公益行业参与养老领域的机构少之又少。

第十二，公募权放开以后给非公募基金会带来机遇与挑战。机遇是筹资渠道越来越多。潘江雪理事长有个说法：非公募基金会在内部有股份有限公司，而公募基金会就像上市公司。你要面对的是公众，而面对公众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成本——原来筹资 100 万元，成本 1 万元就可以了；现在如果是 100 个公众，每一个人捐 1 万块钱，100 人捐 100 万元，你的成本将高于一个人捐 100 万元。通过移动互联网，我们平均单笔捐款规模是 50 块钱，可以想象工作量会增加多少，将有许多问责问题提出来。

第十三，从慈善救济转向慈善与发展并重，助力受益人走上可持续自



我发展的道路。现在大多数公益组织还停留在缺钱给一点钱、缺物给一点物、送一点面条和衣服的层次，但今年送了明年还需要你的支持。救灾领域，我们积极响应紧急救援响应，但是真正参与灾后重建的又有多少？我们使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必要的技能，这是未来我们的公益，现在是 1.0 版，以后走向 2.0、3.0，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第十四，公益和教学机构纷纷出台公益人才资助培养计划，公益人才的供给和专业性将有较大提高，从而推动整个行业水平的提升。



公益慈善组织不要妄自菲薄，要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第一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非公募基金会是 846 家。今天是 3706 家，八年增长了 4.3 倍。第八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可以说是圆满结束，而以“非公募”冠名的基金会发展论坛完美收官。明年“公鸡母鸡”一起上，希望可以孵出更多的“小鸡”。

民政部曾经对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这个行业平台给过一项评价：准行业协会。这个平台不是一家玩，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不是一家机构玩，是一群人一起玩，有着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机构走在一起，也可以叫做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对我们公益行业有很大的推动，公益应该合作，大家更应该共享各方的价值和资源。这次是第八届论坛，我参加了六届，今年是我参加的最好的一届，好在有新的冲击，让我们受到一些振动，主讲嘉宾有跨界的安排，带来很多思考。

马庆钰教授的研究团队算出我国社会组织的 GDP 有 4000 亿元，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还是有一点份额的。这次会议上，杨平同志提出公益组织要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政府给钱，资本给钱，在这么强势的政府和资本面前，作为一个行业部门，你有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美国社会组织 GDP 是 10% 以上，从业人员是 10% 以上，作为一个行业的主体，地位是很强的，价值作用也很强。杨平提出，13 亿人是公益慈善的市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公益的需要，这种社会服务已经不是纯粹的公益捐款，然后去做搬运工。大量的公益组织、公益服务已经和公共服务对接了，13 亿人的公益慈善行业市场，我们怎么就做不好、做不大呢？我们就搞一个千分之几在那里没有意思，真的是凸显不了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作为公益部门，基金会的数量非常小，现在 60 多万家社会组织，咱们基金会才五千，数量非常少。但基金会是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基金会要实现杨平同志提出的“走向主体地位”的目标，我们面临一些很好的机会，



也存在一些难缠的瓶颈。

第一个大机会是社区基金会。美国社区基金会数量不多，700 多家社区基金会几乎覆盖了每一个城市，它对城市社区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人人公益的机构，项目可能会覆盖到很多人，但是支持社区基金会的是有钱人。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是专业机构，专业慈善机构帮助富人打理慈善财产。如果政府有做社区基金会的积极性，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起来，利用社区基金会把慈善信托做起来，这将是非常有效的。很多有钱人就不用自己办基金会，你做委托人，社区基金会做受托人，我帮助你打理慈善财产，按照你的意愿做事情就可以，这是一个大机会。

第二个大机会是家族基金会。中国第一代富人开始考虑财富传承问题，财富怎么安排？比尔盖茨在北京谈话，他说在中国劝富人捐财产比在美国难。美国富人大部分是财富继承人，是一个家族继承财富，而中国的富人基本上是第一代创富者，这个财产怎么安排，老子说了算，儿子插不上话。所以家族基金会在财富代际传承的时候在中国有大发展的前途的。家族基金会是拿自己的钱做事，敢于慈善创新、承担风险，出了问题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就像比尔盖茨拿大量钱投资一些药品的研发，失败了没有关系，成功了让很多人受益。家族基金会没有腐败，为什么呢？因为腐败是从别人口袋里把钱拿到自己的口袋里，而家族基金会是从自己的这个口袋拿到那个口袋。家族后人要继承先人的光荣与梦想，一定要把基金会做好，不能辱没先人。所以家族基金会会得到大发展。

第三个机会是基金会财产的保值增值。基金会和慈善会两千亿存量资产，两千亿存量资产目前的年回报率只有 2% 左右，低于通货膨胀，实际上是缩水的，所以要让慈善财产保值增值、依法运作。这个运作要解决一些观念上的束缚，要打破道德绑架，要提高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同时还要建立为慈善机构打理财产的投资理财平台，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基金会的发展面临两个大的瓶颈。第一，成立这么多机构，去哪里找专业人？这是一个大瓶颈，不会干的会干坏的，这个大跃进是不行的。一定要把人才短缺的瓶颈突破掉，如何让大家拿出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人力



资本的提升上，是非常重要的突破。第二，税收优惠没有到位，现在基金会的投资收入要收 25% 的企业所得税，这个瓶颈是政府放在那里的。

最后，我对明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提三点希望。第一，要更专业。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团队，甚至是注册成一个实体机构来运行。这一届做得不错，有很好的基础，希望更专业。第二，要更开放。开放到“公”的“母”的都来，草根 NGO 也来，特别希望下一届让上个世纪活着的、现在沉睡的、那些很大的官办基金会也来，让他们来受教育。你们天天去拜访，一定要请他们来。第三，要更加彰显我们公益行业的主体性，凸显主体的力量。



2017 年会

主题：新价值 新生态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 年度盛会在成都召开。本次年会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转型升级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后的首届公益盛会，也是基金会论坛的第九届年会。为期两天的年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关心基金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 571 家机构的 918 名嘉宾与会。其中，基金会 197 家，有近 200 名理事长与秘书长参与。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7 年组委会：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与人公益基金会

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基金会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俞可平 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十九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和新战略，其中包括建设“社会文明”的新目标，在原先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之外，增加了“社会文明”，从“四大文明”建设变为“五大文明”建设。并且将社会文明的目标纳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百年目标”之中。十九大报告指出，第一阶段，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一、社会文明与基金会的公益性

人们常常不加区分地使用“文化”与“文明”，在日常生活中两者有同义的一面。广义的文明是指特定人类的理性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各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狭义的文明是指人类的进步状态，是形成体系的文化系统，由不同的亚文化组成，如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社会文明是人类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进步状态，是社会生活领域所有进步成就的总和，既包含人类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产生的先进意识、价值、法律、制度和风俗，也包括个人的素质、修养、道德、习惯和行为方式。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相互塑造。

国务院 2004 年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基金会定义为“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虽然基金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人类的互助活动，正式的基金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自身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简单地说，基金会就是基于自愿捐赠的资产专门从事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组织。



一般认为，作为具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基金会，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早起源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不能据此认为现代基金会是西方国家特有的事物，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人类文明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必然有先后之分。但只要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事物，它必定具有普遍意义。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公益事业，公益事业都离不开公益基金，有了公益基金后，都要追求公益基金的最大效用，因而，基金会对现代国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我国改革开放后也引入了现代基金会制度，1981年成立了我国第一家正规的国家级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基金会具有自愿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是典型的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可以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的部分：以政府组织为基础，以官员为代表的政府系统或政治系统；以企业组织为基础，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系统或经济系统；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以公民自己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系统，或简称社会系统。在基金会的众多属性中，公益性是其本质特征。基金会越发达，表明社会的公益事业越发达。基金会的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状况，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

二、基金会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九大作用

基金会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反过来基金会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

第一，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倡导先进理念和先进价值。基金会的本质功能是公益，而公益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理念与价值，它需要奉献、博爱、友善、合作、负责、透明、诚信、有效、互助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文明所不可或缺的先进理念和价值。

第二，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社会创新。现代基金会本身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基金会既不同于企业组织，又不同于政府组织，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组织。一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适用于基金会的发展和管理，需要制度创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因此，基金会的每一



步发展，都会有效地推动社会创新。

第三，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公益基金实质上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具有特定用途的资金”，是实现财富在全社会公平分配的一种补充手段。因此，从本质上说，基金会通过扶贫帮困和社会救助等形式发挥着调节财富和福利再分配的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四，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基金会实际上是一个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公共平台，任何热心公益并且有一定行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活动，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基金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是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渠道。

第五，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改善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传统统治与现代治理的实质性区别之一，是公共治理的主体从一元至多元，包括基金会在内的众多社会组织是现代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发挥基金会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式之一。

第六，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信力。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力。没有足够的公信力，任何国家都无法有效治理。社会的公信力越低，其治理的成本便越高。基金会主要依赖公民的自愿捐助和志愿行为从事公益活动，公信力更是其生命所在。诈捐可以毁掉一个企业的声誉，失信同样可以毁掉一个基金会的信誉。因此，基金会的成长发展过程，其实也是其社会公信力的提升过程。

第七，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培育公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公民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也同样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基金会是培育和实践公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场所，基金会越发达，就越能彰显公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第八，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基金会所从事的通常是救人于困难、帮人于病弱、团结互助、弘扬正义的慈善公益活动，这些慈善公益活动本身就是社会的美德和良俗。从事慈善公益的过程，就是



弘扬社会美德良俗的过程。

第九，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修养和素质。参与和从事基金会的公益活动，需要牺牲、奉献、利他、友爱、诚信、助人、宽容、忍耐等品格，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高尚情操和修养。参与基金会的公益活动，对于个体而言，可以提升个人的品性修养，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和品质升华的过程。

三、我国基金会发展的五点建议

我国的基金会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展壮大。从1981年成立第一家正规基金会直到现在，已经拥有6263家正式登记注册的基金会，2015年底净资产1187亿元。各类基金会在促进公益事业、扩大社会参与、改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创新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角度看，我国的基金会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宏观制度环境不够完善、公益基金的数量规模相对较小、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管理人才不足、内部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国际性参与不够等。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我国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第一，要更加重视基金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基金会的本质功能是慈善公益，但它对社会进步的意义绝非简单的慈善公益。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民参与、社会诚信、社会治理和社会文明。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升社会文明的高度，更加重视基金会的发展。

第二，要改革和完善基金会的制度环境，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加强基金会的立法，制订更加合适的公共政策，营造更好的社会生态，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和公民投身于基金会事业。

第三，吸引更多的基金和人才，增强基金会自身的能力。基金会没有基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要想方设法募集更多的资金和财产，扩大基金的规模和总量。此外，也同样要重视吸引更多社会精英参与基金会事业。增强基金会的能力、财力和人力，同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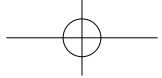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第四，除了做好公益慈善外，基金会还应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



改善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把基金会视作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主体之一，发挥其在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基金会自己也应当自觉主动地承担起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相应责任。

最后，要加强公益教育和培训。努力培育普通公民的公益精神，丰富公民的公益知识，使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基金会的发展。

总而言之，在推动社会创新、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进程中，有基金会的重要角色和广阔前景。基金会的事业，是关系到社会文明进步的战略事业。我充分相信，各类基金会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数据智能与公益未来

朱卫国 阿里巴巴集团综合政策研究室主任

一、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我们已经进入了数据时代，我们已经被数据包围。尼采说“有力量的地方，就有数据；有数据，它就更有力量”。这句话在阿里巴巴看来，是百年前先知对数据时代的预言。数据是力量的足迹和意志的留痕；数据是与劳动力、资本相平行的第三种生产资料；数据是与石油、电力相平行的第三种能源；数据是与物质和能量相平行的第三种世界的构成。

阿里巴巴是一家数据公司，数据是我们核心竞争力。有统计局领导到阿里巴巴调研，说“你们这么大的公司，有这么多数据，为什么没有一个数据统计部门？”我们回答说，“在阿里，一切在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被统计了。”去阿里巴巴参观的人很多，今年1月到10月份，阿里巴巴正式接待的参访就有1500场，到阿里巴巴看什么呢？就是一帮年轻人抱着电脑，还有一堆桌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马云说，阿里巴巴还有未来可看，而这个未来，正在通过我们的数据大屏显现出来。那块大屏上所有的数据都在瞬时发生。阿里巴巴的秘密就是数据的芝麻开门。数据是人类自己产生的能源，这种新的能源不像石油和电力等消耗型能源会越用越少，数据这种能源越用越多，越用越值钱。

数据时代必须满足4个条件。第一，数据在线化、结构化。大数据不仅仅是量大，更关键的是在线。在阿里巴巴，我们常常称为云数据和大计算。第二，算法不断优化，就是机器学习。第三，与数据匹配的计算能力。在阿里巴巴，阿里云可以把一万台电脑连在一起当一台电脑使用，提供与大数据匹配的计算能力。第四，低成本商业化成为现实。大家知道大哥大的时代，要储存1G的数据需要1万美元，而现在只需要3分钱。低成本使数据的商业化处理成为可能，我们因此进入了数据时代。

目前数字经济在主导全球经济的新动能。今天全球市值前五的公司：苹



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他们的市值均超过 5 千亿美元，而他们五家公司市值的总和相当于德国的 GDP。数字经济有一个特点叫粘性，这是一种满足并不断升级需求的魔力。“剁手党”和“败家娘们”都是粘性的表现。数字经济的粘性，使得巨大的规模效应和精准的客户体验结合起来，摆脱了以往企业越大越脱离群众的诅咒。这就是平台经济体的生命力和魅力。数字经济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真所谓“神思方运，万涂竞萌”，“泰山遍雨，河润千里”。

二、数字经济的运营

技术的迭代，在改变商业形态的时候，也在同时改变经济组织的形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据经济的运营有几个方面：数据智能、网络协同、生态再造和平台治理。

（一）数据智能

数据智能是算法、数据和计算集合的智能。数据是能源，算法是引擎，计算是能力。数据智能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从原来的利用数据决策，变为数据自主决策。阿尔法元、天猫、幽灵，还有特斯拉，这些都是数据智能的典型代表。数据智能解放了大量的人力，使得机器有了自身的逻辑和判断。今年阿里巴巴双十一的全球狂欢，24 小时产生 1682 亿的交易额。阿里巴巴办双十一，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实现技术大练兵。制造一个基于人口红利的巨大应用场景。这样的场景逼着我们把技术水平拉升上去。今年的支付峰值再创新高，达到 25 万笔 / 每秒，什么概念？全球最大支付机构的 VASA 卡，它的支付峰值只有一秒 1.4 万笔。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实现精神狂欢。精神狂欢放松的是阿里巴巴团队，这是带团队的办法。这么大的量，24 小时，阿里的同学都在狂欢，谁在干活？我们的数据智能在干活，这就是平台经济的力量、数字的力量。

（二）网络协同

说网络协同必须提麦特卡尔夫定律，这个定律说，网络的价值和网络上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目前阿里电商用户 5.35 亿，腾讯 9.38 亿，蚂蚁金服 4.5 亿，脸书 20 亿。网络协同，使得我们和一个更大的力量链接在一起。



正像王阳明所言：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无穷。

（三）平台生态

在技术变革面前，一切商业模式都是纸老虎。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我们从工厂、到公司、到跨国公司，到现在的平台经济，不断升维。在平台生态中，小前端、大中台、富生态的结构和传统公司、传统的跨国公司有非常大的差别。平台的实质是一个多元生态的经济体。

（四）平台治理

阿里巴巴 2015 年专门设立了平台治理部，它相当于一个经济体里的小政府一样。平台治理有规则、算法、数据和信用，共同构建平台治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算法。算法这个东西很厉害，算法就是牧童遥指杏花村。面对数字经济的大潮，世界各国都在通过调整治理结构予以应对。例如：阿联酋在内阁设定了专门的人工智能部，英国上院设立专门的 AI 委员会，机器人 Sophia 已经成为沙特女公民，而丹麦政府正在考虑向世界上的主要 SuperFirm 派驻大使。在丹麦外交部看来，在数字经济时代，跟这些 Super Firm 打交道，和同主权国家打交道同样重要。

在我们国家，面对互联网经济的治理，也讲到线上线下结合，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单纯行政监管向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机制，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平台经济体，可以通过数据分享、技术赋能和治理参与等形式，实现与政府部门监管的协同共治。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鲜活的实践。

三、未来公益

公益的功夫也在公益之外。易经有“极数知来之谓占”，就是你把所有的技术和数据的可能性穷尽之后，你就知道未来。马云说大数据时代可以搞计划经济，大概也是在表达这层意思。因为数据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弄得很清楚。

在阿里的生态中，已经有很多根植商业的未来公益发生。例如，芝麻信用、团圆、云剑行动、蚂蚁森林、城市大脑等。

第一，芝麻信用。因为信用所以简单，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说，杭



州丈母娘找女婿看芝麻信用就可以，因为芝麻信用同时说明一个人的实力和品质。未来，信用将使 90% 的押金消失，使 80% 的证明消失，这将对民事和行政法律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第二，团圆。阿里去年发布的 1317 名儿童失踪信息，找回率为 96.74%，充分利用高德地图形成的人工智能，帮助警方打拐。这不就是公益吗？

第三，云剑行动。这是数据赋能精准打假的公益产品。以前只是在浙江用，后来扩展到长三角、珠三角。阿里巴巴把这个数据给执法机关，阿里利用数据智能主动防控拦截下架假冒商品，是线下权利人投诉下架商品的 26 倍。淘宝发布的打假地图，通过大数据挖掘 18 万个店铺背后疑似售假团伙 61330 个，这不是公益吗？

第四，蚂蚁森林。支付宝碳帐户产品。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是，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铃而是蚂蚁森林。一年的时间，2.3 亿用户，1025 万棵树，碳排放累计减排 122 万吨，日均减排 5000 吨。这不是公益吗？

第五，城市大脑。把数据智能技术用在城市治理方面。城市人工智能中枢，让城市能够自我调节，与人类良性互动。通过 ET 城市大脑，使杭州的车辆通行速度提升了 11%。这都是公益！

未来公益的支点，首先还是使命。没有使命的人走不远。如果一个公司把挣钱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像人把喘气作为生命的意义。这样的人一打就倒了，倒了也站不起来。有使命的人百折不挠。我觉得数据、信用、动能，是未来公益的支点。数据，包括管理数据、主体数据、业务数据。管理数据主要在政府，主体数据可能在政府中，也在行业协会中，这些数据要实现全面的打通。数据时代，数据必须要共享，共享数据才有价值。信用，诚信激励，失信惩戒，技术支持。发改委在牵头组织这个机制，民政部也参与其中。再一个就是动能，动能首先是制度，其次是信仰，再一个是商业的根基。

最后送给大家两句话，这是《财富的责任》里面引用的：“如果有人问我，一个人为何必须做好事？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我们就是要做好事，好好做。实际上，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公益。



基金会要“名符其实”

胡广华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

一、名不符实：基金会没有基金

大家知道，注册一个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启动资金不能低于 800 万元；注册一个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启动资金不能低于 400 万元，注册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启动资金不能低于 200 万元。据传，这个门槛可能还会要提高。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在每年年检时还不能减少，所以也不敢完全投入使用。同时还规定，公募基金会当年所募得的善款，第二年必须支出 70%。也就是说，基金会基本上没有积累，形象一点说，就像大熊掰棒子，一手进一手出。这样，大部分基金会几乎一直处于没有基金的状态。

如果有人来求助，我们只好说，“好吧，我们试着为你去公募，能否募到心里也没数。”大家说，这能叫“基金会”吗？中国的基金会，包括大部分国字号基金会都没有足够的基金，与“基金会”这个响亮的名字比起来，只能说是“名”不符“实”。

二、名不符实：圈里圈外，冰火两重天

前些天，公益圈“两光”之争炒得如火如荼，朋友圈里转发，评论热火朝天，“向左”还是“向右”？“利己”还是“利他”？圈子里的人们都很兴奋，圈子外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九月份，我和央视《社区英雄》栏目的吴卉导演来杭州，见到新湖集团的叶总，谈及公益。叶总十分坦诚地说，“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对公益行业的印象，隐隐约约有三个标志性的事情，一是‘希望工程’，二是‘郭美美’，三是陈光标。”我的天呐，这就是中国公益？这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企业高管对中国公益的印象。

来成都前两天，我和办公室的小伙伴聊天，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公益向左，商业向右》，问他们知不知道两光之争？居然有一半的人摇摇头说不清楚，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自己的朋友圈里没有大 V，没有公益大咖。俗话说，墙内开花墙外香。然而，中国公益，墙内花开，墙外有



所不知，墙内也是知之甚少。然而，墙内闻到花香的人大多是自娱自乐自嗨。

公益的热，只是在一个一个小圈子里热，在一个一个小群里热，也就是说，公益名义上的虚火与实质上的影响力相去甚远，名不符实。所以，无论是公益大咖大V，还是公益新势力，我们都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公益还只是处于发育阶段、初级阶段，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提出“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大口号。

三、有名无实：公益评奖徒有虚名

这些年来，公益慈善界有各种各样的评奖，“中华慈善奖”、“CCTV慈善人物”、“责任中国”、“安平奖”、“中国好项目”、“中国好公益”……据我所知，这些各式各样的评奖大多数只是发一个奖杯、一张证书，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奖金，可以说是有名无实。

我们知道，诺贝尔奖有丰厚的资金，国家科学奖有好几百万，过去我在联想工作时，优秀员工能获得公司股票，或现金奖励，或奖励出国旅行。

那为什么公益奖励就没有奖金呢？是因为公益人只是要面子好虚荣，不喜欢铜臭味，还是怕社会上的人说闲话呢？我希望，以后的公益大奖有名也有实。不仅要奖励机构，而且还要奖励个人。今年“99公益日”，我们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就是为合作的NGO资助配比人员工资。央视十二频道《社区英雄》栏目是为数不多的有名有实的公益节目。这个节目开播五年多来，有七十多个草根公益组织参与PK，优胜者可以获得30万元的奖励，另一方也能得到10万元的公益金。在徐永光老师和南都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央视和我们几家基金会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英雄基金”，将来还要成立英雄社区基金会，专门支持、资助社区/草根NGO。

四、实实在在：征收管理费与从业者待遇

收不收管理费，收多少管理费，是基金会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有的基金会号称“零管理费”，这实际上是对行业规则的破坏，是不负责的。公益有成本，团队要生存，机构要发展，行业要发展，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收取管理费。基金会、公益组织其实就是社会公益服务的中介机构。我们根据自己的使命与宗旨，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为社会提供优



质的公益产品和服务。体现我们的价值，就需要被认可，就需要被承认。因此，为了团队生存，为了机构发展，我们必须根据政策规定，名正言顺地收取管理费，没必要羞羞答答。

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那就是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基金会工作人员、NGO 专职人员，我们都不是慈善家，我们只是以公益为职业的从业者。我们要生存，我们要更专业更安心地从事公益工作，就必须要有稳定的工资、体面的工资，才能快乐有效的工作。

做公益，不只是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不图报酬。公益从业者也要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还要买房买车……如果我们自身都朝不保夕，如何能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怎么能让捐赠人放心？怎么能让受助人安心？当我们自身都快要成为被救助对象的时候，我们的公益理想也就要破灭了。我们职业，我们专业，我们有价值，我们需要被认可，我们追求价值导向和行业平等。

穷酸不应该是公益从业者的代名词。当有一天，中国公益行业从业者的收入不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当公益行业的高管（我们说的“公益职业经理人”）的收入能够和其他行业的高管 / 职业经理人平起平坐的时候，我坚信，那将是中国公益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最佳时期。

五、做“名符其实”的基金会

我们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要做名符其实的资助型基金会。要让基金会拥有基金：开放理事席位，扩大资本金；投资理财，保值增值，安全稳健，争取高回报，不让资金闲置；管理费积累；定向募集非定向善款。要推动公益市场化，坚持做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质优价、优胜劣汰；高性价比、高投入产出比。要做全员 KPI 考核：提职提薪看能力不看资历；凭业绩不凭关系。要让基金会员工共享机构发展的成果：奖励要及时，实实在在；处罚要坚决，有人性化；涨工薪，提职务，留住优秀人才；给舞台，给机会，不拘一格招人才。要转型做资助型基金会：与 NGO 共同成长；推动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的愿景是做有公信力、有高效率、有生命力的名符其实的基金会，做纯粹的、专业的、体面的、快乐的实至名归的公益人。



新时代中国基金会国际化的契机与路径

刘选国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2013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我当时的结论：中国基金会离世界伟大基金会的距离还十分遥远。无论是在愿景使命设计，还是从实力、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准看，离洛克菲勒、福特、盖茨这些伟大基金会差距的确还十分遥远，但我看到好的趋势，并预期伟大基金会将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中出现！

不过才四年多的时间，随着《慈善法》出台，不仅仅非公募基金会这个名称将改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尤其是十九大新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目标，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建设现代化强国，而且重新定位未来三十多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第十二部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因此，作为中国“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基金会走向国际化，主动担当“全球发展贡献者”责任，成就为世界伟大基金会的大环境和大好契机已经来临。像2011年援非引起的卢美美舆情事件，应当是再也没有舆论土壤了，中国红基会今年开启了近20个国家的国际援助项目，基本上没有负面舆论评价。

除了中国红基会之外，近年来开展国际援助走在前列的还有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基会、爱德基金会等，还有一些企业家设立的基金会和民间救灾也在走出去，如老牛基金会、浙江杭州市公羊会等，他们在摸索前行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援外路径，有的还在境外建立了分支机构或者项目办公室。



一些学者也在积极开展中国公益走出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倡导，黄浩明理事长和邓国胜老师都有中国公益国际化的课题和论著出版，他们指出中国公益实现国际化具有必要性、紧迫性、重要性，指出了当前存在的认识误区和政策障碍，提出了提升能力建设、开展与在地组织合作等策略，还研究了走出去的路径和合作模式等。

通过中国红基会近年的国际项目实践，我们的体会是做国际项目的确困难多，成本高，风险大，但是非常受欢迎，既受受援国人民欢迎，也受中国外交部门、中资企业、海外侨胞的欢迎，还能满足一些具有国际化战略的捐赠方的公益需求，也非常符合中国当前的国际交往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目前也获得了一些部委的口头支持，可以说是一个合作多赢的结果。

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动员不够、不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红十字组织向我们提出很多需求，但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去全部满足，援外人才严重短缺。

中国红基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红十字国际组织在地网络体系，是一个有效合作模式。通过与在地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合作，不仅仅可以帮助了解受援地最急迫的需求，通过他们的专业团队和网络帮助项目实施落地，尤其可以提供项目考察和执行验收等工作的安全保障；这些欠发达国家的红十字组织，由于多年接受红十字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红十字会的援助，一大批领导人和高级职员都系统接受过西方项目培训，掌握语言和规则的水平较高，与他们合作，可以减少建立合作渠道、寻找合作伙伴、执行项目的成本。因此，中国红基会可以为一些有国际化梦想、但目前实力还不足以建立专业团队的组织走出去，提供渠道和服务。

去年底，我在出版文集《中国公益的修炼》时，曾与出版社领导有过书名的冲突，我希望以发表的文章《中国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为书名，但他们看来“伟大”这个词似乎不能用于基金会这种组织，所以最后折中才使用了现在这个书名。陈越光老师在书的序言中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对如何“伟大”的概述：平庸是“熬”不成伟大的，“伟大”是从伟大出发点的出发。



我在《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书评中曾经归纳说：“一个基金会之所以成为伟大基金会的要素构成：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弘善资本 + 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计 + 有伟大理想的专业人才。”

陈越光老师结合我对慈济基金会的介绍文章指出：对于需要募集基金的基金会来说，这个三要素的种子结构似乎可以做一点修订：伟大的愿景 + 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计 + 有伟大理想的专业人才。我很赞赏他的指正，的确对于慈济、红十字会、救世军、乐施会这些使命驱动型的全球性公益机构来说，起初创始人并没有一笔弘善资本，但他们就是在一个伟大愿景和改变世界的目标感召下，持续动员社会资源，终于让这些机构成为造福人类、温暖世界的伟大机构。

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基金会作为中国“第三部门”的有生力量，如果我们诸位基金会负责人有了这种从伟大出发点出发的愿景，还有锲而不舍的持续努力，我们就有可能成长为走向世界的伟大基金会！



中国社会组织与国际联系的观察和建议

阿克曼 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

中国正在不同领域积极发展和推进国际关系合作，比如：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环境、文化等。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合作处在国家层面，如政府与政府机构之间、教育与研究机构之间、文化交流机构之间等。此外，在国际机构以及商业层面的联系也比较多。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组织得到了长足发展，开始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与国际社会组织联络与合作方面却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国家倾向于限制，例如新颁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增加了中国社会组织与外国基金会合作的难度；绝大多数中国的社会组织专注于中国内部问题，比如扶贫、教育公平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很多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资金问题，并不需要国际上的资金支持。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组织还相对年轻。国外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欧美的社会组织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从它们身上，中国社会组织既可以学到关于组织结构、财务管理以及机构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还可以学到组织目标战略发展以及政策倡导等问题。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基金会是慈善基金会，意思是说，他们主要从事赈灾、扶贫、医疗、贫困教育等慈善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将趋缓，而其他一些领域将更多需要社会组织的工作，例如科技发展、社会发展模式、文化推广等。在现在的欧洲，绝大多数基金会正在解决社会、科技、生态和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可以从其他国家汲取经验。

据我们基金会的经验，我们与中方合作伙伴合作的时候，感受到他们向外国学习的强烈愿望，我们对这种对学习的渴望以及虚心的态度感到非常欣喜。但是，请你们也要知道，我们以及其他外国合作伙伴也希望向你们学习。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可能不算长，但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如何发挥其相对国家、科研学术机构的优势：你们更清楚这个社会缺少什么，你们更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对新事物持有开放的态度，你们在有限的资源下做着高效率的工作，你们非常注重项目的效果。比起其他国际社会组织，你们更了解你们国家的情况，更加清楚你们的工作领域并且容易获得外国合作伙伴的信任。

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只考虑在国际合作中你们能学习到什么，也要考虑你们可以提供什么。你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也希望跟你们学习，从你们的知识经验中学习。请在寻找国际联系与合作的时候也思考，你们能提供什么？这种提供不只是资金。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世界必须学习如何理解中国。但是，中国也要学习中国以外的世界。在这方面，双方都做得不够。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联系是必要的，但因利益以及涉及问题的局限性，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即使不断发展的旅游业也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另一种社会文化。

最重要也是最有效促进双方理解的，就是在公共社会领域的对话。社会组织是这场对话的承载者。无可置疑，在社会组织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跨文化对话并不容易。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哪个中国基金会从事促进国际跨文化理解，为此我感到很遗憾。我们非常欢迎中国政府倡导的“人文对话”项目，这个项目会真正促进在公共社会领域的对话，而不只是在政治上展现软实力的工具。



陪伴公益路上的温暖与力量

叶祖禹 美新路基金会创始人

永光说的事我都忘了。年轻的时候做一件事，常常没白天没黑夜地做，什么也顾不上，好像项目总是来不及，老有时间的压力，各种事情都有干扰和变化。今天，我想聚焦在工作中的陪伴，特别是被我们领导的同事和接受我们资助的伙伴，在我的体验里，以前无论是每次的长途跋涉去照顾暮年的母亲，或者是接受心爱的一起走过 36 年的前妻离开我的决定，或者是让宝贝儿女完全地做他们不一样的自己，或者是陪伴朋友和工作中接触到的伙伴，我觉得陪伴总是离不开由内而来的“愿意”。从这份愿意和持续的学习、实践，我们才能够慢慢地走近陪伴的本质。当它内化成我们生命一部分的时候，即使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都能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受到温暖和被尊重、被理解的力量。我用自己的一个例子来分享工作里的一点学习。

1992 年，我在台湾的一家合资公司当 CEO，有一次跟我比较熟悉的人事总监和我一起坐电梯下楼，在电梯里，他问我，“叶先生，你知道吗，如果大家看你走向电梯，很多人都会等下一班。”我说，“怎么会？”他说，“因为大家觉得你太严肃了，老是谈项目，不觉得你关心他们。”听到最后这句话，我此刻还记得当时我胸口有一点发闷，我只说“哦”。那天回到家黯然丧气，我那时已经四十出头，我已经学会了在情绪起伏的时候能够静下来书写，那天也是一样。我打开日记本开始书写，回顾我来到那个公司的日子，我感到委屈，我自认为是关心大家的。记得有一次和美方总公司争取员工福利，我的处境不容易，眼看就要失败，我走到隔壁中方董事长房间和他说这件事，我竟然落泪了，把我和我都吓了一跳。每次持续的书写总是能让我的心沉静。

我继续书写，我开始看到我和伙伴们在电梯里的情景，写着写着我突然明白他们是对的，他们绝大多数看到的我就是我在电梯里的那个我，是一



个非常在意项目和事情成败对错，而不太在意身边伙伴是谁的那个人，找不到时间在他生命里关心别人的那个人。我后来又遇到一个事情让我更难过的，因为我了解到我为什么那么在意事情的成败和对错，我了解因为我是那么在意自己的职位和前途，我是那么喜欢和依赖旁边的人对我的认可和赞赏，还有我看到了我总是希望事情能够按照我认为对的方向去发展，有一种巨大的坚持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操控的欲望，老师说我很不能接纳自己，这不是我以为我的样子。时间老人是有力量的，我最终接纳了，这都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一个专注自己的成败、也自以为是的人，就在那一阵子，我的心里升起了一份愿意，我也愿意让关心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陪伴的基础是培养尊重自己情绪的习惯，这需要学习。当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情绪，能够承受它，和它同在，这样才有力量去陪伴他们走过困难的情绪。我的这份愿意让我开始专心听周围伙伴的谈话，我很快就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听到他们有些人是对未来感到迷茫，是想要有发展，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这给了我一个切入点。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规划，工作也很顺利，年轻的时候就有朋友、同事甚至团体来问我有关职业发展的问題，我都很乐意和他们分享，这我和我伙伴有了深入接触的机会，有的人也因此走上不同的职位和发展的处境。

1995年我来到北京，整个公司都在做职业规划，但是没有人了解为什么要做，或者做了有什么意义，我就请我秘书把全国各地员工填写的表，还有他们的基层经历表都送到北京来。我那时常常出差，每次秘书就会给我一点，那时候大部分员工我都不认识，甚至后来也没有见过，但是你知道吗？当我用心读他们填的表的时候，我好像能够感受到他们有一种连接，好像能够看到一点他们的需要。我的经验这么丰富，我对看公司角度也很广阔，所以有时候我写的比他们写的还多。一次又一次，以后当我和员工有机会再相聚的时候，我心里有了一份亲切感。助人成长的行动就慢慢融入了我的生命，即使在工作里也会冒出一个头儿来。陪伴的另外一个基础是，当我们知道别人有陪伴需要的时候，能够先确认我们的内心是否有那份愿意，因为这份愿意会让我们专心听，用心体会他的处境，真的知道他



的需要，再给予持续的支持。

最后，我看到这里的很多伙伴都还不到 40 岁，可能入行也不是太久，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条公益的路，其实就像天底下的每一条路，都可以是一条美好的路，但是也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艰难和挣扎。每个艰难都是让我们了解自己和未来。如果我们能从大大小小的艰难里持续的学习成长，我想我们一定会靠近我们可以成为的自己。



合力是公益最后能够成功的基本要素

李劲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发展的社会由三种力量组成。第一种是政府的力量。政府力量的合法性在于它被选举出来，然后它能够收税。公民要缴税，然后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收税是强制性，因此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也是强制性，这是双向强制的过程，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所有社会都会有一个政府，否则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第二种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就是交换，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拿他们的产品等价交换价值，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价值获得利润。第三种是公益的力量。有一个经典理论，当政府和市场失效，当政府不能有效提供通过收税的公共服务，当市场不能以交换的方式为有需要的人、没有购买能力的人提供服务的时候，这时候公益组织应当介入。

十九大以后的一段关键字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的构成应该是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企业通过市场方式提供服务和公益组织以志愿方式提供服务的组合，这样才能形成美好的社会。所以，美好社会的形成是政府、企业、公益三方的“合谋”，三个部门一定要合力才能形成。当然，它们又具有分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强制性，政府收税后有责任向公民提供服务；市场交换是自愿性，没有人强迫你，你是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的交流，具有自愿性；公益机构提供的服务是志愿性，不仅是志愿而且是主动，以奉献为特征。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公益本身能改变世界吗？我自己做公益这么多年，我们的梦想就是改变世界，我们想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伟大事业中，不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吗？但是回过头来想，我们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吗？当年刚刚接触壹基金理事的时候，冯仑先生转了马云的话，做公益不能改变世界，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我当时很受刺激，我们做公益，这么多人自愿投入，不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马云都不能改变世界，只能改变自己，话锋一转，做公益其实是改变每一个人。公益的高级入门课就是变革



理论，但是认真想想，公益本身能够改变世界吗？其实不能。我想到几个原因：

第一，公益毕竟是弥补性力量，本身资源是不足的，这也是最近很火的影响力投资的理论基础，就是公益资源不足以普遍普惠，不足以使需要人群普遍受益，所以需要影响力投资，需要商业力量介入。

第二，志愿性。公益组织志愿性的投入也代表动机的脆弱性。慈善基于道德，但基于道德的力量真的那么坚韧吗？我们都知道志愿做一件事，如果受到某些挫折，如果不是必要做的事情，动机可能会减少甚至消失，所以动机具有脆弱性，并不是说不存在，但是容易发生变化。

第三，毕竟公益力量是依赖外部资源的，依赖政府购买，依赖政策，依赖企业支持，依赖公众支持，公益组织自有的资金资源非常少。如果你依赖外部资源，可持续性就会有问题，外部资源因为他们的意愿断绝了对你的支持，那公益组织往往就是无米之炊了。

所以，公益的力量很难改变世界。国家发展理论有一个公益力量改变世界的路径，大概有四个步骤。这些路径在很多公益从业人员里谈得比较少。

第一，研究社会问题。创新性来自于这里，深刻研究社会问题，那些可能政府来不及关注、市场认为没有价值的问题。比如今天报道的幼儿园阿姨虐待孩子的问题，这可能不是市场或者是政府首先会选择解决的问题，那么是不是需要介入？

第二，针对这些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源寻找解决方案。通过公众或者通过其他非营利资源扩大规模，这是好公益平台说的规模化的问题。扩大规模有几种方式，一般来说是其他公益组织跟进，加大资金投入，但在中国可能是更多公众的介入、更多社会资源的投入，现在还没有到政府和企业阶段，公益力量自身扩大规模。在中国社会企业理论兴起后，可能会加入使用公益组织研发的公益解决方案扩大规模解决问题，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大规模交换资源，更重要的是解决方案如何晋级为政策，如何把解决方案变成公共政策，让政府用税收的力量解决问题。比如养老问题，



现在社会机构在研发创新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最后都会变成政策。另外包括营养午餐的方案，包括 0-3 岁儿童早期养育的方案，社会组织先介入然后变成政策，这里也必须要加入市场的力量。改变世界肯定需要市场的力量，大规模的普惠或者是公共政策，用收税的钱使有需要的人问题得到解决，这是我们谈到的公益如何与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合作。

我们为什么要向企业学习？要和企业形成合力呢？我们独特价值在什么地方？我最近有一些思考。

在中国做公益的目的大致有几点：第一，提供直接服务，这是大多数中国公益组织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对有需要的人缺失的公共服务。第二，针对社会问题找出根源，用社会的方法、市场的方法和公共政策的方法解决问题。第三，公益职能是凝聚人心，增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与相互关爱，就像刚才叶祖禹老师谈到，我们对其他人无条件的爱，当然企业也在做这些事情。芝麻信用在做信用的问题，就是解决信用和关爱的问题。第四，培育民间力量，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提升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从这四个层面来说，公益组织的核心价值，对社会可以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在服务层面，在解决社会问题层面，在积累社会资本层面，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我们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我们和企业相比、和政府相比有哪些独特的优势？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在某些层面，我们公益组织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某些层面，我们还缺乏优势，特别是在规模化层面缺乏优势。我们要有自信，我们需要让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合力，共同创造出美好的世界。



2018 年会

主题：拾年—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

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8 年度盛会在苏州召开。这是基金会论坛的第十次年会，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关心基金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 612 家机构 1050 名嘉宾与会。其中，基金会 252 家，有 234 名基金会理事长、理事和秘书长莅临现场。国内外跨行业专家、学者和嘉宾，回顾前十年，畅想新十年，共话社会转型中的基金会行业生态。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8 年组委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轮值主席）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

南都公益基金会

凯风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

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社会转型期，公益更应关注培育人的现代性

何道峰 资深公益人

过去的公益十年，我们走过了一条非常艰辛而又充满跌宕的道路，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过去十年的见证者，但这十年来，很多变化在公益界还是发生了。

比如说虽然捐赠额没我们想象的上升得那么快，但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来做公益，让公益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探索；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加入了公益行业，特别是最近几年，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了公益行业。这些变化都是明显的，它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可以说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

可是站在今天的时空点上，来看我们的过去，来看我们的未来，确实既充满了让人迷思的挑战，同时也仍然有很多潜在的机会。但是有一点要强调，恐怕整个公益行业都面临着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就是，在过去十年我们的公益依然以扶贫、助残、助孤、扶弱和救急为主，作为我们基本的选项，大多数财力和人力都投入到这些领域。可是在未来十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因为中国现在毕竟已经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国民收入 8000 美元。随着我们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结束，绝对贫困应该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纯粹靠扶贫、助残、助孤、救急、救穷这样的事，能否托起未来十年公益的资源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从走在前面的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恐怕这个转变是一个趋势，这种趋势不仅是外在的我们看得见的一种路标，而且很大程度来自于我们内在的社会驱动。这个内在驱动来源于，我们正在冲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艰难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可是现代化是什么呢？现代化恐怕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丰裕度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可能是人的现代性的培育与转变。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化



国家，是建立在人们普遍没有现代性的国民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个人以为，人的现代性问题，是我们未来公益所要面对的、所要关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命题。但现代性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简而言之，其实承载国家现代化的国民性中最核心的，便是人的现代性，就是人的自由和平等，这已经写进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将自由和平等分析一下。人的自由，即多大程度上你有自由权。总体来讲，人的自由可以分为主体性自由和客体性自由。主体性自由就是围绕着人的生命主体和人身安全，以及你说话、写作、出版、结社等自由权，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这些方面自由做出决策，一个准备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有个明了、清楚的规则。客体性自由是说，当我们可以自由思考和自由行动的时候，这些思考和行动的成果，我们能否享有。这就涉及到思考成果的知识产权和行动结果的财产权问题。如果我们有主体和客体这两方面的自由，就有了一个人的现代性中的“人的自由”。如何才能拥有它？国民必须有此自觉意识，否则我们就不会去争取它。可是即使拥有自由，事情也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平等的路径问题。

跟自由相对应的是不自由，跟平等相对应的是不平等。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有很多迷思的。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之一卢梭，在强调人的自由时，他反对洛克的相对自由，说人的自由应是绝对的。由于没有去细致区分主体和客体的自由，在谈论到人的平等时，卢梭立即滑到另一极端。他认为人是不能拥有分工也不能拥有财产，因为拥有财产和分工，必然让人不平等，这样卢梭就进入了他的悖论陷阱：一方面说，人的主体要有绝对的自由权；另一方面，人既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又不能享有他所行动的成果。那么人还拥有什么自由呢？卢梭的自由事实上就是最大的不自由。因此就产生了很大的迷思，大家都记住了卢梭的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耐人寻味。

那平等，又是怎么一个概念呢？平等是说我们这种自由选择权，思考也好，行动也好，是建立在你享有这种成果的基础上。可是这种人人追逐



的客体性自由，是基于竞争取得的还是基于权力垄断取得的？如果基于竞争而取得，那就是平等的；如果基于你的权力垄断或者说完全靠继承获得，那就可能不平等。一个社会常常赢在其组织化的程度和水平，但平等问题在人类的组织化中会变成更大的问题。纵观当今世界，纵使人是生而平等的，但无往而不在组织化奴役的枷锁之中。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现代化社会，基于大多数具有这种现代性的语境。可是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建立起一个坚固的自由平等的语境呢？这就靠每一个个人，但每一个个人怎么去意识到上述问题并清醒认识呢？这就需要有社会的启发者，需要不仅通过语言而且要通过行动来让人感知到，人对他人的生命是尊重的，对自由平等是尊重并神圣坚守的。因此，自由和平等决不仅是写在墙上的概念，而是要换化到、落实到所有行为过程中、融入血液中的国民现代性。

因此，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和政府要为我们捍卫这个平等和自由，要做出切切实实的行动，而且公益这个行业承负着很沉重的一个历史使命，就是启发人具有人的现代性。但这个活儿是一个很长期的活儿，纵观现在人多暴力语言，人的肢体暴力相向，然后通过暴力去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令人凄然。一个不能够平和说话的社会，一个听不到他人平和说话的社会，怎么可能有人的现代性？一个国民没有现代性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

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未来的这一过程中，在未来的公益界，无论是公益的钱投向哪里，还是说公益界的人你怎么做事，怎么去策划一个组织的未来，还是说我们个人怎么处理我跟他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公益界的人相互之间怎么处理这种关系，这些都要回到人的现代性上来。如果回到人的现代性上来，那我们自己可能就找到更多的方向感和幸福感，我们也能够带给他人一种比较良性、平和且长远的影响，让他人也走在培育这个民族现代性的道路上，虽然这个路非常的长。

总而言之，我觉得一个纯粹靠扶贫、帮弱、助残、助孤、救济这样的时代，从某种程度来说，比重应该在下降，应该说我们整个公益要成长的



资源、要投入的人力，可能面临着一个转向。

如果你想成为这个时代公益的先驱，那可能你要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的行动就代表着我们未来十年以后的成果。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沿着惯性，甚至沿着那种路线往下滑，那十年以后我们就会收获另外一种果实。你种什么因，收什么果，只不过有些因果是瞬间就会来，有些因果是两三年，有些因果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公益这个行业可能要种更长的因，让中华民族结人的现代性发育之果，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话。

当然，并不是说那些事就不要做，依然要做，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要考虑人的现代性。比如说你是不是不断地在把钱给这些已经离开最贫困绝境的人，再给钱就一定是好事？未见得。因为你破坏了人去奋斗、去努力的自由，破坏了一个社会最有效的、最内在的动力，那自然就产生这个社会的不公平。那等于你的善行破坏人基于自我自由奋斗的根基，那么你到底是在行善，还是在作恶呢？

这些问题如果深入思考，其实会得出相当不一样的结论。对于我们来说，做多大的规模，我倒不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做对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做过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依然认为它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远见卓识和对未来负责任的事，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我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老者，公益我做了二十多年，这个接力棒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我今天在体力上已经跟你们拼不了了，只能回到一些阅读、思考上来和大家分享，也会做一些有意义的捐赠。所以，看到你们在那奋斗，看到你们疲惫的身影，和面临今天的这种困境，我常常感到公益行业如此稚嫩的肩膀，怎么能够扛起这个民族走向现代性的重大使命。每思及此，还是会眼眶湿润，真的感谢每一个人的努力。我希望，我也能发挥余热，希望公益的这个行业能在中华民族整个人的现代性的培育上，能够做出更多有价值的事，让我们的民族能够读渡过这个难关，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让我们每一个人从现代性的孕育中找到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价值和幸福。



社会转型，让公益人看到行动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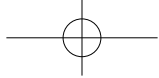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朱永新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我是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第10年的年度盛会上致辞。因为我目前正在国外出访，没有办法来到论坛的现场，没有办法来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苏州躬逢其盛，与公益基金会的同仁们，与公益慈善组织的负责人来共同讨论这10年在论坛推动下，带来的中国基金会行业一些新变化、新进展。所以用视频的方式，表达我对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支持和对中国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的敬意，感谢你们10年来为促进中国基金会和公益行业发展做出努力，让公益人看到行动的力量。

2018年是特别的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教育上来说也是非常尊敬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先生诞辰100周年，同时也是汶川大地震的10周年。今天我们也迎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第10个年头。作为公益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从2000年发起新教育实验开始，我们一直行走在公益的路上。我们新教育实验从第一天开始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公益精神、公益情怀，我们一直把支持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教育，以及把支持弱势群体教育作为自己的重任。所以我们成立了新教育基金会，一直在西部地区捐助图书馆，捐助教室，帮助教师更好地成长。

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教育的问题，比如说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和乡村教育差距在拉大。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发展的矛盾、困难。同时，新的技术革命也在逐步影响中国教育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给教育带来很多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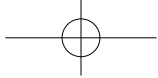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论坛以“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为主题。这个选题选得非常好，把握住了时代的关键点，怎样在新时代、新科学的大环境下，更好地把新技术应用到社会责任之中，同时能够保持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能够更好地融入教育之中，如何用新的扶贫理念和方



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发现，社会的转型让推广更具多样性，资源共享更便捷，新技术应用更得当，也让现代的教育公益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我们特别期待这次论坛能够带来更多的公益领袖行业转型的启迪。

最后，祝愿基金会论坛 10 周岁生日快乐，祝愿 2018 年年会圆满成功。



以志愿求公益，与现代政府和文明市场共同成长

秦晖 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和西方公益一样，中国公益源远流长，而且中国公益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它是在中国传统的所谓“秦制”条件下发展的。很多人说“秦制”对地方的管理比较粗俗，以前有个说法叫“国权不下县”，其实确切地讲应该是“国责不下县”。大家知道“秦制”下中国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要上国家纳粮当差的。既然老百姓要纳粮当差怎么能够说国家的权力达不到他们呢？难道他们都是自愿的？当然不是的，这个国家的权力是可以深入到基层的，但是国家责任没有到基层。地方上提供公共服务的确需要老百姓自己来解决，这是中国的特点。

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一般儒家主张国家必须有一定的福利功能，所谓“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但是，中国传统时代实际操作的政治是法家的理论，而法家的理论实际上是反对政府对弱者承担责任的。商鞅和韩非都主张国家不应该救济穷人，说国家救济穷人就是养懒汉，穷人不是醉鬼就是懒散，他们穷死活该，国家根本不应该管他们。但是国家一方面不应该救济他们，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他们有自由。所以，传统时代王朝不是主张济贫，他是主张惩贫的。讲简单一点，就是对穷人实行强制收容的制度，对流浪的、乞讨的这些人应该抓起来让他们去修长城，当时他们是主张这样的。

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公益当然要由老百姓自己来自觉。从宗族性的公益，一直到非族性的公益，乃至非寺庙、非宗族的世俗公益在中国发展比较早，到了明清时代又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近代乡村中的这一类公益也有很多。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像这些公益传统，结合从国际上传来的现代公益理念和实践，使得民间公益的兴起成为改革很重要的内容。改革头10年，国人主要关心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80年代人们很少谈论社会公益，



很少谈论慈善，很少谈论所谓的第三部门。那个时候也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基金会，这个和西方是类似的。

大家知道西方也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长期发展，到了二战以后才兴起注入“第三部门”、“志愿者部门”这一类的概念。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一些事件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暂时没有太大的推进，市场经济却因为邓公“南巡”而蓬勃兴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却迎来了一个“第三部门的早春”。这个和1995年“世妇大会”有很大关系，因为这次大会使得中国人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叫做“非政府组织”。这件事情曾经搞得很敏感，以至于“非政府组织”论坛不能在市区开，必须在怀柔开。但是也就成全了怀柔成为国际会议的基地，现在那里搞了很多建设。

这件事情搞了以后，政府实际上也知道其实“非政府组织”并不敏感，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也不等于反对党，非政府组织其实是给党和政府帮忙的。因此，这个概念就脱敏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相对脱敏的。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偏向，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偏向于给政府推卸责任。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找市长找市场”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市长可以不去管，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政府在原来公益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忽视了公益的投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后，在很多地方更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说法叫做分税制在很多地方造成的结果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导致很多地方公益缺位，包括教育、卫生，当时的形势都很严峻。因此，当时也希望民间替政府承担公益责任，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当时宣传靠民间捐款来搞希望工程，来支撑基础性的义务教育。

我们在座的徐永光先生当时做的就是这个事，这一切使得中国的NGO、NPO成为热词，各种“第三部门”组织一时像雨后春笋。一些官方公益机构也乐于赶NPO的时髦，而国外的NGO在当时管制尚松的情况下也在中国有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所以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早春”。但是进



入新世纪以后民间公益的发展就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大家知道2005年在国际上出了一些事，这个事使得“非政府组织”这个词再度好像变得比较敏感。

第二个因素就是继市场经济观念传入中国以后，到了新世纪，西方“福利国家”的观念也开始影响中国，在强调“民生”的“胡温十年”，政府福利责任仍然是老百姓不能追问的，但是他们已经知道有些公共服务政府不干是很没面子的。如果这些公共服务还是要靠民间办，当时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好。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由民间捐款支撑义务教育的希望工程，后来就要改变方向了。

同时，这个时期政府的公益投入比前一个时期明显增加，这当然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实力提高很有关系，政府有实力来做这个事。要民众“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口号很少提了，这个方面政府对民间公益组织的需要也减少了。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现象，官办机构出现的弊病，开始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争议。

这一切都严重妨碍了现代慈善公益事业进一步发展，但是在这个时期现代公益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一些以前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

第一，经过30年的开放，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观念一样，现代公益尤其是民间公益的观念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影响是1995年以后一段时间是不能相比的，尤其这些年在网络条件下，国际民间公益的最新观念创新与制度创新都很快传入中国，以至于产生了另一波的热词。

90年代的NGO、NPO、第三部门、志愿组织曾经是热词，到了最近这些年，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BCorp、第四部门等等这些概念也很快传入了中国。这些创新大大开阔了民间公益的思路，并为有志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有钱的中国人”群体变得庞大起来，他们的投资能力包括公益投入的能力，可以说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随着中产阶级意识的形成，他们的公益观念也在发展。从单纯的积德行善，发展到以公益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也开始形成，这对民间公益应



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

当然，最近几年的一些因素也加快了这一点。这几年中国的 GDP 增长开始减速，同时一些制度环境也开始收紧，市场投资风险增加、政治参与空间几乎没有，也使得他们对公益事业投入有了更多的注意。

第三，“胡温十年”以来，虽然政府开始关注民生，但是现代社会公益需求的扩大，仍然使得“公益缺口”有增无减。这个传统的官办公益机构的弊病也使得社会对民间公益的需求仍然在增加。

第四，中国保守和改革这两种趋势并存的现象也并没有因为近年政局的一些变化而根本改变。在最近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两项公益立法中，一方面管控变得比较严密，但是另一方面比如说在民间基金会的公募资格等这些问题，也有更加开放的进步，这也是比较明显的。

因此，新世纪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仍然非常可观，尤其是公益资源的扩大和公益形式向高端的新公益发展这两点，我认为是更加突出。

上世纪末的民间公益资源，除了境外 NGO 的支持之外，主要是像“希望工程”那样的民众散户捐款。当然，境外资源大幅缩减，实际上我们对这些资源的需求也不像过去那么大。一般民众的分散捐款也因为过去筹款机制的弊病，导致热情衰减，但国内的大笔单项捐款却明显增加，加上政府购买民间公益服务以及“社会企业”的非最大化盈利和公益目标并举，公益资源总量可以说比过去明显增加。

那么，公益形势的升级是很明显的。以环保公益为例，1990 年代环保公益典型是“自然之友”，这个环保组织主要还是依靠国外的资助进行一些游说、宣教性的活动。实际上真正参与环保事业的各个链条，当时的能力和资源都比较有限。

在新世纪出现的“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就依靠国内企业家的雄厚财力，在环保事业的上下游都展开了全方位的活动，发展滴灌、推广沙棘等推广环保产业、资助“绿色创业”等等，并和官民产学各界都有广泛合作，它的综合绩效可以说是相当可观。

再以教育公益而言，如果 1990 年代的“希望工程”还只是简单地在



义务教育领域实行“供孩子、盖房子”的慈善活动，那个时代民间公益对教育过程本身参与比较少，主要还是基于财政的支持，盖希望小学，资助困难儿童。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民间公益对教育过程的参与比过去发达多了，像“千千树”、“光彩事业”、“星星雨”、“富平家政”等公益团体，他们在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广泛领域进行了包括教材开发、教学模式改革、教育网络化等方面的创意性工作。这些公益团体都在自己的实践中融入了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新模式，他们的社会影响面、可持续性资源动员能力都有了明显的升级。

我们知道这些年中国公益发展的趋势总的来讲和国际上密切接轨，但是中国公益制度的发展也有它的特点，我们知道90年代出现“第三部门”这个概念是什么含义呢？我做了一个在逻辑上比较严格的界定，之所以把政府叫做“第一部门”，那是因为政府是利用强制渠道得到的资源（税收）来提供公共物品的。只有政府才能收税，其他民间组织是不可能收税的。

“第二部门”是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通过自愿行为来产生私人物品的部门。所谓的“第三部门”指的就是以自愿的资源，或者说自由募集的资源来支持公益事业的部门。

反过来讲，公益组织也存在着这个问题，主要的公益捐款当然是基于公益目的，但是公益部门的就业其实同样也是一个市场行为，现在真正发达以后，不管是国际的还是中国的公益组织，都有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倾向。他们的雇员也是在一个就业市场环境来运作的。你不能要求民间公益组织的人都是义工，尽管我们现在强调的资源是来自于自愿的，比如说捐款，那当然是来自自愿的。就像政府的雇员也是自愿受雇的一样，虽然政府的税收是强制的，但是你不可能让政府的雇员也是来强制为政府来干活的，当然不是。

我们这里定义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其实都是按照现代政府、现代市场的概念来定义的，因为大家知道按照这种定义，它事先就已经规定了政府通过税收能够提供的只能是公共服务，比如说用来支撑家天下、某个小团队的利益。企业也是一样，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通过自愿途径



提供私人物品的。

可是这个过程在西方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在西方第三部门兴起市场化和民主化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第三部门”是和“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的改革、转型同时发生。因此，它就有它的一些独特的问题，当然也有它独特的条件。比如说我们这里要讲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知道西方的公益社团都曾经经历过一个过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西方大量出现的是成员公益组织，这些组织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但是他们提供的公益主要是希望为成员提供公益的，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各种阶层的协会，工会、农会、行会、商会，包括社区组织，他们都是为团体的成员来维护权益的。

在这种角色高度发展以后，人们才在关注自己的权益之外产生了希望越来越强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我们讲到的公民社会，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主要指的是第三部门，但是在六七年代以前，主要指的是我刚刚讲的这种成员公益组织，就是注入工会、农会、商会这一类的组织。但是中国就不太一样，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在市场化转型尚在进行，民主化转型也是在进行的情况下，受到西方影响，在允许的空间寻求发展，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部门”在非成员利益的公益组织发展之前，其实从来没有发展出很大的就是成员利益的公益组织。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我们的公民，假如我们的人民，如果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去维护别人的权益呢？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维护自身权益的人们，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的能力维护他人的权益而角色吗？

我觉得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不少，但是无论如何两类公益组织希望如何相得益彰是公民社会正常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大家知道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现代化从来都是这两种组织的结合。我们知道像我刚才讲的协会，包括工会、农会、商会、社区组织，这些东西既不是政府，本身也不是企业，但他的确是我们讲的非成员公益组织产生之前，就已经高度发达了的。

中国发展路径很可能是倒过来的，现在各个社会阶层广泛的参与非成



员公益以后，这种参与过程中包含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可能反过来有利于补上缺位。在参与的过程中，大家的主动精神、参与意识的形成，很可能会使我们原来欠缺的公益组织，也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也有一个更多的发展可能。

大家知道最近这 10 几年，世界范围内的“第三部门”也出现了一个门槛，一方面社会对他们的期许在提高，另一方面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公益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实际上就需要在维护公益组织自愿性的前提下，从另外两个部门中获得资源，讲简单一点，就是从政府部门、从市场获得更多的公益资源。

那么从国家方面获得更多公益资源，就是所谓的后福利国家模式，讲简单一点就是过去的福利国家是政府直接办公益。但是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发达国家兴起了不是政府直接办公益，而是政府资助“第三部门”办公益，或者说政府购买“第三部门”的公共服务，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扩展了来自国家的公益资源，欧洲和美国的发达国家相比，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更深厚。所以政府资助在美国 NGO 资源要占到 2/3，但是在西欧要占到 80%，在北欧要占到 90%。但是这里我要讲，政府的资助有一个界限的，政府有资助的责任，但是对 NGO 干预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讲简单一点，拿自己的钱仍然是 NGO，虽然你拿了自己的钱，但你仍然是 NGO。反过来讲非营利性的商业性筹资，在最近这些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慈善基金的资本运作，包括经营性收入的公益使用等等。因此，非营利组织现在的边界也开始模糊。但是这里我要讲公益组织可能有创收行为，但是这个创收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也就是说，他可以争取，但他仍然是非营利组织，这本来是通过分配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你的创收只能用于公益，不能自己来分配。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新时代公益范畴在不断地扩大，它的边界也在不断地扩大。因此，现在有所谓的第四部门的说法，比如说未来社会企业的说法，而且伴随着这一点西方的公益界新名词越来越多，什么 L3C、CIC、等等层出不穷。



但是这些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则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就有一个公益和商业之争，大家知道最近公益界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就是所谓的“两光之争”，公益和商业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人说是公益向右，商业向左，还有些人认为公益还是主要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争的是社会企业的话，大家知道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把这个问题搞得挺清楚了。这个社会企业和我前面讲到的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不是一回事，一个企业如果搞公益搞得好，在欧美一些国家人们会赞扬它，说它是一个公民企业，但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企业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企业不是一个政策待遇，它没有免税待遇，它也不是公众褒奖，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契约，它要界定的是投资人和经理人的关系。讲简单一点，一般企业法规定的经理人，你必须要为投资者赚钱。如果你有意不赚钱或者有意亏本，股东会告你的，但是这个社会企业章程就规定，经理人是有一定的自主权。

在保障投资人资本安全和得到一定回报情况下，他可以自主地把一部分盈利用于公益投资。这个是他们之前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本身是自由的。所以，关于民间公益之争，其实不仅是商业与公益，政府与公益之间也有一个广泛的过渡空间。向左的后福利国家和向右的社会企业都是证明。

但是在这里要讲中庸。所谓中庸，既不是商业，也不是公益，只要是社会企业，这两个要素肯定都是具备的。但是他们的比重很可能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光谱，这个光谱中唯一的共性是什么呢？唯一的共性就是他们是自愿的，包括我刚才讲的社会企业的契约，这个契约很大程度上目的是公益的。但是这个契约本身是自由契约，包括捐款这个东西，万变不离其宗，它和税收之间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

如果捐款一旦变成强制性的税收，那大家知道古今中外历史上弊病都非常之大。所以公益资源的不断扩大，仍然是在自由契约基础上，仍然是符合我刚才讲的，通过自愿实现公益的目标。



剧变的时代，艰难的使命，中国公益任重道远

杨平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基金会论坛 2018 年会，并且有机会跟大家交流。10 年前修远基金会也是这个论坛的发起方之一，看到今天如此规模，如此壮观的人群和这么多同仁广泛的参与，感觉心里非常高兴。我觉得当年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有远见的，点个赞，非常好。

组委会给我出的题目是“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题目出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行业是有要求的。所以首先要理解这个时代，进而理解我们的行业，再进而理解我们的使命。

一、理解时代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

当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转型通常是指伴随工业化进程产生的社会转型，一般就是说从传统的农耕社会、游牧社会转型到现代工商社会，这就是转型。转型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形态、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过去我们在农村，现在我们多数生活在城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在变化；小时候在家里吃饭端着碗可以到别人家串门，现在这种情景不再有了。这些都是社会转型。最重要的转型是社会结构，社会上的人按照阶层和阶级出现重新组合，这就是通常称之为的社会转型。

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变化、运动的过程，每一次工业化形态的转变和升级都会造成社会形态的巨大改变。一旦步入工业化，我们过去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就一去不复返了。在技术变迁、组织变迁、社会竞争等因素的推动下，现代人从此迈入永不停歇的变动和转变之中，处在不确定性和焦虑之中。为什么？因为背后有力量在推动我们转变。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升级，从早期的蒸汽机文明，到后期的电话、电报，再到现在的信息文明，这种变化一波又一波推动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每一波变化都会淘汰



掉一大波人，这就是工业化。

（二）工业文明的三个标志

当代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文明阶段，并带来全球范围的剧变，我认为有三个突出的标志：

第一，新技术革命。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还有基于生物工程以及其他方面飞速变迁的技术，在不断地介入和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新技术革命会影响 21 世纪很长的时间。

第二，中国崛起。我们身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笼罩的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在永远的运动和不平衡的状态中。老的崛起国家领先一段时间后，就会有后起国家不断去打破原有的平衡。这 30 年最重要的打破平衡的因素是中国崛起，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与周边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不断的冲突。为什么？因为原有中国的状态和今天不一样了，世界的平衡被打破，冲突就会自然生起。中国崛起将会影响未来几十年到 100 年的过程。

第三，公益全球化潮流。上世纪 40 年代，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曾经探讨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两个反向的运动，一个是效率，市场化、全球化，另外一个是社会保护，是逆全球化。这两种不同方向运动的结果，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反复循环摆动。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而逆全球化的潮流正在涌动，英国的脱欧、欧洲的运动党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特朗普政权的上台，这些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当然，今天中国为主的国家在倡导全球化，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博弈，目前还看不出解决的兆头。伴随着 G20、WTO 这种全球化的组织机制，在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据统计，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个国家出台的保守主义政策法规大概有 2000 多件。现在的世界正处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节点上。

我认为，上述三大事件将会长期影响 21 世纪的世界。

二、理解中国

（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社会转型



谈社会转型最重要是谈社会结构。不谈社会结构谈观念、谈形态，就会有一点虚。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 40 年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转变为现在新的社会结构。

什么新的社会结构？就是三老、三新。一个是国有企业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还有务农的农民，这是老的社会阶层。新的三个阶层分别是民营企业阶层、城市中产阶层、农民工阶层。按照 2016 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注册的民营企业有 2300 万家，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庞大。但是，相比于另外两个新生的阶级（城市中产阶层，农民工阶层），这个企业家阶层人数却并不多。

（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特征是“土”字型。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丁”字型，就是倒“丁”字型，大部分的基层都在底层，少部分在上层。现在改革开放 40 年后出现了“土”字型，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土”中间出现了一横，也就是中等收入阶层，通常说的中产阶层，这个人口大概在 3 亿左右的规模，占总人口的 26-28%。

与此同时，中低收入阶层迅速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包括 3 亿左右的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群及农村的贫困人群。除了社会结构按照这种阶层划分之外，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分化，就是沿着体制的内和外进行重组。40 年来，中国体制内的人数大幅度减少，目前大概只占总就业人口的 17%，而体制外就业的人数现在占到 82%。

我们这儿的人基本上都是体制外的，而政权的组织方式和代表方式还是在用传统的体制方式来做，在座的被代表的可能性还比较小。所以我们开会看不到政府发言、致辞。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们会来的，为什么？因为体制外已经占到 82% 了。

同时，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仍然继续存在，并且有所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比始终维持在 3 比 1，城里人收入是 3，农村是 1。这个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前几年农民有卖土地获得收益的，这个改变了农村农民部分结构，



但总体来说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比例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贫富差距扩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1993年的0.35，至2009年，扩大到0.49或0.5。按照西方的理论说法，这是该“造反”的数据了，社会已经极度不平衡。近几年，基尼系数在各种努力下有所下降，大约维持在0.47-0.48之间。

社会结构演变对社会转型有巨大的影响，一个良性的社会结构通常是中产阶级占主体，它的转型会比较稳定的。如果畸形的社会结构，不是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比较小，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和区域矛盾都会加剧，这是一般的社会研究都会提到的问题。

（三）未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及可能的挑战

第一，全球范围的技术革命及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冲击。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影响我们，而且马上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就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第二，农民工阶层，会由于低端制造业就业空间压缩，以及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而受到明显的影响。前天刚看到一条新闻，富士康要裁员34万人，原因很简单，大规模使用机器人。这就使得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空间受到极大挤压。

第三，城市中产阶级，我们在座的基本上多是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不稳定性最为明显。为什么？由于中产阶级主要依赖于企业雇佣，一旦产业结构变动，他们既缺乏上层精英的抗打击能力，也不像底层民众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且中国的底层民众，农民工还有一块土地，土地其实是农民工的福利保障。所以社会结构的变动，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还有技术革命升级过程中产生的挤压效应，对于中层和底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挤压非常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第四，未来30年中国如果不能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大面积的稳定的中层就将难以持续，相应的社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加剧将不可避免。

稳定的中层就业不取决于国家福利，也不取决于其他，而是取决于中高端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取决于高端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这样，像我们



在座人员高学历的，每年从高校毕业 800 万人，其中 80% 的就业人数是理工科学生的就业，他们才能产生真正持续的、体面的所谓生活和就业。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完成中央所说的，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发展和过渡，目前正处在最艰难的转轨和爬坡阶段。

三、理解中国公益

中国的公益固然跟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公益是伴随现代性而产生，为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而存在。它的发展和关注重点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等问题，与传统慈善有着本质区别。传统慈善关注的绝对贫困、残疾、饥饿这些问题在今天工业化条件下已经很少了，已经出现了最根本的变化。

中国的现代公益与现代公益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就是说市场化的产物，它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展开，着重解决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中国的公益在市场化视角下划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80 年代以前，是中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早期。它基本上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呈现出单位制与农耕经济的双重特征。早期公益的形式多与国家、单位、村庄相结合，基本不存在独立的公益领域。传统社会主义认为没有存在社会性公益的必要，因为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已经把问题全都解决了。另外，大部分是农村时代，超出村社范围的社会问题很少，人们没有所谓跨越与本单位和本社区去解决社会问题的融合需求。

第二，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过渡期。由于市场经济逐渐展开，所有制开始多元，市场社会逐渐发育。与此同时，传统体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过渡期的公益事业呈现出“政社”混合的特征。一方面，体制鼓励适应市场社会的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今天很多基金会都是 90 年代开始做的，为什么？因为适应市场社会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它又不同程度地排斥与体制利益不相吻合的公益行为，这个时候是属于既鼓励又排斥。

第三，2004 年后，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展开阶段。《基金会管理条例》



颁布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民营经济占了半壁江山。十六大又适时提出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现代公益开始井喷式增长。截至2018年11月，中国各类公益组织达80万家，基金会6900多家，2017年公益捐赠总额达1500亿元。

中国公益基金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基本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而展开的。在6900多家基金会中，总体来说，传统的文化艺术教育、助贫、青少年、妇女、儿童、老人、残疾权益、医疗卫生占主导，加起来大概70%-80%的样子，大部分解决的是传统的社会问题。公共服务、社区发展、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国际事务、法律等其他这些总共加起来也就不到10%。

基金会是市场化的产物，但大多数所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传统问题，我认为基金会有一个调整自己重心和调整自己结构的任务。

四、社会转型与基金会发展的方向

第一，未来30年，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建设现代国家，并面对技术革命、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化、工业化，实现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国人的梦。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一部分的现代公益基金会，使命和任务离不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这一点应该加以特别强调。

第二，在价值观上，基金会应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秉持公平、正义、仁爱理念，与全球性的社会保护浪潮同步。我们看冷战以后追求效率、追求自由、追求财富增长的全球化浪潮，造成了巨大的反向运动的阻力。这种巨大的反向运动其实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压力，它诉求的主要是公平。效率固然是我们基金会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总的价值诉求，作为基金会应该是以公平正义为主，公平正义更多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社会主义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主导。

第三，应逐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基金会发展模式。我们从80年代开始发展现代公益事业，大部分理念、方法、模式，都引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在这方面，西方对我们发展现代公益有极其重大的推动和帮助作用。但是我们的公益要想在自己的土地上长久发展，并且取得非常大的影响，



我认为有一个本土化的任务。要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我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国情，与人们实际的需求结合起来，我称之为中国公益事业本土化改造的历史行为。

同时，基金会要更多关注市场条件下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 2020 年就将超过 60%，大部分人都在城里生活，城市问题成为主要问题。所以，犯罪问题、失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应该是我们基金会去关切的方向。还有我们都是城市白领，城市白领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就是有房、有车，下层就是无房、无车。在写字楼里做码字工，网络上嚷嚷最凶的就是下层白领，他们是最焦虑的。怎么能安抚这批下层白领的焦虑情绪，不仅仅是到农村去扶贫，还要使 3 亿中产阶级能够安下心来，是我们在做基金会同仁们非常重要的使命之一。建议大家要多关注这个问题。

未来 10-20 年最重要的任务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淘汰大批的人，有没有可能推动 1000 万、2000 万乃至 1 亿人的城市职业培训，适应新的产业发展，展开大规模的国民教育和培训。当然，我们公益领域很难独自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推动国家来做，整体提高国民素质，然后适应产业结构。

还有我们普遍感觉到的道德滑坡问题，今天城市生活里面“笑贫不笑娼”、“路见不平转头就跑”、“没有是非”，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应该是基金会关切的问题，也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我们中国的基金会应该去投入精力的。

最后，我想说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要搭建一个以中国经济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网络，这个能否实现关系到我们的国运，我们基金会同仁应该在眼睛向内的同时，也要向外，跟随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配置资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搭建做出努力。

这是我今天的报告，核心意思是社会在剧烈变动，我们基金会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道远，希望在座的同仁能够跟着时代，跟着社会前进，在未来的 10-20 年使基金会发展更壮大，希望到 20 年后的基金会论坛能够有上万人的规模。



会适应、会等待、好运气 ——公益组织如何优雅地活下去

潘江雪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对于公益组织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咱们怎么活下去？每年能够再次相聚，我觉得这是我们最现实的问题，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活下去，更重要的是如何能优雅地活下去。

一个会进化的物种很重要的一点得学会适应环境。当宽松的时候，你有宽松的做法。真爱梦想在过去10年一个宽松的环境中，我们快速地扩张规模，形成了全国性的教育服务网络，能服务上百万人。那这个机会在未来10年里还有吗？当你没有一个成百万、上千万的服务人群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有数十亿、上百亿的筹款呢？过去我们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NGO，那未来的10年这个中国特色是什么？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作为体制外的人，我们要学会适应，学会跟体制一起生长、共同进化。

过去几年，真爱梦想的捐赠主要来自于企业和企业基金会；感恩互联网的发展，有将近10%来自于互联网的捐赠，他们以中产阶级为主。同时，我们很幸运地获得了20%来自于各个区县政府的配资，他们以采购服务的方式购买了我们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就是更优质、更公平的素养教育，这帮助我们在服务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那我推动的是谁的变化呢？我推动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是教育局。最难改变的那一群人是谁？是教育局的局长，每个学校的校长，以及在这个教室课堂里面每天面对孩子的老师，我们为他们赋能，让他们成为求真有爱的老师。

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政府采购项目可能还要继续上升。涂猛大哥是理事会的，从体制中出来，会跟体制打交道，但坦率地说我是不会的，我必须得学。筹款管谁要？谁手里有钱管谁要。中国最有钱的人是谁？政府。我们真爱梦想的小伙伴90后占了2/3，这些90后要面对教育局的局长跟他要钱。你能够从政府里面拿到钱，更好地配置政府的资源，是不是公益组织应该做



的事情？自由很重要，我们跟体制合作，但我们不是体制的一部分。体制之所以会珍惜我们，是因为我们做了他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经历过跟体制拖欠的过程，但未来我们会跟他协作，我说的是协作，是共同进化，不是因为拿了她的钱，就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未来 10 年我们需要学会这样的能力，这是第一个能力：会适应。

第二个是所有公益行业面临最痛苦的能力：会等待。我们会等吗？我们的捐赠人能等吗？所有现在的商业发展，所见即所得，马上投入马上有产出，我不知道别的行业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教育行业就是一个慢活。我们要做的是人的改变，你怎样衡量改变了的人？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真爱梦想给自己发明了评估指标，因为一个孩子的素质提升，真的可能是 10 年、20 年、30 年后的事情，一个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接纳自我，在 40 年后可能会少一个在重庆万州扇司机的女人。可能在 8 岁的时候没有学会认识自己的情绪，所以 48 岁的时候不知该如何排遣，于是她把愤怒、把焦虑指向了其他人。所以，公益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行业，我们要学会等待，在等待中充实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强。

说到等待，其实真爱梦想 10 年只做了一个项目和产品，如果一个公益机构能够像我们一样长大，每年能够获得上亿的捐赠，不意味着 10 年只做一个项目，实际上很重要的思维就是产品思维。公益组织有这个思维的人不多，能够坚持的人更少。什么是专业？十年如一日打磨一个产品，你才有机会进步和专业。

等待之后，我们需要共同进化。在共同进化的过程中，最后一个东西我们可能无法掌控，那就是好运气。当初我们做公益的时候，更多是一颗火热的心，今天我们依然有火热的心，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更复杂的认知，因为今天的社会问题太复杂，根本不是一个机构、用一个项目能做得了的。这种复杂的认知在坚持、适应、等待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能力，你才能变得更得更专业。所以，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上天了，祝大家都有好运气。



转型背景下看公益发展的“冷暖色调”

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一、现状是暖色调的

我对公益现状的观察，它是暖色调的：基金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迹象。

不管是从数量上，基金会有接近于 10 倍的增长；还是说从领域上，它能够覆盖到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类型上，比如我们看到企业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家族基金会，还有应用新科技的网络基金会，各种公募基金会，等等生态的形成；再加上参与主体，除了专业公益人，还能看到企业有商业经验的人，有科技专业经验的人，媒体等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加入。

特别今天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年轻人。大量的年轻面孔，包括秘书长、决策层、理事长，非常年轻，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有一种不同的心态和气象。所以对现状的观察是暖色调。它说明了什么？我想它其实是一个前面之因的果。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果实，其实是之前改革开放这 40 年环境生态累积的结果，所以它是一种生长衍生出来的果实。

二、未来也许是冷色调的

第二个观察是我感知到，业内人之间也感知到的未来的信号。这个信号我觉得更多是冷色调。特别你会看到虽然大家谈论到专业的事都很澎湃，但是越相对成熟的机构，特别有资深经历的这些从业者们，很多人提到了“寒冬”，提到的是“活下来”，要面对如何渡过寒冬。

为什么在这么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说如何“活下来”？这个恰恰是一个未来之果的因。当我们站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远的时间，再回看今天，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在发生，而这个因素的冷色调，我觉得更多还不是来自于业内，而是我们对于一种大趋势、大背景的感知。比如说经济的形势，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与经济形势相连的公共财政可能紧缩，甚至说国际上现在的贸易战，等等。如果大家关注这种大背景，可能会感受到压力。



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方面，条例的修订，有可能面临基金会登记门槛的大幅提高，管理监管的趋严。所有这些因素看起来跟业内组织可能有些远，但基金会、社会组织的生长，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环。这个大趋势中，现在其实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这也是为什么相对成熟的组织和领导人会更敏锐感知到，他们现在心里的这种忧虑，其实是先于未来结果发生，是他们更敏感地感知到未来，在提醒我们现在这个因。这个因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果？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基于这两点观察，我想回到今天这个主题。这个“拾”字，用得特别好，不仅仅是说我们过去十年做了这么多事，反过来想一想我们能拾起什么；而且再往未来展望一下，当我们在十年之后，反看今天，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能有什么被未来拾起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现在这个承上启下发展的节点上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三、谈公益之树：果实、枝干、种子

我们有什么能够保守下来的东西？说到“保守主义”，我们通常的理解可能有点消极，但其实保守主义在政治哲学里面特别关注有什么能够留存下来，演进的发展，而不至于不断的“清零”。回答什么是能够留存下来的，就需要区分在繁茂的生态树中，什么是果实？什么是枝干？什么是种子？

果实是最后表现出来的东西，比如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企业贡献的经济增长。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它是可逆的，在条件变化时是可能瞬间全部清零的，比如禁登社会组织，收回民营企业，相应服务和经济体量就不存在了。

我们一定要去看枝干，也就是什么生长出了这种果实。比如就公益而言，公益部门的资源结构，人才库，组织架构，对于社会的黏性，社会公众的启蒙，行业的认知，登记管理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想清楚回答的是公益之树发展的枝干。

再进一步问更深层次，什么是种子？我想它恰恰是枝干背后的价值观念。今天大家谈基金会，有没有理解，为什么会有基金会？基金会是什么？



它原生的是一种发源于内心的财富观的冲动，是基于对私有财产信仰的一种安排。为什么基金会要去资助？这是那种财富观的一种自然体现。

再者，什么是公益？公益和私权之间是相承的，私权保护个人自由，公益也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对公共利益直接的关切。这些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转型。中国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就是 180 年以来这样一种近现代转型，而核心发生点就是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的出现。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经济体量和 GDP，但是当没有私权神圣的概念，经济增长之果都是可以转瞬清零的；如果公益的发展，没有对人的主体性和个人自由权利的认知，也是可能如沙画盛景转瞬清零的。拾年值思，希望我们的公益是可持续的。



十年一梦还是十年一剑？

金锦萍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一、十年一回顾，发展与变化

这个论坛已经走过十年，的确有必要来回顾、反思和总结一下这十年历程。大家不妨跟我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十年的主题。其实我们这些年所关注过的主题非常多元、丰富而且覆盖面广泛：有些是关于基金会的价值和生态；有些关乎使命与责任；有些关乎技术与能力；有些关乎局势与格局；有些关乎时间与空间……有些主题甚至会重复。但是如果放在今天来看的话，今年好多平行论坛所谈及的话题其实我们历年年会里面也似乎都有所涉及。

2009年的发展报告中，我们曾经检讨过当时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到底还在不在。毋庸讳言的是，我们当时对非公募基金会赋予了特别大的期待和热忱，2009年发布的报告谈到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责任、使命和价值。大家不要小看非公募基金会，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能够去设立这样一类品种，绝对不是说只是要把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截然分开，而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基金会的设立者还是政府部门或者需要具有官方背景的情况下，使得社会力量设立基金会成为可能，尽管在公募资格上做了限制。

但是她一旦横空出世，就担负着以下使命：改变民间公益生态，优化慈善资源配置，使基金会保持独立性成为可能，培育民间公益理念，成为实现个人公益理想的上选路径，还要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组织形式。所以，与其说《基金会管理条例》是对基金会的集体松绑，不如说是让其中的一种类别（即非公募基金会）免受本就不该受到的掣肘，为公益事业的发展开辟蹊径。

当时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哪些？这些问题现在我们还有没有？比如说对基金会自身而言，当时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基金会没有充分认识到宗旨和使命的重要性，但独立性的困惑依然存在，当时独立性来自于两方面的困扰：一方面来自于政府，一方面来自于资本。我们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比如企业设立



基金会后实际上还依附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诸多问题：非公募基金会信息公开不主动，专业化程度低。

在制度方面，我们当时也提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分类标准值得商榷；基金会内部治理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章程示范文本效力受到质疑；评估制度喜忧参半；优惠政策配套制度出台不够及时。

当然，我们也有展望。在判断当时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符合社会现实和慈善发展的历史阶段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还将持续快速增长；非公募基金会弥补了政府功能的欠缺，但是仍需更有洞察和远见；非公募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需要开渠培养专业人才，支持性组织初露峥嵘；非公募基金会理事会的能力建设应尽快提上日程；税收优惠政策将有效激励公益捐赠；法律制度期待进一步松绑。

十年一瞬间，蓦然回首，很多问题依然在灯火阑珊处。尽管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十年前的那些问题依然存在，十年的有些展望还是只能展望。不过，点滴进步都是好的。或者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慢一点无妨，只要精进。

二、十年磨一剑，机遇与挑战

十年一回首，很多朋友也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看到好多已经在这个领域坚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朋友，我感觉很欣慰。更高兴的是，看到了更多年轻的新面孔，充满憧憬与期待。十年，3650天，有些新生事物已经迭代数次了，尤其是互联网的到来。十年磨一剑，我们的行业的确在有些方面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总得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与助力。这十年技术方面的发展不可想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移动端大数据，给我们公益领域带来什么？网络募捐呼啸而至，既汇集和分配资源，也汇集和回应需求。99公益日、95公益周……成为慈善领域的嘉年华，而且在慈善募捐之外，还有各种通过互联网方式的公益众筹、个人求助和大病互助……

比如区块链，大家都希望它解决我们的透明问题，尽管一贯保守的我并不看好，因为公益慈善领域最核心的不是只追索到资金的足迹，有些应该留



给良知和上天的事情，我们不可僭越。还有人工智能的兴起，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替代我们很多作为资金和物品搬运工的工作？所以，技术方面带来的冲击会很大，这已经在我们行业里面出现了。那些未雨绸缪，在互联网方面做好做足功课的基金会，在募捐方面已经占到先机。当然如果我们基金会中那些依然是由企业、特定家族或特定个人设立的基金会，它的资金来源很特定的话，这些对它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第二，我们再看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竞争。这些年很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市场对于公益的认知和参与热情日益高涨。企业家进入公益领域的频率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给我们带来不少冲击。企业家们在商业领域里有固有的逻辑、经验、规则和标准。他们进入这个领域后，与我们原先公益领域所固守的价值观、规则会发生冲突和碰撞。我觉得挺好，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斥，也不是简单的各行其道，而是相互融合和相互包容，并因此孕育和滋养着我们新的逻辑和价值观。

比如公益营销，有些基金会做得很好，但是也带来一些隐患。因为公益营销里面包含着商业营销和所附着的捐赠。那到底该谁为谁做嫁衣？其实理想的状态是双赢，但是底线是公共利益不能吃亏。公益金融现在很热，但是很少有人能把公益金融讲清楚。例如与传统商业保险不同的是，支付宝和京东都推出了互相保的保险产品，甚至还有不以保险示人、但也承担着风险分担机制作用的互联网互助基金的兴起，这些方式的出现其实也意味着，这些金融模式对我们原有的救助方式带来改变和冲击。

还有善经济概念的提出，社会企业和公益企业这些集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于一体的组织体的出现，在一个实体里同时要实现双重价值或者多重价值，到底是哪种价值先导？这些命题的提出都是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同时也意味着公益领域的发展终于跟市场接壤了，否则就不会有竞争和碰撞，这是好事，但是我们做好应对的准备了吗？

第三个问题，政社关系带来的压力与动力。这十年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给我们这个部门的资源增多了，中央政府和很多地方政府都用各种资金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资助明显增多。最近，如果大家关注民间教育的话，会发现



政府终于走上一条路子——把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分类管理，政府资助的思路愈加明确。从教育领域开始，医疗、养老、体育、文化等领域的分类管理思路也在路上。

当前管理体制正在改变，尽管跟我们所期待的直接登记制还尚有距离，但是最近来看，有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狭义的公益慈善类、经济类、自然科学类和城乡基层服务类）是有望进行直接登记的。还有党建的全覆盖，要求我们在当前各方面都要增加相关的调控，这些给我们带来压力，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动力。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跟政府相处的时候，重新审视这种政社关系：多元主义下的竞争关系似乎在这里水土不服，而法团主义下的合作关系却是新的出路。

第四个方面是立法与政策带来的规范与规制。这十年我们发现有几部法律的出台和通过，对我们行业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 2008 年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部税法，我们现在能够进行非营利组织所得税免税或者公益捐赠得以享受税前抵扣，都有赖于这部税法。它明确规定了公益捐赠税前抵扣的比例，也明确规定了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是免税收入。税法改革正在进行，比如说最近的个税调整，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接下来你会发现，你的捐赠者里有很多个人，如果他的年度收入刚好处在税率提升的环节，那么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税收规划，他们将成为我们非常忠实而坚定的捐赠者。我们有多少组织已经做好了准备？

还有《慈善法》及其配套制度的出台。《慈善法》当时制定的时候我们对它期待是非常高的，因为尤其在慈善组织设立方面，立法者的态度非常明确，要让大家在做慈善的时候能够非常简便去设立一个慈善组织；而且考虑慈善募捐规则的时候，已经要突破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截然分开、在登记那一刹那就以身份来确定能否公募的命运的规则。《慈善法》规定，每一个基金会都是有可能获得公募资格的；而且立法者试图去突破行政成本方面不合理的规定。所以在《慈善法》及其配套制度中有不少利好，当然也会有一些限制。这是法律本身不可避免的一种确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对相关规则完善的同时势必会带来相关方面的规范，我们又该怎



么去对待呢？

我们现在也看到，《慈善法》里有些规定不合理，或者是那些规定在以后的配套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由于配套制度未能跟上《慈善法》当时的立法意愿而不能实现。例如慈善组织的登记问题。尽管《慈善法》的思路是便于设立和登记，但是与其相配套的三个条例尚未修改，因为慈善组织不能凭空出现，它必须采取三种基础组织形式之一，无论是基金会、社团或者社会服务机构，但是这三个条例中如果关于登记的制度不变革的话，慈善组织登记难的问题依然还是无法解决的。

还有《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部法律看起来跟我们没关系，其实关系太大了。中国的第三部门发展，我们永远不可能忽视境外非政府组织对我们的影响和作用。境外非政府组织跟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同步而行的。在这个法律出来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进行临时活动备案，但也有些机构在观望，有些机构就离开了。

我们不是说简单的从资金或者能力方面去考察，或者权衡得失。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到来其实预示着中国跟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法律的走向以及配套制度制定也是非常关键的。还有一点，如果我们的组织里有大量曾经跟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受到这个法律的影响也非常大。如果一些草根组织原来的资金依赖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由于此法，他们如果失去这些资源，我们在座的基金会们，你们得担当起资源提供者这个责任。

三、十年积累，社会转型下的中国基金会

当下 2018 年的中国，我们到底要不要继续从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进行转型？无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法学角度，或是政治学角度，我们到底如何去看待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国基金会何去何从？你所在的基金会又承担怎样的角色和功能？基金会是一个财产的结合体，从法学角度来看，我们会把它跟社团作截然的对比，因为社会团体是以人为基础的，基金会是以财产为基础。但是请诸位不要忘了，基金会尽管以财产为基础，是被赋于人格的财产，但是在它所有运作过程中都无不与人有关。



基金会的价值和功能可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之上，例如消除贫困或者提供社科文卫体方面的社会服务，而更加体现在在这个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对于人的塑造。所以，人的现代性与基金会绝对是紧密相连的。不光是自以为是助人者的我们这些拥有资源的人，那些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个体也面临现代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施方和受方就是平等的。今年大会的几个主旨发言实际上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下中国，我们的基金会还要不要谈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应该承担的角色与功能？

再来看大会平行论坛的安排。第一个板块讲的几乎都是使命、责任、价值，这也是我们基金会最擅长的。甚至从这十年的主题来讲，我们也有若干次都去探讨这一问题，这些选题选得还不错而且有的非常深入。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价值”跟“情怀”是两回事。因此，考察基金会使命、责任、价值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追问我们的初心。

第二个板块很好玩，“开挂的公益从来不只靠情怀”、“基金会不谈投资何谈可持续发展”、“技术让公益更有AI”、“基金会做合规运行与良好社会效应”、“对接国际标准组织评估的问题”……这个板块里我们看中的是什么？其实是对基金会的技术性、专业性、管理方面的考察和反思。

第三个板块是关乎领域的，无论是农业、环保、社区或城市教育，“苏氏公益与江苏社会转型”可能是东道主的意思，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采取了地域文化的视角。

最后一个板块实际上带有时空感，无论是“民间公益10年，新企业家如何做新慈善”，还是“面对新十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前沿视角”，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商业浸润。

这些板块，其实我想问所有平行论坛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我们如何跟主论坛，跟我们的主题连接？实际上有一些是很好连接的。无论我们谈什么，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度。

回到社会转型的命题上：社会转型何去何从？基金会们路在何方？其实我不太愿意讲寒冬，我觉得四季变化很正常，四季分明才能领略四季风光；我也不大愿意讲抱团取暖，因为还没有冷到那种程度，而且我们的行业很多



元化，即使我们想抱也不见得能抱在一起。其实我们所有的个体，你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下的选择或者判断，不可能统一，我们得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领域里还有些东西让我们得以领先商业领域，那就是我们的价值。没了价值和使命感，我们还能凭什么跟商业领域去PK？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吸引在商业领域里已经很成功的人士进入到这个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道德情怀去绑架他人，也不意味着将挣脱道德绑架的希望寄托在商业化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回归到“自由”这个词上就好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之所以做公益，那是我自由的选择，我并不因为我自由的选择而高尚起来，因为我选择我乐意。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你对自己的定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因为你选择投身公益，当然值得这个世界的肯定和赞誉，所以价值和使命感还得永远谈下去。

但价值本身是多元的，我们不能简单只讲利他或讲为善，我们得去考虑这些利他和为善背后的依据在哪里？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源源不断动力的源泉是什么？每个个体心里都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统一它。无论你源于哪里，能保持住这个动力就行。

每个基金会也是如此，管理和技术难免要去追求绩效，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资助方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尤其从商业领域里刚刚进来的那些成功人士，他们更会大谈绩效。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去辩论，因为对资方来讲，这就是他意愿的体现。你接受资助，你就得遵守你们的约定，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是你得去影响他，让他以后判断成功与否标准的时候，或者在看待绩效的时候，终归不会那么单一或武断。

领域和业务各有所爱，尽管我们今天也在谈一个问题，说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之间的区分，但是不是现代公益就一定高于传统慈善？也不见得，传统慈善就一定只是治表吗？现代公益真就是治本吗？也不见得。如果当一个问题很紧迫，比如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传统慈善，就需要钱和物迅速到位，但灾后重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它需要专业化，需要规划，需要文化方面的考量。这个各有所爱指的是每个设立基金会的人，当你确立你的宗旨和



使命的时候，你要根据你的意愿、你的理解选择，然后坚守你所爱。

地域和跨界也无妨。若论地域，无论是江苏、浙江，还是西北、东北等等，如果把中国地图打开，你会发现在中国有几个板块公益特别不活跃，你们知道是哪吗？广袤的中原和东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是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去点亮那两块地方？跨界的问题其实我不太爱谈，因为我总觉得跨界不等于无界，所谓的跨界只能说在有界别的情况下，我们各自有所守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跨越，是对各自的认可，但不等于完全忽视界限。但是跨界意味着创新的可能，意味着界别不该是思想或行动的障碍。

四、十年一梦（梦想之梦），勿忘初心

其实时间本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我也不认为某个时间点会有特殊意义，因为所有日子的意义都是我们人为赋予的。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以后我们会讲 2018 年 11 月这两天，我们在苏州开过这么一次会，主题是什么，也就仅此而已，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往前走了。

所以我要说：“十年一梦，梦想之梦；十年一剑，非为争锋。”十年一梦，这是梦想之梦，而非南柯一梦，梦想能不能实现取决于我们自己。十年一剑，非为争锋，我们之所以如此努力磨砺自身，根本就不是为了争谁是第一。之所以有这样的剑在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剑指向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指向我们所认为、我们共同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我想送一句话给大家，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最后两句话印象还很深刻：“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唯有与日子的相遇后会无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年、每十年都是如此，一旦过去不会再来。但是这些时间在我们公益领域，在我们这些基金会身上留下了什么？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希望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找到今天的时候，再把 2009 年的问题拎出来，我们再对照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有些问题上发生了实质的改变。



慈善不能靠国营，中国需要良性的慈善生态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这次大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专业。无论是新老秘书长表现的专业素质，还是大会请来的一些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亮相，都展现了专业性。道峰发来的视频演讲，提升了大会的思想性。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做公益最重要的是要把推动人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使命，要为构建现代化国家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两年前的基金会发展论坛，是杨平给了思想性的提升，他提出公益部门应该树立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意识。

同时，这次论坛讨论中也确实感觉到一种焦虑感，出现一个口号“要活下去”。涂猛他最近跑了很多地方，他带来的信息是，很多县一级找不到公益组织，找不到民间的，有也都是政府办的，其实是政府的延伸，如此而已。

我们这个大会规模很大，一千多人，但是公益很小，小到什么程度？我用数据来说明，7月份公布的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开发的非营利组织GDP，即N-GDP。这个项目做了两年，结果应该还是比较科学的。结果表明，2016年全国70万家社会组织，有大约15%是僵尸组织，连电话都打不通，人都找不到。全年创造的GDP是2789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的0.37%。什么概念呢？美国的萨拉蒙教授在25年前做了一个研究，那时候全世界41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创造的GDP平均占4.6%，我们现在是0.37%，是20年多年前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不到。

还有另一个数据，我国非营利组织2016年总支出是6373亿元，达到GDP的0.86%。大家想一下这里出什么问题了？公益支出6000多亿元，怎么最后创造的GDP才2000多亿元啊？因为这里出现了逆向流动。我们的基金会从民间募资的捐款，很多支出到了政府那里，创造了政府的GDP，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总之，资金流向了政府账户，创造的GDP在政府，不属于公益组织。

我们的慈善资源还有一个逆流。美国的基金会每年给公益行业，给草根的NGO捐款占全国3000多亿美元捐款的约13%。美国的捐款来自个人的占82%，来自于企业的捐款大约只有5%，而来自基金会的捐款占13%左右。基金



会是一个给公益部门提供资源的机构，是资金的上游或者是公益行业的投资人。中国相反，基金会是公益资源的吸金器，捐款主要吸到基金会这里来，然后一大半流向了政府。我国资助型基金会那么少，是这次大家反复讨论的问题，我们的草根组织怎么生存呢？据了解，草根 NGO 目前主要是靠政府购买服务活着，政府购买占整个资源的大头。这会是什么结果？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你哪能保持主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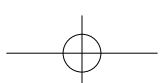
十八大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要尽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新型社会组织体制”。我们现在看看，除了商会、行业协会，基金会政社分开根本没有动静，还有大量的官办基金会，吸收了民间捐款的大头，没有与政府脱离。改革开放都40年了，十八大6年了，官办慈善的改革无动于衷。政社不分是什么概念，本质上是国家越位，占据公民自治的慈善领地。全世界都有国营企业，唯独中国有国营慈善。慈善必须民营自治，这并非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常识。国营慈善一天不终结，建立中国慈善生态健康环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随时会让慈善公信力毁于一旦，前车之鉴难道都忘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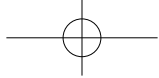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很高兴看到，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在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基金会，应当以资助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主要业务范围”。这说明，民政部在积极推动基金会成为民间公益的资助型机构，这对于公益生态系统的良性构建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我想用道峰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沿着惯性，甚至沿着那条路线往下滑，那十年以后我们会收获另一种果实。”未来十年肯定有困难，我们要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念来拥抱困难。做慈善是我们的自由选择，我一直讲，我就是为了自由来做慈善的。来做慈善就别抱怨，公益圈要么自娱自乐，要么自我陶醉，要么就自怨自艾，或者睡在昨天混今天，这都不行。通向理想、通向目标不只是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非常赞同阿拉善会长艾路明说的，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会撞墙，那你干嘛非得把头撞破呢？没有必要，走不过去可以绕着走，实在不行拿着梯子爬过去，总有一条路是可行的。



思想集的音频、视频已同步上线，
扫描以下二维码，聆听和观看精彩内容。





中国基金会 70 年大事记 (1949-2019)



■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0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下的“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周恩来为首任总理。一般认为，此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前身，但其规模和职权都要远小于后来的国务院。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成立，主管民政工作，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指导，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民政、户籍、救济、社会等方面工作，谢觉哉为首任部长。此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前身。

是年，中国各地自然灾害频发，尤其以水灾最为严重。据《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1958 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统计，1949 年全国受灾面积达 12787 万亩，受灾人口约 4555 万人，粮食减产 114 亿斤，灾情分布在全国的 16 个省、区，498 个县、市。这意味着次年春季在全国范围内将出现大面积灾荒。

12 月 19 日，针对以上情况，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要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帮助灾民订立计划，生产自救，提供一部分贷款和救济粮，扶助灾民战胜灾荒；号召开展节约互助运动，要求机关干部带头参加“每人节约一两米”运动。

■ 1950 年

1 月 6 日，政务院又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要求各级人



民政府提高对救灾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开展生产自救工作，采取措施帮助灾民度过灾荒，“不许饿死一个人”。

2月27日，全国救灾领导协调机构“中央救灾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首次提出救灾的工作方针：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在这之后，受灾地区各级人民政府相继组织由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各级党政负责人直接领导的生产救灾委员会。

时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的文章《我们能够战胜灾荒》显示，截至4月，当时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捐赈灾款共计旧币12亿元，粮食39万斤。

灾荒之外，城市失业问题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8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数据显示，1949年和1950年，中国城镇失业人数分别为474.2万和437.6万，其中1949年的失业率高达23.6%，由此引发了社会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

4月14日，针对以上情况，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指示》，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举行一次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筹措一笔救济失业工人基金的提议应付诸实行。于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了一场全国性救济失业工人的捐献运动，据《人民日报》数据显示，截至7月7日，该运动共募集捐款312.854亿元（旧币）。

4月24日，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宋庆龄在会上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报告》；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作《关于新中国福利救济事业的报告》，他指出，救济福利事业是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并进行和平建设一系列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报告还明确了党和政府对于民间慈善事业的方针政策，“不再是少



数热心人士的孤军苦斗”，而应“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福利救济事业。实际上，这就否认了民间慈善团体的独立地位，政府成为社会福利救济事业的主体。

4月29日，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闭幕，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救济组织“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立，统一、决定全国的救济和福利事业，国内外福利救济人员、款项和物资要在该会的计划下分配使用。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选举宋庆龄、董必武等49人为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任主席；陈其瑗、熊瑾玎等9人为监察委员会委员。

6月17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同时批准公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其中，《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第六条明确把“各界资源捐助的救济金”列为救济基金的三大来源之一。

7月15日，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对民政工作的范围进行了讨论。时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指出：凡属人民的政事，如没专业部门管的，就都属于民政部门。会议确定地方政权建设、优抚、救灾为内务部工作重点。

8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即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新的理事会，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会议选举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会长。9月6日，政务院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8月15日，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原名“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并确定了其主要任务是妇幼卫生保健、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和加强对外交往联络。



10月19日，政务院公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的法规。为更好实施该办法，次年3月23日，内务部公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12月13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由华北基督教联合会、圣公会、青年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院及教会中小学共50多个单位参加的1万多人的示威游行大会。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也举行了集会游行。接着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

12月29日，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时任副总理郭沫若《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对当时在全中国接受外国津贴的同类机关团体中占一半左右的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进行“适当处理”，要求将它们“由政府接办或变为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办”。会议还通过了《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等文件。这次会议在中国拉开了接收、改造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慈善救济机构运动的序幕。

■ 1951年

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同年3月1日正式生效。该条例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以国家保障为主要方式，以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为主要对象，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为基本管理层次的国家保障制度。

3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成立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处理委员会的通令》。

3月31日，“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委员会”成立。



4月26日，全国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在京召开。时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开幕词中说，帝国主义假借“救济”、“慈善”和“宗教”的名义进行侵略，并残害中国儿童的生命，必须团结原有救济社团与救济机关中的中国人员共同来进行新中国的救济福利工作。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和《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社团及救济机关的实施办法》，商定该性质的全国救济社团分别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其各地分会改组或予以接办。经过这次整顿，外国在华的慈善团体陆续停办或转为民政系统的福利机构。

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号召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开展爱国的增产、增收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提出各地捐献的武器将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7月，该会又发出《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强调捐献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

■ 1952 年

6月2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做出关于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的总结：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底，由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至该会的武器捐款共55650.37亿元（旧币），可折合购买战斗机3710架。

■ 1953 年

8月，内务部增设救济司，并将社会司所管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工作中农村部分以及移民工作移交给它；另将残废儿童教养工作交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管理。

11月，内务部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



据《民政管理发展史》（1994年中国出版社出版）统计，截至此时，中国各地已改造旧有慈善机构419家，调整旧的救济福利团体1600多个。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对剩余民间慈善救助社团深入整顿的基本方针。

■ 1954年至1965年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宪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由国务院领导并接受国务院政法办公室的领导。

1955年5月6日，国务院批准内务部的机构调整，其中，社会司改名为城市救济司，原救济司改名为农村救济司，主管农村的自然灾害救济和农村的社会救济。

1955年11月22日，根据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合署办公；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所管的国内救济工作并入内务部，国际救济工作划归中国红十字会；并将原由其领导的盲人福利会和新成立的聋哑人福利会筹备委员会也划归内务部。

此数年间，中央人民政府对旧有慈善团体继续整顿。1955年至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旧有慈善团体或停办或由国家接办或改组为其他性质的机构。其后几十年内，中国内地已经不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间慈善组织，也没有具备一定组织和规模的、经常性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经过调整和改造后，逐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政府成为整个福利救济事业的主体。

1958年8月，内务部农村救济司改为农村救济福利司，城市救济司改为城市社会福利司。



■ 1966 年至 1976 年

1966 年 12 月 1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内务部的军事代表联合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中央领导批示：照办。

1969 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谢富治向内务口四个单位军代表和部分群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内务部撤销后，除在京设机关留守处外，其余人员于同年 3 月下放到湖北沙市五七干校劳动。内务部所主管业务分别由公安部、财政部、卫生部、国家计委劳动局、国务院政工小组办公室管理。

此十年间，慈善行为更被当成“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屡遭批判，人们谈慈善而色变。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 7.8 级大地震，同日，滦县发生 7.1 级大地震。震后，国际红十字会及很多国家相关组织主动提出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但是，在那个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年代，中国政府拒绝了所有援助，全力承担救济与孤儿抚养工作。

■ 1978 年

3 月 5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任命程子华为首任部长。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社会开始出现相对的自由活动空间，慈善事业也开始解冻和走向复兴。



5月20日，民政部召开第一次党组会议，并正式开始办公，其当时的内设机构有：办公厅、政治部、优抚局、农村社会救济司、城市社会福利司、民政司、政府机关人事局和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领域开始进行拨乱反正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慈善事业重新萌芽、走向复兴的条件也日益具备。

80年代初，一批中国政府官员逐步意识到，只靠政府力量进行社会救济，限于政府财力，往往捉襟见肘。与此同时，他们到欧美考察后带回来一个重大发现：“发达国家遍地都是基金会，原来在政府之外，也可以通过基金会筹资做社会事业”。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打报告设立基金会”。

8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救济方面，政府开始改变以往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部分社会救济“让渡”给社会力量，允许其发起成立公益组织，参与社会救助。这消除了人们从事慈善的疑虑，非常有利于国家慈善事业的复兴与发展。

■ 1980 年

10月，针对当年夏季严重的“南涝北旱”灾害，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民政部和外交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提出“欢迎国际社会向我灾区提供人道性质的援助”，获国务院批准。这在全世界引起积极反响，《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首次要求国际援助。

是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正式进入中国，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WWF在中国的工作始于1980年



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1996 年，WWF 正式成立北京办事处。WWF 成立于 1961 年，总部位于瑞士格朗，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 1981 年

5 月，在中国科学院第 4 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由 89 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提议、由国家拨专款设立面向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得到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并于 1982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是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开辟了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先河。1986 年，这一工作全部并入新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随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政府各部门也相继设立地方科学基金会和行业科技发展基金会，形成了一个科技发展的基金支持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金管理体系。

7 月 28 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等 17 个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单位联合发起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也是第一个以募集资金形式注册成立的全国性社会组织。

9 月 8 日，由华侨爱国人士关奋发先生倡议发起的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国务院批准、商务部主管、民政部注册的国家唯一的全国性茶业基金会。

之后，20 多个由政府各部门批准的、以中国字头命名、按部门按人群划分的第一批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纷纷成立，客观上为中国内地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复苏和发展打下基础。

■ 1982 年

5 月 29 日，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廖承志宣



布成立“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儿童科学公园基金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通知，宣布“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成立。（1987年3月，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改名为“宋庆龄基金会”；2004年3月，宋庆龄基金会改名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 1983 年

6月，为纪念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姚依林、宋平、薄一波、谷牧、张劲夫、荣毅仁、刘瑞龙、汪道涵、陈翰笙、薛暮桥、马洪、于光远、许涤新等55人发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84年起，该会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该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具权威地位、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奖项；1995年，该会改称“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 1984 年

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1988年，与中国盲人协会、中国聋人协会、中国肢残人协会等联合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10月26日，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在京成立（2005年更名为中国癌症基金会），该基金会是由一些科研单位和医药厂商共同倡议建立的，旨在挖掘、动员各社会集团潜力，加速癌症研究步伐，为发展我国抗癌医药事业做出贡献。2017年，中国癌症基金会以606,689万元人民币名列全国基金会捐赠收入排行榜第一名。

1984年底，全国城市福利事业单位改革整顿工作交流会召开，提出城市福利事业的改革方向是由国家包办体制向社会办福利转变，这为民间



慈善组织的成立和慈善事业的复兴开辟了空间。

■ 1985 年

3 月 22 日，丁光训等中国基督教领袖在香港举办记者招待会，宣布将在南京成立爱德基金会。4 月，爱德基金会正式成立，旨在促进我国的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截至 2019 年，项目区域累计覆盖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逾千万人受益。爱德基金会成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恢复发展时期的一个成功典范，被誉为“民间慈善机构的一面旗帜”。

■ 1986 年

5 月 1 日，中国老年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前身）成立，宗旨是孝行天下，共建和谐。基金会以老年人为本，全心全意为老年人服务，并呼吁社会共同尊重、关心和帮助老年人。

6 月 14 日，由巴金担任会长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万里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他在会上讲话时说，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以后，迫切需要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他希望各方面做好工作，进一步团结起来，振奋精神，充分利用和谐的环境、创作自由的条件，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

■ 1987 年

4 月 4 日，中国人口计划生育福利基金会成立；6 月 6 日，更名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10 日，成立大会在中南海西花厅礼堂召开，全国政协前主席邓颖超为基金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王首道为基金会会长。

4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批示，万里、李鹏、纪云、乔石



同志圈阅，同意外经贸部、外交部和财政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同国外非政府组织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若干问题的请示》，并确定外经贸部为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开展中国与国际民间组织合作的协调机构。

5月，引入国际社会通行的“院内家庭照顾”模式的天津 SOS 儿童村建成，是全国首个同类型的慈善福利机构。随后，武汉、福州等地也建立起中华绿荫儿童村。由此，民间社会力量在介入福利事业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5月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特大森林火灾，101万公顷森林受害，5万多人受灾，211人丧生，间接经济损失达69.13亿元。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受捐赠工作。到7月底，共收到2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600多万美元的援助。

根据1987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已经建立各种规模的基金会214个，其中全国性基金会33个，地方性的181个；此外，各地还利用救灾扶贫款建立了一大批称为基金会的救灾扶贫基金组织，据1986年8月民政部的一项统计，仅此类基金会就达到6275个，其中乡镇政府设立的有5888个。

■ 1988年

1月，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设立使其成为第一个被中国政府允许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国际组织。

4月21日，由民政部作为牵头单位的“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正式成立。

7月7日，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审议并批准了民政部机构改革方案。机构改革后，民政部设立办公厅、基层政权建设司、



优抚司、安置司、救灾救济司、社会福利司、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司（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社团管理司、社会事务司、婚姻管理司、政策法规司、人事教育司、综合计划司、国际合作司（民政部接待安置印支难民办公室）共 14 个职能司（厅）和机关党委。

9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该办法共 14 条，是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制定的第一部专门规范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第一次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基金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中国基金会无章可循、无序发展的状况；但其实际上规定的“三重管理体制”和“三步批准登记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中国政府对基金会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管控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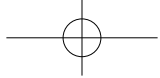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 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的活动宗旨是通过资金资助推进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由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不适用本办法。

• 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建立基金会，由其归口管理的部门报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发给许可证，具有法人资格后，方可进行业务活动。

• 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基金会应当每年向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报告财务收支和活动情况，接受人民银行、民政部门的监督。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对基金会进行清查的通知》，对基金会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对合乎《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基金会予以批准登记，发放《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12 月 25 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起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成立。



■ 1989 年

3 月 8 日，由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管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首任秘书长为徐永光。

3 月 13 日，由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前身为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成立，是全国性扶贫公益组织。

8 月 29 日，马海德基金会在卫生部登记成立，目的是纪念卫生部顾问马海德，致力于表彰、奖励全国先进的麻防工作者，开展救助麻风病人及其子女的扶贫助学活动等。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美国，1933 年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到上海考察当时中国正流行的东方热带病，1950 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成果。

8 月 30 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的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成立，是中国最早的、影响力最广泛的、规模最大的名人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

10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于《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的性质是“社会团体法人”，所以中国基金会要同时接受两部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管制。

10 月 30 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召开“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新闻发布会，宣布建立中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并发起实施“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截至 2018 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 150.23 亿元，资助



困难学生 594.9 万名，援建希望小学 20,110 所。

12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基金会的通知》，要求基金会的清理整顿工作于 1990 年 3 月底前结束，期间原则上暂停审批新的基金会。通知指出，自 1988 年 9 月开展基金会清查整顿工作以来，发现中国基金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对基金会的性质、宗旨认识不清，违反《基金会管理办法》的规定，设立了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基金会；基金会审批制度混乱，一部分未经人民银行审批、擅自成立的基金会，已成为各部门或单位的附属机构；有相当一部分基金会缺乏基金来源，名为筹集资金，实际上是变相向企业、机关、团体进行摊派；有的基金会成立几年来，没有开展任何奖励和资助活动；部分基金会的领导成员由现职党政机关干部兼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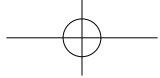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12 月 30 日，在《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社会团体进行的分类中，明确规定基金会属于“专业性社团”。

是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春蕾计划”儿童公益项目，资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辅助国家发展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截至 2018 年，“春蕾计划”已资助女童 369 万人次，捐建春蕾学校 1811 所，对 52.7 万人次女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编写发放护蕾手册 217 万套，成为中国促进儿童发展的著名公益品牌，由彭丽媛担任促进女童教育特使。

■ 1990 年

5 月 30 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京成立，邓小平为该基金会题写会名，标志着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有了新的发展。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第一次全国性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研讨会在



承德召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等 13 家全国性基金会及民政部社团司、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管理司等机构的 29 位代表与会。

■ 1991 年

5、6 月间，中国共有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5 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灾害最重、损失最大的是安徽和江苏两省。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

7 月 5 日，民政部综合外交部的意见，将“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名义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的报告送到国务院，并获得批准。

7 月 11 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灾。

截至 12 月 31 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 23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 2.3 倍。其中，爱德基金会通过海外募款募集了 200 多万美元用于救灾工作。

是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严格审批和整顿基金会的通知》。

■ 1992 年

3 月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经过 3 年多时间，筹资 1.5 亿元，兴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化的、专门培养妇女高级人才的女子学



院——中华女子学院。

6月，时任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获得联合国环境大奖和10万美元奖金。获奖后，曲格平决定将这1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并建议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 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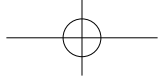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1月8日，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会成立，后更名为吉林省慈善总会。成立20多年来，先后募集善款近40亿元，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吉林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募集善款达14亿余元。

4月27日，由环境保护部主管的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4月，中国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简称“中国民促会”）在民政部正式注册，宗旨是加强与国内外民间组织、企业、政府和热心公益事业人士在社会发展、扶贫济困和公民社会互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基层民间组织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和咨询，促进社会建设的协调和发展。2017年，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特别咨商地位。

6月，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个以“慈善”命名的慈善组织——上海浦东老人福利慈善会成立。该会由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蒋明道创办。

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月，全国性民间基金会第二次交流研讨会在北京香山召开，20个全国性民间基金会的40余位代表参会，与会者一致同意择机筹建一个基金会联合会。

■ 1994年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其第六条第四款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1月8日，我国首家孤儿基金会——杭州市孤儿基金会成立，旨在宣传、提倡推进关怀孤儿的新风尚，立足长远，持久地扶助杭州地区的孤儿，资助孤儿文化教育、医疗康复保健。

1月25日，由教育部主管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成立，是建国后最早成立的大学教育基金会。2018年，捐赠收入21.26亿元，在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中排名第一。

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颁布，其第二十四条规定：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慈善正名》，开始褪去裹挟“慈善”的污名化外衣，让“慈善”公开重返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在此之前，《人民日报》几乎没有使用过“慈善”这个词。直到1998年，媒体每做一次慈善报道都得向上请示，因为当时中央主管宣传的部门认为慈善不属于党和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还认为慈善与政府的理念和工作有冲突，报道慈善会给政府抹黑。可见，当时虽然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的改革开放后又一次思想解放，促成了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但是社会各界对慈善的认识依然明显滞后。



3月15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成立。

4月1日，浙江大学联合社会各界成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2004年，更名为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06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国家民政部重新进行登记注册，更名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2018年，捐赠收入4.5亿元，在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中排名第三。

4月12日，由民政部主管的中华慈善总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创始基金2000万元，首任会长为崔乃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慈善组织。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明确要走出一条慈善组织独立发展的道路，制定不同于事业单位的独立财务体系，人事制度上独立招聘、待遇与市场挂钩；其目的在于保持慈善事业的民间性、自主性，树立“慈善是民间自主、自办、自创的事业而不是政府福利”的思想观念，使慈善成为一种民众自觉自愿的行为，从而与现代慈善理念接轨。它的成立，标志着慈善事业在中国大陆已得到恢复。

5月7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在上海市民政局登记成立，宗旨是以安老、扶幼、助学、济困为重点，依靠社会办慈善，办好慈善为社会。它是全国累计筹资额最大的基金会之一，是公益基金商业运作模式的范本。

■ 1995 年

年初，接续1993年的会议，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二十余家基金会和部分新成立的社会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联名向中国人民银行和民政部要求正式登记注册。后因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基金会管理，民政部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筹委会在成立一年后停止工作。



4月，以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为团长的中国基金会代表团出访美国考察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十余家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民政部社会团体管理司、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管理司都派出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是中国基金会第一次组团出国考察。回国后，项南执笔报告《信誉是基金会的生命》，基金会访美考察报告也公开发表。

4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提出申请注册的基金会，除具备最低10万元人民币注册基金外，还须有200万元人民币的活动资金，并限定同一区域内不应重复设立宗旨相同或相近的基金会；此外，凡经营管理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经济实体的基金会，要限期清理并作出适当处置。

9月4日至15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这次大会被认为是全球公民社会影响中国最引人注意的例子，也被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转折点。这次大会后，NGO这一术语进入中国公众话语。其后几年，在中国的国际NGO、政府NGO以及草根NGO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10月1日，由国家教委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2018年，捐赠收入12.7亿元，在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中排名第二。

10月25日，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登记注册。该基金会是专门资助与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有关研究活动的学术性社团，每年面向社会资助各研究机构和个人，进行与当前经济改革与发展有关的课题研究。

11月，中华慈善总会为汲取美国联合之路发动社会筹募的经验，邀请香港公益金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联合捐委员会的骨干成员进行培训，并推动这两个组织于1996年春节分别策划和举行慈善募



捐社会活动。之后，将上海经验推广至各地，在全国慈善会系统内倡导制度化、社区化、一年一度的慈善募捐社会行动。

是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计生协、中国人口报设立“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截至2018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25个县开展过项目救助，累计投入资金18.2亿元，救助34.2万贫困母亲及家庭，惠及人口146.3万。

■ 1996 年

春节期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新民晚报社联合发起“慈善一日捐”活动，以街头贴花、举办“蓝天下的至爱”晚会、设置募捐箱、义卖、义诊等多种方式倡导慈善捐赠。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带头捐赠，市、区各级党政机关、工商企业和社区纷纷响应，形成群众性捐赠热潮。之后每年春节期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都会举办系列慈善募捐活动。

7月12日，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在湖南长沙成立。湖南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是在原“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会”的基础上，经过重新审批登记注册的地方性社会团体，其目的是通过基金奖励和资助方式，促进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事业的发展 and 农业优秀人才的成长。

10月7日至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是年春，为了给慈善和慈善事业正名，中华慈善总会邀请季羨林、王



蒙、朱传一、丁望等老一代专家和孙立平、郑也夫、刘军宁、康晓光等中青年学者，以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施德容等共同出席“慈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高层研讨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慈善为题举行的理论研讨会。会议提出，慈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慈善并不姓“资”，做慈善应不问动机；弘扬慈善、实践慈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等重要观点。会议纪要刊登于《光明日报》理论版，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把慈善提到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高度，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慈善理念的作用。

是年，中华慈善总会与天津市慈善协会合作创办《慈善》杂志。1998年5月，经国家出版署批准，在海内外公开发行。杂志以道德教育、普撒爱心、净化人性、引人向善，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为办刊宗旨，是全国最早的慈善文化期刊。

是年，首部《基金会指南》出版。该指南由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管理司主编，汇集当时65家全国性基金会的基本信息，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 1997 年

5月，民政部社团管理司更名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司。

9月，中国第一个非营利机构评估项目启动，对天津鹤童老人院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规范性评估。此次评估不仅提出系列报告，而且通过个案研究，形成了对非营利机构评估的成套程序、规则和评价准则。

11月27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其目标是支持政策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科学的、民主的决策。自2000年起，连续组织承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是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首次规定对提供慈善捐助的企事业单位给予减税待遇。

■ 1998 年

是年春，中国内地第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支持性机构“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信息网”成立。该机构致力于推动慈善组织间的信息交流和行业公信力建设。当年底，该机构召开“非营利组织的自律”主题论坛，首次提出“中国非营利组织九条自律守则”。它是在 1995 年搁浅的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委会的基础上设立的。2001 年，在北京市工商局正式注册，更名为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

是年夏，中国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爆发历史罕见大洪水。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遭遇洪涝灾害，受灾人口达 2.23 亿，直接经济损失 2650 亿元，为百年罕见。6 月 30 日，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全国工商联、全国企业家协会、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全国青联等单位共同发出捐助呼吁，并倡议全国各地慈善会紧急动员，为抗洪赈灾募集资金和救援物资。

8 月 16 日，民政部设立全国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办公室。是日夜，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举办“我们万众一心”大型赈灾义演晚会，向全国及海外直播，募集到海内外各界捐款、捐物总计 6 亿多元（由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分别接收）。这是中国第一个电视募捐专场晚会。

截至当年 11 月底，中华慈善总会募集的赈灾款物总计达 6.27 亿元；中国红十字总会募集到款物达 6.7 亿元。通过“98 抗洪救灾”活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充分调动民间慈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使慈善事业的功能作用得以充分显现，使人们对慈善事业的信心有所加强，树立起民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也使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给予充分肯定。

10月14日，清华大学召开非政府组织问题座谈会，宣布正式成立“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内地成立的第一个NGO研究机构。自2007年起，该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Brill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编辑出版中英文学术期刊《中国非营利评论》。

10月25日，国务院发布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自此，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步入法治轨道，在社会福利、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可以依据此法登记注册。

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再次进行机构设置调整。其中，社会福利司和社会事务司合并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

■ 1999年

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以后成立的最早的社会学研究所。2003年升格为院级中心。该中心是一个注重社会政策试验与理论创新、开放式、网络化的社会政策行动研究与咨询服务机构。中国第一家社会学个人基金会——北京市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的办公地也设在该中心。

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该法9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的第一部捐赠法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慈善事业方面的第一部法律，其宗旨是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它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民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做好社团基金会监管职责交接工作的通知》，按照监管职责分工、上下分别对口交接的方法，中国人民银行将基金会的审批和监管职责全部移交民政部。

10月，一套10本的《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出版。这是中国内地首次成套出版第三部门研究丛书，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研究领域覆盖募捐、资助、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法律环境、文化功能、效益评估、转型期发展模式、历史、国际比较等方面。

11月，中国内地首次国际非营利组织论坛“非营利组织发展和中国希望工程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该研讨会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

12月2日，民政部成立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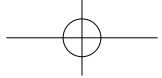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是年，《基金会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开始启动。

■ 2000 年

10月16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民政部。

10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支持下，历经三年准备的首次公司与社会公益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办。会上阐发倡导企业好公民、慈善市场、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慈善投资的新概念，研讨了非营利机构资金管理和基金集合信托等新方式。

是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北京市政府、中央电视台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承办的“情系西部·共享母爱”世纪爱心行动大型公益活动



募捐善款 1.16 亿元，用于设立“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专项基金，并于 2001 年开始实施“母亲水窖”公益项目。截至 2018 年底，“母亲水窖”在以西部为主的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修建集雨水窖 13.96 万口，集中供水工程 1846 处，共帮助 268 万人获得安全饮水，项目资助规模达 9.46 亿元。

■ 2001 年

3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性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捐助资金使用的监管”的要求。

4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同年 10 月 1 日生效实施。该法规定了公益信托的性质、范围和批准方式。

12 月 27 日，在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召开的“非营利组织的自律”主题论坛上，首次提出“中国非营利组织九条自律守则”。

■ 2002 年

4 月，北京富平学校在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成立。这是一家由学者、企业家和发展工作者共同创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10 月，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正式成立。2010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富平学校的核心发起人成立北



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通过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综合性投资，乐平支持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代社会企业快速发展，并催化具有规模化潜力的社会创新方法，最终产出规模化的社会影响力。

4月18日，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成立。

10月，鉴于“健康香港基金”的动作机制日趋完善以及它为内地所做出的贡献，国务院特别批准成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使“健康快车”可同时面向内地筹款。“健康快车”于1997年开始运行，是中国唯一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截至2019年1月，健康快车火车医院已累计停靠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18个服务地区的179个站点，使20多万名摸索在黑暗中的贫困患者恢复视力、重见光明。

■ 2003年

3月至6月，中国爆发“非典”疫情。在全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行动中，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慈善救助，慈善捐赠款物达40.74亿元。其中，民政部门接收14.94亿元；卫生部门接收14.73亿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地方红十字会接收6.36亿元；中华慈善总会和地方慈善总会接收1.96亿元；其他指定机构接收2.75亿元。40.74亿元捐赠款物中，内地企业、个人捐赠27.44亿元，占67.3%。

4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对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自然灾害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

5月18日，上海率先将超市冠以“慈善”之名，正式建立慈善超市，由此揭开我国慈善超市发展的帷幕。



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向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11月9日至11日，“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暨公益项目展示会”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国内公益机构与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18个机构联合发起，主题是“走进公益、服务社会”。

■ 2004 年

2月4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3月8日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向社会公布，并于6月1日起实施。该条例对基金会设立、变更和注销，组织机构，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首次将基金会划分为公募性基金会和非公募性基金会。此外，该条例还第一次以官方行政文件的形式允许国际NGO在中国注册办公室。

5月31日至6月2日，“上海国际慈善论坛”在沪举行，这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十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交流活动，也是上海首次召开的以慈善为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

5月，《公益时报》与胡润百富榜联合推出首届中国慈善排行榜。自2005年至今，已成为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品牌。

7月7日，旅美华侨叶康松捐赠原始基金200万元发起的“温州市叶康松慈善基金会”获浙江省民政厅批准设立，这是《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后第一个成立的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



8月18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印发《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于次年1月1日起执行，由此中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开始有法可依。

9月16日至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该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慈善事业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从根本上确立了慈善事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12月1日，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成立。（此即为后来的爱佑慈善基金会。2008年初，经审批，爱佑慈善基金会由地方性升级为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

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地震海啸。中国慈善组织迅速组织民间救助行动，开启中国民间捐赠支持国际灾难先河。全国共接收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款物近7亿元。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共募集救助款物折合人民币4.43亿元；中华慈善总会和地方慈善总会共募集救助款2.56亿元。

12月28日，“内蒙古老牛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成立，下设“老牛专项基金”，此即为后来的家族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的前身，由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总裁牛根生携家人将持有蒙牛乳业的全部股份及大部分红利捐出设立。截至2017年上半年，老牛基金会累计与161家机构与组织合作，开展208个公益慈善项目，遍及中国各地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尼泊尔、非洲等部分地区，公益支出达12.02亿元。

■ 2005 年

1月，财政部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包括基金会在内



的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制度作出详细规定，从制度上为基金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保障。

年初，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将民间组织评估工作列入计划，以招标投标方式进行“中国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研究课题，并选择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浙江省、青岛市和深圳市进行民间组织评估试点。在充分研究和广泛试点基础上，确立了民间组织评估指标体系。

3月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的字眼。这是慈善事业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4月7日，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由香港光华控股有限公司捐资设立。其早期针对服刑人士开展服务的“光华公益创业行动励志人生项目”受到业内好评。

6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成立一个为救助贫困家庭白血病儿童的专项公益基金：小天使基金。但面对逐年增加的求助人数，小天使基金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2009年7月，财政部批准国家彩票公益金向小天使基金注资5000万元，专项用于白血病患儿的医疗救治。这一举措被专家学者称为“政府首次向公益组织购买服务，是政府在职能转变、创新机制上迈出的可喜一步，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事件”。

6月14日，由香江集团捐资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成立。它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中国第一个在民政部登记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民政部批号“001”。

8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启动“红十字天使计划”，关注贫困农民和儿童的生命与健康，协助政府改善贫困乡村医疗卫生条件，促进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

11月20日至21日，由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颁发了“中华慈善奖”，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首次明确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原则和措施。

12月28日，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反映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和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的愿望。其主要功能是，在全国各地和老少边穷地区直接扶持一批扶贫项目，起到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为参与光彩事业的企业家排忧解难，为光彩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和中外交流提供支持。

■ 2006年

1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联合发起中国NPO自律行动，由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执行，制定了《中国公益性NGO自律准则（草案）》及实施办法。中国NPO自律行动遵循自愿、自律、自救的原则，旨在通过建立自律准则，加强NPO行业的行为规范，提高社会公信力，促进我国NPO的健康发展。2008年4月，《中国公益性NGO自律准则》正式发布推广。

1月12日，民政部发布《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和《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

5月26日，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成立，标志着“西部阳光行动”由原来的草根NGO发展成为专业服务于西部农村教育的非公募基金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基金会致力于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及社区发



展，以多元形式支持和帮助乡村教师、儿童及弱势人群自我提升，为他们提供自我改变的机会。

7月19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英国伦敦成立分支机构，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海外为中国境内开展的儿童少年项目募款。这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设立的首个海外分支机构。

9月21日，浙江大学旅美校友段永平携夫人刘昕联合网易公司总裁丁磊，向浙江大学捐资40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用于设立“浙江大学等额配比基金”，纳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统一管理，为中国慈善捐赠文化带来了新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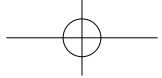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的要求。

是年，民政部启动《慈善法》立法调研工作，多次举办相关的国内外交流和论坛，并邀请专家参与论证。

■ 2007年

3月1日，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成立。它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由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家联合发起、以参与式资助为主要运作模式的在民政部登记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4月6日，第一个由中国民营企业设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成立——“王振滔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推出了全新的慈善



模式：受资助学生要在工作后资助一名贫困学生，这个基金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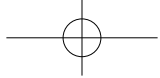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4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发起，在中国红十字会架构下独立运作慈善计划和项目。2010年12月3日，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自此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已清算注销，其项目、资金及工作人员已由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承接。

5月1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成立，原始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它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发展，带动民间社会创新，实现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在整个公益行业的生态链中，是一个资金和资源的提供者，扮演“种子基金”的角色。

6月26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成立，是中国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互联网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通过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和服务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2015年9月9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企业、明星名人、创意传播机构共同发起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腾讯99公益日”，三天募集善款1.27亿元；自此，腾讯99公益日成为中国一年一度的全民慈善日，持续创下中国互联网募捐的新纪录。

8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慈善法》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

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



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0月，民政部组织专家小组，设立评估委员会，启动对基金会的评估工作，从基金会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社会评价等方面先后对62家报送材料的基金会进行了评估。这是中国第一次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的全方位评估。

■ 2008年

1月1日起，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该法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可以免税，首次确定了公益组织的认定标准，并将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从原来的年度所得额的3%调整为年度利润的12%。12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又颁发《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且符合该通知规定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公益性社会团体，可按程序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标志着中国的慈善立法进入了组织法与税收法两条腿走路的阶段。

3月11日，华民慈善基金会经国务院批准，在民政部注册成立。它是中国内地当时注册资金规模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为2亿元人民币，原始出资人为卢德之、李光荣及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月29日，民政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基金会评估工作总结暨授牌大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6家机构获得5A等级。另有13家获得4A等级、19家获得3A等级。

5月12日，汶川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唐山大



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后，全国数十万社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主动配合政府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救援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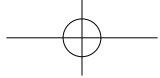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5月13日，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50多家民间组织发表《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联合声明》，这是中国民间组织在国家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首次联合起来，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联合公告，独立行动。几天内，共有168家民间组织参与联合声明与抗震救灾行动。

5月1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1个民间组织在四川成都共同发起成立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同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紧急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持。资助项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到年底，有近60家服务类民间公益组织得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资助。

6月17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召开“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以求共同实施“5.12灾后重建项目”，实现公益资源的优化组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聘请专家成立独立评审委员会，鼓励各类申报机构公开、平等竞争。截至11月25日，共有两批12个慈善公益组织的项目获得资助，中标总额1416万元。这种评委独立、规章完备、程序公正、资助透明的项目公开招标开创了中国社会组织横向合作的新模式。

8月14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成立。基金会首创以“梦想中心”为核心的素养教育服务体系，提供软、硬件一体化的儿童素养教育。从2008年开始，真爱梦想每年详细公开审计报告和财务数据，并从2009年开始每年公开举办年报发布会，成为国内首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公开发布年报的公益基金会。2014年4月12日，获批转制成为公募基金会。

9月1日，民政部公布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设立，分管福利彩



票发行、慈善和社会捐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及儿童福利事业等。

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11月1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发起的首届典范工程启动评选。典范工程每年评选一次，旨在通过评选治理严谨、运营高效、财务透明、可持续发展以及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典范机构，倡导慈善公益组织要加强专业管理和制度规范，为中国公益事业运作提供可资参照的经验。

11月8日，中国首家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是由深圳航空城（东部）事业有限公司和深圳桃源居地产集团捐赠1亿元人民币发起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推进中国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利用社区劳动力，发展社区经济，完善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福利，积累社区资本，创建社区自救自助、民主自治的公共服务体系。

12月19日，以“全球金融危机下社会组织的作用和责任”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社会组织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论坛指出，2008年是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也是社会组织经受考验和受到空前关注的一年。为更好地总结盘点2008年工作，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联合多家单位评选并公布了2008年度社会组织十件大事。

12月23日，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的阿拉善SEE基金会成立，致力于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NGO的成长，打造企业家、NGO、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可持续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是年，中国慈善事业捐赠总额为1070亿元人民币，个人捐赠首次



超过企业捐赠，中国大陆地区公民个人捐款达 458 亿元，占捐款总额的 54%，改变了此前国内个人捐赠不超过总额 20% 的格局。

■ 2009 年

2 月 12 日，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在福建证监局举行的福建辖区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希望捐出其家族所持有的部分福耀玻璃股权用于创建慈善基金会。事实上，2007 年 8 月，曹德旺就第一次向福建省表达了捐股份设立基金会的想法，但由于当时的制度制约，该事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3 月 10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使非公募基金会能够享受到原本只有几家公募基金会所享有的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捐赠税前扣除优惠政策普惠到了非公募基金会，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鼓励作用。

4 月 21 日，民政部发出《关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得提供公益捐赠回扣有关问题的通知》，明文规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得在接受的公益捐赠中提取回扣返还捐赠人或帮助筹集捐赠的个人或组织，对“善款提成是否合法”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

4 月 26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为契机，发起全民公益行动项目“爱心包裹”活动，依托中国邮政网点在全国开通 3.6 万多个捐赠站，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只需要通过邮政网点捐购爱心包裹（统一的善品和捐赠标准）并选择捐助对象，就可以一对一将自己的关爱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6 月 12 日，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探索他律机制，增强社会公信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监督巡视员，对其所有公益项目进行



跟踪监督。7月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京宣布成立，由25位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监察、审计、法律、媒体、学界、捐赠人、非营利组织等有关方面的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每届聘期为3年。此事件被视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在社会监督机制上的重大创新，被评价为“中国公益组织在社会监督方面所迈出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并被国家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报》联合评选为“2009年度十大公益新闻”。

6月19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名上书税务局，提交了《就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延期进行的紧急请示》。事件反映了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对于非营利组织收入免税资格认定严重滞后的问题，税务局各分管所进行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要求基金会把捐赠收入并入应税所得计缴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待非营利组织收入免税资格认定下来以后再将相应税款予以返还。按照《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仅中国青基会一家就得缴纳5000多万元的企业所得税。5家基金会提出的《紧急请示》表示，对于基金会组织而言，先缴税后退税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更为严重的是，此举将给基金会带来资助资金拨付的困难，给捐赠人乃至社会带来误解。

7月2日至3日，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参会的非公募基金会达110多家，还有10余家公募基金会和10余家境外基金会及国际组织。论坛展示了2004年以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成果，公布了《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并签署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自律宣言》。其后，论坛每年举办一届，并于2016年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8月，中央电视台《大家说法》栏目推出“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系列节目，打造了一场NGO的PK。NGO首次以群像的身份走进荧屏，以镜头的方式展示自身的精神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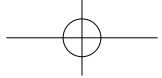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8月1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三家发起的为期三天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在京举行。这次活动被称为中国“首次公益广交会”，是慈善资源优化调配的重要尝试，对于解决公益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大胆的探索。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教授邓国胜团队提出的有关地震捐款去向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8月中旬，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并投入超过5000万元，在贵州、云南两地启动一系列以教育发展帮扶为主，兼顾环境保护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内的公益项目。这种“公益集装箱”式的服务方法开创了企业、公益机构、地方政府与受助群体合作的一个公益新模式。该事件被第二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公益新闻事件之一。

9月1日，中国第一家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在广东省民政厅登记注册成立。千禾基于珠三角社区面临的生计、教育和环境问题，动员并联结基层政府、企业、基金会、慈善团体和研究机构等各界力量，持续开展社区服务、共建共享社区资源、打造社区文化，推动社区创新发展、合作与多元治理，建设公正、关爱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0月20日，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宣布以个人出资的形式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资金形式全部为陈发树个人所持有的流通股股票，价值达83亿元人民币。此事在年初“曹德旺股捐”事件后再次引起“股捐”大讨论。同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就企业以持有的股权进行公益性捐赠有关财务问题予以规范；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把企业的捐赠范围扩大到“股权”，让“股捐”有法可依。

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代表团赴美考察。考察团回国后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中国基金会中心的成立。



11 月，首期“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在上海举行；12 月，第二期培训在北京举行。两期培训共有 160 多家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参与。

11 月 19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两个通知没有明确就基金会营利性收入企业所得税免税问题作出规定，限缩了非营利性收入免税范围，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做出不合理的规定，引起强烈关注。

12 月 22 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九家基金会建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两个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希望与时任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直接对话。该事件被评为“2009 年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之一。

11 月 23 日至 29 日，“希望工程·完美爱心使者代表团”应马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在马来西亚进行为期 7 天的交流访问活动。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首次进行海外捐赠，也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第一次尝试走出国门。

12 月 29 日，云南省政府下发《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次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规定被认为是中国专门针对国际 NGO 的首个管理条例，并被某些观察员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国际 NGO 的法律模板。

■ 2010 年

1 月 12 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成立。该基金会由中国第一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主要起草人魏久明等人共同创办，并得到上海企业家袁祥先生捐赠 2000 万元原始基金。



1月21日,《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获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于当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首部地方性慈善法规。

1月29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战略合作暨“微笑母亲——农村妇女‘两癌’普查普治救助项目”启动。在该项目中,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承担“普查普治”人物,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负责对“两癌”患者实行一次性现金救助。两个基金会的此次合作被视为探索建立分工、专业运作、资源优化组合的公益创新模式的有益尝试。

4月至9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和主办首届新公益嘉年华。该活动以北京为起点,上海为终点,在近6个月时间里,以公益创新工作坊、社会创新发现之旅、上海公益季、社会创新嘉年华周等系列活动,倡导“全民公益、创新公益、快乐公益”理念。

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也快速前往救灾前线。截至7月9日,全国共捐赠款物106.85亿元。同时,中央及青海省财政共安排抗震救灾资金73.02亿元。

4月28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幸福列车”公益活动启动,旨在通过募集社会救助资金,使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有机会与长期在城市的农民工父母团聚。

5月4日,曹德旺、曹晖父子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向西南五省区市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2亿元善款,但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以每户2000元的标准发放到滇、桂、渝、黔、川五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而且管理费不能超过3%,差错率不得超过1%,超出部分按30倍赔偿。项目最终按照协议的质量和时



被称为“史上最苛刻的慈善”，也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家推动公益慈善组织透明与问责的一次实验。

5月16日，首次中华慈善百人论坛在京举办，两岸三地慈善界人士探讨和反思当下富人慈善话题，共同促进大中华慈善事业的进步。

6月21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资助的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宣布成立，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被聘请为院长。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大学与公益组织联合发起的专门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共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其成立意味着中国公益领域学科体系建设和完善迈出标志性的一步，是中国教育部门为探索公益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尝试。

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规定15家公募基金会募集的善款要统一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由青海省政府统筹安排使用。这一政策关涉慈善领域的权利规则，不仅引发公益界、学术界的主动沟通和积极建言，而且引起公众对于捐款者权利的思考，在网上展开讨论。该政策后由有关部门做了相应调整。

7月8日，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等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基金会中心网”正式上线，其使命是“建立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为行业提供能力建设服务，促进行业自律机制的形成和公信力的提升，建立良性的、透明的公益文化。”基金会中心的筹备与成立，是中国慈善行业自律20年努力的一个结果，在中国基金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9月15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在北京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以支持公益人才个人成长为目的发起的资助项目，其资助包括1年10万元、连续3年的资金支持和1年2次的集体活动。据南都公益基金会官方网站数据显示，该项目从运行以来，共产生81位银



杏伙伴。2015年7月20日，银杏伙伴、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9月29日，美国慈善家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拉斐特城堡酒店举办慈善晚宴，王石、余彭年、牛根生、冯仑、曹德旺、柳传志、张朝阳、马云、李连杰等50余人受邀参加。

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85年之际，由马化腾、万捷、王石、冯仑、宁高宁、刘长乐、陈东升、陈启宗等八位企业家发起的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在故宫博物院举办成立仪式。该基金会旨在维护和扩大故宫博物院藏品和建筑，为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和公众服务提供支持，扩大故宫博物院国际影响力。这也代表着国内博物馆在吸纳社会力量和制度管理创新上的积极探索。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10月28日至29日，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91家非公募基金会和96家公益组织及企业的代表出席。论坛年会发布了《2009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和《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等系列研究报告。

11月27日，国内规范募捐活动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湖南省募捐条例》经湖南省人大审议通过，于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

12月5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全民公益



论坛并启动“全民公益”活动。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银行联合推出“全民公益月捐平台”，社会公众可利用中国银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开通扶贫月捐业务，实现按月自动捐款。

12月20日，民政部出台《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对评估对象和内容、评估组织机构和职责、评估程序和方法、回避与复核、评估等级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

是年，南京大学筹建全国首家社会慈善学院。福建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向南京大学捐赠2000万元，用于建立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学院依托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办学基础，致力于公益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公益项目的创意与策划，公益研究与政策倡导等工作。

是年底，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

■ 2011 年

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举行揭牌仪式，宣布正式成立。自此，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为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募资格的基金会。

2月2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正式发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第三部门的观察报告，其总报告对中国第三部门进行环境分析，认为中国第三部门是“依附式发展的”，整体弱小，并且存在结构与功能失调，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此后，该报告每年发布。

3月，日本遭受9级地震及巨大海啸的袭击。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发起联合救灾行动，11家非公募基金会向日本灾区捐款142万元，捐助建设“环保复兴集体住宅”，支持“RQ市民灾害救援中心”实施救灾行动，实现了首次联合捐助海外。



4月2日，前媒体人邓飞联合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该计划源于邓飞等人同年3月9日在新浪微博发起的“免费午餐”社会捐款倡议。截至2017年8月底，该计划募款已超过31784万元，累计开餐学校达到893所。

4月5日，“微基金”成立，面向全球华人网友筹集1000万元爱心善款，用于改善西部地区特别是贵州农村学校的“小餐桌”、“小床铺”问题。该基金由知名微公益人士、微计划发起人梁树新与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主要依托互联网渠道，以微博、虚拟社区、网店等新媒体工具和平台传播公益理念，发起和组织公益项目。这被视为中国第一个以微公益理念为核心的公募基金。

4月24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对基金会接受和使用公益捐赠，基金会的交易、合作及保值增值，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等三方面进行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规定》明确项目人员工资、福利计入基金会10%的管理经费，不得资助营利组织等，引起较大反响。基金会中心网和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收集有关方面意见并报有关部门。

5月5日，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基金会资金注入方式、运作模式和管理规则的先河。在成立仪式上，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向基金会捐赠个人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市值35.49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内地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扶贫、救济等公益慈善事业；这笔捐赠使得河仁慈善基金会成为当时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一家基金会。

5月18日，民政部发出《全国性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初审暂行办法》，明确申请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应当



具备的条件、如何计算公益支出、哪些社会团体不属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范围等。

5月31日，安利公益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政部直管的跨国企业背景基金会。

6月6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凯、马洪涛等多位主持人、编导、记者、企业家、名人明星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爱心衣橱基金”。2018年3月16日，爱心衣橱团队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合作设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爱心衣橱公益基金”。

6月15日，前媒体人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该行动后来发展成为“大爱清尘基金”，致力于在中国推动预防和最终消除尘肺病。

6月19日开始，自称“红十字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网上炫富引爆舆论热浪，中国红十字会因此被网友关联，此前“天价餐费”、“天价帐篷”等种种事件重被提及，受此舆论风波影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红十字基金会等慈善机构也被卷入质疑漩涡。21日、22日，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过官方网站对此事件进行两次声明，否认中国红十字会设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及“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24日，中国红十字会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决定启动法律程序，以维护红十字会的合法权益。26日，郭美美连发三条微博向中国红十字会致歉。此事件后被称为“郭美美事件”，是中国最为公众所知的“慈善丑闻”之一。

7月，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捐助、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建的“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正式竣工，这是中国民间组织首个海外公益项目。对苏丹的援助，标志着中国扶贫基金会走出国门实施公益项目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我国外交部将阿布欧舍项目评价为2011年公共外交的典范工程。



7月8日,“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三十周年暨基金会中心网一周年大会”在京举办。会议发布了中国基金会行业30年来第一本专业数据研究成果《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倡议发起“基金会‘晒行动’”,进一步推动基金会透明化的进程。

7月15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宣布推出资助型项目“童缘”,以2000万人民币资助社会公益慈善组织重点对中国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孤儿、流浪儿、问题少年等进行生存、医疗、技能和成长救助。这被认为是中国基金会资助基层民间组织、构建公益产业链的良好尝试。

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明确今后5年慈善事业发展目标:到2015年,基本形成制度完善、作用显著、管理规范、健康有序的慈善事业发展格局。纲要明确,公开透明原则是未来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

8月14日,“郭美美事件”余波未平,又一条中非希望工程20亿元项目资金被24岁姑娘卢星宇掌管的新闻爆出,此即为“卢美美事件”。尽管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时出面声明,仍无济于事。10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受托做第三方评估,认定中非希望工程项目合理合法。这场质疑风波尽管未阻止中非希望工程计划在非洲援建希望小学的项目,但一度对项目筹款产生影响,并引发公众对慈善与商业的关注。

8月26日,首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在安徽发布。城市公益指数涵盖我国53个城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全面反映了其2008-2009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水平。公布的指数结果显示,深圳的慈善综合指数得分最高,上海、北京、无锡紧随其后。

9月1日,《南方周末》曝出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资产30亿元,在中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里名列第一,但公益支出却与其收入不符,大量



捐款被用于放贷；其下公益项目“郑州新区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80%变为豪宅等问题。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的行为属“为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铺路”的创新之举还是“变相的高息放贷”，引起社会争议。

10月22日，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中国社会政策专题系列论坛——中国红十字会体制改革与探索”召开。会后，“红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成立。12月30日，课题组向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提交了一整套包括六个分报告的研究成果。由此，中国红十字会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

10月22日，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发起公益徒步筹款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参与者需要在12小时内走完50km，并通过创意的方式向熟人网络募集善款，完成甚至突破既定筹款目标，实现个人挑战。该活动于2012年发展为平台型筹款活动，被视为中国现代公益筹款创新和突破的代表性案例。

11月11日，前媒体人孙春龙担任理事长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注册成立。该基金会缘起于2008年孙春龙为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战士发起的“老兵回家”公益行动。

11月22日至24日，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大开幕，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主题，发布了《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非公募基金会行业使命与社会发展报告》。

11月28日，福布斯中文版第三次发布关于慈善基金会的榜单，首次聚焦基金会透明度问题，推出中国最透明的25家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位列前三。

12月16日，民政部正式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为各



类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公开信息提供了指导规范，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参考文本，也为社会和公众了解、获取和监督慈善捐助信息提供了参照标准。

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办的“公益与商业合作研讨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24家基金会联合声明，愿意遵守《公益组织与商业合作九大行为准则》。同日，在第一届社会责任与诚信建设论坛上，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在内的100多家中国公益组织和企业，共同发布“社会责任与诚信联盟”宣言，承诺“践行责任，恪守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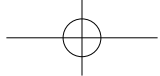
12月19日，商业社会责任国际协会联合倍能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及社会资源研究院共同撰写的《中国基金会发展指导手册》发布，为成立和运作非公募基金会提供指导，帮助个人和公司更好地了解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原则以及运作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要素。

是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对慈善事业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关注度最高的一年。

■ 2012 年

1月8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等全国性慈善组织联合主办的“2011中国慈善年会”在京召开，112家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发起“透明慈善联合行动”，呼吁行业自律，提升整个慈善行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2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建



立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2月26日，国家宗教局联合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和税务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鼓励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3月9日，民政部在北京发布《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3月19日，温家宝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强调，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

3月21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18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在京成立，旨在促进基金会的规范运作和科学发展，推动各基金会之间合作交流，引导基金会行业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3月30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京正式发布《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这是第一次向社会全面介绍改革开放30多年来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内地开展慈善活动的状况，分析了美国在华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5月11日，资助型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成立，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为使命，秉持“尊道贵德”的价值观，深耕于文化传承、公益支持、慈善文化等领域。

6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福建新华都基金会在



2010 年开始运作的以大学生就业培训为内容的“蓝天工程”项目存在造假嫌疑，其 2011 年之前运作的项目介绍和基金会年报未出现在新版网站中，甚至一直挂在首页的“陈发树先生将其个人持有的市值 83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捐赠给福建新华慈善基金会”也随之消失。随后，福建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介入调查。

6 月 19 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杭州主办中国基督教公益慈善事业经验交流暨先进表彰会。这是我国宗教界首次举行公益慈善事业交流表彰活动。

6 月 28 日，由民政部指导、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的“中国基金会网”正式开通，旨在打造一个集信息公开、数据查询、项目展示、学术研究、互动交流、捐赠救助于一体的专业化信息平台，提升行业整体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7 月 10 日，民政部公布《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包括“基金会接受和使用公益捐赠”、“基金会的交易、合作及保值增值”和“基金会的信息公开”三个部分，对规范基金会接收和使用捐赠行为，基金会的交易、合作以及保值增值行为以及基金会的信息公开行为作出指导。

7 月 12 日至 14 日，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举行。这是由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国家级、综合性的公益项目集中展示会。

7 月 13 日，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在深圳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发起的地方性环保类公募基金会，也是中国基金会中第一个公开推选市民理事和监事的基金会。

7 月 3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善品网正式上线，善品网是中国扶贫基



金会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启动的面向公众筹资的创新型公益项目，以慈善义卖为核心，现代网络技术为手段，将社会捐赠的闲置物资通过公益换购的方式，一方面加大扶贫资金筹集力度，另一方面实现社会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资源浪费。

8 月 29 日，基金会中心网正式推出“中基透明指数 FTI”，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捐赠参考，促进基金会行业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提升。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的民诉法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做出如下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9 月 15 日，阿拉善 SEE 基金会发起“创绿家资助计划”，致力于发掘和支持有组织化意愿的初创期环保公益团队。截至 2018 年 8 月，共资助全国各地 277 个初创期环保公益组织，资助总额超过 2700 万元，涵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环境教育、垃圾减量等多个环保议题。

11 月，财政部、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基金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通知》，首次引入专项审计这一形式，明确规定基金会年度审计、离任和换届审计、专项审计的范围，规定了审计机构的要求以及审计资金的来源等内容。

11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提到“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做好优抚安置工作。”

11 月 22 日至 23 日，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广州



举行，以“财‘劲’其用，追求卓越”为主题，出席本次年会的有 316 家机构，共计 600 余人。会议交流和探讨了作为推动社会建设与创新发展的积极力量，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有效地使用和管理资金以及与此相应的策略、方法和具体实践等议题，发布了《2011 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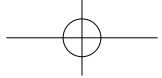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11 月 25 日，北京马拉松在中国率先推出“为慈善而跑”的体育慈善新模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救助儿童会、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自然之友、“给孩子送双运动鞋”公益行动、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等组织的近 600 名慈善选手参与其中。

12 月 7 日，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希望通过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体系，进一步增加红会的透明度。此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该委员会的成立对中国慈善事业改革、社会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12 月 10 日，网络公布一则微博，质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账目不清，怀疑有“洗钱”行为。该基金会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经历了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与拷问，同时也暴露了内部管理的诸多问题。由此引发的社会思考，超越了事件本身。

12 月 16 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举行主题为“为爱奔跑”的马拉松赛，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马拉松赛，来自 22 个国家的 1 万多名赛跑者参加。参赛选手和爱心企业为本次活动捐款总额超过 600 万元。

12 月 22 日，中国灵山慈善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是由民政部批准并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全国性公益慈善平台机构。促进会致力于联合全国及海外公益慈善机构和人士，共建、共享并共同监督开放性公益慈善平台。该促进会还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



■ 2013 年

1月1日，由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千万元设立的“翔业爱心基金”正式成立，成为全省首个由国有企业出资并自主运营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福建省民政厅下放审批权后厦门市首家由市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非公募基金会。

1月5日，实事助学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正式注册成立，其原始基金2000万元全部为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著书版税捐赠。

1月17日，安徽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传出消息，2013年起，该省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全面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在市级民政主管部门就可进行，无须再到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办理。

1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等46家公益慈善组织首次发布年度筹资、捐资情况及资金使用计划，共包括264个慈善项目、62.49亿元。

1月25日，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杂志创刊，杂志主要开展社会组织理论研究，反映社会组织改革实践，促进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公益慈善类等四大类公益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4月19日，中国慈善联合会成立，这是致力于我国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有关机构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联合性、非营利



性、枢纽型社会组织。

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共有219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此次救灾参与，被认为是中国有序、有效、专业、可持续、平等互助的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应急与联合机制正在成型。

4月21日，美国黑石集团总裁苏世民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3亿美元，启动“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这是当时中国从海外获得的最大单项慈善捐赠。

5月13日，网络人周筱赟爆料称，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实质就是红会的公关部，实际控制人王永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之间涉嫌商业利益交换关系，继“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与红监会的业务透明性再次受到各方质疑。

5月17日，中华慈善博物馆在江苏南通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慈善专题博物馆。2016年9月1日，正式开馆。

5月23日，文化部印发《文化部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将原来只规范社会团体改为将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纳入统一规范管理范畴。

5月28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劝募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将通过项目合作将全国性公募平台向更多民间公益机构放开。

6月15日，第五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召开，论坛首次纳入公益慈善议题。本届议题包括“志愿精神与公益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构建”等内容，在两岸公益交往历史上还属首次。



6月25日，由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获得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批准。8月6日向社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北京市第一家无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口述历史资料收集、乡村教育支持和文化交流方面的社会公益。

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举办“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云南省提出“云南省的政府部门将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政府不再参与社会募捐”，“不再限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等，社会管理改革在全国范围开先河。

7月31日，国务院研究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明确指出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并要求各地方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9月9日，针对公益人马克的救助行动引发对公益人生存状况的思考，由爱德基金会、原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等组织共同发起的恩久关爱基金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首个关注和救助公益人的基金，以帮助突遭重大疾病、意外伤害或其他特殊困难的公益从业人员渡过难关。

9月21日，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在深圳发布，此数据库是首家专门以民间公益组织为对象的数据库，覆盖全国范围，有望为草根民间组织提供技术传播、资金募集等多方面的支持。

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发布。该意见指出，到2020年将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

10月30日，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正式宣布其获得“公募性地方基金会”的资质，在中国率先由非公募基金会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成为北京市民政局



在 2011 年初提出北京地区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后成功转型的首例。

11 月 11 日，由 5 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100 多家 NGO 参与的《中国基金会评价榜》发布。这是中国第一个 NGO 针对基金会的评价榜单。

11 月 12 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 3 次提到“慈善”，明确“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并且把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作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重要力量。

11 月 14 日至 15 日，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以“理性公益，多元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和定位”为主题，回顾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非公募基金会未来应如何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理性发展，实现多元共生的公益诉求。发布了《非公募基金会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税收政策研究报告》。

11 月 16 日，中国第一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股权投资基金——社会价值投资基金设立。该基金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气候组织 Green China Lab 绿色创新实验室共同发起设立，倡导从战略性公益的视角，发现有长远社会价值的投资机会，通过所投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应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挑战，首轮计划募资额为 5 亿元人民币。

11 月 21 日，民政部印发《2014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服务项目实施方案》，2014 年中央财政将再次拨付 2 亿元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 2014 年



1月1日,《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规定》提出,政府应该通过规范和监管加强对慈善事业的引导和支持,以及公募基金会以外的其他慈善组织需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财产的,应当与公募基金会联合开展募捐活动。

1月6日,周筱赟在网上举报,称嫣然天使基金存在黑幕,7000万元善款下落不明,涉嫌利益输送等,并向民政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嫣然天使基金2006-2012年年度审计报告和年度工作报告全文。1月20日晚,嫣然天使基金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嫣然天使基金对周筱赟不实言论的调查报告》,再次公示筹建医院的基本账目。

1月9日,民政部和全国工商联会印发《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捐赠有偿证券、专利、技术及公益信托等方式参与慈善事业。

2月21日,华民慈善基金会与深圳市民政局在深圳前海试点公益信托公司。该运营模式是一种制度创新,为慈善基金会的非现金捐赠和投资保值设立“过桥”机制,能使公益信托制度得以真正落地并逐步完善。

两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门成立慈善法草案起草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召开慈善法立法研讨会,邀请有过慈善法规立法经验的地方机关、民政部门代表和专家对立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初步讨论,计划在年底前完成草案,并在201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3月12日,深圳市民政局出台《深圳市民政局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推广立足于当地的社区基金会。5月,深圳光明新区在百花、凤凰、新羌、圳美、玉律五个社区试点全国首批社区基金会,探索创建社区治理新模式。



4月25日，阿里巴巴两位创始人马云、蔡崇信宣布，将捐赠两人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成立公益信托，着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此事件开创了中国期权捐赠的先例，刷新了当时中国大额捐赠纪录，也令马云和蔡崇信跻身世界最知名的慈善家之列。同时，这次大额捐赠落地境外，也凸显出中国国内慈善制度的种种障碍。

5月2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启动仪式暨活动体验日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举行。这是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公益和健康结合的百公里户外徒步活动，通过亲近自然加自我挑战的体验形式，激发参与者为贫困地区儿童筹集善款，践行“每一步都会带来改变”的公益理念。

7月14日，郭美美等人因涉嫌赌博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依法刑事拘留，郭美美公开表示，想还红会一个清白。8月初，公安部门公布郭美美及其资金来源均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系。

7月18日下午至19日早上，超强台风“威马逊”致琼、粤、桂三省（自治区）数百万群众受灾，中国红十字总会在“三伏天”向灾区送棉被遭到质疑。

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里氏6.5级地震，灾后政府迅速响应，社会组织有序协同，形成了“政府主导、平台合力、基金搭台、专业服务、在地扶持”的协同救灾模式。

8月16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老牛基金会协办的首届“中国慈善论坛”召开。论坛以“开启善时代”为主题，探讨了全球慈善发展趋势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道路等诸多议题。

8月17日，风靡美国的呼吁公众关注ALS的冰桶挑战游戏传至中国，



立即掀起热潮，吸引超过 20 亿的点击量，成为当时最热门的公益活动。新浪微公益与瓷娃娃罕见病关闭中心借势联合发起“一起‘冻’起来”微公益项目，不足半个月获得善款 800 余万元。“冰桶挑战赛”以其创新性、娱乐性、互联网化等特征，刷新了公益慈善的刻板面貌，被认为是中国乃至全球公益史上一个重要节点，宣告公益 2.0 时代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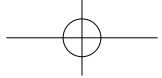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9 月 13 日，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由中国 17 家支持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基金会、公益创投机构和社会企业研究机构共同发起，致力于成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生态系统构建的倡导者。

10 月 6 日，由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主办、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4SEE 穿越贺兰山”公益筹款行动在宁夏举办，这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环保公益徒步筹款行动。此次行动募集的善款，将用于支持荒漠化防治、工业污染防治、三江源保护等项目的一线保护工作。

10 月 17 日，经国务院批准，当天从 2014 年开始被设立为“扶贫日”，以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

10 月 23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定万科公益基金会侵权禾邻社的《全民植物地图》的知识产权。这起案件后被称作“中国公益组织知识产权维权的第一案”。

10 月 23 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要完善慈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这使中国的慈善立法在长跑将近十年之后进入“快车道”。



11月6日，慈善网站施乐会被媒体报道身陷“置顶费”旋涡，施乐会的公告显示：将2013年10月起至2014年的“置顶费”相加共计7192756.1元。次日，金华市慈善总会要求其立即停止收取“置顶费”。

12月8日至9日，第六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以“超越·共识——大互联时代非公募基金会的转型与发展”为主题，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精神等不同层面，结合非公募基金会的传播、筹款、人才、资助、运营等内容，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年会发布了《中国基金会资助行为及状况调研报告》。

■ 2015 年

1月4日，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京启动“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用于资助和支持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

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研究员朱传一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0岁。朱传一先生是中国社会保障领域的著名学者，是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不但著书立说积极传播公益理念和公益文化，而且身兼爱德基金会等数家公益组织的董事、理事和顾问等职务，身体力行，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4月10日，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在宁波宣布成立，马云、马化腾出任该机构董事会联席主席。

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中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公益机构迅速反应，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多家民间救援机构奔赴灾区投入抗震救灾中，同时展开形式多样的募捐和捐赠行动，获评“中国海外救援力量初长成”。



4月26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由民政部和清华大学联合发起成立。

4月28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发布“蔚蓝地图”APP。

5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境外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集意见。这是中国第一次为境外非政府组织专门立法。

5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其中第16项为“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

5月20日，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关于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建立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政策措施等。

5月29日，民政部和国资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中央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为中央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提供了十个方面指引，包括直接设立慈善组织、发挥好已成立基金会的作用、利用自有资金积极进行捐赠、与慈善组织缔结合作关系等。

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社会组织拥有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被列入环境权利板块。

7月28日至29日，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等数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公益筹款人大会议召开，对筹款人职业发展、筹款模式、筹款伦理以及商业经验如何助力公益筹款等议题进行分享并展开深度探讨。

8月3日，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挂牌。这是中国第一家



互联网领域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8月12日，天津港发生爆炸事件。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部、天津蓝天救援队等民间组织第一时间响应，协助政府做好救援与善后工作。

9月7日至9日，第一届腾讯99公益日启动。3日内，共计205万人次参与捐款1.279亿元，创下中国互联网的募捐纪录。无论捐赠金额、参与人数，均创下国内互联网的募捐纪录。此后，该活动每年举办。

9月16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启动“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暨马云乡村教师奖”，每年一届，寻找100位优秀乡村教师，给予每人总计10万元支持——持续三年的现金资助与专业发展机会。

9月23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成立。

9月，媒体报道，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设救助脑瘫儿童的“星光专项基金”成立以来，共募集142万元和价值67万元的物资，但通过其账目显示，有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如此高额的行政支出引来众多争议。

10月8日，民政部发布《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统筹协调社会力量高效有序参与救灾工作，进一步提高救灾工作整体水平提出指导意见。

10月14日至15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联合主办主题为“妇女·发展·未来”的中外妇女论坛。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志愿服务活动。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10月29日上午，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提起的国内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宣判，原告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胜诉。这是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实施后，国内判决的第一例生态破坏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

10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该草案历经10年酝酿、2年起草后公布，引发社会各界对慈善公益事业的热议与建言，对推动与规范我国慈善事业具有深远影响。

11月3日至5日，2015年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在香港举行。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应邀出席并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演讲：社会企业在中国前途无量。该峰会由香港社会创业论坛及香港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自2008年起，每年举行，已经成为大中华地区有效促进官商民多界别对话与合作的有力平台。

11月10日，美国慈善救助基金会发布基于对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万民众抽样调查后形成的“世界捐助指数”报告，中国倒数第四。

11月12日，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共同捐资，是中国首家由中美慈善家创建的国际性公益学院，填补了中国没有独立公益慈善教学专门学院的空白。



11月19日，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携手中国公益研究院、世界厕所组织发起首届厕所革命论坛，宣布厕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希望通过免费厕纸的使用，使公众从关注厕纸开始，认识到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11月30日至12月1日，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深圳召开，以“非公募基金会的人才素养与根基培力”为主题，年会聚焦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在公益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探讨处于公益价值链前端的非公募基金会应如何关注一线，注重一线人员的成长、进步和伙伴关系，引领公益行业整体素养的提升，取得更大的行业推动成就，发布了《倾听一线的声音：项目官员眼中的基金会与行业》报告。

12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推出“中国慈善基金会榜”。爱佑慈善基金会首次登上榜首，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并列第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列第四。

■ 2016 年

1月1日，《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正式执行。该通知减除了企业对所捐赠股票的增值部分须缴纳的所得税，股权捐赠的税收减免问题得以破题。

2月14日，财政部、民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有关问题的通知》，接通了社会组织接受捐赠的“最后一公里”。

3月5日，中国首个民间志愿服务全国联盟网络——中国民间志愿服务联盟成立，这是由全国12家平台型社会组织及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的，旨在搭建全国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篇中，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专节，提出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等目标规划。

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并于2016年9月1日起施行。《慈善法》出台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慈善法》的高潮。

4月14日，民政部、国家海关总署下发《关于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办理进口慈善捐赠物资减免税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使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制度得到落实。

4月18日，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宣布将捐出一亿股腾讯股票，注入正在筹建中的公益慈善基金，通过各家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支持在中国内地的医疗、教育、环保等公益慈善项目以及全球前沿和基础学科探索。

4月2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使论证多年的企业向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股权并获得相应税收优惠的制度得以确立。

4月20日，阿里云正式启动公益云计划，为公益组织提供云计算以及大数据服务，将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结合，推动创新公益活动。中国扶贫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社会组织参与了这一计划。

4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5月11日，上海蓝海基金会成立，这是全国人力资源行业第一家公益基金会，旨在培训专业领域的精英团队，协助科研专利项目转化，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支撑，支持社会公益助学帮困。

5月22日，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先生宣布捐赠25亿港元（约3.2亿美元）设立全球最具规模的教育奖项“一丹奖”，由独立慈善信托基金运作及管理，确保此奖永续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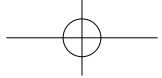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5月26日，民政部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月5日，中国慈善联合会携手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澳门基金会、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爱家文化事业基金会在香港联合主办“2016海峡两岸暨港澳慈善论坛”。

7月5日，二十国集团民间社会（C20）会议在山东青岛开幕。这是当年在中国国内召开的规模最高的国际性公益会议，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个民间组织参与。该会议是二十国集团峰会重要配套活动，是民间社会向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和社会提出民间建议的制度性平台。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参与此次会议。

7月6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进一步明确“十三五”期间我国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具体目标。

7月9日至10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举办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鼓励草根公益组织，支持全球环保行动，关心全国4000余万名乡村儿童和乡村教师，并推动建立人人参与的XIN公益文化。大会由马云发起，邀请潘基文、姚明、李连杰、布朗、扎克伯格、比尔盖茨、里昂那多等重量



级国内外名人为草根公益英雄站台。

7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成立，旨在通过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实践咨询、社会倡导和决策参与等方式，成为公益研究的领导者和公益创新的发动机。

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8月25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由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批准成立。该联盟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国社会影响力基金、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中国投资协会、青云创投、明德公益研究中心领衔发起，近50家机构联合创办。

8月30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执法监察局）正式更名为“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局），对外称“国家社会组织管理局”。随后，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管理局内设处室进行调整，将社会组织管理局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处更名为“社会服务机构管理处”，将涉外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更名为“涉外社会组织管理办公室”，并撤销原执法监察办公室，新设置执法监察一处、二处、三处。

8月31日，民政部发布《慈善组织认定办法》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9月1日，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并经社会公示，民政部指定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等13家平台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9月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清华大学、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会联合发起举办首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

9月18日，民政部下发《关于社会组织成立登记时同步开展党建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申请新成立社会组织提交党建工作承诺书和党员情况调查表。

10月11日，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规定了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支出的范围，包括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以及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等。

10月13日，浙江传华集团股东徐传化、徐冠巨、徐观宝一致同意捐出总价值30亿元的现金和有色证券，注入正在筹建中的传化公益慈善基金。传化公益慈善基金会拟致力于精准扶贫，通过设立产业扶贫项目、农业扶贫项目等，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11月17日，北京巧女基金会宣布出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专项基金，支持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这是《巴黎协定》生效后中国第一笔聚焦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民间基金。

11月23日，“中国好公益平台”正式宣布启动。该平台由阿拉善SEE基金会、爱德基金会、陈香梅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新华公益等联合共建，是中国第一个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的平台。

11月22日至23日，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以“新格局新想象”为主题，旨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关键期、《慈善法》出台之际，探讨中国基金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闭幕仪式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正式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11月29日，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京东、阿里巴巴、中国电信、腾讯、百度、新浪等15家网信企业，在全国网络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共同发起成立“网络公益扶贫联盟”。

11月29日至30日，罗尔在微信公众号上记录患白血病女儿的治疗过程，引发社会好心人士打赏捐助。随后有网友指出罗尔隐瞒家庭经济情况事实，推送文章存在商业炒作。12月1日，各方协商后决定将微信公众号的全部赞赏资金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

12月7日，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成立，专注中国商业文化遗产整理工程。

12月28日，“2016阿拉善SEE公益金融班环保慈善信托”在北京举行，并发布《慈善法》施行后首例慈善组织作为单一受托人的慈善信托。

12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旨在发展公益事业，弘扬公益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同时以完善国内公益研究体系、回应公益行业需求、架设公益行业对外桥梁为使命。

■ 2017年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正式实施。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已经登记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有489个。

1月6日，基金会中心网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UNDP）“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合作项目签约发布仪式在京举行。将在北京、日内瓦发布《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报告中英文版，该报告对5545家中国基金会的83038个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公益项目进行了深度分析。



1月25日，“常州毒地”公益诉讼案宣判，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败诉，并承担189.18万元的案件受理费。这是中国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第一起社会组织败诉的公益诉讼。有评论认为，这个案件将会影响整个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

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被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被修改为：“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月24日，修订后的《红十字会法》公布。其第十九条规定，红十字会可依法进行募捐，募捐应符合《慈善法》有关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红十字会应及时聘请依法设立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对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将审计结果向红十字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新法于2017年5月8日起施行。

2月2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志愿者出征仪式在京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志愿者项目受商务部委托和资助，是中国对外援助工作首次将民间组织纳入援助框架。

2月28日，第十个国际罕见病日，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成立一周年，中国首个罕见病创新解决方案服务设计项目“司南Lab”启动，旨在使用设计思维和服务设计，优化罕见病患者在确诊前、中、后期的信息甄别和服务流程，帮助罕见病患者提高信息甄别能力，准确找到所需医疗资源、提高就医的关键决策力等。

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并于10月1日起施行。该法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有评论认为，创设非营利性法人类别，有利于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

3月16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宣布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专门项目资金，用于帮助中国未成年人有效应对和防范网络风险，为其合理健康使用网络提供保障和技术支持。

3月28日，深圳市慈善会与深圳市民政局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深圳市慈善会成为具有独立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向慈善会派驻监事会。此举是《慈善法》颁布以来全国首次。有评论认为，这拉开《慈善法》实施以来中国慈善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的序幕。

3月30日，吴建民基金会成立仪式在京举行。该基金会的目的是纪念2016年夏因车祸溘然离世的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吴建民，致力于支持和资助外交理念和实践研究，设立国际青年访问计划，推动中外优秀青年交流互访，培养有志于国际交流事业的优秀青年人才等。

4月7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官网发布声明，终止与“善心汇”合作。声明指出，2016年12月27日，善心汇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并“善心汇公益基金”，后由于公众对善心汇的经营模式存疑（质疑其为传销、骗局），该基金自启动后未开展任何活动，而终止合作后，善心汇在外开展的任何活动与自己无关。

4月8日，阿里巴巴基金会启动XIN伙伴计划。这是一项面向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的长期战略性资助计划。首批XIN伙伴包括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及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4月26日，致力于推动国内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公益支持型平台“禾平台”在深圳正式对外发布。该平台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等联合发起。

5月10日，公安部召开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世界经济论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能源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11家境外非政府组织驻华代表机构负责人，以及清华、北大专家学者和外交部、商务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代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开展合作交流。

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在开幕式上，中国宣布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

5月18日，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会长何巧女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资助“联合国南南气候合作伙伴关系孵化器”项目。这笔捐赠资金是《巴黎协定》生效后，第一笔来自于民间致力于推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资金。

5月23日，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中伦公益基金会、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捐赠者服务体系创新”专题研讨会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深圳校区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以捐赠者服务体系创新为主题召开的专题研讨。

5月26日，在“慈善+”2017跨界公益论坛上，“华北渗坑”发现者向春获爱佑创新公益领袖100万元资助。

6月13日，2017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京举行。该峰会由腾讯基金会发起，主题是“互联网改变公益”。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



一丹在主旨演讲中提出，透明、科技、链接是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公益的三大关键词，而未来的互联网公益则在于心智的运用、人机协同、保持组织形态和心态的开放。

6月25日，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小云助贫中心发起河边公益对话。对话着重研讨公益力量如何能够整体性地回应中央关于动员社会力量投入深度脱贫攻坚的号召。这是中国公益界首次在一个深度性的贫困村，就公益如何在精准扶贫的场域中发挥在场性作用展开的理论与实际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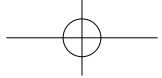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6月28日，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更名为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7月，公安部组织侦办“善心汇”涉嫌特大传销案，依法对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天明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问题进行查处。“善心汇”名为精准扶贫实为非法传销，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

7月1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三方共同发起的“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在京启动。该项目计划以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为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提供保障，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难题。

7月19日至21日，Youth Connket 非洲青年峰会期间，马云宣布，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将开设非洲项目，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将一同出资，设立保护区巡护员奖励基金，总奖金额为150万美元。此外，马云还宣布个人出资1000万美元成立非洲年轻创业者专项基金，帮助非洲的年轻人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

7月25日，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公布总额60亿元人民币的捐赠计



划，包含股权捐赠和现金捐赠两个部分，捐赠的 1 亿股美的集团股票将设立慈善信托，现金捐赠总额为 20 亿元人民币，包含 5 亿元现金设立的“顺德社区慈善信托”，另外 15 亿元现金涵盖精准扶贫、教育、医疗、养老、创新创业、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推动两家新型慈善基金会的成立。有评论认为，这种“慈善信托+基金会”的模式，对推动我国大额捐赠的落地和私人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示范和标杆的作用。

7 月 25 日，万通基金会正式变更为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原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万通基金会主要发起人冯仑继续担任沃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但该基金会与万通公司再无任何关系。

7 月 26 日，银监会、民政部联合印发《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对已开展近一年的慈善信托业务予以规范。《办法》强调，慈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和处分慈善信托财产，不得借慈善信托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洗钱等活动。

8 月 1 日，民政部推出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正式实施。民政部今后将运用这两项行业标准指导和规范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管理和运营。

8 月 8 日，四川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灵山慈善基金会等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救援机制，通过公开募捐等形式参与灾后救援。这是从 2008 年以来四川第三次大级别地震，但人员伤亡最轻。重要原因之一是，这次地震救援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整体上都快速、高效、有序，而且政社、社社之间的协调机制也较此前几次大级别地震救援有明显提升。

8 月 14 日，国际“慰安妇”日，记录中国内地 22 位“慰安妇”幸存



者晚年生活的影片《二十二》正式公映。该片用众筹的方式筹集资金，共有 3 万多众筹者，灵山慈善基金会支持了众筹活动。导演郭柯表示，影片票房收益部分除去还债，将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8 月 17 日，民政部网站消息，由民政、财政、税务、金融、公安等部门参加的社会组织资金监管机制正式建立。

8 月 29 日，腾讯公益联合 WABC 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发起的“一元钱购画”公益项目刷爆朋友圈，用户可以通过捐款“买下”由自闭症、脑瘫等特殊人群的画作作为手机屏保，不到 6 个小时就完成 1500 万元的筹款，共有超 580 万人次捐款。但这个火爆的公益活动随后也遭遇了画作为代笔、捐款用途不明等诸多质疑。

8 月 31 日，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成立仪式暨“慈善文化：传承与变革”圆桌研讨会在北京举办。该基金致力于筑造中国公益思想文化的建设、传承和推广平台，引领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建设。

9 月 4 日，民政部举行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开通仪式。截至 2019 年 8 月 5 日，通过慈善中国网，共可查到慈善组织信息数据 5864 条，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数据 1626 条。

9 月 5 日，第二个“中华慈善日”，阿里巴巴在京举办“95 公益周”发布会。发布会上，阿里巴巴发出“人人 3 小时、公益亿起来”倡议，呼吁每人每年捐出三小时践行公益。“95 公益周”期间，阿里巴巴与爱德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 11 家组织上线百个公益项目。

9 月 6 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幕，有 196 个缔约方代表团及相关国际组织、民间组



织代表、嘉宾及部分国家元首约 1400 人出席。这是该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大会期间，中国绿化基金会、阿拉善 SEE 基金会等分别主办多个主题的论坛、边会。

9 月 7 日，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条例》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法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公益慈善活动传教；此外，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财产和收入应当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不得用于分配。该条例于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9 月 7 日至 9 日，第三届腾讯“99 公益日”筹款超过 13 亿，再次刷新互联网募捐纪录。但比起巨额的筹款量，这一年对其“透明”与“公信”的质疑以及各类对“恶意套捐”、“骗捐”、“机器人刷单”等违规行为的质疑更受关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对“99 公益日”期间捐赠合规性进行核查后，启动第三方独立审计与核查，第一时间公布审计结果。

9 月 8 日，阿里巴巴 18 周年年会上，12 位阿里女性合伙人宣布成立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首期计划筹资 1 亿元，旨在为中国偏远贫困地区的母亲与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12 位女合伙人表示，不打算只做捐赠者，她们将全程参与基金会的日常运作。

9 月 14 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公开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驳“永光”谬论》，批评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8 月出版的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宣扬“公益商业化”颠覆了公益的本质。次日，徐永光发表公开文章《答复关心“康徐斗”的朋友》进行回应。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二光之争”。两位资深公益人针锋相对的观点引发公益领域内关于公益本质的大讨论，“公益市场化”



议题再度引发热议。

9月17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签署中国公益联合援非行动首个非洲国家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将援助8万美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援建一个社区综合减灾项目“博爱家园”；援助4万美元在该社区开展学生免费午餐项目，昱庭基金会资助2万美元在该社区资助开展免费厕所及厕纸项目。

9月27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汤计人道传播基金”成立暨首届“汤计博爱新闻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该基金和奖项由新华社高级记者汤计首倡发起、联合捐赠企业共同设立，旨在褒奖和传播人道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作品及新闻从业人员，救助因采写新闻报道等因公负伤致残或陷入困境的记者或媒体从业人员，鼓励社会力量关注和改善新闻从业人员群体生存现状。

10月3日，2017年卡内基慈善奖颁奖典礼在美国纽约举行，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翟美卿获奖。翟美卿是此次九位获奖慈善家中唯一来自中国的慈善家，也是中国内地首位卡内基慈善奖得主。卡内基慈善奖是全球慈善界的最高奖项，目前全球华人共有两位获得此奖，第一位是李嘉诚。

10月17日至20日，中国公益团队赴荷兰参加第29届IFC国际筹款人大会，并在大会上首次介绍中国筹款发展及现状。IFC国际筹款人大会是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筹款会议之一。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再次强调慈善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和价值。此外，报告还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



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11月8日,《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对社会组织信用信息进行了界定,并提出要建立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同时给出了列入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具体情形等。

11月11日,微信公众号“益碗FUN”发文质疑友成基金会在2017年“99公益日”期间与一家涉嫌传销的商业公司“云集微店”合作,是在为该公司“洗地”。13日,友成基金会发表《郑重声明》,称“该文章涉及友成基金会的大量内容和判断,与事实不符甚至违背事实”。该事件引起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评论认为,《慈善法》实施后,慈善组织在选择商业合作者时更须评估风险,勿因小失大。

11月16日至18日,以“新常态下的高校基金会工作”为主题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第十九次年会在北京召开。据报道,1999年中国高校基金会举行首次学术年会,当时高校基金会数量不足20家;但经过近20年发展,目前中国高校基金会总数已达537家,净资产超过300亿元人民币,超过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总量的50%;仅2016年,中国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就超过70亿元,公益支出超过50亿元。

11月22日至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在成都召开,主题为“新价值新生态”,这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转型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后的首次年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571家机构的918名嘉宾与会。其中,基金会197家,有近200名理事长和秘书长莅临现场。

11月,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宣布以88.4分完成SGS的全球NGO基准审核。这意味着该基金会成为通过SGS审核的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



来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SGS 是全球领先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已经为全球超过 310 家公益组织提供服务，并为一百多家具有 CSR 职责的捐赠者和政府提供了基准评估，服务遍及 54 个国家和地区。

12 月 3 日，首届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 2017 社会影响力投资峰会在深圳举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合蜂群物联网公益基金会，邀请全球公益金融与社会影响力投资领袖及金融、公益、实业等跨界代表，以“让投资成为向善的力量”为主题，探讨了普惠金融、金融扶贫、战略慈善、社会影响力投资、养老产业等内容。

12 月 7 日，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规定慈善组织为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开展投资活动时，不得用于直接投资股票、人身保险产品等 12 种活动，投资权益类和固定收益类等资产，单个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不超过慈善组织总资产的 30%。中国慈善财产在保值增值方面表现乏力，目前中国 90% 的慈善基金会的钱都是存在银行，做投资理财的慈善基金会的平均收益率不到 4%。

12 月 10 日，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于 2016 年创立的全球最大的教育单项奖“一丹奖”在香港举行首届颁奖典礼。首届“一丹教育发展奖”由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始人兼总监薇奇·科尔波特获得；“一丹教育研究奖”则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获得。“一丹奖”由 25 亿港元的独立慈善信托运作及管理，每位得奖人将获颁一枚纯金奖牌及 3000 万港元奖励。

12 月 23 日，“同一天生日”网络公开募捐活动引发质疑和争议。24 日晚，深圳市民政局着手调查。25 日晚，深圳市民政局再次发布声明，称 25 日上午调查组约谈了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责令其立即停止“同一天生日”网络募捐活动，并向深圳市民政局提交募捐活动情况报告、与



相关企业的合作协议及所有公开发布的文件资料。26 日，深圳市民政局决定对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立案调查。28 日，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官方网站发布《“同一天生日”筹款项目处理进展说明》，称将安排专门的工作组为需要退款的人进行退款。围绕此网络公开募捐事件的法律问题，仍在持续。

■ 2018 年

1 月 5 日，自然之友等十余 NGO 联署倡议：叫停民生银行 ME 计划等票选公益项目做法。据介绍，民生银行 ME 计划把项目公众投票数作为直接影响能否获得资助的重要考评指标。公开信认为，资源方和公益组织关系理应平等，这种资助评估形式让公益从业者疲于拉票，让公益行业成为相互对抗比拼媒体资本的造势场，让本应服务弱势群体和公共利益的公益组织，成为服务资助方企业品牌和公共关系的媒介。

1 月 9 日，“冰花男孩”、留守儿童王福满头顶风霜上学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引发一波社会捐赠，并出现了一些质疑。“冰花男孩”也引起社会各界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困境的反思，马云发表的“孩子根本就不应该走读制，就应该是寄宿制，中国必须大力推动寄宿制”、“贫困乡村里 100 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应该并掉”等言论引发了不少争议。

1 月 10 日，全国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管理系统学习和贯彻“2018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召开。

1 月 14 日，因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发表题为《在跨界流行的时代恪守边界——“同一天生日”筹款事件法律问题分析》的文章，“同一天生日”是否违反网络募捐法律规定的争论在渐趋平静之后风波又起。同年 6 月 15 日，深圳市民政局发布公告，因未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没有对发布的募捐信息进行审核，



发布的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活动发起方爱佑未来基金会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改正。

1月23日，“2016-2017年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十大成果”发布。十大成果分别是：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平台、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全国志愿服务信息平台、公益网校、中国好公益平台、益库网站、普华永道慈善组织透明自测系统、《基金会工作人员素质能力库1.0》《一线儿童工作者能力素养与行为准则指南》《慈善规范实务指南》《资助系列指南》。

1月24日，民政部《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公布并实施。《办法》规定，登记管理机关依据社会组织未依法履行义务或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有关信用信息，建立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社会组织的信用信息、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开；登记管理机关通过互联网向社会提供查询渠道。

1月29日，中国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在京启动。该网络不是独立的法人注册机构，依托基金会中心网运行；由阿拉善SEE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之友基金会10家基金会联合发起创立。

1月30日，海仓慈善基金会被民政部撤销登记。海仓慈善基金会由山西前首富、海鑫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兆会于2008年捐资5000万元创立，曾被视为中国家族基金会的代表；但在2014年海鑫集团申请破产后，该基金会就消无声息了。

2月7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非营利组织申请免税资格认定的条件、申请时所需报送的材料、被取消资格的情形等，并规定非营利组织免税优



惠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

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意见》明确公开内容包括决策信息、管理和服务信息、执行和结果信息；且明确提出，要以社会高度关注、公益色彩浓厚的社会公益事业为重点，着力推进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灾害事故救援、公共文化体育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2月1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月11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40个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建立慈善捐赠领域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其中明确了列入慈善领域黑名单的5种情形，列明了24条由不同部门牵头实施的惩戒措施。

2月28日，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通、圆通、申通、天天、百世快递、韵达等主要快递公司共同发布“中国绿色物流研发资助计划”。该计划面向全社会征集绿色解决方案，社会各界组织、环保人士可以登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相关页面进行项目申报，围绕绿色包裹、绿色配送、绿色回收、绿色智能等方面进行科技创新。

2月下旬，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按照共建共治共享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强调：“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3月1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在办理相关业务中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通知》。《通知》提出，自2018年6月30日起，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会等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停止使用，改为使用由相关登记管理部门（或批准单位、归口管理单位）制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

3月1日，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公益空间之一鸿芷咖啡馆，由于入不敷出、经营难以持续发出关闭公告，引发慈善界对公共空间、公益创业、社会企业困局、公益行业生态等多个重要议题的热烈讨论。

4月1日，岭南公益慈善学院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由广州市民政局指导，广州岭南教育集团、灵山慈善基金会、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人人公益等多家机构联合倡议发起，由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筹集资金，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社合作”模式。据介绍，这是广东省首家全日制公益慈善学院，并于2018年开始面向广东省招生。

4月1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乌干达启动“幸福家园——难民自立与社区融合”难民项目。此项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捐赠100万美元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在乌干达落地实施项目的民间组织。2016年7月，南苏丹再次爆发国内战争，造成大量的难民涌入邻国乌干达，联合国难民署（UNHCR）估计在乌干达的南苏丹难



民和寻求庇护者达到 140 万人。

4 月 10 日，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分别发布了区域慈善指数体系和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体系。同年 9 月 12 日，基于《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体系（广州地区试行版）》的广州市慈善组织透明度排行榜发布，这被认为是全国首个基于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地方慈善组织透明度排行榜。

4 月 15 日，“西北大学慈善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慈善理论研究、慈善人才培养和慈善政策咨询的科研教学机构。前身是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

4 月 18 日，“爱佑公益 VC 支持计划”项目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该计划先导基金 4000 万元，针对环保、教育两大领域成立 2 支基金。其中，环保基金资助了北京市朝阳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教育基金资助了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

4 月 18 日，联合国环境署和微博在北京联合发起中国地球卫士青年奖。地球卫士青年奖旨在表彰对改善环境创造积极影响的青年人，为其创造更多参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和机遇。这是联合国环境署设立的首个国家奖项。

4 月 27 日，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平台由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瑞士通用公证行、普华永道中国、德勤中国 9 家机构共同发起。此外，敦和基金会作为重要的资助方，参与了平台共商、共创、共建的过程。这是中国首个面向公益行业评估提供专业支持的平台。



5月3日，“中意对话 益见未来”中意慈善论坛圆桌会议在北京召开。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T0China Hub 科学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与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等中意两国慈善家、政治家、学者，就中意两国慈善的发展、未来的合作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5月4日，河北武安民政局联合有关部门，以连续四年未参加年检为由，对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予以取缔。次日，被誉为“爱心妈妈”的该村创办人李利娟又因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被刑事拘留。

5月4日，河南三岁癌症女童王凤雅离世。在其离世前后，志愿者质疑家属“消极治疗”，并试图在家属手中“抢人”的行为引发社会关注，但后来警方调查发现，王凤雅家属在治疗过程中并无明显不当。王凤雅事件不是孤例，近年来，由个人求助引发的社会爱心风波层出不穷，其反映出的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当前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伦理模糊的现状。

5月8日，《2018 胡润慈善榜》第十五年发布。榜单显示，100名中国大陆最慷慨慈善家总捐赠额比去年上升33%，达到218亿元；上榜门槛比去年提高6.7%，达到1600万元；美的创始人何享健以75亿捐赠额成为中国首善。

5月9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这是中国首个由网络社会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联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由10家全国性网络社会组织发起成立，国家网信办作为业务主管单位。首批会员单位总共300家网络社会组织，包括全国性网络社会组织23家、地方网络社会组织277家。

5月12日，200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该次地震救灾中的社会行动被认为开启中国慈善的新纪元。2018年，社会各界纷纷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纪



念活动，例如，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的“社会力量救灾论坛”等等。这些纪念活动从多个维度对中国慈善 2008 年以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5 月 14 日，民政部发布《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的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应当自通知下发之日起，要求正在办理成立登记和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尽快按照通知有关要求，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写入章程。

5 月 16 日，《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发布。《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社会组织已达 80.3 万个，较 2016 年的 70.2 万个增加 10.1 万个，是历年来增长数量最多的一年。2017 年增速较 2016 年增长 14.3%，创下近 10 年的新高。

5 月 23 日，第二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公布。它们分别是美团公益、滴滴公益、善源公益、融 e 购公益、水滴公益、苏宁公益、帮帮公益、易宝公益和中国社会扶贫网。2016 年以来，民政部先后遴选指定两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并接受了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基金会中心网的退出申请；当前，共有 20 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可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信息发布服务。据统计，2017 年全年，首批 12 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合计募集善款超 25.8 亿元人民币。

5 月 26 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民政部彩票公益金民政部项目立项和评审办法》《民政部彩票公益金项目督查办法》《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民政部彩票公益金服务和其他类项目管理办法》《民政部彩票公益金培训项目管理办法》等六个办法。

5 月 29 日，“百乡工程”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社科院举行。中国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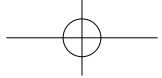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院社会学研究所支持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打造政、产、学、研、社、农六界集群的公共服务平台，共同探索乡村振兴之路。会议提出，乡村振兴是自现在起到未来几十年间中国最大的公益。

6月7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敦煌石窟研究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和新华公益联合发起的“数字供养人”项目上线。用户在腾讯乐捐平台捐赠0.9元就可以成为“数字供养人”；该项目的筹集款项则将用于把莫高窟55窟的壁画以300dpi的高分辨率图像永久保存，将数字化成果应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展示。2017年年底，腾讯和敦煌研究院发布战略合作，启动“数字丝路”计划，“数字供养人”是双方合作的首次落地成果。

6月12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中加强名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认真查处社会组织未规范使用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名称的行为，特别是要重点查处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规以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在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开展活动未冠有所属社会组织名称等行为。

6月14日，习近平致信“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大会”，希望中国福利会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继续致力于缔造未来的事业，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发展，为培养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6月20日，“2008-2018中国公益十年高峰会暨2018年《慈善蓝皮书》发布会”在山东尼山举办。该高峰会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和第一财经联合主办，来自公益慈善界、商界、学界、媒体界和政府等各界代表近百人参与，以“从历史到未来”为主题，共同回顾中国公益慈善过去十年



的发展历程，并深度探讨中国公益慈善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方向与战略路径。会上发布了《慈善蓝皮书（2018）》以及“2008-2018 中国公益慈善十年十大热点”。

6月21日，《民政部受理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代表机构业务主管单位申请工作办法（试行）》印发。《办法（试行）》规定了民政部受理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代表机构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需提交的材料及答复期限等。

6月23日，俄罗斯世界杯举行期间，泰国一支少年足球队13名成员陷入洞穴中，包括中国救援队在内的多支国际救援队驰援这场泰国近年来最大规模搜救行动。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的6名洞穴救援专家和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5名救援人员携带设备先后飞抵泰国参与此次救援行动。

7月3日，“谁是绝对贫困终结后的穷人？”南都观察2018夏季论坛在京举办。在论坛上，围绕“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什么是贫困？谁是穷人？如何扶贫？”等问题，与会专家围绕贫困的标准与特征、扶贫战略和政策、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7月10日，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会）主办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服务网络平台（GBIF）“十亿数据”暨中国濒危物种（中华穿山甲、白鱀豚）信息录入成果发布会在京举办。GBIF是目前全球数据量最大和影响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服务网络，成立于2001年。

7月10日，田家炳基金会官方网站发布《田家炳博士讣告》，备受尊敬的田家炳博士于当天上午辞世，享年99岁。24年前，田家炳博士成立“田家炳基金会”，累计捐资10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



7月13日，民政部发布《民政部直管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明确提出，民政部直管社会组织应当按规定向民政部报告换届会议、调整负责人、举办或承办参与人员200人以上或开支50万元以上的活动、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部领导参加活动或会议、开展军民融合或以国家战略为主题的活动、开展民族宗教或公益诉讼等活动、申办和承办国际或涉港澳台的活动等重大事项，并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报告工作。

7月16日，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发布《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PO-GDP，简N-GDP）的概念，用以测度一定时期内法人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0.37%。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组织增加值即使与发展中国家同行相比，也还有不小差距，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太吻合，说明社会力量的经济能力需要继续得到国家政策杠杆的针对性支持。

7月17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以下简称WISE）在官网上宣布，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一村一园计划”（One Village One Preschool，英文简称OVOP）荣获2018年度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成为自该奖项创办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WISE Awards）由卡塔尔教育科学与社会发展基金会发起，是一个旨在鼓励和倡导世界范围内教育创新实践的国际性大奖，被BBC等国际主流媒体誉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

7月18日，首届“阿里巴巴公益电影月”在北京启动。电影月计划在北京、呼和浩特、杭州、上海、重庆、成都等城市的热门影院免费放映阿里公益短片及国际知名公益题材电影，旨在让“走进电影院，用心看一部公益电影”成为人人参与公益的新方式。



7月21日，网络文章《疫苗之王》迅速传播，引发社会与政府极大关注；次日，国家药监局通报称，责令问题疫苗企业长春长生生物公司停产，立案调查，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飞行检查。而在“疫苗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媒体记者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多款疫苗曾获得“年度全国制药行业十大名牌产品”，而经核查，颁发上述奖项的中国制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行业管理协会均未在民政部登记。

7月下旬起，舆论陆续曝光了多起公益慈善界知名人士涉嫌性骚扰事件，造成恶劣的行业与社会影响，引发了中国慈善界关于行业伦理以及性别友好机制建设的大讨论。其中，8月8日，超过40家机构的代表共同参与了在北京举办的“公益慈善界共建性别友好机制讨论会”，以集体发声的方式作出了建设性行动。

8月2日，民政部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共接收社会捐款754.2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25.0亿元，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729.2亿元；全年有1716.4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5395.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6.2万个，比上年增长8.4%，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86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2%。

8月3日，民政部发布把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合而为一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该意见稿发布后，引发慈善业界实践者、专家、学者等的广泛关注和纷纷议论。一些专家指出，《草案》无论从宏观的立法依据、依法指导思想、法律框架和具体的制度建构、条文表述，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认真对待这个社会组织治理领域的重要法规的立法，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适当延长立法周期，不宜匆忙出台。

8月6日，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办法》共26条，



突出了对慈善组织财产活动和公开募捐的信息公开，并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在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本办法规定的基本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等七项信息，且应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办法》于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8月7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对韩学臣（原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理事长、法定代表人）等人集资诈骗、职务侵占二审刑事裁定书，维持一审判决。韩学臣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4年1月，韩学臣向民政部申请设立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在韩学臣的操作下，基金会近3000万元的资金通过虚假的公益项目，被转到韩学臣自己手中。

8月19日，有网友公开发文，从项目业绩、项目管理、项目财务、个人作风等多个方面，对黑土麦田及其联合发起人兼首席执行官、“2018爱佑创新公益领袖”秦玥飞提出质疑，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相关质疑多次提到黑土麦田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在腾讯“99公益日”上发起众筹一事。

8月28日，自然之友起诉水电站建设威胁濒危绿孔雀生存境况的“绿孔雀公益诉讼案”正式开庭审理。这是全国首例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它再次将物种保护和水电开发的矛盾推向前台，被认为是民间环保公益组织以法律手段介入问题核心的又一典型案例。2017年3月，自然之友、野性中国、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家民间环保公益组织联名向环保部发出紧急建议函，建议暂停红河流域水电项目，挽救濒危物种绿孔雀最后完整栖息地，由此开始了一场“绿孔雀保卫战”。

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百分之三十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

9月5日，民政部召开慈善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发展经验，听取意见建议，引导慈善组织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作用。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参加会议并围绕扶贫攻坚、网络慈善、内部治理、信息公开四个方面分别介绍了经验。

9月10日，民政部印发《“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行动方案（2018-2020年）》。《行动方案》针对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事业发展信息化基础薄弱、信息公开不广泛、互联网服务不充分等问题，提出未来三年民政部将着力推动“互联网+社会组织治理”、“互联网+专业社会工作”、“互联网+志愿服务”、“互联网+慈善募捐”。

9月10日起，《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同年10月9日。这是中国首次制定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相关规定。《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以宗教名义开展募捐，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发起设立的慈善组织在互联网上开展慈善募捐，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规定。

9月21日，深圳市递爱福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在深圳举行。该基金会被认为是中国首家捐赠者服务类基金会。资料显示，“捐赠者服务基金”一词起源于美国的 Donor Advised Fund（简称 DAF），是一种帮助捐赠人开设专属慈善账户、享受税收优惠、捐赠人在捐赠财产的投资和捐助方面享有建议权的捐赠模式。该模式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已发展较为成熟，具有



捐赠门槛低、服务专业化、捐赠策略化、管理便捷化、投资多元化等优势。

9月26日，大型纪录片《慈善的力量》新闻发布暨公益慈善文化沙龙在北京举行。《慈善的力量》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探索现今慈善事业的整体运行机制、发展趋势和社会化扩展方式的电视纪录片，将慈善从事业的高度进行理性分析展示，探讨慈善事业在市场环境下运行与发展的规律，强调慈善应是社会上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并以此推动慈善事业向宽度与深度发展。该纪录片由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资助。

10月8日，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豁免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及“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披露，同时《收购报告书》及券商顾问报告和律所法律意见书也面向社会公告。至此，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的设立工作全部完成。这一慈善信托的初始信托财产是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财产规模超过60亿元。这使得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

10月16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强化对社会服务机构的登记审查，要求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出台以及民政部关于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分类标准和具体办法下发之前，各地要从严从紧把握社会服务机构直接登记申请，稳妥审慎探索；此外，还提出要落实双重管理、强化综合监管、开展登记管理自查自纠工作等。

10月17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慈善医疗救助活动监管的通知》。《通知》提出，针对近期个别医疗机构、企业或者个人通过慈善组织设立“爱心基金”，以慈善医疗救助名义开展的非法营利活动，将对登记的慈善组织开展的以公益、慈善、救助为名，涉及医疗、卫生、健康的活动进行全面排查，并依法坚决查处；同时，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加强对专项基金的管理监督、并加强对相同、相似问题的研判和监管。



10月19日，中国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联合签署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和《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首批发起自律的三家平台委托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独立组建日常工作团队，并邀请相关专家组建独立的专家评议委员会。

10月20日，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非营利性研究型高校西湖大学在杭州成立，被教育部称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先河”。西湖大学是社会捐赠办大学的新典型，从2015年初到2018年10月，已有超过400位捐赠者向西湖大学捐款，马化腾、叶庆均、杨国强、张磊、陈一丹、敦和基金会等均为西湖大学的创始捐赠者。

10月22日，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捐赠仪式，未来10年内将向清华大学捐资22亿元人民币，支持清华大学的基础前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这是目前为止国内高校获得的最大单笔校友捐赠（碧桂园集团副主席杨惠妍及其丈夫均为清华校友）。2018年，多家高校也获得亿元级的校园捐赠，包括泰和集团董事长黄其森向福州大学捐赠3亿元、腾讯创始人团队马化腾等四人联合向深圳大学捐赠3.5亿元、李彦宏夫妇与百度公司向北京大学捐赠6.6亿元、刘强东夫妇向清华大学捐赠2亿元、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向武汉科技大学捐赠1亿元，等等。

10月22日至23日，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举办，共有220位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荷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与业界代表参加。

10月25日，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十周年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次高



峰论坛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是中国首次围绕社会组织评估举办的专题会议，被认为在社会组织评估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10月29日，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中国好公益平台发布“首个公益产品规模化标准”，并就标准向业内征求意见。在发布该标准的同时，中国好公益平台提出将对平台上符合标准的优质公益产品授予“益次方”商标。益次方，即“益的n次方”，意为公益产品成效和影响力的成倍扩大，并逐步实现服务规模、成效和影响力的指数级增长；被授予益次方商标标志着公益产品已经取得了规模化的显著成果，成为行业示范和标杆。

10月30日，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可以投资与禁止投资的领域。其中，慈善组织禁止投资的领域共有八个，分别是：直接买卖股票；直接购买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投资人身保险产品；以投资名义向个人、企业提供借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可能使本组织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违背本组织宗旨、可能损害信誉的投资；非法集资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11月2日，针对社会人士对免费午餐专项基金审计报告的质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官网公示了对免费午餐专项基金7年的专项审计结果。结果显示，公众质疑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与免费午餐专项基金历年审计报告披露的收支结余差异确实存在，基金会管理工作和信息披露存在疏漏和不足，而造成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基金会与基金的收支统计和披露口径不一致；但是，审计也表明，免费午餐专项基金的资金是安全、完整的，没有发现违法违规问题。

11月6日，中国在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议。审议前夕，中国有关社会组织和团体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人权进步”和“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与人权进步”两场



主题边会，分享中国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推动人权事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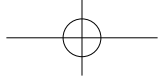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11月6日，中和农信官网宣布，中和农信近日完成6亿元C轮融资。该融资由世界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TPG（德太投资）旗下的影响力投资基金“睿思基金”（The Rise Fund）领投，宁波仁达普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跟投。中和农信被认为是中国影响力投资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

11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将规范发展民办园，遏制民办园的过度逐利行为。

11月9日，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振宁、毛淑德、何华武、邬贺铨、李培根、陈十一、张益唐、施一公、高文、谢克昌、程泰宁、谢晓亮、潘建伟等科学家，共同发起设立“科学探索奖”。据悉，腾讯基金会将投入1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资助该奖项；按照计划，科学探索奖每年将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方面的九大领域，遴选出5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每位获奖者将连续5年、每年获得6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11月12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公布《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2月7日，围绕该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承办的第二十八期基金会双月沙龙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应把社会组织也作为国家对外援助实施主体之一，并在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人员出境、国际志愿服务发育等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

11月16日，2018中国企业慈善公益500强名单在京发布。该名单显



示，2018 年内，中国企业慈善公益 500 强在慈善公益方面的总投入超过 275 亿元，与 2017 年相比增幅达到 23.8%。但是，该名单也反映出，2018 年入围该名单的中国企业 500 强数量不增反降，由 2017 年的 235 家下降到 181 家，而且企业间的公益慈善投入的“两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11 月 20 日，在中国慈善文化论坛（2018）上，“2018 年中国慈善文化年度事件”及其点评发布，引起慈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这是中国慈善界第一次从慈善文化的维度对行业进行年度发展观察。

11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8 年会在苏州举行。这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第十次年会，主题是“拾年——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除了主论坛，还举办了“基金会如何引领行业共同价值”等 16 场议题丰富的平行论坛。

11 月 23 日，2018 澜湄国家民间组织论坛在昆明开幕。此次论坛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主办、云南省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承办、昆明东盟国际贸易投资促进会协办，由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提供支持；其主题是“澜湄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旨在推动澜湄区域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澜湄地区的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11 月 30 日，民政部印发《公开募捐违法案件管辖规定（试行）》。《规定（试行）》所称公开募捐违法案件，包括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在公开募捐活动中发生的违法案件，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违法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案件，以及社会组织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违法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案件。

11 月 30 日，在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以全票通过。同日，《江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草案）》公布。

12月7日，由40多家机构参与起草讨论的《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实操指引手册（征求意见稿）》发布。该手册制作涵盖60余个由真实案例改编的本土化实操指引，是中国慈善界直面近年来频繁曝光的筹款乱象，凝聚筹款伦理共识，倡导筹款伦理建设，跨界联合多元力量以付诸行动的一次重要尝试。

12月12日，2018中基透明指数FTI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12月6日，参与本次评分的基金会共计5694家，FTI平均分50.08分；其中，有151家基金会获得满分，六成来自北京、广东、浙江和上海四地。

12月14日，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人民法院对“善心汇”创办人张天明等10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一审宣判，判处被告人张天明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一亿元；对本案其他9名被告人分别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一年六个月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罚金，同时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善心汇”以“扶贫互助”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培训、宣传等多种方式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截至案发，参与“善心汇”传销活动的人员共598万余人，涉案金额1046亿余元。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获得先锋称号的100人中，涵盖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公益慈善领域杰出人士代表，包括何享健、李彦宏、马云、马化腾、霍英东、曾宪梓、马万祺等。

12月18日，首届全球慈善家论坛暨慈善家之夜在北京举行。全球慈善家论坛（The Global Philanthropists Forum）是慈善家联盟



(Philanthropists Circle of China, 简称“PCC”)的开放性年度盛事,定位为汇聚全球慈善领袖的思想平台。慈善家联盟由 36 位中国商界领袖和公益界领军人物共同发起成立,并于 2018 年 9 月 5 日举行成立仪式暨创始理事大会,由马云、马化腾担任联席荣誉主席;沈国军担任理事长,牛根生和沈南鹏担任副理事长。

12 月 21 日,《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通过,将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按照“严管”慈善募捐和“方便”慈善捐赠的总体思路,对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进行规范;同时,着眼于增强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透明度、公信力,规定了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息的义务和具体内容。

12 月 28 日,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爱佑慈善基金会共同发布《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蓝皮书在对评估工作动态跟踪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成为社会组织领域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参考依据。

■ 2019 年

1 月 2 日,中信信托携手深圳市递爱福公益基金会共同完成国内首单 DAF 捐赠,开启公益慈善新实践。DAF,又称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advised fund),是一种帮助捐赠人开设专属慈善账户、享受税收优惠、捐赠人在捐赠财产的投资和捐助方面享有建议权的基金,1931 年起源于美国。本次捐赠合作方深圳市递爱福公益基金会是中国首家正式批准成立的捐赠者服务基金会,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及深圳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三方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

1 月 3 日,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到,今明两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等成为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全国 80 多万家社会组织而言，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1 月 3 日，2019 年全国民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披露了 2018 年公益慈善行业的相关数据。截至 2018 年底，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社会组织 81 万个，认定慈善组织 5289 个（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1454 个）；全国共有 44 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注册的志愿者人数超过 1 亿人、全年各类慈善捐赠达到 754.2 亿元。

1 月 14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八届中国慈善年会。本届年会以“慈善与改革开放”为主题，以慈善与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果回顾、脱贫攻坚的成就为重点，展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趋势，积极回应行业对深化改革的强烈呼声，振奋行业信心。

1 月 15 日，《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及“2018 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十强”、“2018 家族慈善新生代十杰”在京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个系统分析“家族慈善基金会”的智库研究成果。按照综合评价得分，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老牛基金会、泛海公益基金会、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深圳市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等依次位列“家族慈善基金会十强”。

1 月 25 日，民政部官网发布《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对“三定”方案进行正式发布。民政部内设机构中，新设立的“养老服务司”、“儿童福利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引发关切。

2 月 26 日上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与阿里巴巴公益共同主办的“来自熊猫国度的礼物——国际爱心包裹项目（Panda Pack Project）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该项目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助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项具体行动，旨在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有需求的小学生的基本学习条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搭建友谊之桥。

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多处涉及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包括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多个领域。报告明确提出，要“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3月7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2018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慈善信托新设立的信托财产达11.01亿元，同比增长84.42%；新设立慈善信托79单，同比增长75.56%。2018年共有17个省份的民政部门进行过慈善信托备案，浙江省备案的慈善信托财产8.69亿元，规模名列第一。

3月8日，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签订合作备忘录，旨在促进双方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合作，这是爱德基金会首次与联合国机构签订合作备忘录。

3月9日，民政部召开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再动员会。160余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负责人代表和70余家全国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会议。

3月15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和阿里巴巴董事局副主席蔡崇信的关联实体和慈善基金会签订售股计划。自协议签订之后的今年4月开始，按照事先确定的条款，在12个月内马云将出售最多2140万股，在今年年底前蔡崇信将出售最多920万股，用于达成公益慈善承诺及一般财富规划。以阿里当前股价180美元计算，此次马云和蔡崇信一共减持3060万股，价值达55亿美元（约370亿元人民币）。

3月20日，为发挥减税政策对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支持作用，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1月1日至2022年底，对企业用于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贫捐赠支出，按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对符合条件的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

3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与意大利共和国总理孔特的共同见证下，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欧阳乔正式就中意慈善论坛长效合作机制签署“关于设立中意慈善论坛的谅解备忘录”，对共同推动中意慈善领域未来合作达成共识。该备忘录成为两国领导人见证下19个合作签约项目中唯一一个来自慈善领域的合作，这也是两国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慈善交流活动。

3月25日，联合国民间组织委员会主席布鲁斯·纳提兹先生在北京访问了中国扶贫基金会，高度赞赏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希望加强联合国民间组织与中国在扶贫方面的合作。

3月30日至31日，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联合主办、浙江省红石慈善基金会协办的“第三届世界公益学论坛”在浙江乌镇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公益与乡村振兴”。

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着火点在海拔3800米左右，地形复杂、坡陡谷深，交通、通讯不便。截至4月4日15时，这次森林火灾确认遇难31人。“3.30凉山森林火灾”发生后，多家社会组织展开积极行动，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发起筹款为“3·30救火英雄”募捐，善款用于慰问英雄家属及提升当地防减灾能力。

4月2日，新华社权威发布：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革弊鼎新、攻坚克难，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有力服务



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习近平指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

4月4日，民政部发布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2018年度考核情况。以腾讯公益平台为代表的20家指定平台，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2.1万条，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超过84.6亿人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26.8%，指尖公益成为新的潮流。

4月11日，北京的王女士支付宝里收到一张50元的个人捐赠电子发票。这是全国第一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将电子发票送达个人。这张发票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出。此次应用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携手支付宝，打造了“捐赠到账－填写开票信息－开具发票－推送至发票管家小程序”的捐赠电子发票全流程场景。

4月12日，《2019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此次报告由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和南都基金会共同发起。报告显示，中国社会企业数量为1684家，其中有34.8%的社会企业申请过并成功融资，只有20.5%的社会企业实现盈余。

4月中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开出首张电子捐赠票据。捐赠者完成捐赠填写相关票据信息后，就可以收到一张和纸质捐赠票据同等效力的电子捐赠票据。

4月27日，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在北京开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70名中外民间组织机构代表围绕“深化务实合作、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4月28日，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榜在京发布。本届中国慈善



榜共上榜 274 位慈善家、744 家慈善企业，2018 年合计捐赠 276.3303 亿元，捐赠额再创历史新高，且较去年涨幅达 50%。

5 月 8 日，民政部印发《关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有关要求的通知》文件。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应当及时要求本级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在章程中明确载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相关表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章程核准时应当加强审查。

5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在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中，包含由民政部负责起草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5 月 16 日，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广州举办。峰会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各慈善组织共同召开，汇集知名企业、慈善组织、高校学府、主流媒体等近 3000 位热心公益人士共聚一堂。峰会期间，跨界公益领袖们共议“理性公益、科技向善”。

5 月 17 日，首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研讨会在广东韶关召开，来自全国的 41 个社会组织的 65 位机构代表参加本次研讨会。参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的工作涵盖产业发展、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环保、社区养老、社区卫生与健康等领域。

5 月 21 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 胡润慈善榜》。今年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十六年发布该榜，并首次将港澳台慈善家统计在内。年度总捐赠额比去年下降 3% 至 225 亿元；平均捐赠额比去年下降 10% 至 2 亿元；上榜门槛比去年提高 25%，达到 2000 万元。万向接班人 48 岁的鲁伟鼎为纪念其父亲鲁冠球，捐出其持有的万向三农全部股权，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市值 49.6 亿元，首次成为中国首善。



6月14日，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在内的十部门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凡是符合条件并纳入改革范围的行业协会商会，都要与行政机关脱钩，加快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国家发改委文件还显示，目前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共有795家，其中已脱钩422家，拟脱钩373家。

6月15日，东西方慈善论坛·中澳圆桌会议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圆满闭幕。本次会议由东西方慈善论坛、中国国际公益学院、澳大利亚慈善协会、桥爱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澳大利亚善引力社会创新孵化器、国际创善联盟协办。中澳两国参会嘉宾就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公益教育与儿童保护、艺术慈善与文化保护、医疗健康与养老科技等领域展开深度讨论并促成了系列联合行动意向。

6月18日，经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通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已被批准授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特别咨商地位”（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6月19日，“孟想非凡·慈善先行信托”在京成立，受托人为中信信托，这是国内首单“慈善先行信托”，也是中信信托在家族信托这一领域的新打法。作为该信托的委托人、《非诚勿扰》主持人、素有“国民月老”之称的孟非，也开启了国内明星慈善的一种新模式。

6月27日，以“问道孔孟之乡：基金会如何发挥杠杆效应”为主题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山东峰会在新泰举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关心基金会发展的近250家机构、400余人与会。

6月28日，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据悉，2018年仅全国性社会组织和省



级社会组织扶贫项目涉及的资金就超过 500 亿元，大量的资金投入必须得到规范。《通知》提出了严禁利用扶贫名义牟利、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的新要求。

7 月 1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蓝皮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报告》指出，2018 年社会组织增速下滑。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81.6 万个，与 2017 年的 76.2 万个相比，总量增长 5.4 万个，增速为 7.1%，增速下降约 1.3%。蓝皮书指出，当前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之严为近二十年所未有，登记从严、监管从严、处罚从严已经成为政策主基调。在严格管理的政策基调下，我国社会组织增速明显下滑，开始从追求数量增长的高速度发展阶段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

7 月 13 日，郭美美 5 年刑期已满，重获自由。靠着网络炫富一夜成名的郭美美五年前因开设赌场罪而获刑。在为期 5 年的服刑期间，郭美美未曾减刑。2011 年 6 月，郭美美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引发舆论对于红十字会捐款去向问题的质疑。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多次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郭美美事件与红十字会无关，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因此严重受挫。

7 月 16 日，民政部对外公布《民政部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被列入计划的有 2 件法律，6 件行政法规，3 件部门规章。《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被列为 6 件行政法规的第一件，责任单位是政策法规司、社会组织管理局。制定进度描述为“拟提请国务院审议”。这不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第一次被列入民政部立法工作计划。《民政部 2018 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就曾提出力争年内完成《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

7 月 19 日，第 68 届联合国公益组织大会（四川成都）预备会议在成



都召开。本次会议是将于今年 8 月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召开的第 68 届联合国公益组织大会的预备会议之一，其主题为“人道与公益：青年力量与可持续发展”。来自国内和国际人道与公益方面 100 余名与会代表参加会议，在大会主题下，共同探讨公益组织在推进实现 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独特作用。

7 月 23 日（纽约当地时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举行管理会议，授予中国慈善联合会“特别咨商地位”（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特别咨商地位”是非政府组织取得国际承认的重要标志，意味着中慈联可以向联合国提交行业报告和数据，更有效地参与国际慈善议题，促进不同慈善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7 月 26 日，首次落地广州的 2019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圆满落幕，汇集了国内外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公益慈善及社会创新事业的政府机构、企业代表、公益组织及媒体人员等各方责任伙伴。商道纵横联合南方周末发布《中国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观察报告》，探究家族企业公益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探索相应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

8 月 27 日，11 家深圳知名公益基金会联合倡议发起的全国首个公益慈善基金会行业组织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以不忘初心再先行、牢记使命当示范的信心、决心和行动，为基金发展赋能，为公益慈善汇流，为脱贫攻坚助力。

8 月 29 日，民政部发布消息透露，日前，民政部持续发力、重拳出击，会同网信、电信主管部门，在新浪、腾讯公司支持下，依法关停第二批 14 家非法社会组织的网站及其微信、微博、博客等新媒体账号。民政部已实现实时归集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信息，截至目前，共登记社会组织 83.6 万个。民政部提醒社会公众在参与有关组织活动时，注意核查该组织的合法身份。



8月30日，基金会论坛·陕西峰会在西安市隆重举行，峰会以“从独善其身走向价值共创：基金会的蝶变之路”为主题，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基金会从业者共同探讨基金会的规范治理和社会价值发挥。本次峰会吸引了陕西省及全国各地关心基金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200多家机构、300余人与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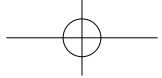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9月1日，《慈善法》实施已满三周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京发布“中国《慈善法》2018年实施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全国登记认定1349家慈善组织，其中229家获得公开募捐资格，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总筹款额超过31.7亿元，慈善信托备案新增87单，合同金额累计19.8亿元。

9月1日，以“行之有效·社区慈善十年实践”为主题的社区基金会峰会在广州举行，本次峰会由禾平台和12家社区基金会联合举办。

9月5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共同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于第四个“中华慈善日”到来之际在深圳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湾区慈善·美好生活”。

9月9日，2019年“99公益日”温暖落幕。4800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17.83亿元，超过2500家企业配捐3.07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3.9999亿元配捐，本次“99公益日”总共募得善款达到了24.9亿元。

9月9日，阿里主导的“95公益周”迎来收官。首创“公益无界”新玩法，阿里经济体首次近30个事业群联动加入。“95公益周”累计带动超18亿人次公益行动，相当于平均每天带动公益行动近2亿人次，线下130个城市的500多个志愿服务组织共同打造了一场线下“公益双十一”。



9月9日，在第五个“99公益日”到来之际，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基金会中心网共同发布《2018中国体育公益白皮书》。截至2019年3月6日，全国共有7201家基金会，其中，体育基金会有74家，仅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1%。自1986年10月30日第一家体育基金会——四川省发展职工体育基金会成立以来，全国体育基金会数量保持缓慢增加。

9月10日，马云在生日当天，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职务，将重心专项从事教育、公益等活动。在宣布将卸任后公布的名片中，马云的大部分头衔都与公益相关：阿里巴巴一号公益志愿者，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主席，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乡村教师代言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席主席，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和联合国世界妇女峰会联席会议联合主席等。

9月20日至22日，第七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举办。本届慈展会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聚焦脱贫攻坚的一次公益慈善行业盛会。展会主题是“聚焦脱贫攻坚，共创美好生活”。

9月26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行“满足人民新期待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主题新闻发布会。70年来，民政部门围绕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有力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其中，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各类社会组织达到83.5万个。慈善事业从自发分散向法治化、组织化、规范化转变，2018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额超过900亿元。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收录标准：

- 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层面对基金会行业有重大影响的宏观事件
- 在公益慈善行业内比较有知名度的行业 / 组织 / 项目 / 人物事件
- 呈现基金会行业发展未来趋势、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事件 / 议题 / 问题（其影响力可能在事件发生的若干年后表现出来）
- 反映基金会行业重大积弊或挑战的事件 / 议题 / 问题

参考书籍：

- 《慈善蓝皮书》系列（2009-2019），杨团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基金会绿皮书》系列（2011-2017），基金会中心网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国社会组织（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版
-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系列（2011-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刘忠祥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国基金会发展解析》，葛道顺、商玉生、杨团、马昕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 《中国散财之道——现代公益基金会发展报告》，刘京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5月版
-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中下，周秋光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 《中国慈善史纲》，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著，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9月版
- 《中国慈善简史》，周秋光、曾桂林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版
- 《基金会导论》，陶传进、刘忠祥编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3月版



参考网站 / 自媒体：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
- 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 中国公益研究院
- 中国发展简报
- 公益慈善周刊
- 善达舆情
- 基金会中心网
- 正文内提及的基金会官方网站

致谢：

徐会坛 董 炜 王秀娟
温舰洋 洪 峰 任广阔
史成斌 问 津 周 帅

扫描下载电子版





比肩而立于思想之端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思想集后记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后文简称“基金会论坛”）缘于一批有志于追求卓越、行业发展的基金会对行业的主动担当和责任。2008年，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等7家基金会联合发起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通过举办年会等活动，加强中国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中国基金会和公益行业的发展。2016年，经过对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入讨论，正式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并于次年6月将其秘书处注册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2018年，以“拾年——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为主题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8年会在苏州召开。至此，基金会论坛已经持续走过了十余个年头。回望40余家基金会携手同行的来时之路，在对这个领域拳拳之心的感召下，在这些思想和智慧的指引下，随踵而至的理想主义者们无一不是用行动推动基金会行业发展，建设中国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努力使基金会行业成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力量。

我们接过前人肩膀之上的重担和责任，继续负重向着未来走去。然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故此，站在环境和前景都不确定的当下，我们沉下心，怀着敬畏，拜读十年以来的精粹观点、经验、分析和期待，前行者们当时为着理想和激情奋斗的身影不断跃入眼前。而现在，喧嚣的热闹似乎掩盖了太多本应的价值和追求，只要我们稍微一脱身于这个环境，就可能感受到迷失和无所适从。正因为这样，找寻初心，重拾价值和理想就显得特别必要。

如果说十年来基金会论坛是在组织会议，这只看到了表象，其实更加贴切地说我们是在通过观点的交流和碰撞而共创思想。我们相信，不管世道如何纷繁复杂，也不管人们如何自顾不暇，回首之时，唯有思想会一直散发着永恒的光辉。这便是这本思想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于这本沉甸甸的思想集，我们只是做了简单梳理的工作。要特别感谢这十年来在基金会论坛发展的道路中亲力亲为的支持和参与者们，包括收录在思想集中的嘉宾：是你们，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是你们，提供了行业不断发展的方向；是你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了公益慈善事业的进步。也要感谢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和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你们看到了这本思想集的价值，并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资助我们前期整理和印刷等相关费用，并鼓励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修订和完善，为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感恩你们的担当和眼光，以及给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还要感谢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这些宝贵发言的基金会论坛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你们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确认、认真细致地校对，尽可能让嘉宾们的思想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你们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憧憬实现的可能。

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这本思想集的内容，并将其付诸于出版，让更多的人能够共飨思想之硕果。除此之外，我们继续坚持每年举办基金会领域的年度大会，不断在会议产出内容的质量和成果的转化上投入和精进，以期更加有效地推动行业建设；我们还启动了基金会档案馆、基金会从业者成长体系研发等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希望借助大家的经验、智慧，为行业发展积累更多的知识和人才。我们真诚地期待有更多的伙伴像这些思想者们一样加入到这个行列，比肩而立，共同承担起对行业的责任，一道推动基金会行业的发展！

谭红波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



关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以下简称“基金会论坛”）由具有 8 年历史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转型升级而来，是在当时的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and 有志于追求卓越、行业发展的基金会自愿发起设立的非正式网络平台。基金会论坛坚持开放共享、追求卓越，旨在加强中国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中国基金会和公益行业的发展。经过十年的发展，基金会论坛现已成为公益行业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之一。

历史发展 >>>

2004 年 6 月 1 日《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发展。为了互相学习，2007 年 12 月 25 日，10 多家非公募基金会联合举办非公募基金会沙龙。经过交流形成共识，决定联合发起“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08 年 11 月 20 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来自 10 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确认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八家公益组织为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成员。2016 年，经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第三次会议深入讨论，决定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 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基业长青”），基业长青是基金会论坛的品牌所有者，负责协调整合资源落实基金会论坛年会及相关行业交流活动以及推动建设行业生态的工作。

组委会 >>>

基金会论坛设立组委会，秉持公开、民主、参与原则，负责组织管理基金会论坛年会及相关行业交流活动，并按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包括 2008 年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指导下，参与发起基金会论坛的机构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在内，历年来，共有近 40 家具有行业担当和广泛影响力的基金会先后成为基金会论坛组委会成员。基金会论坛组委会设 1-2 家轮值主席，轮值主席是当年组委会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9 年组委会成员

轮值主席：



年度盛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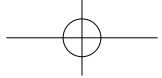
年度盛会是基金会论坛从 2009 年开始，每年下半年择地连续举办的基金会领域的行业大会，千人规模，吸引政府、企业、高校、媒体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关注，在公益慈善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

截至 2018 年底，基金会论坛曾经分别以基金会的“成长中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项目成效”，“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与社会责任”，“财劲其用、追求卓越”，“理性公益、多元发展——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和定位”，“超越·共识——大互联时代非公募基金会的转型与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人才素养与根基培力”，“新格局新想象”，“新价值新生态”，“拾年：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等为主题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成都、苏州等城市举办 10 场年度盛会。年度盛会旨在聚合政治、商业、媒体、高校、慈善等领域资源，搭建交流平台，探讨行业议题，回应社会问题，促进基金会行业的沟通与合作，扩大基金会的影响，助力行业发展。

【愿景】基金会行业成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力量

【使命】建设中国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

【价值观】立足行业视角、倡导多元开放、追求卓越发展



资助机构简介



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

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由恒申控股集团捐资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是福建省 5A 级基金会；荣获“先进党支部”称号；荣获福州市“巾帼文明岗”称号；中基透明指数 FTI 全国并列第一。基金会紧密结合集团“创造美好生活奇迹”的企业文化，关注福建省内妇女群体、乡村学校教育、公益行业支持三个领域。

基金会成立以来主要开展的项目有：“贫困母亲帮扶计划”、“巾帼新生”服务女性公益项目支持计划、“姐妹乡伴”乡村妇女自组织支持计划、“力恒”模范小学公益项目；并联合其他在地基金会共同开发“福建公益沙龙”、“束脩计划”、“香草计划”、“福建公益传播班”等助力公益行业发展的项目。

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 2018 年加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9 年轮值主席。



hs-foundation.com



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

成立于 2016 年 7 月，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000 万元发起成立，并于 2017 年 5 月被北京市民政局认定为慈善组织，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中国商业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的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以中国商业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为核心项目，将通过支持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数据库建设、专业博物馆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式对中国商业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出版、展示；同时关注重大灾害、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及其他公益项目。



yonyoufoundation.org

